# 武大校友通讯

2022 年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主　　编　邓小梅
执行主编　陈东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新才　邓小梅　叶琳娜
刘赛男　肖艾芹　吴根友
张发林　陈东华　陈　纲
胡庆方　涂上飙　涂险峰
潘迎春

# 目　　录

## 卷首语

以高质量发展的新成就拥抱百卅华年
——武汉大学2023年新年献词
…… 校党委书记　韩进　校长　张平文(3)

## 特别报道

武汉大学2022年十大新闻 ……（9）
武汉大学2022年度新闻人物：宗福邦
——甘守冷门绝学　铸就传世巨著 ……（16）

## 珞珈风采

资深教授陈伟：潜心简牍研究　守护“中国记忆” ……（21）
资深教授汪信砚：笃求真赓续学统　勤传道培育英才 ……（26）
资深教授陈传夫：赓续中华文化　推动数字创新 ……（31）
校友阮立平：选好人生赛道　争做第一　走远路 ……（37）

校友刘金成：做世界上最好的锂电池 …… (39)
校友雷军：穿越人生低谷的感悟 …… (43)
为冷门绝学的传承而砥砺前行 …… (55)
“启明星一号”背后的学生军 …… (64)

## 珞珈记忆

我与王世杰王星拱两位校长 …… 严耕望(71)
李达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 涂上飙(77)
我的乐山老师 …… 吴鲁芹(80)
我的老师苏雪林教授 …… 孙法理(87)
我眼中的许海兰教授 …… 熊性淑(91)
李约瑟与国立武汉大学 …… 赵基明(99)
遗传学家余先觉 …… 周荣家(109)
我的老师邵象华院士 …… 张兴钤(114)
刘绪贻先生在 1949 …… 胡　耀(120)
回忆父亲姚琢之教授 …… 姚立宁(128)
永远的老师曾启贤先生 …… 朱　玲(133)
怀念张兴钤院士 …… 张晴丹(139)
我的老师谢鉴衡院士 …… 韦直林(144)
回忆父亲陶振宇先生 …… 陶翠慧(148)
深切缅怀恩师王昆杰先生 …… 李建成(154)
深切怀念茆智院士 …… 刘　萍　雷　宇(162)
回忆导师李金荣教授 …… 赵怡芳(171)
追忆恩师余能斌教授 …… 吕忠梅(176)
我的老师黄钊先生 …… 沈壮海(181)

潜心学术锐意著史的学术大师冯天瑜先生 …… 明海英(187)
古远清学长与《珞珈山文艺》 …… 赵致真(197)
同窗好友忆志希 …… 玲子整理(202)
纪念恩师卢烈红先生 …… 金桂桃(211)
测绘世界文化遗产的朱宜萱先生 …… 张 帆(215)
罗以澄教授与武大新闻学院 …… 刘建明(221)
我眼中的马费成老师 …… 王晓光(229)
“标本唐”家族的守望者 …… 刘 丹(234)
我与老师夏军院士 …… 左其亭(241)
难忘珞珈岁月 …… 陈长畅(245)
我所了解的农业生物系 …… 杨学仁(250)
20 世纪 60 年代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 张 珉(255)
1970 年代的图书馆学系 …… 汪晶晶(263)
在珞珈山求学的日子 …… 宾晓华(270)
大学读书亦读人 …… 杨厚君(276)
珞珈山下岁月有痕 …… 骆 毅(279)
毛泽东主席视察武汉大学始末 …… 秦 然(282)

## 珞珈文苑

清平乐·忆珞珈樱 …… 陈 卫(291)
早樱 …… 陈 勇(292)
望海潮·武汉大学 …… 丁海军(293)
母亲——武汉 …… 范 江(294)
一剪梅·鲲鹏广场 …… 刘怀俊(297)
七绝·信息管理学院九十华诞感怀 …… 李金庆(298)
秋之珞珈 …… 李立屏(299)

在珞珈山 …… 李　浔(300)
最美校园，我们的武大 …… 李远谋(302)
白头堪比樱花秀 …… 龙育群(305)
观展感赋 …… 陶佳珞(306)
总有一朵红梅，是你的心事 …… 吴根友(307)
浣溪沙 …… 王新才(309)
美人樱 …… 张彩雯(310)
珞樱朵朵我愿做其中一朵 …… 陈　敏(312)
爱情原本的样子 …… 珈　言(314)
《武大校友通讯》捐订名录
——(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 (316)
征订征稿启示 …… (317)
关于进行校友信息系统认证的通知 …… (319)

# 卷首语

# 以高质量发展的新成就拥抱百卅华年

## ——武汉大学2023年新年献词

校党委书记　韩进　校长　张平文

日月其迈，岁律更新。走过129年峥嵘岁月的武汉大学，告别了2022年最后一场余晖，迎着2023年的第一缕曙光迈向百卅华年。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如约向全校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海内外校友，以及所有关心支持武汉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

2022年，我们一路砥砺前行，一路开拓奋进。在这极不平凡的一年中，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全校上下同心协力，在共克时艰中坚定步伐。站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重大历史节点，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回应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推动各项事业向更高水平跃升。

回顾2022，我们以学生为本，立德树人。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构建一流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加强教育教学内涵建设，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关注学生诉求，开通“珞珈直通车”互动平台及时回应“急难愁盼”问题；在疫情危急时刻迅速行动，用心用情全力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加大基础设施新建改造力度，打造更加优质的育人环境。

回顾2022，我们广纳人才，争创一流。学校牢牢抓住人才这一兴校强校的第一资源，大力推进新时代人才强校战略，高水平人才增长持续保持领先全国高校的“加速度”，有力带动了学科水平和学术竞争力的显著提升，学校连续两年入选全球十大自然指数上

升最快机构，20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新一轮学科评估 A+ 和 A 类学科数量均有提升。

回顾 2022，我们拔尖筑峰，绵延文脉。学校牵头 24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两大基础科学中心正式启动，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率先突破，在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和新文科建设，咨政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稳居全国高校前列。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同心者，不以日月为限。在此，我们向全体师生员工和校友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武大每一个高光时刻都凝聚着你们的心血和汗水！同时，也向所有关心武大发展的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武大每一项办学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你们的支持与奉献！

2023 年，武汉大学将迎来建校 130 周年华诞。这是学校承前启后的里程碑，也是学校在新的历史时期再创辉煌的新起点。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深刻认识高校作为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和人才强国“三大战略”重要交会点的独特作用，切实增强使命感与责任感，坚持高质量发展主题，着力提高发展效能、增强发展动能、健全发展体系，以“双一流”建设的新成就拥抱武大百卅华年。

展望 2023，我们要通过完善治理系统提升学校高质量发展效能。要面向国家战略、聚焦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以推进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为抓手完善管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营造人才脱颖而出、人人担当作为的良好发展环境，以高效能治理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展望 2023，我们要通过优势引领着力增强学校高质量发展动能。要充分发挥学校综合性学科生态优势，发挥高水平人才高增速、人才培养高质量的显著优势，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汇聚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和人文大师，培养一大批引领时代的卓越人才。

展望 2023，我们要通过整体布局不断健全学校高质量发展体系。要加强统筹规划、一体部署，以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为中心、高水平人才队伍体系为引擎、高水平科研创新体系和学科生态

体系为支撑、高品质办学保障体系为基石，构建各系统互相作用、有机统一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展望2023，我们更需要全体武大人勠力同心、携手并进。一直以来，武大校友以拳拳之心和赤子情怀鼎力支持学校建设，是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的力量源泉和坚实依靠。在母校130周年华诞将要到来之际，我们诚邀海内外校友共赴百卅之约，希望大家常回“珈”看看！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党的二十大已吹响奋进新征程、成就新伟业的号角，让我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开辟新赛道、谱写新篇章，以高质量发展的新成就向130周年校庆献礼！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2023年1月1日）

# 特别报道

# 武汉大学2022年十大新闻

## 一、武汉大学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教育部党组、湖北省委工作要求，武汉大学党委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

及时跟进导学，全员行动掀热潮。学校第一时间组织收听收看，校院两级领导先学领学，开展多轮党员骨干热议，党委常委会和中心组学习会研究制定学校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方案，召开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大会，举办中层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培训班……扎实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全员覆盖。

结合学科深学，做强宣讲增实效。学校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开展宣讲，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融入专业课教育教学，推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11月9日，中央宣讲团成员、湖北省委书记王蒙徽走进武汉大学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发挥人文社科优势和多学科交叉融合优势，线上线下举行60余场学术研讨会；建成理论宣讲专家库，成立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在全国高校率先开通专题网，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创新理论在师生心中“生根发芽”。

联系实际笃学，着眼未来启新程。学校研究制定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战略谋划调研报告”及具体举措，出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系列文件，积极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办学治校体系、融入高质量发展体系、融入服务国家战略体系，更好地发挥战略支撑作用。12 月 28 日，《光明日报》“红船初心”整版聚焦我校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走深走实。

## 二、学校启动实施新一轮“双一流”建设，11 个学科入选国家第二轮“双一流”名单

2022 年，学校启动实施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进一步推进学科布局优化调整，切实增强主干学科和学科主流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以高水平学科引领带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2 月，国家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我校 11 个学科入选：理论经济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学、地球物理学、生物学、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口腔医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4 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召开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推进会，我校作为高校代表发言，介绍经验做法。学校连续两年入选全球十大自然指数上升最快机构，20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

## 三、首颗学生自研微纳卫星“启明星一号”成功发射，学生团队科技创新活动再获突破

2 月，满载着珞珈学子航天梦的“启明星一号”微纳卫星顺利起航，进入预定轨道。“启明星”是一颗以在校学生为研发主体的微纳卫星，是遥感学科教学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举措，为国内外遥感相关专业师生提供了开放式的太空教学实验平台。

在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我校获 1 项特等奖，这也是我校在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类领域首次获得特等奖。在 2022 年中国青年创新创业交流营暨第九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我校获金奖

2 项、铜奖 3 项。在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华为杯)全国总决赛中，我校获 7 项全国一等奖，位居全国第一。在第六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2022-CURPC)国际线上决赛中，我校夺得“水下声学通信解码与辨识智能算法”赛道冠军。在“华为杯”第一届中国研究生网络安全创新大赛中，我校获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3 项，一等奖获奖数居全国高校首位。在“华为杯”第四届中国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中，我校获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总分第一名，一等奖获奖数与总获奖数均位列参赛高校榜首。

## 四、“万里千年——敦煌石窟考古特展”成为高校现象级展览

5 月 18 日至 12 月 12 日，由武汉大学、敦煌研究院共同举办的大型展览“万里千年——敦煌石窟考古特展”在万林艺术博物馆展出，展品共计 168 件(套)，其中珍贵文物 30 余件，多数展品为第一次离开莫高窟。该展览共接待了 24 万人次参观，创下自开馆以来单场展览接待量的最高纪录，在全国高校博物馆的办展历史中也堪称“现象级”。

## 五、新增 27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新增数全国第二，教育部“教育这十年”采访团走进武大，聚焦我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成效

6 月，教育部公布 2021 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我校 27 个专业获批，获批数居全国第二、全省第一。学校坚持以课堂为中心、以专业建设为龙头，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本科生源质量较去年显著提升。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2022 版)》中，我校位居全国第四；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 2021 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分析报告中，我校位列全国第三、综合类高校第一；入选教育部首批“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建设单位；入选首批国家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建设高

校名单。

6月，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湖北日报、湖北卫视等中央和省级媒体记者组成的教育部“教育这十年”记者团走进武汉大学，以集中采访座谈会和实地参观访谈形式，聚焦十年来我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成效。在教育部举行的“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采访活动的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我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经验。

## 六、学校召开人才工作大会，更高质量推进新时代人才强校战略，师德典范的榜样引领作用彰显

6月，武汉大学引进人才入职仪式在樱顶老图书馆隆重举行，62名引进人才正式成为珞珈山新主人。学校通过隆重举办入职仪式、荣休仪式、教师节表彰大会等举措，大力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

7月，武汉大学召开人才工作大会，全面系统总结了学校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以来的成效、经验和存在的不足，立足学校人才队伍建设的阶段特征提出新时代“人才强校十条”，为更高质量推进实施新时代人才强校战略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师德典范的榜样引领作用彰显。6月，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本科生辅导员杨荷获得全国“十佳标兵”荣誉称号，为湖北高校唯一获奖者；武汉大学“国家高程基准现代化”团队入选共青团中央公布的“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名单，是湖北省唯一获表彰集体。9月，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宗福邦入选2022“荆楚好老师”特别奖，程功臻教授荣获湖北省“楚天园丁奖”，古籍整理研究所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冷门绝学传承团队，我校退休教授孙洪所在的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教师团队入选“最美教师团队”。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获“中国医师奖”，人民医院心血管医院教授江洪牵头完成的“自主神经调控防治恶性心律失常的策略创新与临床转化”项目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中南医院王行环教授临床试验团队成果入选《中国2021年度重要医学进展》。李敏、袁荃获得

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颁发的第 17 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刘胜、何克清入选 2022 年武汉“最美科技工作者”，蓝柯、胡钦勇、黄建英、钟自彪、王颂获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系统“先进个人”表彰。

## 七、汪信砚、陈伟、陈传夫当选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持续繁荣发展

1 月，学校在樱顶老图书馆举行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聘任仪式，汪信砚、陈伟、陈传夫(依姓氏笔画为序)受聘为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11 月，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立项名单公布，我校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张杰教授领衔的“阳明学研究团队”《钱绪山学派、龙溪学派与近溪学派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入选，这是我校首次获批该项目。

12 月，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名单公布，我校获批 12 项，是继 2020 年之后获批立项数再次位居全国高校第二位。此外，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获批立项 30 项，1 篇智库报告被列为中央核心报告；获批研究阐释重大重点项目 6 项、中央马工程重大项目 1 项。

## 八、NSC 期刊刊登我校学者多篇研究成果，学校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3 月 3 日，*Nature*(《自然》)在线发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熊婧副主任医师为第一作者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首次揭示了卵泡刺激素是老年女性更易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原因。5 月 13 日，*Science* 在线发表高等研究院阴国印教授课题组利用“金属迁移”策略推动环己烷合成取得的新突破，第一署名单位、第一通讯作者、第一作者均为武汉大学。6 月 1 日，*Nature* 在线发表药学院刘天罡教授团队联合日本东京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团队，在天然产物生物合成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8 月 3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命科学学院、

泰康生命医学中心教授宋保亮实验室在 *Nature* 上发表论文，揭示促使胆固醇外排而降脂的新策略，武汉大学为唯一作者单位。11月22日，药学院教授高帅和普林斯顿大学原教授颜宁共同在 *Cell*（《细胞》）杂志发表药物调控钙离子通道的最新研究成果，高帅和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姚霞博士为共同第一作者，高帅和颜宁为共同通讯作者。12月7日，*Nature* 在线发表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生命科学学院严欢研究组在病毒受体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武汉大学为共同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

6月，科研公共服务条件平台正式揭牌运行，包括目前世界最先进的300kV冷冻透射电镜在内的43台高端设备投入使用，为高水平科研提供支撑条件。

12月，2022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评审立项工作接近尾声，我校牵头承担的24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获批立项。此外，本年度我校还有59个主持的课题和68个一般参与的课题获批。牵头项目、主持课题和一般参与课题共计获批国拨总经费5.77亿元。学校2022年获批牵头项目数量和经费均创新高，实现了项目数量、获批经费的跨越式增长。

## 九、学校开通“珞珈直通车”“珞珈回音壁”，深入开展“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民生实事重点工程稳步推进惠及广大师生

4月，“珞珈直通车”平台启动，是学校党委行政了解校情民意、解决学校师生员工合理诉求、倾听师生员工建议的互动服务平台，是深入推动师生员工急难愁盼问题得以有效解决的重要措施。从去年的流程优化、一网通办，到今年开通“珞珈直通车”“珞珈回音壁”等，学校不断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将师生为本落到实处。

5月31日，学校启动“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校领导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师生，着力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第一线发现问题，及时疏导，化解矛盾；在第一线倾听师生的愿望和呼声，为师生办实事、办好事；在第一线汲取师生的智

慧，总结经验，指导工作；在第一线解决问题、推进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为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动力。

自“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启动以来，学校全力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开展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一把手工程”，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为毕业生提供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完成了一批智慧教室、多媒体教室的新建和改造；文科综合实验大楼、双湖综合实验大楼、研究生教学科研大楼等一批教学科研重点基建项目顺利竣工；大学生体育活动中心项目竣工，松园操场及多个室外球场翻新，工学部 8 舍、文理学部湖滨 6 舍等宿舍维修改造完成；建成 8 个快递服务中心，实行校内公共巴士免费乘坐。对校徽及辅助图形进行优化升级，启用新的校园标识系统，制定校园景观升级总体方案，完成交通标识标牌更换改造。以师生为中心着力打造平安校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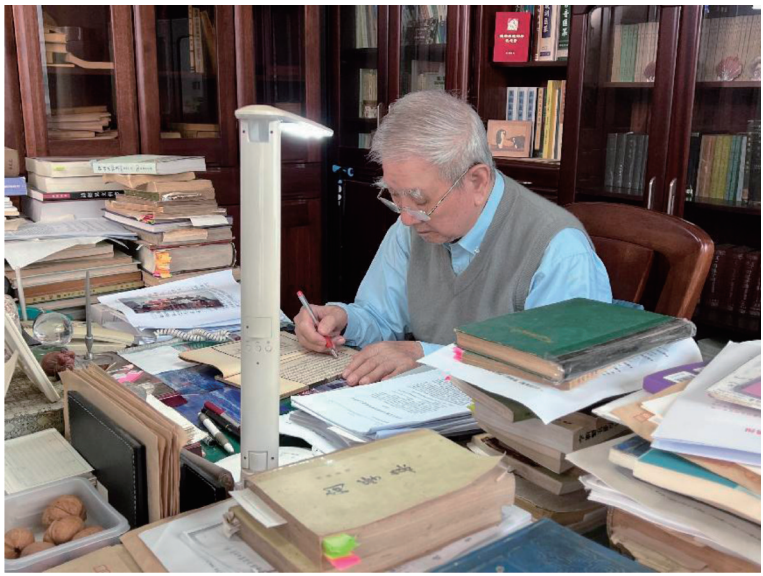
## 十、经中央批准，张平文同志任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同志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

12 月 28 日下午，在武汉大学教师干部视频会议上，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宣布了中央决定：张平文同志任武汉大学校长（副部长级）、党委副书记。张平文，1966 年 7 月出生，研究生，理学博士，中共党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1 月份，中央批准，窦贤康同志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12 月 5 日，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窦贤康任科学技术部党组成员，免去窦贤康的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2 年 12 月 31 日）

# 武汉大学 2022 年度新闻人物：宗福邦

## ——甘守冷门绝学　铸就传世巨著



宗福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他在武汉大学任教 60 年，埋首丹铅，为往圣续绝学；打造团队，致力于学术薪传；以身作则，耄耋之年仍志存问道，学问不辍。自 1975 年以来，他一直献身于国家古籍整理研究事业和大型团队科研攻关，曾作为编委参编

《汉语大字典》，主编《中华大典·音韵分典》；带领团队历时35个春秋完成2600万字的《故训汇纂》《古音汇纂》编撰，留下传世巨著；培养了一批学术实力强、甘于奉献的优秀学者，入选教育部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他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荆楚社科名家”、湖北省优秀教师、“荆楚好老师”特别奖等荣誉。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2022年12月31日）

# 珞珈风采

# 资深教授陈伟：潜心简牍研究 守护“中国记忆”

陈伟，1954 年 3 月生，湖北黄梅人，简牍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1978 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 年毕业留校任教。1987 年师从石泉先生在职学习，1992 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历史学会会长、中文集刊《简帛》主编、英文期刊 *Bamboo and Silk* 两主编之一、简帛网主编。

## 长期专注简牍研究，切实推进文本复原和内涵解读

中国古代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简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就考古所见，简牍主要流行于战国、秦汉以至魏晋时期，大致上承甲骨文和金文，下启纸质的写本和刻本文献，在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脉络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学术价值，是中国出土文献中的重要门类、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珍品，为探索古代历史的发展轨迹和具体景像提供了珍贵而丰富的原始资料。

与甲骨文、金文相比，简牍的材料容易获取，制作和书写也比较简便，并且可以编连成册，承载卷帙浩繁的文献。不过，用竹片、木板制成的简牍容易损坏，书写的字迹常有脱落，编连简册的绳索出土时万不存一。这使简牍的整理异常艰难，必须通过释字、断读、缀合、编连等多个环节的缜密考订和反复推敲，才能在文本

复原和内涵解读上逐渐贴近古人书写的真相。几十年来，陈伟教授甘于寂寞，花费大量精力，对简牍图版逐字逐句推敲，并特别留意残断简牍的拼合和竹简之间原本次序的重建，在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等多批重要资料的识读和诠释方面，析疑解惑，攻坚克难，持续取得切实推进。1996年出版的《包山楚简初探》，是陈伟的第一部简牍学专著。李学勤先生撰写的序言指出："《包山楚简初探》的特点是，在详细考释竹简文字的基础上，对简文所体现的楚国制度作系统地考察分析。在文字、制度两方面，都提出了新颖的见解。……包山楚简的研究，无疑由这部书的出版划了一个新阶段。"吕静、井之口哲也等人介绍说："《包山楚简初探》一书问世后，立刻在日本引起了热烈的回响。日本学者认为陈氏的新释文达到了新的水平。"(《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会"介绍》，《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3期)陈伟对郭店楚简"杀"字和岳麓秦简"奔""威"等字的考释；对包山楚简131-139号简的重组和将郭店楚简《语丛一》31、97号简连读；把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苍梧县"解释为苍梧郡属县，进而根据攸县地望推断秦苍梧郡相当于汉长沙郡；证明秦汉简牍中的"居县"为当事人户籍所在之县，厘清了相关律令、文书的空间关系：这些成果得到学界普遍认同，成为简牍研究的经典案例。

在陈伟出版的著作中，有一本名为《燕说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他借用《韩非子》中的典故"郢书燕说"，在前言写道："出土于楚地的简牍，正可谓广义上的'郢书'。而我们这些读者，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很容易像燕相国一样对古人手笔做出有违原意的解读。……历史学者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但完全复原历史则是很难企及的目标。我们应该充分了解这一点，从而坚持不懈地努力，争取尽可能正确地解读古代文献，探求历史原貌。"在简牍研究之路上，陈伟教授始终怀着这样一种戒惧之心，探索前行。

## 连续主持重大项目，推动多批简牍整理、再整理

2003 年，教育部启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陈伟教授联手校内外十多位同行，争取到“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这一项目，对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九店楚简、曾侯乙墓竹简等 14 种业已系统刊布的简册进行系统的再整理。课题组与文物部门合作，搜集到早期拍摄的各种照片，并利用早稻田大学提供的红外成像系统，重新拍摄九店简、望山简、曾侯乙简，取得比常规照片更为清晰的竹简影像。在此基础上，吸收海内外同行的已有成果，融入课题组的研读心得，形成有普遍改进的简册释文和注释。

2008 年，楚简攻关项目以优秀等级结项，同年陈伟又获得第二个攻关项目“秦简牍的综合整理与研究”，对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周家台秦简、放马滩秦简等 20 世纪出土的 7 批秦简牍进行再整理。其时芝加哥大学捐赠的数字红外相机便携易用，课题组把收藏在武汉、北京、荆州、成都、兰州等地的 7 批简牍全部重新拍照，在释读方面有更多发现。项目在 2016 年再次以优秀等级结项。

这两个项目，都形成了系列的重要成果，得到海内外同行高度重视和广泛引述。《秦简牍合集》《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成为相关简牍目前最为可靠、便用的著录本，分别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和二等奖，并均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马克教授评论《秦简牍合集》说：“前所未有的高清晰度照片、在缀合编连调整及文字隶定上无可争辩的大步进展，具有非常高参考价值的注释……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体现了该领域的勃勃生机。”(T'oung Pao 102，1-3，2016)

2016 年，陈伟教授作为首席专家，开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云梦睡虎地 77 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整理与研究”。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睡虎地西汉简牍》8 卷本即将陆续刊布。

## 主导创建简帛研究中心，服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2005 年组建，2006 年被列为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学校、学院的支持下，陈伟教授身体力行，带领中心同事零基础创业，一步步做大做强。

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有四个方面：一是以简牍文字为主的战国秦汉文字研究；二是以简牍资料为主的战国秦汉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三是以简牍文献为主要着眼点的先秦、秦汉史研究；四是简帛图像的数字化与简帛文献的数据库建设。中心富有凝聚力和创造力，坚持简牍文本整理与多学科综合研究相互促进、传统治学方法与现代技术手段有机融合、本土学问与国际学界深度合作，形成显著的学术特色，是公认的简牍整理与研究重镇、简帛学科发展与国际交流的推动者和资料信息中心。

简帛研究中心现有专职教师 7 人。十多年来，致力于简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已圆满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 项，目前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 项、国家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工程项目“中华字库”工程分包项目 1 项，以及多个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推出《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秦简牍合集》《里耶秦简牍校释》《二年律令与奏谳书》《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等多种简牍整理、研究方面的重大成果，获得多项重要奖励。中心主办学术集刊《简帛》(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 2014 年开始连续被收录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2021 年获中国历史研究院首批学术性集刊资助。主办英文期刊 *Bamboo and Silk*(Brill 出版)，先后被收入 European Research Index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ERIH PLUS，欧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索引)、Web of Science 的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子集(ESCI，新兴资源引文索引资料库)、Scopus 引文数据库。主办简帛网，注重原创，长期持续更新，发表学术论文及研读札记 3000 多篇，被同行广为征引。中心与芝加哥大学顾立雅中心等单位合作，连续举办“中国简

帛学国际论坛”，成为各国同行交流互动的重要窗口。

中心创办以来，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硕士、博士毕业生。毕业的博士生有在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任教，有在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等文博单位从事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硕士生有多人考入海内外著名高校（如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攻读博士学位。中心还长年接收国内外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包括多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受新汉学计划资助的中外合作培养博士生。中心为“冷门绝学”的传承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9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 周年的贺信中指出：“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 周年贺信精神，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央宣传部等八部门共同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入选首批协同攻关创新平台。陈伟团队决心全力以赴，不负使命，把主持整理的睡虎地汉简、胡家草场汉简这两批新出土重要简牍的成果做成精品，为守护书写在竹片木板上的“中国记忆”做出新的贡献。

（原载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网站 2022 年 4 月 3 日，图片有删减）

# 资深教授汪信砚：笃求真赓续学统 勤传道培育英才

汪信砚，1961 年 9 月生，湖北麻城人，哲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1988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今。1993 年晋升教授，1995 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2007 年被评定为二级教授。现任哲学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第八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副秘书长、国家教材委员会思政专委会委员、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北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杂志社编委会委员等职。入选教育部、中宣部、中组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多项高层次人才计划。

## 奋力求真，赓续百年学术传统

“我之所以选择并始终能够满腔热情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深地吸引着我。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吸引我，则是由于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汪老师在谈及自己选择并矢志不渝地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原因时如是说。然而，汪老师走上哲学探索之路却有一定的偶然性。1979 年高考后，他因高中政治课教师一句“你的政治考分不错就报哲学

专业吧”的玩笑话，机缘巧合地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习。在哲学系度过四年时光后，他痴迷上了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科毕业后，他继续深造，于 1988 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至今。

在武汉大学第十一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颁奖典礼上，汪老师引用马克思的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对他而言，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由李达先生开创，并在汪老师的恩师——陶德麟先生的带领下不断取得新的建设成就。二位先生毕生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求解“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演绎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思想接力。在这种学术传统的熏陶下，汪老师以二位先生为楷模，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科研工作，赓续百年学术传统，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的理论维度，提出、倡导并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领军人物。

2016 年 12 月，由汪老师主编的《李达全集》(20 卷) 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文本整理和研究的一项空白，为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汪老师在一次学术访谈中说：“《李达全集》所展现的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他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他的治学方法和开拓精神、他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都堪称楷模，对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也是我们推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丰富思想养分。”

## 教书育人，做天底下最幸福的事

“陶先生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教育家，形成并践行了一套精辟而睿智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之道首在成人’‘为学之道首在立

志’‘为文之道首在晓畅’‘育才之道首在识才’的教育理念也成为我为师、为学、为文和育才的基本遵行。”从教 30 多年来，汪老师始终以陶先生的教育理念为根本遵循，勤于传道授业解惑，用求真务实的态度和博大包容的胸怀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几十年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中，就如何培养好学生而言，汪老师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成才须先成人，要做好学问须先学会做一个大写的人。作为研究生导师，汪老师不仅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优良学风和健全人格，强调要把做人与做学问统一起来。他曾指出：“大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的培养，绝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传授过程，而应该同时也是一种德性涵养和人格塑造过程。”基于这种理念，汪老师把“课程思政”融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过程之中，引导学生在学术问题的探讨中涵养德行、成人成才。

注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授课过程中，汪老师不只提倡一家之言，鼓励学生进行开放式研讨，教导学生敢于质疑权威、勇于创新。2019 级博士生黄丹阳回忆，她曾在课堂上指出一位学界权威论述上的漏洞，有的同学不以为然，但汪老师却给予了肯定，告诉大家不要盲从权威。汪老师还语重心长地寄语学生：“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不迷信书本和权威，敢于质疑成见，勇于提出新见，才能为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贡献。”

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汪老师针对学生的学术兴趣和专业背景，根据不同学生的基础理论掌握情况，给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对于硕士生新生，他会列出夯实基础的必读书单，并定期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适应情况。2016 级博士研究生程通专业基础扎实、学术发展前景大，汪老师鼓励他修习德语，开展经典文本研究。经过汪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推荐，该生先后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北京大学学报》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

授人以渔，培养学生养成正确的治学态度和掌握有效的治学方法。汪老师坚持每年为研究生开设论文写作课程，从论文选题到开题报告撰写，从谋篇布局到立论和论证，从写作技巧到写作规范，

都结合具体案例，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在上课过程中，汪老师反复强调，“对学术、学问要怀敬畏之心，要慎之又慎，对自己写的东西要仔细推敲，即使是细节上也要下大功夫”。他经常叮嘱自己指导的学生，要思考、琢磨他给出的论文修改意见，学会举一反三，只有这样，才能在论文写作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除了授课以外，汪老师每周安排固定的时间在办公室与学生交流，要么指导学生选题和写作，要么给学生修改文章，要么同学生聊天谈心，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身心健康，帮助学生克服困难，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汪老师常说：“看着自己精心培养的一批批学生不断成长、不断取得新成就，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迄今为止，他已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 52 名、博士研究生 53 名，他们有的已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有的在高等学校、党政机关、军队系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 “无用”之学，也有大用处、大价值

“哲学确实不能烤面包，但世界上并不是只有烤面包重要。就人之为人而言，还有比烤面包更为重要的东西。”在金钱至上、实用主义横行的时代，“哲学无用论”甚嚣尘上，而汪老师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确实不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那样能够为学生带来更多的“面包”，但人文学科也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汪老师从哲学高度对人文学科的意义和价值做了说明。他强调：“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人文学科的理论旨趣主要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回答‘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了探寻意义和价值、回应‘应如何’的问题。”当然，如果人文学科不以真理为基础，不能正确地回答“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那么，它必然也不可能对“应如何”的问题做出合理的解答，它所构建的意义和价值世界就必然是一种虚无缥缈、对现实社会生活没有任何规范意义的东西。就哲学而言，汪老师认为，学

习哲学可以培养人们的哲学思维；哲学思维不仅考察现实的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还建构和追寻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状态，不断拓展人的意义世界。

汪老师还十分重视哲学基础教育，亦对哲学专业的学生充满期待。对于初学哲学的同学和硕士生新生，不仅建议他们学习和掌握哲学史知识、认真阅读哲学史名著，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等，还嘱咐他们注意培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素养。汪老师认为，在学科高度细化和专业化的现代社会，综合性大学的哲学专业有独特优势，有利于培养从事哲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也有利于适应社会对具有较高哲学素养的人才的需要。不仅如此，他还倡议，大学应该普及哲学教育，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

汪老师常把经典意识、现实意识、问题意识、前沿意识挂在嘴边，鼓励青年学者要有长远的学术发展规划，确立稳定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并要有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原载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网站 2022 年 3 月 18 日，图片有删减)

# 资深教授陈传夫：赓续中华文化 推动数字创新

陈传夫，1962 年 5 月生，湖北广水人。1979 年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获文学学士、硕士，法学博士学位。1986 年留校任教，1993 年晋升教授，2022 年获聘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兼图书馆学科主编等职。获全国性荣誉表彰多项，入选国家人才称号(2009)。

“培养优秀人才，推进理论创新，服务国家需求，是一位教师最大的心愿，也是我工作的不竭动力。”怀着这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陈传夫教授把握学科前沿与学科方向，根植中华文化，奋力推动学科拥抱数字时代；他以立德树人为己任，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为理论创新献智慧，为学科繁茂洒汗水。

## 矢志求真理，探索无止境

陈传夫教授时常殷切地鼓励学生：“要珍惜学习时间，努力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要尝试解决关键问题，做真正高水平的研究。”这同样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坚信并坚持的理念。

他先后承担各类重要研究项目 30 余项，撰著《著作权概论》《高新技术与知识产权》《后 TRIPS 时代国际版权制度研究》《目录学教程》《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研究》《图书馆学研究进展》等多部

著作和研究论集。在《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中国软科学》、《光明日报》、C&RL、JOD、LISR、Aslib Pros 等国内外优秀出版物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著作与论文被 10 余个国家的学者广泛引用。他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发展理论、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理论，开辟信息资源知识产权新领域，探索理论构建的制度本体范式，形成了特有的学术风格。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等省部级一、二等奖，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首届国家教材建设奖先进个人等奖项。

陈传夫教授研究工作主要聚焦以下三个领域：

第一，图书馆发展基本理论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学科刚刚恢复、理论较薄弱。他通过研究几个世纪以来图书馆的变化特征，初步探索图书馆学科进化规律，预示了学科的新发展，开启探索之路。在彭斐章、黄宗忠、谢灼华等前辈的指导下，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网络化带来社会形态新变化，他及时关注公众信息获取的差异状态，发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若干利益冲突研究》等成果，引入公共利益理论，提出网络环境下维系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原则。2006 年，主编《数字时代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论丛》多卷丛书，发表系列成果，提出了图书馆融入社区、回归文化与教育价值等理论观点。与匹兹堡大学 Ron Larsen 教授合作主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与趋势》，国际下载超 25 万次。

21 世纪以来，全球信息化进一步加快，大数据、社交媒体、商业化信息服务崛起，哈佛大学丹顿馆长说图书馆发展进入“十字路口”。国际上出现“剧变论”等理论思潮。如何引导理论，促进理论创新，陈传夫教授提出“转型发展，守正创新”的理论方向。及时发表系列成果，深度分析国际思潮的原因，提出面向公共文化、公共获取等观点。提出面向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促进行业常态化转型发展模式，科学回答新时代图书馆发展方向这一重要命题，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被海内外权威机构广泛转载。研究成果也被国际期刊统计为“下载量最多的文章”，为图书馆在数字社会的

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参考。

第二，数字时代的知识产权问题。

1986 年，中国恢复 WTO 地位谈判，他敏锐预感到新技术环境下的知识产权问题将变得复杂与紧迫，这是我国过去从未遇到的新问题，并将影响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他及时编写内部交流资料，发表文章，警示行业重视知识产权问题，并推动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出版该领域早期著作《著作权概论》《高新技术与知识产权法》。他在而立之年报考法学专业，在著名国际法专家万鄂湘先生指导下研究国际知识产权法，出版《后 TRIPS 时代国际版权制度研究》《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研究》《图书馆发展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等著作，提出发展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等观点，推动有关知识产权政策完善，确保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健康发展。其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第三，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理论。

信息获取的成本与效率关乎公共利益。21 世纪初陈传夫教授在国家自科基金资助下，开始这一问题的探索，提出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的理论框架，关注信息资源获取效果、效率与成本协调问题。提出了对公共资助的成果信息实行开放存取、提高公共信息的权威性、防止知识产权对公共利益的损害等观点。在《中国软科学》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会议上连续发表研究成果。所提出的信息资源公共获取理论，强调了公众对信息资源获取的价值，揭示了公共获取的一般规律。提出的信息资源公共获取框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于构建数字政府、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社会建设，提升信息资源开放与共享，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在科研之路上，他将服务公共需要、人民立场、立足中国大地作为不懈的追求与原则。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一代代学人秉持结构要素本体的视角构建图书馆学理论框架，他从制度与社会方面考察，探索形成制度本体范式，发展了传统的理论体系，强调了文化价值。将社会公共利益理念引入，使理论更具有解释力与实践性。

## 倾心育桃李，才智献杏坛

陈传夫教授是一位“双肩挑”学者，长期在学院、学校教育管理岗位工作。始终坚持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陈老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起到了引领示范和传帮带作用。”武汉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吴丹教授说，“在他的带领下，学院一大批青年教师迅速成长起来，形成了稳定的人才梯队。”

他在学科建设上科学谋划、全身投入，带领师生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提升国际合作水平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他积极推动本学科领域发展合作，促进两岸学术交流与共识，推动建立图书情报专业学位制度，促进全国学科协调发展。他与国际组织和同行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关系，先后应邀到美国、法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地进行学术交流。他尊重人才培养规律，凝练出以问题为中心、面向任务的嵌入式教学方法，推进教学改革，探索出“三融合”教学模式，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所授课程获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指导的多名博士生获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全国优博论文提名奖和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文资助项目。

他瞄准国家需求与学科前沿，注重战略规划。提出“以重点学科为龙头，促进学科群协调发展”的建设思路。提倡“开拓创造、务实创业、引领创新”的发展理念，瞄准国际一流，创新学科建设机制。在一级学科学位授权、国家重点学科、新增学位授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等重要建设中，挥洒汗水，持之以恒。2009年我校成为国际顶尖信息学院联盟组织 iSchools 首个发展中国家成员，提高了学科的国际话语权，为学科领跑奠定了基础。

他多次组织全国同行和国际性学科建设研讨会，起草并推动签署系列合作文件，推动学界、行业、两岸交流与合作。组织全国同行科学论证，提出设立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的建议，获国家采纳，目

前全国已有 70 余所高校获得授权，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几十年来，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他都始终坚持给本科生授课，站在研究生培养一线。他注重教学理论与方法创新，承担“三全育人示范岗”项目，主讲的研究方法课获省课程思政精品课称号。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支持他们大胆探索，让学生全面发展。

注重队伍建设，重视老一辈学者的学术引领，加强青年人才培养。通过相关平台锻炼培养青年人才，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学院形成国家级核心课程教学团队。牵头成立国际合作机构，世界多所大学加盟，创新人才合作机制。

在管理工作中，尊重学科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教学管理规律。特别强调加强学生的创新精神、科学精神、国际视野与社会责任感培养。推动教师教学发展、学生担任课程助教、研究学分、优秀研究生延期资助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 坚守践初心，尽责担使命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陈传夫教授传承了老一辈学者的优良学术品格，始终坚持科学研究观，认为研究要扎根中国、放眼世界，既要“顶天立地”，更要能落地，回应国家重大现实需求。

注重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的紧密结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先后有多篇成果被中宣部《成果要报》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外参考采纳。研究成果在七部委联合建设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工程项目、南方电网等国家重要工程项目中得到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在政府信息公开、科技创新制度、科研诚信与学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立法中得到参考。组织百余名专家，完成数百万字百科条目编纂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积极开展研究，成果被有关部门采纳。

应邀在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巴黎十一大学、英东英吉利大学从事合作研究工作，与多个国际组织建立了良好学术交流关系；曾任国际图联（IFLA）教育委员会委员，推动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教育合作。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信息素养师培训项目(TTT)。担任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中美日三国科研论坛“信息获取小组”召集人。应邀到华盛顿大学为北美东亚研究图书馆馆长授课，培养他们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同与热爱，指导他们用好中国文献。2019 年 4 月受邀参加中欧领导人会晤配套活动，为《第四次中欧创新合作对话联合公报》做出了贡献，为后续中欧开放科学合作路线图专家级框架达成贡献了武大力量。

陈传夫教授在 40 余年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他尊古重今，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守护人，也是数字化转型的推动者。他为培养更多栋梁之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谋求人类命运福祉默默耕耘，笃行务实，砥砺前行。目前，他正在推动开放科学发展，推动科研与交流变革，促进公众对科学成果与文化的数字化获取与共享，促进开放创新生态建设。

(原载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网站 2022 年 4 月 2 日，内容及图片有增删)

# 校友阮立平：选好人生赛道　争做第一　走远路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能参加这个毕业盛典，看到同学们年轻而又有朝气的面庞以及热切的眼神，我感到很亲切、很感慨。38 年前我也和大家一样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走出了珞珈山。非常感谢母校，让我在大学四年中完成了人生的蜕变，也给了我开始新旅程的台阶和力量。

我 1984 年从武汉大学工程机械专业（当时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毕业，做了 11 年的工程师后开始创办公牛企业，一直到现在，有几点感想和心得在此和同学们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第一点，努力探寻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我们每个人都想做自己擅长的事，但却往往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擅长什么，只有通过不断尝试才能够找到。毕业分配的时候，班主任问我愿不愿意留校，我没有多考虑就谢绝了。因为在学校的这些年，我知道教书做学问不是我擅长的，于是去了一家研究所做工程师。做了几年后，我对工程师这个职业逐渐感到了乏味。正巧，1992 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国家开始大力鼓励经商办企业，在偶然参与其中后，我发现自己对此很有兴趣，于是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做了许多尝试。我先后卖过猪肝、贩过桃苗、生产过洗洁精等，直到最后接触到电源插座，才发现这是我最擅长的领域。一方面，因为我是工程师出身，设计是我的专长，对品牌也有一些感悟；另一方面，我的老家浙江慈溪当时是全国有名的插座集散地，聚集了几

百家小工厂，供应链配套非常齐全，于是就确立了将电源插座作为我新的职业方向。

第二点，要勇于挑战，敢做第一。

公司创立初期，我们根据当时插座行业小、散、乱，产品质量普遍低下的情况，大胆提出了做“用不坏的插座”、做行业第一的目标。通过对产品设计的一系列创新，并制定严格的质量标准，我们使用的产品质量标准遥遥领先于同行。产品一经推出就迅速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用了七年时间，产品销量就做到了全国第一。之后我们陆续进入的开关、led 照明、智能控制等领域也都是以做第一为目标，目前有的已经是第一，有的还在努力的路上。

第三点，专业专注，走远路。

自从确立了把电源插座作为我的职业方向、把做第一作为公牛的目标后，我就在这个领域扎下了根，一做就是 27 年。这期间，我们经受住了各种诱惑，也没有被各种热点和风口（如房地产、金融）等左右，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在产品、营销、品牌等方面做了许多变革和创新，引领了行业的发展方向，靠品质和品牌赢得了市场和消费者，把一家当时只有 5 个人的家庭小作坊发展成了拥有 1 万多名员工、年销售额超百亿的国内最大的民用电工及照明上市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都名列全国第一。我想，这就是专业专注、持之以恒、走远路的力量。

同学们，俗话说得好：“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专长。在这个变革的伟大时代，只要我们耐得住寂寞，兢兢业业努力寻找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并坚持不懈，走远路，我们就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成就。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人生旅途中一帆风顺，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阮立平校友在 2022 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2 年 6 月 22 日）

# 校友刘金成:做世界上最好的锂电池

他是一位掌舵千亿市值上市公司的博士企业家，也是武汉大学著名电化学家、“倡导恢复高考第一人”查全性院士门下的硕士研究生，一直怀揣着“做世界上最好的锂电池”的梦想。

近 10 年来，他领军的企业累计在家乡荆门投资上百亿元发展锂电产业，带动恩捷、新宙邦、科达利等多家锂电头部企业扎堆落户，“华中锂电之都”呼之欲出。

他，就是国内锂电行业巨头——亿纬锂能董事长刘金成。

近日，刘金成做客《湖北日报》，畅谈行业趋势、创业历程、发展愿景等。

## 谈锂电池技术：亿纬已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

“亿纬锂能的电池技术水平已经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刘金成说，亿纬锂能是一个提供锂电池全面解决方案的高科技公司，主要服务于智慧生活和新能源领域。

在动力电池的新技术方向上，亿纬做了全面研究，比如针对乘用车动力电池，将技术方向逐渐收敛为大型三元圆柱电池和叠片的磷酸铁锂电池，安全性高、经济性好，具有非常好的普及和发展前景。

除了做动力电池，亿纬锂能还做家用电表、水表、燃气表以及高速公路 ETC 所用的电池，多年来国内 ETC 系统的电源大多由亿纬提供，“每当我经过高速公路 ETC 收费通道的时候，就很兴奋，

因为 ETC 用的是我们的电池”。

自 2001 年创立起，亿纬锂能就提出“做世界上最好的锂电池”。刘金成认为，“最好”的含义包括性能最好、卖得最多。随着好几款产品达到上述目标，两年前亿纬锂能将愿景改为：“打造最具创造力的锂电池龙头企业，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建设最好的研发团队、建设更好条件的研究中心、打造 100 分的质量体系……锚定新目标，亿纬蹄疾步稳。

## 谈研发创：3100 名青年才俊汇聚亿纬

多年来，公司同事都习惯称刘金成为“刘工”。

“这样叫很亲切，叫‘刘总’我觉得好像不是叫我一样。”刘金成说，他多年前就是正高级工程师，不管是做公司管理还是做运营，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聚焦在技术环节。他还入选国家科创人才“万人计划”，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刘工”称谓的背后，是一家市值过千亿的创新型公司。持续的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正是亿纬高质量发展的命脉所在。“如果说董事长就是一个工程师的话，我觉得对整个年轻团队的影响力和感染力都会更好，让他们觉得我们是一路人，不是跟着老板打工，我们就是一个大的团队、一个有远大理想和追求的公司。”刘金成表示。

目前，亿纬锂能汇聚 3100 余名研发人员，硕士、博士学历者约占 60%，还拥有“锂电池关键技术与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锂电池研究基地。

“我跟同事们讲，你们大胆去做，做好了算你们的，做坏了算我的，因为真正好的创新方向，10 个中有 1 个能成功就不错了。”刘金成说，搞研发要有耐心，要耐得住寂寞。在研发上，亿纬不惜血本。比如，亿纬总部 14.5 万平方米的研发中心大楼就花了 20 多亿元，2021 年公司研发费用逾 10 亿元，占销售额之比超过 8%。

亿纬锂能持续攻克锂电池核心技术，现已申请超过 4990 余项国家专利，其中 4 项发明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

作为武汉大学硕士和华南理工大学博士，为何不当教授去创

业？刘金成透露，这与其导师查全性院士有关。“导师 70 岁生日时，曾跟我们讲，他为学生里面没人做出一个有影响力的电池企业而遗憾，这进一步强化了我创业的想法，所以在查老师 80 岁生日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把电池卖到了欧美，老师非常高兴。”

## 谈二次创业：一边搞研发一边盯市场

20 世纪 90 年代在粤创业时，亿纬锂能曾给小灵通供应过 2000 多万块电池，但刘金成却急流勇退。

“这是一个企业发展战略的问题，你到一定阶段最好的时候，就要为下一阶段做准备。”刘金成说，小灵通电池的技术有局限性，后来公司把重心放到了锂原电池研发上面，大概用了两三年时间，也做得很好。

一边埋头搞研发，一边不停地看市场，亿纬的多次超前决策凸显了掌舵人的战略洞察力。“当企业家与当教授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把握好方向。”刘金成说，2015 年以来，亿纬在同行中较早聚焦动力电池、储能电池这一新兴领域，开启二次创业，很快做到了国际一流水准。

2009 年，亿纬锂能作为国内首批 28 家企业成功登陆深市创业板。上市成为亿纬动力储能电池加速发展的强大助推器。比如，亿纬开始做汽车动力电池的时候，所用“第一桶金”就是从资本市场募集来的 6 亿元，2019 年、2020 年又一共融到 50 亿元资金，6 月 8 日亿纬发布公告，再募集 90 亿元资金扩大动力电池产能。

刘金成认为，上市融资后降低了企业负债率与财务成本，抗风险能力大增，同时显著提升了产品的开发、交付与质量管理能力，以及服务重要客户的能力，推动了企业良性发展。

## 谈布局：荆门政府优质服务产生“1+1>2”效应

2012 年，羽翼渐丰的亿纬锂能做出重大决定：投资荆门。

“最初的动因，其实来自荆门当地政府领导的上门游说，请我

回归做一些事情，开始只做了一些小产品，结果一发而不可收。”刘金成回忆。

近 10 年来，亿纬锂能在荆门的子公司亿纬动力根深叶茂，厂区从 1 个扩至 11 个，产能由最初的 5GWH 扩至现在的 72. 5GWH。目前还在大举扩规，预计到 2023 年产能将达到 152. 61GWH，产值突破 800 亿元。

“这些年来荆门各级领导给了亿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尤其是在征地扩迁、要素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确保很短时间内工厂顺利建成投产，满足了客户需求，帮助我们在市场竞争中抢占了先机。”刘金成说，企业自身努力+政府优质服务，形成了 1+1>2 的效应。亿纬非常珍惜这样的环境，非常努力地在荆门越做越好。

去年以来，宁德时代、比亚迪先后在宜昌、襄阳大举投资，刘金成认为，这说明湖北投资环境好，汽车产业链日渐完善，但这 3 家企业是差异化竞争，不会导致产能过剩、恶意杀价，长远看利大于弊。

他还透露，亿纬即将在东湖高新区建设储能研究院，把公司整个储能业务的运营部分放在这里。

[**企业名片**]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质量锂电池平台公司，同时拥有消费电池和动力电池核心技术及全面解决方案。其消费电池产品涵盖锂原电池、小型锂离子电池及圆柱电池，锂原电池连续 6 年销售额及出口额居国内第一；动力电池全面解决方案涵盖方形磷酸铁锂电池、软包三元电池、方形三元电池、大圆柱电池、电池系统开发等，服务戴姆勒、现代起亚等国际车企，并获德国宝马、捷豹路虎定点。2022 年 1—10 月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 TOP10。

（来源：《湖北日报》及网络客户端等相关报道，图文有增删）

# 校友雷军：穿越人生低谷的感悟

大家好，今天是我第三次年度演讲。

这三年来，全球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

如何面对这些连续不断的巨大变化，不少人感到迷茫，甚至非常焦虑。

今天的演讲，我们不聊小米，聊点不一样的话题：我是如何穿越人生低谷，又从中获得了哪些重要的感悟。

这次我聊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遭遇了“产品失败、业务崩盘、公司差点关门”的困境。

故事要从 30 年前说起。

DOS 时代 WPS 非常流行，几乎装在中国每台电脑上，金山如日中天。同时也有很大隐忧，微软已经带着 Windows 和 Office 进入了中国市场。我们要尽快研发出新的办公软件，才有机会正面和微软 Office 抗衡。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没有细想就直接开干，还给项目取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名字“盘古”，希望盘古在 Windows 平台上开天辟地，能把 WPS 辉煌推到一个新高度。

一个国内小公司要抗衡微软，这个难度真的不是一般地大。为了这个宏伟梦想，我们压上了几乎全部家底，抽调了几乎所有程序员，没日没夜地干了整整三年。到了 1995 年 4 月，盘古终于发布了。

闭关3年只等大成的这一天，我们连庆功宴都提前精心准备好了。

## 一、生死关头

### 1.1 盘古受挫

谁也没有想到，盘古销量极为惨淡，不及预期的1/10。

我的心态直接崩了，同事们的心情也从云端直接跌落到谷底。没有办法，我拼命打鸡血，鼓励大家继续奋斗；就这样，我们坚持到了1995年年底1996年年初，盘古依然没有任何起色。更大的麻烦是，WPS也卖不动了，收入锐减。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那年我26岁，担任北京金山的总经理，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困局，有点束手无策。每到发工资的那天，都是我最难熬的时候；最惨的时候，账上只有十几万元，眼看着下个月就发不出工资了。同事们也都很绝望，不少人离开了，办公室开始有点空空荡荡。那个时候我经常彻夜不眠。好多个晚上，我独自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窗外，眼睁睁地看着对面楼里的灯一盏一盏熄灭，再看着天色一点一点亮起来。这种痛苦，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真的明白。

### 1.2 站店的故事

金山这样的金字招牌，盘古这么好的产品，怎么可能卖不动呢？我有点想不通，下定决心要“一竿子捅到底”，到第一线去把问题搞清楚。我决定亲自去站店卖货。站店卖货，刚开始我信心十足，特意选了当时中关村最大的一家软件店。虽然没有销售经验，但产品是我们自己做的，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搞定。

每有客户进店，我都像见到亲人一样迎上去，热情接待，细心讲解。有时面对一个客户，我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半个小时。一遍又一遍，一整天讲了八个小时，讲得口干舌燥，也累得晕头转向。当晚回家，连饭都不想吃，直接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我是一名程序员，天天坐在电脑前写程序。第一次站店就站了

八个小时，辛苦程度大家想想就可以理解了。

如此辛苦的一天，业绩如何呢？真的不好意思说，一套都没卖出去。

“一定是运气不好”，我给自己打气。毕竟是头一次干，没关系，第二天继续努力。

第二天，同样八个小时站下来还是一套都没卖出去，我就有些懵了。

到了第三天，依然颗粒无收，尤其是看到其他店员成交了一单又一单，我都有点怀疑自己了，真心觉得销售不简单。

第四天，我干脆不卖货了，干什么呢？看别人是如何卖货的。于是，我跟着店里最好的销售转了一整天，还真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说，我一见到客户就会滔滔不绝，而他话并不多，他是先听听客户的想法、再顺着客户说。我懂技术，总希望把技术讲明白，反而容易把问题讲复杂了；而他，拿着产品或者宣传页三言两语，客户就明白了。让我最羡慕的是：他和客户交流轻松自如。对于我，和陌生人交流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五天，我一边琢磨一边练习，到了中午，终于开张了。那一瞬间，我激动得就像赢得了整个世界一样。我逐渐找到了跟客户沟通的感觉，自信心也开始恢复。

第五天、第六天，我的业绩逐渐好起来；第七天，我居然成为了店里的销售冠军，太不可思议了！

### 1.3 站店的收获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在讲“一个促销员七天速成”的故事。其实，这是“一个研发负责人在产品失败后深入销售一线，站了七天店面”的故事。站店，非常累，但收获巨大。

给大家举个例子：那时电脑刚刚开始普及，站店那几天，每天总有客户一进店就问“有没有电脑入门的软件？”我有点想不通，学电脑，买本书看不就行了，还需要买个软件教吗？我总是非常耐心地告诉他们：“确实没有这样的软件，你出门左转就是一家书店，买本书跟着学就好了。”被问了很多次以后，我终于恍然大悟：既

然这么多人想买，做一个不就完了吗？说实话，和盘古一比，这类软件没啥技术含量。我们立刻开发了一个，就叫《电脑入门》，以最快的速度推向市场。结果大获成功，迅速登上了软件畅销排行榜。

这七天的站店卖货体验让我学会了：作为一个工程师，一定要做用户需要的产品，而不是做那些只是看起来高大上的产品；只要能做出用户想要的产品，销售就不是问题。有了这样的顿悟，再做产品就容易了。后来，我们陆续发布了《金山词霸》《金山毒霸》等十多款软件大获成功。

回头再看盘古的问题，原因非常简单："闭门造车。"

我非常庆幸，如果不是这次危机，我可能完全没有机会补上这么关键的一课。这次站店经历，也成为我日后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

站过店之后，再去逛店感觉就完全不同了。我逛店就不仅仅在看商品，也在琢磨别人的店面，比如装修、动线、货架、堆头、海报等，开始有点"内行看门道"的感觉了。从那以后，无论多忙，我都一定会抽空到店里转转；哪怕到国外出差，也会千方百计到当地最好的零售店去学习。这让我对零售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

就这样，金山找到了活下去的路！但我自己却陷入了新的迷茫，开始了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时间。

## 二、迷失彷徨

### 2.1 泡酒吧

那时候，我一直沉浸在盘古失败的情绪中，非常低落。和微软抗衡，完全看不到赢的希望。如果只是做一家挣扎活着的公司，这绝对不是我的追求。我彻底失去了理想，1996 年 4 月底，直接交了辞职信。求伯君反复挽留我，最后决定，让我先歇半年再说。

问大家一个问题：面对这样的人生逆境，你们是如何解压的？

当时，我的办法就是经常和几个朋友去泡吧。那时，蹦迪特别

风行，我们能疯狂蹦一整个晚上。也是这个阶段，我开始喜欢上了重金属摇滚。之前完全不能接受，但现在不一样了，沉浸在音乐中能让自己暂时忘掉所有的烦恼。那段时间经常泡吧，还真的琢磨过，是不是干脆转行，在三里屯也开家酒吧？

### 2.2 BBS 论坛

很快，我就找到了更有趣的事，那就是 BBS。我有了足够多的时间整天泡在 CFIDO BBS 上。那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CFIDO 是爱好者自建的电话拨号连接网络，聚集了国内一大群极客。上 BBS，可以自由自在地和远方朋友交流，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这种神奇感，特别像今天的元宇宙。就这样，我找到了新的寄托。

那时候对在论坛发帖要求还是蛮高的。大家都是拨号上网，上网费特别贵。如果你总是发水帖一定会被痛骂。当时我有足够的时间认真准备每条帖子，而且我还有个特别的优势：就是打字超快，多的时候一天能写一百帖，其中最长的一个帖子从晚上写到天亮，大约上万字。直到今天，网上还能搜到几篇我当年写的帖子。

就这样，我的发帖量经常排在全站飙信排行榜前几位。像我这样疯狂的人还不少，当时在论坛上认识一个朋友，每天也是上百帖，打字也很快，但他不会盲打，只会用两个手指打字，弹指如飞，号称“二指禅”，据说打坏了好几个键盘。

帖子写得多了就成了版主。别看版主官不大事还不少，有点像今天的“群主”。首先自己要发帖，要拉一大帮朋友来玩，还要负责搞气氛；最难的是，大家因为观点不同经常吵架，解决网友之间的各种纠纷就成了版主最重要的工作。为了当好版主，我经常早上 7 点就开始上网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比上班还累。

不过，非常充实。有朋友认为我在逃避现实、不务正业，甚至有人为我惋惜，觉得我是在浪费生命。对于这种关心我非常感谢，但不是特别认可。这半年，我没有任何目的，非常纯粹地玩，玩得特别开心。

在这样放松的氛围里，我的情绪也在一点点恢复。

### 2.3 意外收获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了这段经历的真正价值。2010 年我创办小米，第一步先把论坛做好。我们做得非常顺利，不到一年就成了最火的手机发烧友论坛。怎么做到的？就是靠当年玩 BBS、当版主时学会的那几招。

很多人觉得看小说、上网、打游戏只会玩物丧志，我个人的体会是，只要有一定的自制力，娱乐也是很好的学习方式。不带任何目的地学东西，特别轻松，也特别快。不过，玩也要玩出点名堂，不要瞎玩，瞎玩只是浪费时间。

当年在 BBS 上我认识了不少朋友，有的走到今天已非常成功：有一位在一家叫润迅的寻呼机公司做程序员，叫马化腾；还有一位在宁波电信局做工程师，叫丁磊。当年他们为什么有那么高的热情、那么多的时间泡论坛，我没有问过；但我相信，这段经历对他们后来的事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沉浸在论坛的这半年时间里，我逐渐恢复了状态。1996 年 11 月，我结束了半年假期，正式回归金山。主要原因，还是放不下民族软件这份光荣与梦想。我们下决心，要跟微软打一场“持久战”：一边在办公软件的正面战场和微软死磕；一边做各种应用软件和游戏，赚钱养家，以战养战。

一家差点关门的小公司，经过 20 多年的苦心经营，重新崛起了。到今天，WPS 月活跃设备数超过了 5 亿。我为 WPS 取得的成就感到特别自豪。

## 三、错失互联网

### 3.1 环境变了

就在我埋头重整金山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大洋彼岸，网景 1995 年上市，雅虎 1996 年上市……互联网的第一波浪潮已经蓬勃发展。很快，国内也开始了：1997 年网易创办，1998

年腾讯创办，中国互联网第一波浪潮汹涌而至。而我忙着做软件，不知不觉与这一波浪潮擦肩而过。直到 1998 年 10 月，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波浪潮已不可阻挡。我说服董事会，我们可以采用收购的方式快速出击。

这些年来，网上有很多传言：有的说马化腾刚创业的时候要把 QQ 卖给我，我没买；有的说马云刚创业时找我投资，我没投。我要澄清一下，他们没有找过我，这些全是谣传。我认真谈过的收购只有一家，就是网易。

那时网易成立一年多，公司只五六个人，主要做个人主页托管服务，做得非常好，甚至还帮广州电信做了一套邮件系统。我开出了 1000 万元的价格，这在当时真的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但丁磊很快拒绝了。仅仅 2 个月后，网易就融到了 1000 万美元，估值达到 6000 多万美元，按当时的美元汇率，大约 5 亿元。真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我看不懂但大受震撼。

### 3.2 卓越网

收购不成，我们只能自己干。试了差不多一年，对互联网业务有了一定的认知。当时，我以为自己完全搞明白了："互联网就是工具。未来所有的公司都会用的，电商最有前途。"

做电商，说干就干。2000 年 5 月，卓越网正式上线，在网上主卖图书和音像制品。这次我信心爆棚，志在必得，力主自己掏钱干。就在这时，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进入了资本市场的寒冬。这样的局面也没动摇我们的决心，第一笔大约 2000 万元的投入，全部来自金山股东。

电商本质还是零售，我把当年站店的经验，选品策略、定价模式、店面布置等，迅速全部用到了电商上；同时，我们在管理上也下了不少功夫。电商的核心就是运营，需要非常认真把每个细节做好。

每天早上一上班，我先把首页所有的 banner 广告和商品链接都检查一遍，总是能发现一些链接错误的地方。这让我想起了自己从软件工程中学到的最重要的道理："可能出错的地方，一定会出

错。”每天晚上，我们坚持做当天业务的复盘和总结，做完才下班。

每个星期我都要在卓越网上买好多单，来测试我们的选品和物流。于是，我书架上堆满了各种图书、电影电视剧及音乐 CD，很多连包装都没拆。那段时间，同事们特别喜欢到我办公室开会，离开的时候顺手到书架上带走几样。卓越网还做了很多敢为人先的创新，开创了最早的多地仓储、最早的自建物流等，还有北上广深 4 小时送达服务。很难想象，这些在 20 年前就已经实现了。

我们从零起步，两三年时间就成为了当时最大的 B2C 电商。现在还有不少朋友记得，他们在卓越网上买过《大话西游》《小王子》《东京爱情故事》等，这些都是中国电商的第一代爆品。

### 3.3 融资

卓越的业务非常顺利，困难只有一个：钱不够。电商平台实在太烧钱了。

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资本市场低迷，融资非常困难。那时的 VC，基本都是外资。像我这样没有留过洋、英文又不好的本土创业者，找钱就更难了。我们至少谈了 30 家，把所有能找的 VC 基本上找了一遍，没有一家愿意投钱。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才从朋友那里融了 100 万美元，金山股东不得不又追加了 100 万美元，才勉强完成融资。但仅仅一年时间又烧光了。卓越网创业的历程，就是我们拼命找钱的过程，相当煎熬。

到了 2004 年 9 月，实在熬不下去了，我们只能忍痛把卓越网卖给了亚马逊，成了亚马逊中国。谁也没想到，仅仅半年多时间，新一轮互联网热潮又来了，B2C 电商迎来了全面崛起的盛世。

卓越网，创办于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倒下于电商全面崛起之前。这真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 3.4 痛定思痛

很多人问过我，卖掉卓越后不后悔？我咬着牙说：不后悔。

卖掉卓越网，对我来说是一次重创，内心无比痛苦。在情感上，就像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一样，那段时间，我努力切割和卓越网

的联系，强迫自己不再去卓越网办公室，不再到卓越网买东西，也尽量不见老同事了；更痛苦的是，作为一个创业者，错失了整个互联网时代。

在那段痛苦的煎熬里，我反复问自己：我们到底输在哪里？好像是运气特别差：首先，“卓越网创办于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一上来我们就输在了起跑线上，错过了最好的时机点；接着，“卓越网倒下于电商全面崛起之前”，我们融资能力不足，没有资金、也没有信心坚持到胜利到来的那一刻。

创业，确实需要运气，需要对大势的精准把握。这也是后来我特别强调“风口”的原因。过了大半年时间，我才慢慢缓过来，彻底想明白了一些事情：“互联网不仅仅是一次技术革命，更是一次观念的革命；未来互联网将融入各行各业。”

我想通的道理，本质上就是后来大家谈的“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

有了这样的思考，看很多问题的思路就发生了巨大改变，我用全新的视角重新扫描了产业里的一些新机会。比如，2005 年，市场上一直传言 3G 网络即将开通，我隐约看到了一个大机会。

## 四、移动互联网

### 4.1 下一个机会

经过深入研究后，我越来越坚定：我们即将迎来移动互联网时代，而且未来十年都将是移动互联网的十年，规模会是 PC 互联网的 10 倍。想明白这些事情后，我做了一个决定：立刻行动。

我主要做了两件事：

第一，我要成为最早一批真正的用户。要真正了解移动互联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亲自用。这是一个“笨”办法，但也是最好的办法。十多年前，市场上主要是功能手机，无线网络是 2G。这么小的屏幕，慢到无法忍受的网速，用这样的手机上网，想想都很崩溃；有电脑的人，绝对不愿意用手机上网。但不管多难

用，我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所有事情都要在手机上完成，尽量不用电脑。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我更深地理解了：哪里有用户的痛点，哪里就有创业者的机会。后来我做移动互联网的各种产品思路，就是这样来的。

第二，我要成为这波浪潮最早的参与者。最快的办法，就是用天使投资的方式投资一批初创公司。几个月后，我就投资了第一家，后来陆续投了 10 多家。其中，最出名的就是 UC 浏览器。在这个过程中，我愈发确信：一个全新的大时代，真的来了。

### 4.2 离开金山

2007 年，金山终于上市了。接着，我离开了这家奋斗了 16 年的公司，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一边做天使投资，一边对过去经历进行系统性反思和总结。这一系列的反思，为下一段旅程做了充分的准备。

### 4.3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经历三个人生低谷的故事。

面对这些挫折、失败，我也迷茫过、动摇过，甚至放弃过；但如果没有这些挫折，没有这些挫折带来的积累，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没有人会喜欢挫折、失败，但每个人不可避免一定会经历，甚至，不少人现在正在经历着。

既然这些痛苦难以回避，我们能做的就是直面，并在痛苦中坚持前行，让痛苦来塑造更好的自己，这就是痛苦的意义、挫折的馈赠。而你所经历的所有挫折、失败，甚至那些看似毫无意义、消磨时间的事情，都将成为你最宝贵的财富。

人生很长，无论如何，让我们保持信念：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 五、《小米创业思考》发布

今天提到的站店、泡论坛和卓越网这三段经历，都为小米的创办做了至关重要的准备。2010 年 4 月 6 日，在北京中关村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里，我和 10 多位同事一起喝了碗小米粥，创办了小米。

一转眼，小米已经 12 岁了。

小米十周年时，我们内部进行过长达半年的深入复盘总结，收获特别大。当时我就萌发了一个想法，要把这些思考和总结写下来，让更多小米同学了解并分享给所有关心小米的朋友们。但这件事情比想象的要复杂，我们下了很大功夫，花了两年时间，忙到今天才出版，这就是《小米创业思考》。这本书包含了小米创办前后我大量的思考，以及小米创业历程、小米方法论和一些实战案例。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买来看看。

大家还记得小米三大铁律吗？“技术为本，性价比为纲，做最酷的产品。”我们始终极度重视技术投入，去年我们的研发投入是 132 亿元，今年预计会达到 170 亿元。未来五年研发投入将超过 1000 亿。正是永不止步的创新精神和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确保了我们能一直不断研发出最酷的产品。

小米正在构建全新的科技生态。从智能手机出发，到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再到智能制造、智能电动汽车以及仿生机器人，小米正在构建不断延展的科技场景，并提供丰富的智能终端和服务。

围绕人的生活和工作，更好为人服务，紧密连接人和万物，这就是小米科技生态的核心理念。

贯穿所有场景和终端的，就是小米不断融合进化的技术体系。这套融合体系已经非常完整，并在持续进化之中。比如，CyberDog 视觉系统，成就了小米手机的“万物追焦”功能；小米自动驾驶进展非常快，得益于 2017 年创办的小米人工智能实验室；同样，自动驾驶部门的很多技术，也应用在 CyberOne 上，又构成了仿生机器人的大脑。

12 岁的小米，仍在不断进化。

小米和大家一起，始终保持对这个世界的热爱，才能在变化中发现机会、在挑战中找到出口，才能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

谢谢大家！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2 年 8 月 13 日，图片有删减）

# 为冷门绝学的传承而砥砺前行

中华文化的基石是汉字，中华文明的基因就刻在一个个汉字上。一个字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才代表现在的意义，它的读音又经历了哪些演变？

在武大，有这么一个团队，为了这一冷门绝学，经过几代人的接力，走过了近 40 年。2022 年年初，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冷门绝学传承教师团队，入选教育部第二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足迹可以回溯到 1983 年，武汉大学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主要成员为原中文系刚完成了《汉语大字典》武大编写组任务的部分教师，包括其中的大部分编委。他们没有忘记在中文系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章黄学派先师、著名传统语言学家黄侃先生当年提出校补《经籍纂诂》以及编撰《经籍纂音》的构想，深切地认识到，系统梳理汉字字义和字音的历史演变，是一个急需认真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 果敢起步

清代阮元主编的《经籍纂诂》是近两百年间文史工作者和传统文化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影响深远，但它的缺陷也很明显：第一，资料不完备，只收录了先秦至隋唐汉字字义的训释资料，唐代以后则是空白；第二，由于书成众手、成书仓促，又疏于校对，错漏不少；第三，体例不便，全书依《佩文韵府》分平上去入共 106 韵归字编排，不注音读，一字多音者则分见多韵，给今天的大部分

读者造成查检困难。

古籍所的教师们准备进行的是一个更宏大的构想：对汉字的训释历史演变从先秦延伸至晚清，编写一部内容宏富、资料翔实、体例合理、检索方便，能清晰展现我国两千多年来汉字字义发展演变脉络的大型工具书，取名《故训汇纂》。

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当年阮元主持编撰300多万字的《经籍纂诂》时，署名的作者就有40余人，资料搜集、管理人员则难以计数；而武大古籍所先后参加编撰的作者只有12人，资料管理人员仅2人，担子之重难以想象。

此项工程的三位主持人分别是宗福邦、陈世铙、肖海波。宗福邦1959年在武大中文系毕业留校后，担任过语言学概论的教学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也发表过音韵学方面的文章，但系统的音韵、训诂学知识只能在十年浩劫中靠劳动之余挑灯恶补。陈世铙1960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分配来武大中文系任教，他天资聪慧、饱读诗书，但彼时尚未一展才华。肖海波是著名语言学家刘博平老先生的研究生，颇得师传。就是这么三位当年快要进入“知天命”之年、在学术界并不知名、仍被称作“年轻人”的教师，非常渴望在改革开放的火热年代释放自己的潜能，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想为社会的进步、为祖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扎扎实实地做点实事”。他们与古籍所的张世俊、田景奎、任巧珍、李菊英、骆瑞鹤、罗积勇、李步嘉，以及后期加入的李秀巍和刚硕士毕业留校的于亭，共9位老师先后组成了编撰团队。

为了争取科研立项，当时也有好心人提醒他们是否请一位有名气的学者来挂名主编，以增强有关部门对项目的信心，他们婉言拒绝了。幸运的是，教育部的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在充分了解这个项目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后，决定给予正式立项，并给予当时算是数额颇巨的3万元经费支持。至此，团队果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 迎难而上

樱花大道向东有一座矩形的两层楼房，下面一层实为地下室，

上面一层则曾经是化学系的实验室，室内还经常充斥着残留的化学药物气味。20 世纪 80 年代，武大新基建尚少，为了尽快开展工作，这里就成了刚成立不久的古籍所的工作地点。

团队并不满足于只对《经籍纂诂》做一些时段上的延伸和内容上的修补，他们在编纂理念上力求有所创新，克服《经籍纂诂》那种重源轻流，重儒家经典的雅言、轻民间话本的口语，重单字义、轻复音词语义的思想局限；也就是要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烛照下，打破传统的理念和方法，另外创立一套适合于当代文化构建的理念和方法。这就意味着不仅在编纂体例上要另起炉灶，而且要把主要精力贯注于第一手资料的直接掌握。

这个任务极其繁重，又需要极度的细致和耐心。教师们收集了自先秦至晚清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经典以及佛典和近人训诂笔记等 280 余种书籍，从中提取了极其丰富的语料，《经籍纂诂》所忽视的唐代以前大量多音词语的训释，也被他们认真收集了。

在 20 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电脑尚未广泛使用，团队只能用“笨”办法：靠手写笔录或剪辑。整个团队全员投入，前后花了 6 年左右时间，共制作了 70 余万张资料卡片，一次次在长长的桌子上摆开供取用。为了卡片不被风吹乱，团队成员们在大热天连电扇都不敢开，就此熬过半年多的日日夜夜。现在我们从当年拍摄的视频中还可看到，近 2 万个标明字目的卡片袋，依照部首顺序、笔画顺序整整齐齐地排列在 10 多个书架上，20 多平方米的房间全被挤满，这是从浩瀚的古籍文献海洋中仔细择取的第一手资源。

体例的设置关系到整部著作的谋篇，犹如基建的标准蓝图。《经籍纂诂》的编排是按《佩文韵府》的 106 韵（平水韵）归字编次，而今天的北京话音系只有 30 多个韵母，因此难以“依韵归字”。《故训汇纂》编写团队经过反复研究，一致决定采用《康熙字典》的 214 个部首作为《故训汇纂》的基本框架，再依各个单字的现代读音，编写一个“单字拼音索引”和“难检字笔画索引”。以这种布局开展内容的编纂，使得《故训汇纂》较之传统字书显得更加面目一新。

今天我们翻开《故训汇纂》，就可以感受到当年编写者们的宏阔视野和良苦用心。全书共收录了 16000 多个字头，在每一个汉字

下面各有几十个到1000余个注项，全书的注项共有近40万个；而且每个字头注项的编排有其内在逻辑，不仅有利于显示该汉字自产生至清末以来其字义发展变化的脉络，更有助于读者从总体和发展上掌握字义的变化，让读者“寻检一字而历代训释一览无遗，查阅一训而诸书用例历历在目”。难怪有人慨叹：它一个字头所提供的材料，就足以帮助我们写出一篇言之有物的长长的学术论文！

## 一次“险情”

1986年，这部著作被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作为重点项目立项后，在我国出版界享有盛誉的商务印书馆很快与古籍所签约，承担《故训汇纂》的出版。然而，当编写组前后花了十一二年时间、编写出近2000万字的初编稿时，商务印书馆考虑到出版的成本，要求将原合同为800万字的书稿压缩为400万字，否则无法出版。

这消息犹如一场大地震：压缩就得大刀阔斧去掉书中无数极为珍贵难得的语料，那较之只有16万条资料、260多万字的《经籍纂诂》还能增加多少新的价值呢？将近一个月时间，宗福邦晚上都难以入睡，他和陈世铙、肖海波反复商讨对策，三人一致决定：不能让这一项工程半途而废，即使商务印书馆不出版，也要把《故训汇纂》编撰成功。

最后，由宗福邦代表编撰团队赴京，向商务印书馆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林尔蔚先生被打动了，经过领导层的认真考虑，这本书终于可以按原计划进行，“险情”渡过。

此后，团队又花费两年多时间，对2000万字的初编稿进行压缩、修改、定稿，2003年7月，《故训汇纂》正式出版，终编稿为1300万字，第一次印刷8000册，瞬间售空，很快又进行了多次重印。

## 感知冷暖

《故训汇纂》出版后，先后荣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第五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更令团队感动的是，被誉为学术界高层次奖励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第五届开始评奖时，在《故训汇纂》编撰团队没有主动申报的情况下，评委会的专家们主动地一致决定授予《故训汇纂》一等奖，充分体现出学术界对这部著作编纂成功的高度赞誉。至于海内外学界朋友及读者的来信、来电所给予的赞许、激励，更是难以数计。学术界把《故训汇纂》与《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一起称为中国现代五大辞书。

自古籍所成立至《故训汇纂》出版，前后经历 18 个年头。在这段日子里，团队的老师们除了埋头苦干，还是埋头苦干，因集体项目完成的周期长、工作成果未正式出版，不被评审组承认等原因，多次错过晋升机会。而他们的同代人甚至较他们晚参加工作的教师，有许多都先他们晋升了教授、博导。

对他们来说，“坐冷板凳”不仅要甘于寂寞，还要承受清贫。在集体项目繁重的任务下，团队老师只能拿着基本工资养家糊口。记得在“新闻会客厅”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曾问宗福邦：编书 18 年得到了多少稿酬？宗福邦回答：“作为主编，18 年我得到的报酬每年平均也只有 3000 多元。”白岩松听后，一脸惊讶。

之后，武汉大学果断做出决策：在职称评定方面，古籍所实行晋升指标单列；在业绩认定上，承认编撰人员所编字稿经终审后可作为科研成果。至于经济收入方面，学校也决定对哲学、历史，包括古籍整理等特殊学科，给予财力“扶贫”，让这几个单位的教师经济收入不低于其他业外“创收”的老师收入的平均数。这大大缓解了常年坐“冷板凳”的学者们的焦虑，让他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

## 再创新篇

《故训汇纂》刚开始定稿，古籍所的老师们已经开始酝酿着下一个巨大工程的开始，这就是《古音汇纂》的编纂。

当年黄侃先生在提出校补《经籍纂诂》构想的同时，也曾有过

编纂《经籍纂音》的想法，也就是希望在梳理汉字两千多年来字义演变的同时，亦对汉字音读的演变过程有个详细的梳理和判识。这种对汉字字义、字音演进历史系统完整的整理和研究，对促进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有着莫大的意义。

2000 年，古籍所几位年长的老师或因年龄、或因健康原因，先后离开了工作岗位。承担《古音汇纂》编纂任务的除宗福邦、陈世铙外，几位年轻的老师于亭、熊桂芬、邓福禄成了编写团队的中坚力量，后来又陆续加入了骆瑞鹤和更年轻的李广宽。当年曾任《故训汇纂》资料员的汪波，多年来专业水平迅速提升，也成了这次编撰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如果说《故训汇纂》的编撰还有前人的《经籍纂诂》作为参照，那么，编纂《古音汇纂》则完全是“白手起家”。据有关资料显示：在阮元《经籍纂诂》成书之前，就有洪亮吉所撰的《汉魏音》四卷，辑录汉魏诸儒传注中之譬况说音之文，是首部博采汉魏经师音注之作；到 20 世纪 20 年代，又有吴承仕先生为“求音韵变迁之迹”“博采汉魏六朝众家音注百有余家，撰成《经籍旧音》二十五卷”。遗憾的是，昔遭战乱，作者早逝，未及成书，其稿散佚。20 世纪初期，前辈学者姜亮夫先生、殷焕先先生都提出过编撰《古音汇纂》的方案，可惜因为各种条件限制，未能成编。

无论是《汉魏音》还是《经籍旧音》，都具有“开创之功”，它们留下了汉魏六朝经师的音读，是汉语语音史源头性的资料，弥足珍贵。但它只能是一个特定时段音读的反映，不足以“总声音之流变”。而古籍所老师们所追求的，是要“提供一部上启秦汉，下迄晚清，源流并重，音义互见的汉语语音资料总汇，以填补汉语语音领域的空白”。

翻阅目前已正式出版的《古音汇纂》可以看到，它收录古今常用字和较常用字 1 万余个，每个字目下的音注资料据其所属时代，分上古(先秦至南北朝之宋齐)、中古(南北朝之梁陈至南宋末)、近代(元明清)三个时期加以排列。每一时段音切资料又是按所出之早晚分注项排列，非常清晰地梳理了汉字音读的历史线索和时代层次，有条不紊地反映了汉语语音的发展脉络。为了遵循汉字重视

“形”“音”“义”的关系，编纂者还注意完整准确地标出不同时代的音读所表达的意义和产生的具体语境，使读者不仅了解不同时代同一汉字音读的变化，而且明白“因音而得其义”。这样的编纂原则，使《古音汇纂》不单对研究语音史有价值，对研究词汇史和语法史也同样有重要意义。

得益于时代日新月异的变迁和 20 世纪 90 年代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古音汇纂》的编纂手段也更具有开创性：在项目设计之初，就大胆地准备采用计算机技术作为编纂《古音汇纂》的辅助手段，率先在国内开展大型辞书编纂的计算机数据库建设和利用计算机辅助编纂的探索。这个决定得益于当年还是讲师的于亭博士，这位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古代文献专业，又在武汉大学获得古典文献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是《古音汇纂》三位主持人之一，在他的带领下，同事们群策群力，边摸索边实践，用了数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上百种主要列目书的资料录入和检核工作，建立了包含 100 余万条数据记录的古代音切资源的计算机数据库，总字量达 4000 万字，同时开展了利用计算机做辅助编纂的探索。

据于亭的介绍，从古书资料的录入、校改管理和排序，到形成数据结构、组织流程、分析排查、编排出稿，以及初稿完成之后的删减书目、批量性修改文字讹误等，都使用计算机完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誊抄、编写中难以避免的笔误。

然而，团队还是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古音汇纂》的 100 多种列目书，经前人校理过的不足 10 种，大部分书目未经校勘，更缺乏研究。若仅依原书辑入音切资料，势必将大量底本的文字讹误带入书稿，贻误读者。但又因这类书多是孤本，难有他本可据，在编写过程中遇到这类疑有讹误又无可参证的音切资料，就只能依靠编者的学养多方参证、慎重认定后做出校改。每编一字，对编者都是一场颇费心力的应试。

## 神通各异

奋斗 22 年，《古音汇纂》终于在 2019 年年末由商务印书馆正式

出版，作为《故训汇纂》的姊妹篇，它同样受到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出版的次年，就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就在《古音汇纂》开始编纂的前后，国家的一项巨大文化工程《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将《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包括《音韵分典》《训诂分典》《文字分典》)的编纂任务下达给湖北省。当省里任命朱祖延先生为主编、宗福邦为执行主编时，宗福邦正作为《古音汇纂》的主持人之一忙得不可开交，但面对国家的重大文化工程，他责无旁贷。《音韵分典》由骆瑞鹤与他共同担任主编，万献初、罗积勇任副主编，他们与古籍所 7 位老师一起前前后后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6 大册、1000 多万字的《音韵分典》终于在 2012 年正式出版，并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而宗福邦因为两个 1000 多万字的大型长线项目的同时重压，终使颈椎不堪重负不得不经受一场重大手术，病情虽勉强缓解，但此后仍不时受运动神经不适的困扰。

可喜的是，于亭、骆瑞鹤等以厚实的学识和研究实力分别进入大型项目的主编位置，这也意味着古籍所教师团队新一代学者正在成为这个团队的核心。

古籍所的老师们在全力投入《故训汇纂》《古音汇纂》和《中华大典·〈音韵分典〉》编纂的漫长过程中，各自也都有着个人的创造。古籍所的老师们参加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撰写工作：陈世铙撰《左传选译》，张世俊、任巧珍撰《汉书选译》，肖海波、罗少卿撰《六朝志怪小说选译》，任巧珍撰《三袁诗文选译》等。陈世铙的《左传选译》和张世俊、任巧珍的《汉书选译》，还被国务院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推荐为“经典古籍的优秀整理版本”。此外还有李步嘉的《韦昭汉书音义辑佚》《越绝书校译》，骆瑞鹤的《荀子补正》等。一些更年轻的老师在完成集体项目前提下，也撰写了一批个人专著，如于亭的《玄应一切经音研究》、熊桂芬的《从切韵到广韵》、邓福禄的《字典考证》、罗积勇等的《礼部韵略与宋代科举》，等等。

如果说，团队集体智慧的汇聚犹如一支巨大树干的挺立，那么，巨大树干的挺立也自然会伸展出无数同样生机勃勃的枝蔓，这

也是耕耘者们精神的力量和各种智慧的闪耀。

## 迈向未来

40 年漫长岁月，古籍所尽管经历了一系列人事更迭，但团队自始至终同心协力，合作无间。商务印书馆的史建桥先生是两部《汇纂》的责任编辑，他说：“团队多年坚持下来，始终旗帜不倒，班子不垮，人心不散。宗先生和其他老先生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是很重要的因素。”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也说：“古籍所是武汉大学独具特色、声誉卓著的科研实体和攻关团队”，这个团队“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和坚韧不拔的学术精神，正是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承所必需的，也是武汉大学的发展所必需的”。

有了古籍所教师团队新一代的整体神力，近年来又有了更年轻的、学术上已崭露头角的学者李寒光、韦胤宗、梁静、赵昱、赵清泉等的陆续加入，可以预期：未来这个团队将会建设为集成性的“中国古代小学资源平台”，不断努力探索古籍数字化平台建设和人文计算实现的可能，以此促进我国传统语言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的更好更快发展。

让我们祝福这个团队：明天会更好！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2 年 8 月 16 日，内容有删减）

# “启明星一号”背后的学生军

2022 年 2 月 27 日 11 时 06 分，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随着长征八号遥二火箭圆满出征，满载着武大学子航天梦的“启明星一号”微纳卫星顺利起航。这是我国首颗可见光高光谱和夜光多光谱多模式在轨可编程卫星，也是一颗以在校学生为研发主体的微纳卫星。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两年前。2019 年 9 月，在武汉大学遥感专业的一次论文答辩会上，有学生提到“有很多新想法，但得不到想要的数据去验证”。对此，武大遥感信息工程学院金光教授与巫兆聪教授商量，即使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武大遥感学科，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很依赖国外数据，为何不研制自己的卫星，按自己的需求获取遥感数据？

自此，“启明星”研究正式开启。该星研制历时两年，先后有 50 余名学生参与设计、研发及测试，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本科生就有 20 多名，把书本上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林炜华是武汉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 2018 级本科生，最近很多朋友都调侃她“深藏不露”。在巫兆聪老师的团队里，她负责选定卫星预期应用所需的高光谱工作谱段，最忙时，一天收集 200 多个波段范围，再逐一比对检查。林炜华参与的是个大项目，却在新闻报道前从未声张，在研发团队中，她从没觉得自己贡献“突出”。

“那段日子过得太充实，眼界开阔到前所未有的远。”林炜华调侃自己搞科研搞“上头”了，课堂学习之外，她总是背着电脑轻盈地奔向实验室。热忱源于引领。对林炜华来说，巫兆聪老师就是那颗引领她找到未来科研之路的“启明星”。

入学的通识课上，巫兆聪老师用通俗易懂的比喻解释了摄影测量和定量遥感的区别：“如果拿遥感技术去拍一个人，摄影测量能得到这个人的身高体型，而定量遥感能得到他皮肤毛孔的含水量！”林炜华听了神往不已，便一头扎进巫兆聪老师的实验室学习。

大三时，她一边跟进卫星项目，一边上巫兆聪老师的“定量遥感”课。有一次林炜华起得比较早，7 时 20 分就在教学楼下碰见了老师。两人一起爬楼梯，年过 50 的巫兆聪声音洪亮：“来得挺早哇，任务完成得咋样？”她答着答着，老师回应的声音逐渐变小，抬头一看，巫老师早就到了上一层楼。

实现智慧农业和智慧城市，巫兆聪他们的这类研究大有可为，比如，适当的遥感设备可以对农田近距离实时观测，还可以宏观调控城市物流和交通状况，乃至 2060 年实现碳中和，都需要遥感技术监测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含量。

周昊这几天被各家媒体争相采访，作为项目里毛庆洲老师团队的研三学生，负责“启明星”上传感器的集成与测试，他第一反应是有些惭愧，自己的工作似乎平常且枯燥，谈不上有趣有料。

传感器，简而言之就是一些可对不同光谱扫描的辐射成像仪、CCD 相机等，卫星能传送回来数据，全靠它们。

“启明星”身怀“十八般”遥感手段，白天能接受 32 个、夜晚能接受 8 个波段高光谱，还能进行红外遥感。而仅重 19.2 公斤的微纳卫星要放入如此多的传感器，结构设计和集成至关重要。

周昊形容自己集成传感器就像搭积木一样，但也不是简简单单就能拼成的：“搭积木也要看衔接处是方孔还是圆孔，这边搭好，还要看另一边对不对得上。”测试中会出现各种突发状况，比如他明明花了大量时间按照配套手册操作，却收不到数据，或者数据呈现乱码。“这就是理论和实操的差异吧。”面对这些 bug，他常常踏着夜色去撸串儿，再钻进被窝蒙头大睡，第二天从头再战。

2月的一天，他跟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的老师去文昌航天发射场做最后调试，卫星的太阳帆板突然无法正常展开，如若“启明星”就这样上了天，将会因为没有太阳能供能而成为太空垃圾。老师们面不改色，在场学生一片淡定沉着，周昊开始想解决方法。最后问题连夜解决，卫星如期升空，新闻迅速引爆热搜。

周昊也关注着成千上万条把他们“夸上天”的网友评论，他能理解，隔行如隔山，凭借“航天”“卫星”这些家喻户晓的时事热点，遥感这个略显神秘的学科，也进入了普罗大众的视野。他还记得宇航学院院长龚健雅院士说过，遥感若是棵参天大树，那仪器只是小小的枝丫，武大遥感专业全球第一，但遥感仪器仍是弱势。

“我们有最专业的应用团队做支撑，发射‘启明星’是要实实在在造福社会的。”周昊认为，“启明星”作为遥感仪器的成果，虽然只是“小枝丫”，但它如此“耀眼”，能使得更多青年对遥感产生兴趣，汇聚更多人才。“遥感仪器的光明未来指日可待。”他憧憬着。

回想起2020年10月，金光的2019级博士生张雪峰和2020级博士生郭羽萱记忆犹新，他们从导师手上接下一项棘手任务——搭建卫星数字系统。这套系统就是“启明星”的“神经中枢”，可实时知晓卫星工作状态，还能向卫星发出指令，操控卫星完成各种任务。

“这是‘星敏’，就是恒星敏感器，能让我们知道卫星此时的姿态，简单说就是通过天文坐标系来确定卫星的绝对方位……”张雪峰展示着大屏幕上的一项项卫星数据。之前，为了尽快搭好这些设备，他和同伴们没少着急上火。

郭羽萱发现连接设备的直流电源不运行，张雪峰看到传输模拟数据的设备没指示灯提示，金光就请了光机所的老师远程视频答疑解惑，学生们泡在卫星仿真测试室学习原理，动手实操，逐个排错，金光随时跟进进度，3天内就顺利搞定。

他们还被派去光机所研学10天，“足有四层楼高的空房间用来做卫星装配测试，嚯，一个大镜头十几米长！”郭羽萱感到眼界随之开阔，她的专业方向是遥感图像处理中的色彩恢复，属于搞“软件”，她在光机所遇到搞“硬件”的年轻女老师，是做传感器CCD

相机的专家，知识一“碰撞”，郭羽萱就知道自己来得太值。

“武大发射‘启明星’也在表明，卫星距离普通学生并不遥远。时代在发展，卫星的自主研发以后会更加普及。”郭羽萱清楚，卫星上天，国家政策、资金保障、学校平台、老师辅助，缺一不可，他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国家推动技术发展，反过来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将反哺于人民，回馈给时代。小我在时代的精神中被滋养得勇锐丰润，我想在国家遥感事业中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人。”这是她的志向。

（原载中青报·中青网，2022 年 3 月 18 日）

# 珞珈记忆

# 我与王世杰王星拱两位校长

严耕望

1969 年 10 月尾，我自香港归来，适逢校友集会，赵保轩、徐叙贤两位学长促我写一点在校时期的回忆录，我一直迟迟未能应命。一方面是由于疏懒；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思滞涩，写不出来。以一个出版量超过 400 万字的人说写不出来，似乎是言不由衷。然而在我，实在是千真万确的事。因为平日所写全是研究性的论文，根据材料去推论判断，习惯了，不觉得难。但要凭空写一篇散文，却感觉殊为不易。何况我这个学历史的人却不注意自己的历史，没有养成经常写日记的习惯，加上记忆力很差，过去的事只是依稀仿佛，所以更无从下笔。但看到各位学长的长篇回忆录，勾起我 30 年前在校时期的生活情趣，总也想勉强写一点凑凑热闹。

1970 年 4 月初的一个早晨，收到《珞珈》第 26 期，是为祝贺雪公校长（王世杰）八秩寿辰而编辑的。我因为不知道这期出版的特别意义，未能写一篇恭祝校长的嵩寿，十分歉疚。事有凑巧，当天下午历史语言研究所开所务会议，决议出版《庆祝雪公院长八十岁论文集》，我这才有了弥补内疚的机会。现已缴卷，我大约是第一个提供论文的祝贺者吧。

后来又接到叙贤学长的通知，为《珞珈》第 27 期催稿，适当雪公校长刚刚摆脱最高学术职位，我想就此写一点我认识他老人家的经过，也谈一谈我对于王抚五（王星拱）校长的认识，表达我对于两位校长的感念！

1937 年的夏天，我从中学毕业，与几个同学结伴到武汉，向三所大学(中央、武汉、浙江)联合招生会及中山大学招生会报考。我在中学时代，喜欢看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书，希望用人类学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当时中山大学在人类民族学方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原想以中山大学历史系为第一目标。但一到珞珈山，看到武大校舍的宏伟壮丽，兼具幽静自然之美，就把我的精神吸引住了，遂改变意志，以武大历史学系为第一目标。录取入校后，住在那样古典式的宏伟辉煌的建筑中，感觉无比的兴奋，也加强了我对于学术追求的信念！每读中国史，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大兴土木，建筑咸阳；萧何在天下未定之前即创建未央宫，极尽壮丽；隋文帝舍弃长安旧城，另筑新都大兴城(即唐之长安)，规制的整齐，规模的宏大，都非迄今全世界任何都市可与比拟(包括东京与纽约)。秦始皇的评价姑且不谈，但萧何与隋文帝都是节俭的政治家，何以要这样不惜民力呢？细想起来，此中极有深意。国都为四方观瞻所系，秦汉刚由列国纷争归于一统，隋代也是中国分裂三百年后的初次统一时代，首都的宏大壮丽，对于四方的向心力极具凝聚作用。一个大学为国家最高阶层的教育机关，在建筑方面实在应当要尽可能地达到高度的宏壮水准，这样也可以增强青年学子的责任感与自信心，这无疑也是一种基本的精神教育。武大建校在两座山上，毗邻东湖，环境优美，建筑伟丽，就当时中国建筑而言，无疑已达到最高水准。后来慢慢知道，这都是前任校长王世杰雪艇先生一手擘划树起的规模，当时就叹服雪公的气魄与远见非常人所能及。再后来又了解到，那些建筑物大多为雪公向各方面奔走呼吁获得捐款而兴建，并非全由教育部拨款，这更显示创校的艰难与创校者的能力了。自那时起，雪公校长在我心中已有了深刻的印象。但直到来台以后，每年一度开校友会，始能瞻仰他老人家的风采，可是仍无缘面聆教益。

1962 年五月雪公校长接手“中研院”后不久，大约是看到我刚出版不久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一、二册(秦汉之部)，颇为欣赏，约我谈话，询及我的出身，才知道就是他自己一手创建的武汉大学的学生。老人微笑着，也许是感到相当快慰吧！后来屡次约

我谈话，备极关怀。有些主管虽然对于我的成绩也相当了解，但他们的观念是“权利要自己争”，而我的禀性，只要生活可过，有书可读，一切听其自然，绝不愿积极地为自己争取什么。而雪公校长每当关键时刻论成绩应有我一份的时候，总没有忘记我。但似又因为有师生关系，不便直接处理，往往兜着圈子，间接达成他的意思。这是我非常感念、永远不忘的！但是愚鲁的我，却在有些事上实在辜负了他老人家的好意！

1962 年 7 月，校长希望我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他愿意全力支持。但我考虑结果不敢写。因为当时我虽然是在写《地方行政制度史》，但实际上的兴趣早已转移到历史地理方面去了，要想兼顾两方面实在不可能。而且以我的写作习惯，纵然只是一篇论文，立意至少也在三五年之前，慢慢搜集史料，然后一气完成。

要写一部大书，限期完成(向公家提出计划一定不能太久)，我实在毫无把握。后来校长希望由研究院领导，仿英国《剑桥历史》写一部《中国通史》。上古史部分已由李济之先生承诺，领导编纂；至于中古史，因为我平时发表的论著不出秦汉至隋唐范围，就目前研究院同仁而言，我不能辞其责，所以校长要我领导中古史的编纂工作。

这项工作无论做得好与坏，只要编成都可以享大名于一时，但我仍然不能体念他老人家这番美意，来担负起此项任务。我之所以不敢负起此项责任原因很多：第一，这项工作要邀集岛内外很多学人来共同努力，而我毫无行政领导能力。我常说，我在学术研究方面是个“强兵”，但不是个“良将”。自己做工作，自信是个标准工作者，如果领导他人，不免有联络协调开会应酬及文书处理等麻烦，我平日书信日记都懒得写，也常常几天不说一句话，如何能做领导工作呢？第二，集体工作本身就困难。中国史学史上最成功的集体著作当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虽然是几个第一流的学者合作编辑而成，然而首尾呵成一气，文章风格一致，如出一人之笔。那是因为司马光以旧相之尊，又是当时文章宗伯，为大家所心服，所以底稿虽由多人撰写，但定稿则出司马氏一人之笔，所以能卓绝千古！现在写通史远较九百年前为难，以目前客观环境，纵能勉强

凑成，但内容势必不能连贯一气。不但不能一气呵成，而且必将各持所见，矛盾重重，只能算是一部较有计划的中古史论文集，不能算是一部中古史。所以到时纵能缴卷，也等于没有缴卷。第三，我自己的工作实在太繁重，照我多年来已定的计划，非再写三四百万字不能解决；若再承担另一重大工作的领导责任，实在绝非我的能力与精神所能负荷！这次休假回院，校长又旧事重提，屡次告诉我："事在人为，并无不能解决的困难"，但我仍然鼓不起那份勇气。一项工作的开始就没有信心，那将不可能会做得好。如果现在勉强承诺，将来把钱用了，而拿不出满意的成绩，那将更辜负老人的知遇之恩！所以终于在惶恐的心情下违背了他老人家的美意，这是我感到十分愧憾的！

雪公校长是一位有气魄有冲劲的创业长才，而王星拱抚五校长则是一位善于守成的良才。抗战军兴，迁校乐山，那时期的同学大多称抚公为"王菩萨"，大约觉得他是位老好人，具有菩萨心肠吧？抚公每天乘黄包车到文庙办公，在车上正襟危坐，遇到同学向他敬礼，总是微哂作答；那种肃穆慈祥的面貌与表情，多少也让人加深"菩萨"之感。在这里我想提几件与我有关的事，透视他老人家办学的态度。

我们那一班历史系人数不多，但对于老师的教课却非常挑剔，尤其是我的好友钱树棠，性情生硬固执，有时弄得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教授们对于我们这一班多感到头痛。系主任方壮猷先生的"宋辽金元史"，前后各班都开课，但却自动地没有给我们讲授。有一次他在"史学方法"的课堂上愤愤地说："衮衮诸公十年以后都将是大学教授，就知道也不容易！"新聘的教授更要被挑剔。记得有一次请得一位老教授徐光给我们开"秦汉史"与"三国史"。听说他历教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颇有名气，同学们也很高兴。但一经开课，他倚老卖老，好像只有他读过很多书，我们都一无所知！而他所讲的，不过就《通鉴纪事本末》摘要演述而已，而且有很多错误。

听了两堂，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错误十几条，连同钱树棠所写一篇呈文，经全班同学签名送呈校长，这位老先生就此离开了。同时，我们又常要求学校聘请某人某人，学校也都尽可能照办，如

钱穆宾四先生到母校作短期讲学，就是一例。这些都可看出抚公校长对于教授的进退，真能做到优先考虑学生的意见，这是今日大学很难看到的，恐怕学生也无此要求。到高年级时，树棠与我还做了件荒唐事。我们觉得学校高阶层人事不够理想，将来毕业证书由他们签字，不光荣，希望请朱光潜孟实先生出任教务长。那是一个冬春的星期日早晨，我们两人拿着呈文到校长寓所去晋谒，似乎是先将呈文送进去。抚公怒气冲冲地走出门来，严厉责斥我们一顿，说“这是学校行政，你们管什么？你们要请某人担任某职，人家就听你们安排吗？”把我们赶出竹篱大门。但结果却出乎意外，后朱先生果然担任了教务长！可能是他本有此意，两个傻学生的要求不过加强其决心而已！回忆起来，少年时代荣誉感太强烈，做出这样荒唐的傻事，此刻写来也觉好笑。无怪当时有些同学称我们是两个“书橱”，只知装书，不懂世事！

民国三十年(1941 年)毕业后，钱师宾四惠函召我到齐鲁国学研究所继续读书。三十三年(1944 年)春天，因为想回家看望年届八十的老父，走到重庆，中原战事复起，襄阳老河口通道断绝，只得停留下来，在北碚做事。

三十四年(1945 年)春抚公校长来到北碚，我带着出版不久的长篇论文《两汉郡县属吏考》去看望。他很高兴，告诉我说，他计划下年度每系设立一个“研究助理”的名额，届时我可回到母校历史系专心读书。

这正是我所梦寐以求的职位，不想他回校不久就辞职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自然是个理想的读书地方，但我没有任何人事关系可以联络得上。有时异想天开，想来一次毛遂自荐，但又无勇气。

后来曾祥和女士说，傅孟真先生为人特别，找人介绍未必能成功，自己把文章寄给他看，可能会成功。我急切希望有个读书环境，遂决定一试。大约是七月中旬，就选了三篇论文寄给傅先生。不久傅先生果然复信，允许我的要求，这真使我喜出望外。信中又说，抚五先生前曾有信推荐，但无著作，无从考虑。这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抚公校长在辞职前后百端纷忙中，居然还记得我这个远隔千里之外的学生，母校没有机会，仍然希望给我另外安置一个更适当的地方！此番爱护之情，实在使我感动万分。后来却一直没有拜谒的机会，此番盛意只有铭肌刻骨。今日走笔至此，仍不禁涕泪交流，久久不能自抑！

我生平愚鲁迂拙，但却得到不少前辈学人的鼓励，两位校长更是备极爱护。我少年时代欢喜读书，一方面是兴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自己有相当抱负。我违背雪公校长的意旨，没有负起中古史编纂的领导工作，绝不是逃避责任。相反地，是要完成另一项已定的目标。我自小学时代即对地理有兴趣，自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开始搜集“唐代交通”“唐代人文地理”方面的材料，后来又扩大范围到全部“中国历史地理”。现已累积史料近十万条，并已开始撰述。这三部书是逐步扩大、由专到通的连锁计划，意欲从地理观点讲中国历史。

这虽非雪公校长指定的题目，但只要有真正贡献，他老人家亦必乐观厥成。我的身体不算很坏，近几年来又听取校长的教训，每天走路增进健康，相信还有二十年可努力工作，当能达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为中国史学界开辟一块新的园地，也希望以此项成果报答两位校长及其他师长前辈的知遇之恩！

(选自《珞珈》1970 年第 28 期)

作者系历史系 1937 级校友

# 李达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涂上飙

李达老校长一生有两段时间在武汉大学：一是大革命时期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任教的 3 个月；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即 1953 年 2 月 23 日至 1966 年 8 月 24 日在学校任校长的 14 个春秋。

李达在武昌中山大学的日子，虽然是教书育人，但多与革命活动相伴，既轰轰烈烈又惊心动魄。

李达早期的革命活动可以追溯到留学时期。在留学日本时，他就参与了革命宣传和游行等活动。以后在上海参与筹备党的成立工作。1921 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他被选为中央局宣传工作组负责人，他在成都路辅征里的家就成为党的通信联络站。此时，李达收到毛泽东的信，邀他去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1922 年，李达携家眷去长沙，负责湖南自修大学的教务工作。

1926 年 5 月，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从广东分三路向北挺进。1926 年 10 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因革命战争宣传及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李达被邀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校长为邓演达)，并代理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因事未到校)，负责讲授社会学概论。

1927 年年初，全国的农民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为了更好地领导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决定成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李达被聘为委员会常务委员，受毛泽东的邀请定期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

此时，李达还受毛泽东之托，回湖南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1927 年 3 月底，党组织派李达回湖南参与筹备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由唐生智当挂名校长，谢觉哉任秘书长，李达任教育长，主要负责招生和教学工作。

正当革命运动方兴未艾之时，由于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湖南的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五月中旬长沙城内已是白色恐怖的前夜。某日上午，李达去党校演讲，组织上派人通知说要发生事变，党的一些负责人已陆续转移，要李达速离长沙。李达吃完晚饭后雇一木船，和老父、大哥、大侄子一起回老家零陵，夫人王会悟及女儿留在长沙。5 月 21 日“马日事变”发生，屠杀了许多优秀的革命战士，长沙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李达回零陵后，由于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出于保密安全的需要，一直没有和在长沙的王会悟联系。大约八月，王会悟从报上看到武昌中山大学的一则消息，得知李汉俊仍在武汉并在武昌中山大学任职；于是王会悟给李汉俊写信，告诉他李达目前暂避乡下，向他打听去上海的轮船是否通畅。

十多天后，李汉俊给王会悟回信说：去上海的轮船畅通，但沪宁政局混乱，也非保险地方；认为湖南情况更加险恶，劝李达迅速离开家乡，免遭意外。由于难以估计时局，李汉俊在信中就直接邀请李达来武昌中山大学任教。

历经千辛万苦，九月下旬，李达在大侄子的陪同下，乘坐一艘以前中学同学蒋姓朋友的包船回到长沙。回来后听王会悟说李汉俊邀他去武昌中山大学任教，非常高兴。那位蒋姓朋友刚好也要去汉口，于是就和那位朋友一起乘船北上，大约在九月底抵达武昌。

李达到武昌后见到了李汉俊，探讨了当时的形势，接受了武昌中山大学的聘书。他向文科教员费姓夫妇借到一屋，两家共用一小厨房，生活十分清苦。

其实，早在 1927 年 1 月 27 日，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决定聘任李达为社会学讲师。当时李达因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没有到任。在武昌中山大学，他主要讲授社会学概论，内容涉及社会学的定义、功能、发展历史、社会学派、社会

学的发展等方面。

1927 年 12 月 16 日，胡宗锋、陶钧等反动军人奉蒋介石之命，率领大批军队进入武汉，造成了恐怖大屠杀的局面。他们首先进入武昌，包围武昌中山大学，杀戮和逮捕很多教员和学生。林可彝教授及其他许多人当场被捕。李达那天因故迟到十分钟，在校门外看到风头不妙即避开，幸免于难。不久，武昌中山大学被军队占领，林可彝、詹大悲、李汉俊等人先后惨遭杀害。

当时，宪兵询问全校职工、校役，搜查李达，问居何处。某工役回答，李达早已离开武昌去上海了。李达借居的费家夫人劝李达夫妇即刻过江去汉口租界友人家避难。于是李达夫妇立即过江，后又向一友人借了 30 元钱、出了小费买到了日商长江轮船的官舱票。当夜 10 点上船，到次日清晨轮船基本驶出湖北省界了。为保险起见，他们沿途停泊点都未出仓。第四天清晨轮船已停泊在上海租界码头，李达夫妇逃过一劫。

作者系历史系 1984 级校友

# 我的乐山老师

吴鲁芹

一位青年人同一位老年人谈天。青年人说："您怎么一下子又把话扯远了——扯到别的事上面去了?"

老年人慨然答曰："到了我这个年纪，提到某一件事，就会联想到另一件事或者另几件事。提到某一个人就会联想到另一个人或者另一群人，要想文章切题就很难了。"

这正是我目前的心境。

此处所谈的是40年以前的旧事。其中有些人尚健在，不少早已先走一步——"走了"。但是旧人旧事，尤其是我的老师们往往是身无长物的老年人的重要财产。

幼时初读《三国演义》的印象是单名的人何其多也。初到武大的印象也是单名的人何其多也。1937年秋，上海正是大战方酣，直接溯江而上去武汉的轮船当然停了。先循陆路，再走水路也还是相当方便的，我是存心拖一拖再说。因此到了珞珈山办入学手续时已经迟了一个多月。注册组的执事先生们颇为客气，说战区来的可以通融，只要写一简单报告请教务长批准就行。那时"战区来的"，和稍后的"流亡学生"，好像都是一种资格——别人该让他三分。当然比伤兵的地位还是要低一些。

我按照注册组的指点，拿了一张刚写就的报告直入教务长的办公室，我亦不知他是何许人，鞠躬如仪之后，就递上报告。他亦一言不发，在报告上批了"特准"。我拿去办入学手续，也还不知其

为何许人也。稍后方知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国际法专家周览(鲠生)。接下去的顺序是要请文学院院长外国文学系主任在注册证上签字。院长是陈源(通伯)，系主任是方重(芦浪)。再翻一翻武大一览中教职员名录，现在还能记起的是：中国文学系主任刘赜(博平)、哲学系主任高翰(公翰)、经济系主任陶因、物理系主任查谦、机械系主任郭霖。总之，当时以为是置身在《三国演义》的环境之中了。

这份名单到后来学校内迁四川乐山，也还是有增无减。大约是1938—1939年，四川大学发生风潮。领衔反对教育部派程天放接掌四川大学的是当时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朱光潜(孟实)。似乎武汉大学的学术自由气氛较浓，而且和在成都的四川大学距离也较近，反对以党人治校的一批学人就转移阵地到了武大，包括前四川大学校长张颐(真如)、哲学系教授到武汉大学担任注册主任的叶麟。同时中国文学系在那一年请了讲书如演戏的教授高亨，以及后来与我有点交往的黄侃的侄子黄焯等人。至于后来吴宓(雨僧)就任外文系主任，已经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

在乐山时，曾有人用“高翰高公翰”为上联，对以“顾如顾友如”。平仄倒是十分工稳。高翰原为哲学系主任，后来改任文学院院长，为人极其风趣，辩才无碍，口若悬河。武汉大学初迁四川乐山时，当地的县立民众教育馆曾经洽商武汉大学教授作一系列的演讲。用意相当谦虚，好像是区区小地方忽然有了一座大学堂，来了这么多大学者，就请开导一番、启迪一下民智。记得高公翰先生的讲题是“笑”，谁不曾笑过？那是并不怎么费事的事情。可是唯有哲学家、心理学家才说得出那么多大道理，而且深入浅出、谈笑风生，并未存心卖弄学问却处处显出博学。我想武大能在当地民众间建立起学术地位，高公的一“笑”之功不可没也。

上述下联的“顾如顾友如”，是外文系教授兼女生指导顾如，字友如。顾女士只教一班英文，是美国某大学的一名硕士，大约英文甚好，可是未见她用中文发表过文章，因此没有人把她归入女作家一类，去增加“珞珈三女杰”的名额。顾女士是南开出身，据说当年是南开出名的校花，我见到时，她已渐进中年，但风韵仍极高

雅，相信当年校花的头衔绝非虚誉。后来在台北一次聚会中，座中大半是男女弟子，小半是她昔日的同事，有人对她当年倾倒芸芸众生的情形愿闻其详，于是众口一词："顾老师，说出来听听嘛！"那时她已是60以上高龄了，可并未现老态，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就差没有闹出人命案子来就是了。"这是何等的笔墨。她没有写文章是十分可惜的事。用笔能够经济到一如蜻蜓点水，一句话远胜过一篇冗长的叙述。

顾女士管女生，据女同学说，十分讲情理。不像婆婆管小媳妇，也不像狱吏管囚犯，松紧有度，颇得口碑。就连不时枉顾白塔街女生宿舍的男士，也说她富于同情心，没有把好逑的君子一律看做抢亲的恶汉。我有一位好朋友，籍隶法律系，经常到外文系来"留学"，醉翁之意是想结交我们班上一位除去衣着尚入时、其余并无可取的女生。某晚某君携了三本大书——都是属于古典名著之类的东西，直奔白塔街求见该女。据他回来报告的灾情是：先是双方面面相觑，无话可说，接着他就以三大本名著相赠，对方似乎不知所措，花容失色，连叫几声"我不能接受你的礼物！"就从会客室奔到后面去了。这时顾女士正从外面走进来，看到他一副丧家之犬的模样，知道准是碰了钉子，问明原委，不免莞尔："原来是这么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啊！好了好了，把这三本书留在我这里，我也是念文学的，我可以看；有时也有女同学向我借书看，说不定我还可以替你借给她！"后事当然并没有照这种如意算盘发展，不过我这位朋友对顾女士的雍容，是感激涕零的。他说："不但感情上不肯把这几本书抱回来，体力上也真的抱不动了。"

上述以"顾如顾友如"对"高翰高公翰"，也有人以"陈源陈祖源"作下联的，这不大妥帖。因为高翰字公翰，顾如字友如，都是一个人。陈源字通伯，陈祖源乃是另一人。唯此人亦颇有可记之处，他是历史系的教授，欧洲史是他的专长，他准备的讲义材料十分丰富，在教室讲授时又时时加以补充，问题是他舍不得"割爱"。他授欧洲史，往往一学年才讲完上古史；他授欧洲近代史，略微提一提近代史以前的事以便衔接，这一提就把一学期提掉一半了。

写武大的旧人旧事，自必要从校长王星拱（抚五）写起。我虽

忝列门墙数年，并未和他直接打过交道。但对他的印象极好，总觉得大学校长就该像他那副模样。他终年长袍马褂，有重要集会如此，平常亦如此。在珞珈山时代，我只是在汪兆铭、王世杰、陈立夫三位中央大员到校演讲时，看到他在大礼堂讲台上做简短的介绍词，那也真是简短，后座之人还不大听得清楚。但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不像一般介绍名人演讲的主席，奉承的嫌疑很重，然后再把别人的废话摘要或补充做一个总结，苦了坐在下面的听众。

我对王抚五校长的好印象，都是由道听途说而来。可是每听到一点小故事，就增加一层对他的好感，为了维护这层好感，往往就拒绝相信传闻(因其可能失实)，固执到底。我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位化学系的高材生与军训教官发生冲突(当然是言语上的冲突)，似乎理亏的并不是学生，可是教官嗓门大，来势汹汹，训导处想用记过的处分来平息教官之怒，可是教官不答应，声称不把该生开除学籍自己就卷铺盖。在校务会议中，王校长没有官官相护的习惯，把是非曲直弄清楚，就慢吞吞地说："我宁愿更动一个教官！"自从听到这一件轶事之后，我私下对这位校长就开始肃然起敬了。这是何等的风度！当时我还不满 20 岁，入世未深，容易冲动，好像有点欣喜若狂的状态，连声说："大学校长当如是也！"

我获得王抚五校长照应的是一封他亲笔写的八行字的信。大约是在 1939 年年尾或者 1940 年年初，我已经是病体支离，颇有不起之势。乐山小地方医药设备差，而我的病情似乎又复杂迷离，几个好朋友决定死马当活马医，把我送到成都三大学联合医院去碰碰运气。似乎不如此，大家都心有不甘。行前有人到秘书室要封公函，请求医院体念该生来自战区，经济断绝，贫病交迫，酌情减收医疗费用等。等到我的好朋友去拿这封公函的时候，秘书室办事的人又给他一封王抚五校长亲笔写给"寿南院长吾兄"的私函。三大学联合医院是中央、齐鲁、华西三个大学医学院合办的，院长是中大医学院院长戚寿南，我一见到这封信就知道是校长的亲笔。那时乐山有一家裱画铺，我路过时总进去看看，常见到校长的书法。他虽然是科学家，可是诗做得好，字也写得好。另外几位书法家是哲学系的胡稼胎，中文系的刘赜、刘永济、徐天闵，机械系的郭霖。我若

不是为了那封信的实用价值，几乎想把它留下来了。

当然那时的大学没有今天大学学生两三万人的规模，但两三千人也还是有的。做校长的肯在百忙中为一个并无一面之缘的学生亲笔写封求助信，这种人情味是很难得的。我所知道的王抚五校长就这么两三件事，就凭这两三件事中所表露出的雍容、讲理、重道义、富于同情心，立传的人或者是替“为人师表”塑像的艺术家，也就不缺少什么基本资料了。

几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我的“误人”与“误己”生活》，写大学生活的一段，曾经提到某些教授，大半是我直接受业的。为了避免重复，这里不再提他们了。此处多少是想用漫画家的手法描绘出我依稀记得的印象，或者依稀记得的传闻。外文系有一位以韵文翻译莎士比亚《李尔王》出名的孙大雨，是写新诗的才子，他上课时有时会心血来潮在黑板上抄出一节闻一多的诗，连呼“狗屁!”再抄一节徐志摩的诗，也还是连呼“狗屁！狗屁!”接下去就抄一节他自己的诗，击节赞赏。这和他上的课并无关系，然而有了这段前奏序曲之后，似乎他上正课的情绪才能纳入正轨。同他有往来的学生说，孙大雨有两件讲究的东西：一张座椅和一张床，他相信一个人大半生都消磨在这两件家具上面，讲究一点也不为过。除去同代的诗人作品容易触怒他之外，就轮到管轮渡的人了，他坐武昌到汉口的轮渡，十有九次要和轮渡或者码头上的工作人员在言语上发生一点小冲突。没有人问他何以要如此，就像也没有人敢问他闻某、徐某的诗何以是狗屁一样。同诗人才子去讲理，对彼此都是扫兴的事。

不是诗人才子而专治英诗的是费鉴照，此人天分不怎么高，但是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苦读了几年书，英文能动笔，自诩为“文学的英文”，十分瞧不起历史系教授郭斌佳写的“新闻记者的英文”。学校内迁之后，郭斌佳没有跟去，留在重庆外交部或者是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做官去了，并且主编了一份英文刊物。有一次费鉴照把这本刊物带到教室，把郭斌佳的英文解剖得体无完肤，然后就劝大家学习英文，一定要取法乎上，那当然就是指他的“文学的英文”了。

费鉴照的专长是“浪漫诗人”，在利物浦的论文就是以济慈为题。他平时的穿着相当马虎，唯有开始教济慈的一段时间，总是衣

冠楚楚，讲完济慈就恢复旧观。他有肺病，我想他有时是以济慈自况的。说不定他在恋爱上也有过痛苦的经验，提到济慈的女朋友樊妮·布朗，不止一次双眉紧蹙、严词呵责，好像济慈就是樊妮害死的。后来听说他最终死于肺病，不过不是夭折，比济慈多活了一二十年。

还有一位中国才子型教授陈登恪，他是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共有的财产。他在中文系教中国小说史，在外文系教法文。有人说他一肚子学问，可教的东西多得很，可是教什么都等于没有教。他上课就念讲义，对学生视若无睹，顺着钟声下课。他是大诗人陈三立的儿子，大学者陈寅恪的弟弟。江西省修水县陈家的祖坟一定风水好。他们弟兄辈个个得天独厚，个个都有成就。除去陈寅恪是博通今古、流贯中西的通儒以外，他的长兄是名画家，二兄陈彦通以研究目录学望重士林。陈登恪的名望不大，据说是因为少年时在恋爱上受了挫折，寄情诗酒、无心著述的缘故。相传他在少年时代与某相国之女已到了论嫁娶的阶段，半路杀出一位青年军官。秀才遇见兵，秀才败下阵来，远渡重洋，到法国读书去了。他嗜酒如命，中年说话时有点发抖，双手亦微颤。中文系的老先生们对他的诗文很佩服，外文系主任方芦浪有一次对我们说陈登恪在法国时写过一本《留西外史》，可惜绝版失传了，是一本极有趣味的小书。他对陈君的记忆力、尤其是已经到了哀乐中年的记忆力不胜惊羡。据说他们有一次同游乐山对岸的乌尤寺大佛寺，倦游归来，陈君能把当时也只是一掠而过的几副长联逐一背出来，同有这样异禀的人一起念书，只有落后的份了。

教授中脾气大的、或者说爱发脾气的要数法律系主任燕树棠和历史系的吴其昌，不过他们发脾气的对象不同。前者是对学生，后者是对图书馆员。燕树棠原是北大法律系教授，和王雪艇、王抚五、周鲠生、陈通伯一批北大老人同来创办武大，在教授群中是“重镇”之一。他思想极端保守，遇到学生不肯好好读书最痛心疾首，忍不住时就破口大骂。抗战初期，捣乱的学生用“要求实施战时教育”做题目来罢课请愿。他在法学院门前对请愿的学生迎头痛击：“你们说给我听听，什么是战时教育！教育就是教育，你想学

开枪杀敌人就到军校去，到前线去，不要在这里捣乱，妨碍别人上课。”

吴其昌爱对图书馆员发脾气，就像孙大雨和武昌到汉口轮渡上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一样，都不是偶发事件，也不是专对一人而发。我们对某一类的人或者某一制度心存偏见，这种偏见殃及在这制度中讨生活的“池鱼”是相当普通的事。我两次亲眼见到吴其昌在图书馆大发雷霆。有一次我看到他拿起手中的一本书对着图书馆员砸了过去，却并未命中，就举足一踢，结果又踢到了椅子脚，最后只有一跛一跛地徒唤奈何而去。

（原载《我的武大老师》第二辑，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作者系外文系 1930 届校友

# 我的老师苏雪林教授

孙法理

我是1939年上初中时知道苏雪林这个名字的。有一篇课文的作者介绍是苏梅，字雪林，笔名绿漪。

课文多，作者也多，还有鲁迅、陶渊明、林觉民什么的，似乎都是作古的人，对于我都是辽远的过去。可我不久却发现，那位苏雪林离我并不远。

抗日战争爆发，武汉大学从武汉迁到了四川乐山。就在1939年冬天，我哥哥考上了武汉大学，教他一年级国文的老师竟然就是苏雪林。

5年后，我也考入武汉大学外文系。第二年，我去旁听了苏雪林的“宋诗课”，渐渐对她的样子熟悉了：白皙、文静、瘦弱。据说学生都不敢看她的脚，小时缠过又“解放”了，她最不愿别人注意。别人一看她的脚，她就不高兴。

她的“宋诗课”讲得很有趣，内容已不记得，唯一的印象：新颖。记得她分析苏轼的诗句“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时说：让塔上铜铃“独自语”，是“拟人”，塔就有了人格，似乎是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一串带d、t音的字：塔、独、颠、当、断、渡，是模拟铜铃的叮当声，是“拟声”，赋予了诗句音乐之美。两者都用生命点染了景物，别有一番情趣。

她总是这样娓娓地讲，每讲完一段就发下书稿，让学生传阅一段。我也找正班生借来细读。书稿写在带竖格的本子上，字迹工

整，但书法平常。她毕竟不是中文系科班出身——我在武大附中听过的国文课，老师的板书都是很漂亮的。有的还是著名的书法家，如文字学家刘赜(博平)，就连外文系的朱光潜老师也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那时，我听说过苏雪林老师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1930 年代初期，鲁迅称雄文坛，与人论辩，往往用词尖刻不留情面，甚至骂对方是“资本家的走狗”之类。苏雪林觉得过分。她认为五四运动争取的就是自由、民主、平等，谩骂是清朝衙门大老爷的做法，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别看她个头儿小，胆子却大，倔劲儿一上来，就挺身而出，在报纸上公开批评鲁迅，虽然因此和左翼联盟结怨，她也满不在乎。她就是这么个我行我素的性格。

第二件事情：抗日战争爆发，武汉市举行全市抗日募捐。苏雪林把平生吃粉笔灰、爬格子积攒下来的辛苦钱全数掏了出来，买成黄金若干两(有人说是 40 两)，送到捐献台上，献给了抗日军。此事透露出这位文弱女学者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令人佩服。

苏雪林、袁昌英和凌叔华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时原本住处相近，一起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有“珞珈三女杰”之称。武大内迁乐山后，三家人又住到了一起，其中还有个缘故：那屋子最初是苏雪林租到的，出入很方便，正好那里还有空房，就建议另外两家人也搬了过来。

赵树理有一篇短篇小说叫《套不住的手》，描写一个中年农民那双停歇不住的大手，这是对中国农民勤劳习惯的歌颂。其实，苏雪林也有一双“套不住的手”。房屋一搬定，她那双手就“套不住”了：她置办好木料、斧子、锯子、锄头、簸箕等工具就干了起来，修理门户，平整土地；还修了个菜园子种菜，让三家人都能吃到新鲜蔬菜。同时，她还在屋后开辟出可供三家人使用的防空洞，让大家有地方躲轰炸，还因此躲过了一次毁灭性的大轰炸。

当然，她这双“套不住的手”并不完全用在农活上，更多是用在做学问上。苏雪林出身诗书世家，十三四岁就写出了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北京高师毕业后，留学法国，学成归国后一直在大学教

书，并从事写作。在安徽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武汉大学都任过教。她的散文结为《绿天》和《棘心》两个文集出版，被阿英称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一起并称为20世纪30年代“五大女作家”。她的作品一再被选入中小学课本，我读初中时，课本里至少有她的两篇文章：一篇叫《秃的梧桐》，还有一篇是风景描写，名字记不清了。

在乐山的时候，苏雪林就已经开始探索李商隐，在楚辞和神话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1949年，苏雪林为朝圣去了罗马，为了《屈赋》研究资料问题，又顺便去了一趟法国。可这时她已无法返回大陆和老伴张宝龄团聚了，她辗转到了台湾落脚——先是在台湾师大，然后到成功大学任教，直到退休。

她是个异常刻苦的人，在成功大学的教师宿舍里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工作。老年后由于骨质疏松，多次摔倒。199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她不慎跌倒，一个人躺在地上5个小时，痛苦不堪。

出院后她仍然孜孜不倦地研究和写作。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她穷尽半生写成的近200万字的《屈赋研究》出版。可是，大陆出版的只有她的《苏雪林文集》和《苏雪林自传》。她那大部头的《屈赋研究》依然沉睡在书柜里。

别看苏雪林弱小文静，她的体质却结实得惊人！我见到她那本《浮生九四》时，就已大吃一惊了：以她那样瘦弱的身子骨怎么能活到94岁呢？可是，更令人吃惊的事情还在后头。

大概在1997年，在台湾住了50年的苏雪林，决心要回黄山老家看看。这时她已经102岁了。这位百岁老人眷恋故乡之情，受到海峡两岸文化界人士的尊重和政府的重视，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终于帮助她实现了重回故乡的夙愿。

1998年5月22日，她从台南飞抵安徽合肥。在参加了安徽大学70周年校庆之后，渡过太平湖，回到了阔别73年的家乡——徽州黄山区岭下村。乡亲们齐聚村口，以最隆重的徽州风俗欢迎这位“民国才女”重返故里，鞭炮之声不断，她的子辈、孙辈、曾孙玄孙辈以欢声笑语簇拥着她。老人看见故居的老房子依旧，幼时读书的女塾仍在，当年亲手栽下的桂花树已经老树虬干、枝繁叶茂……

不禁感慨万千。正午，乡亲们摆开八仙桌，端上了一大碗一大碗的徽州菜。老人吃到老家的蕨菜回锅肉时，忍不住兴奋地说："这可比台湾回锅肉好吃多了。"

这还不算，老寿星还硬要上黄山。5 月 28 日，苏雪林乘缆车登临黄山北海，纵览黄山云卷云舒的绝佳美景。20 世纪 20 年代，苏雪林曾在黄山小住，她写过黄山、画过黄山。她在台湾时经常对朋友说："我的家乡黄山是最美的地方。"她的房里也一直挂着黄山风景图。现在，她终于重登了多年魂牵梦萦的黄山。

当然，梦笔生花、猴子观海、仙人晒靴之类的景点，她的轮椅是到不了的。但是，黄山到处可见的迎客松她是能够看到的，它们正热情欢迎着这位远方归来的黄山女儿。

这次回来，学术界和家乡人士还在她下榻的黄山太平国际大酒店举行了苏雪林学术座谈会，畅谈这位作家对于中国文学及对楚辞屈赋研究的贡献，赞扬她孜孜不倦沉醉于学术的精神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1998 年 6 月上旬，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将苏雪林返乡行程进行了播报。

（原载《我的武大老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作者系外语系 1944 级校友

# 我眼中的许海兰教授

熊性淑

许海兰教授(1899—1995)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年了。记得那是1995年初春的一个早上。许教授的追悼会在小儿子桂希恩大夫工作的医院小礼堂内举行。许教授满头银发，面色红润，安详地睡着了。子女们和一些至亲好友依次走过去最后一次轻轻地亲吻了她冰凉的额头。

许教授出身于美国纽约一个华裔牧师之家，青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于康乃尔大学。1921年，她只身来到上海，与当时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桂质廷共结连理。此后70多年，她一直定居中国，历尽沧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我有幸于半个世纪前结识这位长辈，做过她的学生，又因家庭关系而称她为“桂伯母”。

最初认识桂伯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乐山。那是1942年初秋，我母亲朱君允教授抵达乐山武汉大学没几天，就急着要拜望桂伯母。一天，我怀着好奇心走进了刚刚结识的同班同学桂华珍家中。我来到桂家时，见临窗坐着一位身着蓝布旗袍、披棕色头发的中年妇女正在补袜子，桌上放了一个大簸箩，盛满了针线碎布等杂物。她见我进屋，就抬起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朝我笑吟吟地说：“你是熊性淑吧？我听华珍说过她们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那时我快满12岁了，和华珍一起在武大附中读初一。

这样就开始了我和华珍同窗六年、形影不离的友谊。在这6年里，她的家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我的家也是她的第二个家。

经过六年(1942—1948)难忘的中学生活，我们从不懂事的小孩逐渐长大成人。我看见桂伯母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当时所有的慈母一样，辛勤地哺育子女，照顾家庭，做饭、买菜、洗衣、缝纫等忙个不停。有时又见她挟着一本书，匆匆在街上走着赶去上课。1948年后我上武大，她成了我尊敬喜爱的“许老师”。若干年后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已成了一位白发老太太，于是我又恢复了小时的习惯，称她为“桂伯母”。“桂伯母”这一称呼总带给我温馨的感觉，近乎母女之情；我的母亲去世后，桂伯母对我来说就更加亲切了。

大约在1944年，桂质廷教授因公出差到美国去工作，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桂伯母身上。抗战时期，米珠薪桂，经济困难，桂伯母毅然决定参加工作，到武大附中教授英语。她教的第一个班就是我哥哥熊性美所在的高二年级。可以想象，有了这么一位活泼可亲、以英语为母语的教师，学生们有多高兴！可是这些学生毕竟还只是十六七岁的大孩子，有时坦率得惊人。一天，哥哥在家中饭桌上描述了他们班课堂上的一幕——学生：“许老师，您爱中国，还是爱美国?”许老师：“我都爱。我爱中国也爱美国。”学生：“您说爱中国。怎么证明呢?”许老师坦然回答：“我爱中国，因为我的先生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们都生长在中国。我自己也是中国人。我永远不会离开中国。”时隔多年，我不敢说现在的描述完全准确，但这件事却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许老师已用她96年的生命历程，实现了她当年在一帮小青年面前所作的承诺。桂伯母就是这样一位表里如一、诚实坦率的人。她是一个不含杂质的、纯粹的人。

上初中二年级时发生过一件令我羞愧万分的事，可谓“作弊未遂案”。因我一向散漫懒惰、荒疏学业，考试时学会了作弊过关。一次英语考试时我正要动手翻阅预先放在抽屉里的课本，一个美国腔的湖北口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熊性淑，课本不能放存抽屉里，你要做什么?”冷不防听到桂伯母的声音我震惊万分，赶快悬崖勒马，来了个急刹车，否则会被当众撕卷，后果不堪设想。桂伯母平日宽厚仁慈，碰到原则问题却铁面无私，她不失时机地制止了我的错误行为。事后华珍告诉我，她妈妈为此很生气，告诫华珍万万不可如此。

桂伯母见我能编织毛衣，就给我创造了一个“打工”的机会，让我赚几个零用钱。我小小的心灵十分明白桂伯母是个“大好人”，感激夹杂着尊重，还有几分畏惧。

一天，学校要开文艺晚会，我们班的女生要出个节目。出什么节目呢？6 个小姑娘一致决定：“走，找桂伯母去！”桂伯母歪着头想了一想，找出一本英文的儿童舞蹈书，说：“有了！就表演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吧。”于是在桂家的走廊上，桂伯母成了舞蹈老师。她自己先看书弄懂再示范，然后一招一式地训练我们；最后她伴奏，与我们“合成”。她始终兴趣盎然，我们更是兴高采烈。就这样练了个把星期。桂伯母还煞费苦心地拼凑出了几套“宫廷舞服”，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的演出大获成功。

桂伯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每逢星期日早上，她总端坐在教堂的风琴前热情地为唱诗伴奏，在许多公益活动中也总能看见她的身影。工作、家务、疲劳、清贫，似乎什么都影响不了她那乐观积极、热心公益活动的精神。抗日战争胜利后，桂家和我们家都于 1946 年回到了珞珈山的武汉大学。

华珍和我都进入希理达女中住读。我们上高二，周末回家，两人还是须臾不离。这时桂质廷伯伯已经从美国归来，带回许多新的学术思想与实验仪器，率先在中国开展电离层研究。桂伯母已在武汉大学英语系任教。也许因为桂伯伯回来了，也许因为生活条件有了相对改善，桂伯母脸上笑容多了、皱纹少了。她新添了一套浅蓝色的西装套裙。我第一次看见容光焕发的桂伯母。

一次周末放学回珞珈山，我随华珍来到十八栋桂家。客厅的门紧闭，听见从客厅隐约传来一位男子用英语演说的声音：“…my idea I sweet heart…my idea I sweet heart to”我们满腹狐疑；第二个周末相同的情景与声音又出现了，华珍就蹑手蹑脚下楼去看个究竟。不一会儿，只见她笑红了脸跑上楼来说：“哎呀，原来是妈妈那个学生赵世开，对着妈妈在练他的演讲稿呀！”这篇演讲稿不知耗费了桂伯母多少心血，遣词造句、话音语调、表情手势，她都耐心进行指导和纠正。赵世开也不负老师的期望，在英语比赛中一举夺魁。

1947 年秋，武大化学系新来一位著名学者张资珙教授。抗日战争前他与桂质廷伯伯在武昌华中大学共过事，并成终身挚友。张家的钢琴在战争时期没有跟着主人颠沛流离。抗战胜利后张资珙伯伯决定来武大任教，就委托桂伯母先将钢琴弄到珞珈山，暂放在桂家。就这样珞珈山上第一次有了一台正宗的钢琴。钢琴虽已失去了亮丽的外表与清脆的音色，但毕竟是“乐器之王”，能奏出美妙的音乐，引起我们这群少年女子无限的赞叹与遐想。最为兴高采烈的是桂伯母，她以“物尽其用”的思想为指导，马上利用暑假从汉口聘来一位白俄教师授课。参加学习的有以华珍、庐音为首的桂家六姐妹，姐姐性慈和我也在其中。课表排好，每人每日练习一小时。

武汉酷暑，烈日炎炎。每逢我们到桂家二楼练琴，就见桂伯伯的书房门紧闭，里面不停地传出清脆而节奏极快的打字声。楼下进进出出的姑娘们则叮叮咚咚练琴，吵个不停。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无法理解，繁忙工作着的桂家夫妇是如何能容忍这种噪音干扰的？且他们根本不是容忍，而是主动把这种吵闹请到家里来的。记得一次晚餐时，桂伯伯笑容满面地对一位姑娘说：“I heard you play. Oh，you played beautifully!”天哪！居然还 played beautifully！就这样，我们几个得天独厚的姑娘在桂家吵吵闹闹，高高兴兴地度过了一个暑假。

1949 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了。

1950 年华珍赴美留学，我留在武大外文系成了许海兰教授的正宗弟子，坐在第一排，但远非最好的学生。同时给我们授课的还有著名学者吴于廑教授、吴宓教授和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杨静远女士……说实话，这些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有许多我早已淡忘，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举止风度，对待青年学生耐心而又一丝不苟的学者风范，仍旧历历在目。

1951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决心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得到了妈妈的热情支持。桂家的庐音小妹妹也突然成熟长大了。她双颊通红，兴奋地在我家谈论着参军的事，要去打世界上最后一场战争，彻底消灭美帝国主义。她也得到了桂伯伯和桂伯母的支持。

全武汉市都沸腾了。送行那一天，妈妈、桂伯伯和桂伯母都戴上了大红花。我们则高唱着：“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

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踏上了征途。

1954 年深秋，我第一次由部队回珞珈山探亲。这时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但妈妈并没向我详谈什么。我说自己一定要去拜望桂伯伯和桂伯母，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呀！妈妈陪我去了。桂伯伯似乎更加敦厚慈祥了。他高兴地把华珍的相片拿给我看，还不无骄傲地告诉我庐音在部队里连连立功受奖的消息。

1958 年，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妈妈和我丈夫张以增都被错划成右派。1960 年我到武汉测绘学院教英语。我有了孩子，却没有一间可以安家的房子；教学任务很重，却要不断地应付各种批判与“划清界限”。我不敢与人多来往，只间接地听说桂伯伯被污蔑为特嫌，受到种种打击，1961 年因病逝世，年仅 66 岁，桂伯母极为伤心。我当时自己的处境也不佳，思想已近麻木，什么事都不多问，也不敢多想。我没有去看望桂伯母。有一次我远远地在油菜花田畦中见到一位一身黑色衣裙的女子，从步态上能辨认出那是桂伯母。她顺着蜿蜒小路正朝武大方向走去。我不能跑过去打招呼，只能在心中默默为她祝福，祝她勇敢坚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全家又遭了厄运。我先是被监督劳动，后又下放农村。桂伯母的情况我从武大的大字报中略知一二：她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并干着清扫厕所的活。

1972 年，我终于从农村抽调到华中工学院任英语教师，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全家又团圆了。1974 年的一天，突然收到嘉年从武大寄来的一封信：“湘云的儿子在武汉钢铁学院学习，需要一本华中工学院编写的日语教材，若弄到请寄去。”我喜出望外，立即搞到一本日语教材，提了一只大母鸡(那时母鸡还是个稀罕物)，迫不及待地往珞珈山跑。

仍是熟悉的校园，只是树木更高大了。走到一区山脚下我却全然糊涂了：怎么不见那栋半山腰的小灰楼了呢？20 年前被孩子们踏平了的上山小路也找不着了。可那些嶙峋怪石却还散落在山坡上。“不管它，爬上去再说。”我终于来到了桂家的旧居，从厨房敞开的后门直接爬上二楼。主人不在，房门却敞开着。迎面挂着乐山

时期的那面椭圆形镜子，镜下是已褪色的五屉柜。东窗下一排矮矮的书架上面陈放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它们原来是摆在楼下客厅里的)。西面墙上挂了桂伯伯的巨幅相片，华珍全家的小照则散置于东边的墙上。这里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经过新旧重新组合，令我顿时产生恍如隔世之感。

不一会儿桂伯母回来了。经过那么多的风雨与磨难，她还是步履矫健、笑容明朗活泼。见到了我带来的教材与母鸡，她就像孩子似的轻轻拍起掌来，连声说："下个礼拜来吃饭，全家都要来。"谈话兴奋而快乐地进行着。我们谈到桂家兄妹，也谈到我们一家。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谈到庐音时，桂伯母骄傲地说："她真是我们家的革命者，她带着孩子到北大荒垦荒去了。"谈到希恩夫妇时，她同样骄傲地对我说："那两位大夫经常坐着皮筏子跨越黄河去给病人看病，他们每年带孩子回来看我一次。"又指着墙上的电钟对我说："那是他们给我的礼物。"我们也谈到在北京的湘云大姐和正在访问英伦的华珍。桂伯母说，华珍的三个孩子正在英国上学。

多么博大深厚的慈母之心，她爱每一个孩子，且绝无任何世俗的功利色彩。她的价值观就是为人民服务，只要能为人民发挥作用她都引以为自豪。孩子们也都崇拜母亲，他们长大成人后的确个个都是好样的。

星期天以增和我带着第一次去珞珈山的力儿赴约。嘉年忙进忙出，在阳台上摆出了一桌丰盛的午餐。饭后真正的快乐时光来临：桂伯母在一架破旧的风琴前坐下，找出一本破旧发黄的 One Hundred and One，就娴熟地演奏起来。我也跟着琴声，先小声、后来就放声高唱起来。那些美妙的、久违了的音乐与歌词，经过多年的禁锢，又自然地注入我们的心田，一首接着一首，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又成了站在亲爱的桂伯母身旁的小姑娘。让时光经过她的手指与我的歌喉，与音乐融化在一起。音乐似乎带来了什么，又轻快流畅地向前奔去。多年的积郁都在这次歌唱中消失了。记得桂伯母那时视力甚佳，面对密集的乐谱，她完全不用眼镜；而我，虽年轻了 20 多岁，却非戴老花镜不可了。我一生中经历过许多幸福时刻，那个深秋的音乐之日最使我终生难忘。

那是1974年，坚冰虽未打破、“四人帮”还未倒台，但迎春花已悄悄地开放在我们心中。

我和桂伯母又恢复了来往。华珍也多次由美国回来探亲。每次我们一定欢聚在一起，畅叙友情，介绍近况。我们始终是好朋友，心灵相通。

1978年，桂伯母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故乡——美国，去探视华珍。当时她已年近80高龄，希恩亲自送她到罗湖口岸，目睹她一个人提了一只小箱跨过罗湖桥经香港到美国去了。华珍爱母心切，为她在美国办好了长期居住手续，希望她在美国安度晚年。然而，一年后，桂伯母却如期地回到武汉大学的教学岗位上了，而且还把华珍的女儿Helen带到武大外语系做短期教学。她要让桂家在海外的第三代也能认识新中国。她对美国的众多亲友说：“属于我的生活是在中国。那里还有我另外几个子女，还有我的学校我的学生。”我听后十分感动。别瞧老太太说中文带美国腔，举手投足之间带些“洋味”，但她的根已深深地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她心胸博大，同样地爱着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也许还有更多的国家)。美国是她的故乡，那里同样有她的许多骨肉亲人、她的青春与美好回忆……还是希恩说得对：她有自己的信念，却又绝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她走自己的路，却始终尊重他人的选择。无论是对待子女还是学生，她从不教训别人。我想这正是为什么众多晚辈都如此爱戴她的原因。桂家的第三代已构成了一个国际大家庭，包容了多种肤色，但年轻人们只要有可能，总会千里迢迢来探视老奶奶，向她表示敬意。

华珍还告诉我：“在美国过春节，许多华人都向桂伯母说‘恭喜发财’，并劝她不要再返回大陆了。桂伯母却笑嘻嘻地纠正别人说：‘在中国不说恭喜发财，说为人民服务！我还要回去为人民服务呢。’”这就是桂伯母！她永远表里如一，水晶般透明。凡是她真正接受了的、承诺了的，她必恪守终身。

20世纪80年代前期，她还在武大外语系带研究生并任教研组主任。当时国内正掀起学习英语的热潮。武大外语系许多青年教师争相请她辅导。她说：“每天一个组，一个星期有八天也不够呀！”

此外还有大量的社会活动及其他学术活动，她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她的生活始终俭朴，据说有段时间，中午她嫌往返家里午餐太费时，就一个人留在资料室，只用几片面包一点水果充饥。

她 70 多岁时，夏天还经常去东湖游泳、跳水。有一次从跳台上纵身一跃，头却撞在水下一块石头上，脸都肿成了一个圆球，她自己却并不在意，好在没两天就好了。

1985 年，桂伯母终于退休了。1978 年后她就与嘉年住在一起，希恩和庐音也都先后从遥远的西北与东北调回武汉。湘云大姐有机会常从北京来探望，子女们都十分孝顺，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华珍总说："妈妈太好了，对别人从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

每次我去探望，她总是露出慈祥和蔼的笑容，还常开点小玩笑，然后就端坐在电子琴前，手指在琴键上娴熟地演奏起来。她的琴声永远轻快活泼、欢乐振奋；更令人惊奇的是，到后来我即使戴着老花眼镜也看不清歌词了，只能估摸着凑合着唱，老太太却仍腰板笔直，不需眼镜，弹奏仍然流畅自如。她究竟是有着超常的视力，还是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我愉快地记叙着这些往事，内心充满了敬仰与感激之情。我很幸运能结识这样一位人品崇高的长辈，并长期得到她的恩泽与爱心。我能把她颇具传奇色彩的生平点滴写下来，实在是在享受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这严寒的日子里，我仍然能感到来自她的温暖与鼓舞。

窗外正是一个银色的世界。桂伯母，就是一位冰清玉洁的、纯粹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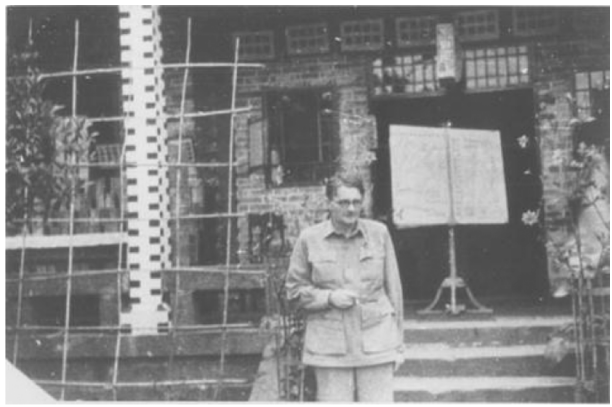
（原载《我的武大老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作者系外文系 1948 级校友

# 李约瑟与国立武汉大学

赵基明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 年 12 月 9 日出生于英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4 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1928 年起任剑桥大学等校生物化学教授。1923—1942 年在《自然》《生物化学杂志》《实验生物杂志》《伦敦皇家学会会报》等著名期刊发表近百篇研究论文，出版了《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胚胎学史》等学术著作，这些成就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1941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42 年秋，他受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和英国文化协会驻华代表，自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李约瑟博士 1943 年 5 月在乐山(嘉定)

李约瑟 1943 年 3 月底抵达重庆，立即着手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亲任馆长。该馆由中英两国科学家组成，具体负责执行为战时中国的科研和教育机构提供信息、援助物资。1946 年春离任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后返回剑桥大学任教并开始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科学史巨著于 1954 年开始分卷分册陆续出版，其后被多个国家翻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发起成立英中友好协会、英中了解协会并任会长，先后八次来华考察旅行，广泛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他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始撰写了大量科学史研究论文，直至 1990 年仍有《中国和欧洲——各有不相同的科学进步》在《交叉科学评论》上发表。他以科学史研究的巨大成就赢得了世界科学史界的敬重，1968 年被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授予国际科学史界最高荣誉萨顿奖章，1974—1977 年担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主席。他的学识胆略、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对中英科学交流事业的贡献令中国人民仰慕，1994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2009 年与白求恩、斯诺等人一起被评为“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之一。

1943 年春至 1945 年秋，李约瑟足迹踏遍了中国十省，参观了解中国战时的科学与教育机构状况，同时广泛考察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与典籍，收集资料为日后研究中国科技史做准备。他访问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等近 300 个教育和研究机构，其间曾两度到访国立武汉大学，并对武汉大学赞赏有加。李约瑟来访无疑是武汉大学早期对外学术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1943 年 9 月 25 日和 10 月 2 日出版的世界著名学术期刊《自然》连续刊载由李约瑟署名的《川西的科学》一文，其中用较大篇幅记载介绍了他访问武汉大学时的情形。

李约瑟与其助手黄宗兴 1943 年 5 月 26 日乘坐武汉大学派往成都迎接他的汽车来到乐山（当时称嘉定）。他在这座小城访问了武汉大学、工业专科学校、中央工业试验所等机构。李约瑟对武汉大学的最初印象是：“地处嘉定的武汉大学，由化学家王星拱博士任校长。一座美丽的孔庙是它大部分校舍，图书馆占据了供奉着孔子

像的正殿，理化两个系都位于城西李公祠，祠堂的城墙上有个可爱的凉廊，近可俯瞰大江，远处则是佛教徒的朝圣地——峨眉山。”那时武大因日本对华战争而被迫西迁乐山已有五年，这一时期的武汉大学是武大办学史上最为艰难的时期，只能利用祠堂、庙宇作为临时校舍，因陋就简办学，教学、科研、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学校校部设在乐山文庙内，而教室、实验室、宿舍等则分散在乐山城内外。

据《川西的科学》一文记载，李约瑟此次造访武汉大学，除到过乐山城内文庙崇圣祠校长办公地拜会了王星拱校长，参观了设在文庙大成殿内的图书馆外，还到访过位于乐山城外李公祠内的理学院等地。他在与学者们交流时都用小卡片记录下他们的姓名、特点等信息，黄兴宗负责登记他们所需的仪器物资等项目。例如，在关于胡乾善的记录卡上记载信息为：“物理学家、嘉定武汉大学，布莱克特的合作者(布莱克特也是胡乾善的博士生导师，因在宇宙射线等领域的贡献而荣获 194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研究宇宙射线，由于缺乏器材而无法开展研究工作。此人非常之好。”

在理学院，他了解到物理系胡乾善教授不久前完成了一部论述宇宙射线研究的专著(指 1943 年 3 月在正中书局出版的《宇宙射线浅说》一书)，理论物理学家江仁寿教授正在指导研究生刘立本等两名学生开展有关氧化铜整流器以及金属弹性变形温度效应的研究。在化学系交流访问时，得知其系主任、物理化学家邬保良教授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关于全向电力与静态核子的研究成果，叶峤教授则在开展天然药物活性研究。他了解到战时中国几乎所有从事研究参考用的书刊资料都是来自遥远的美国和英国，研究人员很晚才能阅读到这些资料。因为乐山离重庆国际文化服务社较近，在李约瑟访问武大时，老师们已可用上由他赠送的缩微阅读机阅读当年 2 月出版的《科学》《营养学杂志》缩微胶卷了。李约瑟切身地感受到了这些被隔绝的人们的由衷喜悦。

李约瑟还造访了由资深植物学家张珽教授领导的生物系。生物系也在李公祠内，且在距离不远的观斗山城墙上的一个石砌望楼内有一个生理学实验室。他对这个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实验室情有独

钟，做了详细访问和记载。李约瑟了解到，这个实验室是由著名植物学家、中国植物生理学研究和教育先驱汤佩松教授在武昌珞珈山时所建。汤佩松先生 1938 年调到西南联合大学工作后，这个实验室就成为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执教的高尚荫教授和他的同事们的科研场所，也是中国唯一用于非医疗细菌学研究的实验室。在这里，还有机灵敏锐的石声汉教授在从事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病理学教研工作，林春猷教授设计了一种新的电极用于血液 ph 值和红细胞渗透性的研究，实验室已经拥有当时在中国难得一见的瓦氏呼吸器。李约瑟称其是个“极好的实验室”。

李约瑟看到战时武汉大学科研工作取得很好的成果非常高兴，在望楼眺望大渡河与岷江交汇处的美景时，不禁吟诵起英国玄学诗鼻祖约翰·但恩的诗句。他乘兴来到河中一池塘参观，得知这个离大海约 2000 英里的池塘中每年都有淡水水母种群发育，而且这里的水母已由高尚荫教授和公立华助教命名为“中华桃花水母”，并在几年之前就对桃花水母进行了生理学研究。（这是中国学者最早在无脊椎动物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1939 年，研究论文《四川嘉定淡水水母之研究》在《国立武汉大学理科报告（生物学）》上连载发表，其研究简报 *Studies on the freshwater medusa found in kiating, Szechuen, China*，1939 年 9 月在美国著名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这一成果时至 2009 年仍有外国学者引用，2019 年仍有国内学者引用。）

李约瑟访问期间应邀为武大师生做了有关“生物化学”的专题讲演，还亲手为武汉大学当时的教学科研校舍、图书馆及学校的教授们和学生们拍摄了许多珍贵照片，这些收藏于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东亚图书馆的历史旧照，是对那段艰难岁月，对生生不息的武大人、中国人的真实写照，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追思。

通过这次访问与交流，李约瑟对武汉大学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他在其著述和讲演中曾多次赞许武汉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教师们在战争时期不怕困难、自强不息的科研精神和敬业精神。在《川西的科学》一文中，李约瑟对武大给予了高度评价：“武汉大学学术水平非常之高，甚至可与国立西南联大相媲美，这是毫无疑问

的。”(There is not doubt that at Wuhan University the scientific level is very high, comparing favorably even with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ies at Kunming.)李约瑟 1944 年年底回国述职，曾在伦敦广播电台发表题为《战时中国的科学与生活》的讲话，以武汉大学为例说明战时中国科学和科学家之艰难处境，告知世人“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指理学院所在地李公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武大学者追求科学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这位援华使者。

王星拱校长(中)、朱光潜教务长(右)、叶峤理学院代理院长(左)

右起依次为江仁寿教授、高尚荫教授、胡乾善教授、尹致中讲师、邬保良教授、叶峤教授、石声汉教授

按照李约瑟的日程安排，结束对武汉大学访问后要到位于宜宾市李庄古镇的同济大学访问，学校特意安排被李约瑟称为“一位很有剑桥气质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生理学家”的石声汉教授护送。1943年6月3日，李约瑟、石声汉、黄宗兴乘坐运盐的小木船顺江而下，一路上交流学术，情投意合，有如故交。这时正值多雨季节，他们挤坐在小舱内听着断续的雨声，文理兼备的石声汉触景生情，不禁应情应景地吟诵起南宋词人蒋捷的《虞美人·听雨》：少时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石声汉教授还在临行前用篆体书写一条幅赠与李约瑟，题名是“游嘉纪念”，内容为孔子答哀公问政中的名句“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李约瑟对武大学者的为人为学极为欣赏，并尽心尽力给予帮助。1944年，当他领导的重庆中英科学合作馆需要中国学者参与合作时，诚挚邀请物理系胡乾善教授担任物理学及机械学技术顾问，并同英国物理学教授班威廉共同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日常工作。他们不仅是好同事也是知心朋友，工作上的事也常在一起交流。李约瑟在1945年8月的日志中就有：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7日与胡乾善共进晚餐后讨论有关原子弹的问题。李约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后，他们一直保持联系，分享喜忧。胡乾善在于1946年12月22日写给李约瑟的信中，不仅关心询问刚刚开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情况，还写道：近期，中国科学社和新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共同组建了科学促进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标志，这个协会将资深的科学家与年轻的科学家联合在一起。但与每个中国科学组织一样，面临的唯一问题是缺少经费。中国的政治形势与以前一样，看起来两党之间没有妥协的可能。而政治局势也影响了经济形势。经济的稳定与工业化遥遥无期。因此，我决定继续我的教育生涯。直到20世纪60年代李约瑟访华时，仍然不忘这位老朋友，并提出与胡乾善相见的要求，可惜未能如愿。

1944年11月11日，高尚荫教授在因与世隔绝无法了解学科动态的情况下向当年的老师哈里森教授写了一封求助信，告诉老师说自己仍在国立武汉大学坚持日常教学工作，但很难得到外界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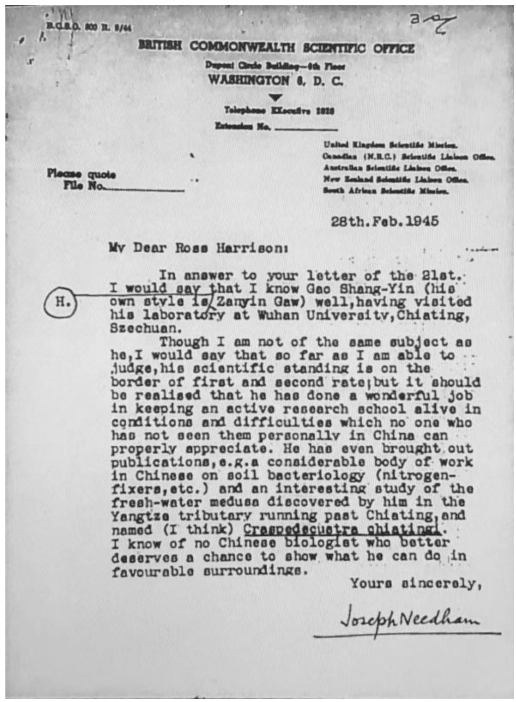
息……“我想知道您是否有可能帮助我安排一个一年期的职位。我不介意具体是什么机构，只要它能让我做些研究工作”。哈里森教授收信后没有立即做决定，因为他不了解这位弟子当时的研究状况。但他知道好友李约瑟到过中国西南考察，于是写信向他了解情况。李约瑟见信后于 1945 年 2 月 21 日在给哈里森的回信中热情洋溢地推介高尚荫及其成果：我认为，我非常了解高尚荫，并且造访过他位于四川嘉定武汉大学的实验室。虽然我与他的专业并不相同，但根据我所能做出的判断，他的科学地位介于一流与二流之间。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是在一个我们若不亲身见证就根本无法理解的恶劣条件下，出色地维持着一个研究机构的正常运转，甚至还发表了多篇关于土壤细菌学(如固氮细菌)的中文论文。此外，他还开展了一项十分有趣的研究，他在流经嘉定的长江支流中发现了一种淡水水母，我认为可称之为嘉定水母(后被高尚荫正式定名为“中华桃花水母”)。依我所知，没有哪个中国科学家比他更有资格获得到一个更好的环境中去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机会。

后来高尚荫收到斯坦福大学生物化学家温德尔·斯坦利教授的邀请，到其实验室做访问学者。在高尚荫到访的第二年，斯坦利教授因成功制备出烟草花叶病毒蛋白质结晶而荣获 1946 年诺贝尔化学奖。正是因为在斯坦利教授实验室的这段工作经历，让高尚荫后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了病毒学领域。由李约瑟亲笔签名向哈里森教授举荐高尚荫的原信件，至今仍被耶鲁大学图书馆所收藏。

李约瑟与石声汉更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学术型、事业型朋友，从石声汉 1945 年 12 月 17 日给李约瑟 12 月 2 日来信的回复信件和其后的交往看，说他们是过从甚密称兄道弟的终生至交也不为过。下面从石声汉复信中摘录一二，足可看出二人的亲密程度。

李兄惠鉴：本月二日大函领悉，甚感隆情……惠函之情真意切令弟深刻感念情谊，而英伦学者之同情牵挂，亦怦然心动。对往事之怀念，随之纷至沓来。几多时日，尔我四处游览，称心惬意；弟在伦敦逗留最后数月，众友人待我诚恳亲切，至感愉快……有关向兄咨询植物生理实验室仪器设备一事，吾兄关切，至为铭感。因校秘书处无意中耽延发送信件，谨此致歉，尚祈海涵……兄赠送在下

两册书：《达尔文作品集》《生命演变》均已得收。在此谨代表自己同事，敬致谢忱……随函附上拙作《生命新观》……



B.C.S.O. 800 R. 9/44

BRITISH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OFFICE

Dupont Circle Building—4th Floor
WASHINGTON 6, D. C.

Telephone EXecutive 1938
Extension No. _____

United Kingdom Scientific Mission.
Canadian (N.R.C.) Scientific Liaison Office.
Australian Scientific Liaison Office.
New Zealand Scientific Liaison Office.
South African Scientific Mission.

Please quote
File No._____

28th. Feb. 1945

My Dear Ross Harrison:

In answer to your letter of the 21st. I would say that I know Gao Shang-Yin (his own style is Zanyin Gaw) well, having visited his laboratory at Wuhan University, Chiating, Szechuan.

H.

Though I am not of the same subject as he, I would say that so far as I am able to judge, his scientific standing is on the border of first and second rate; but it should be realised that he has done a wonderful job in keeping an active research school alive in conditions and difficulties which no one who has not seen them personally in China can properly appreciate. He has even brought out publications, e.g. a considerable body of work in Chinese on soil bacteriology (nitrogen-fixers, etc.) and an interesting study of the fresh-water meduse discovered by him in the Yangtze tributary running past Chiating, and named (I think) Craspedacusta chiatingi. I know of no Chinese biologist who better deserves a chance to show what he can do in favourable surroundings.

Yours sincerely,

Joseph Needh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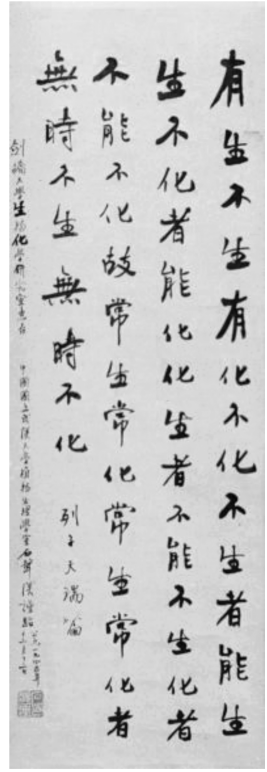
李约瑟签名举荐高尚荫的信件

石声汉同时还将自己在《生命新观》中引用《列子·天瑞篇》的一段话书写成条幅，赠与剑桥大学同行众友，是想借中国道家宇宙万物生成与转化的认识论，来表达自己的生命观人生观，并与剑桥友人交流。李约瑟在世时一直将石声汉书赠的条幅挂在办公室醒目处，将其《生命新观》置于背后书架上。如今，这些赠品和石声汉后来的《齐民要术今释》等多种著作都收藏在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内，见证着中英两国科学家的真挚友谊。

1958 年 7 月，李约瑟访华时再三要求中国科学院陪访领导安排，并得以与石声汉教授会面（此时石声汉已调往西北农学院工

作），与其讨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卷、农学卷的编写问题。回到北京后，李约瑟向中国科学院领导提出派遣石声汉去剑桥与他合作三年，共同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卷、农学卷编写的请求，可惜在当时背景下，这一计划未能成为现实。

李约瑟的科学史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 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序言中他对武大友人深表感谢："在成都和嘉定，我有机会聆听郭本道以及已故黄方刚（郭本道为神学家，华西大学教授；黄方刚为黄炎培之子，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关于道教的艰深而重要的阐释……与此同时，当时武汉大学校长、已故王星拱博士，则使我看到了旧儒教的各方面的教义。"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一分册（植物学）出版时，李约瑟特地在扉页上题记：谨将本分册作为对植物和真菌学教授石声汉的纪念，以感激他那激励灵感、轻松愉快的谈话，并追忆嘉定雨中的"人蘑菇"……在书中谈到石声汉教授所做工作时称其为"我的朋友"。在第六卷第二分册（农学）出版时，他又在扉页上写道："谨以本分册纪念武功西北农学院石声汉教授……没有他们开拓性的中国农史学著作，本分册是无法完成的。"他在读到石声汉教授的著作时深情地说："他在西方世界已很出名。因此，石声汉是不会被忘记的，而我个人将一直最深切地记着他。"李约瑟对武汉大学的



石声汉书赠剑桥大学生化研究室的条幅

访问不只到过理学院，从他对黄方刚教授的致谢可以看出，他在武大访问期间也曾与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有过交流探讨，这些对成就其科学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也有很大帮助。

国立武汉大学流亡乐山的八年，虽然正是战火频仍、民不聊生的至暗年代，但老一辈武大人却共克时艰，铸就了武大极为辉煌的一页。李约瑟对武汉大学的访问、赞许和宣传，也让国外学术界加深了对武汉大学的了解，大大提升了武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武大人应该在铭记西迁乐山的艰难岁月、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乐山精神的同时，永远记住李约瑟这位好朋友、老朋友。

2023 年于武大是个特殊的年份，笔者谨以此文纪念武汉大学建校 130 周年，纪念李约瑟博士访问武汉大学 80 周年，并向建校以来的先贤大师们和所有为学校作出贡献的人们致敬。

作者系物理系 1973 级校友

# 遗传学家余先觉

周荣家

孟德尔为确立遗传学基本原理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摩尔根和他的学生们则以果蝇为材料，发现了伴性遗传规律以及连锁、交换和不分离遗传规律，并提出基因论等，这是对孟德尔遗传学说的重大发展，为现代遗传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余先觉教授正是这一时期在摩尔根实验室中成长起来的现代遗传学家。

图 1　Sien-chiue Yu，1909—1994

余先觉于1909年1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农民家庭。父母以种田为生，育有8个子女，余先觉排行第三。因家境贫寒，父母只好把他的一个哥哥过继给经商的叔叔。他的这个哥哥为他后来上学提供了不少经济援助。余先觉就在这样一个典型的南方农村家庭中长大，自幼学习刻苦、上进和坚强，并对大自然和生物有着浓厚的兴趣。1931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在大学期间，他不仅成绩优秀，而且爱好运动，在校出类拔萃。1935年毕业时，被胚胎学家章盈五教授推荐留校，担任生物学系助教。在他毕业后的10年里，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学校西迁四川乐山，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不仅没有丢掉自己的专业，而且还刻苦学习，努力工作，自编讲义，在组织学、细胞学和胚胎学等多门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充实了自己的理论基础知识。[1]抗战胜利的第二年，余先觉获得李氏基金资助，被派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余先觉在加洲理工学院进入了摩尔根(Morgan)的实验室，成为斯特蒂文特(Sturtevant)教授的学生。当时该校生物学系的创始人摩尔根刚刚去世，摩尔根的大弟子斯特蒂文特和摩尔根夫人还留在摩尔根实验室里继续从事果蝇的研究工作。斯特蒂文特于191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摩尔根的果蝇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随摩尔根来到加洲理工学院。斯特蒂文特的学生刘易斯(E. B. Lewis)和诺卫兹根(E. No vitski)直接对余先觉进行实验研究方面的指导。刘易斯后来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并于1995年因果蝇发育生物学研究成就获得诺贝尔奖。余先觉于1949年完成博士期间的研究工作，写出了长达112页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取得了博士学位。余先觉的博士论文课题是用X-射线技术研究果蝇的反向突变和位置效应，[2]导师和刘易斯对他的实验结果十分满意。余先觉获得了一系列的新发现，包括有名的触角足突变(图2)，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突变为 $Antp^{Yu}$，被刘易斯推荐编入果蝇遗传学研究的工具书 *Genetic Variations of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中，并于1968年由美国 Carnegie Institute 出版。该突变体的发现为后来刘易斯等研究同源异型盒基因与果蝇发育奠定了基础。编入该书的有由

余先觉发现和命名的 T(2；3) $Antp^{Yu}$ 突变，以及 B48g、Scar、T(2；3)B48g 和 T(2；3) Scar 突变等。[3] 余先觉非常爱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决定立即回国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当时他的哥哥是国民政府驻休斯敦的总领事，多次劝其留在美国，但他毅然于 1949 年 10 月回到了祖国。返回的旅途是艰辛的，他知道祖国当时缺乏专业书籍，回来时随身带了大量的专业书籍及文献资料，返回船只转到天津上岸，他扛着沉重的书籍，转辗回到武汉，任武汉大学生物学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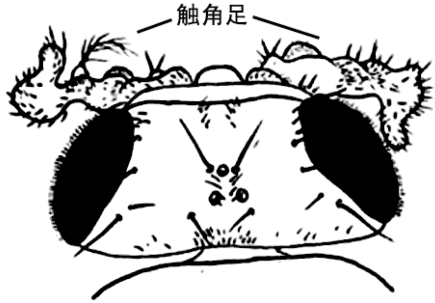



图 2　果蝇触角足突变 $Antp^{Yu}$

余先觉教授在武汉大学生物学系执教 50 余年，对中国的遗传学教育事业忠心耿耿。他先后指导了细胞学实验、胚胎学实验，讲授了组织学、细胞学、遗传学、动物学、昆虫学、生物学引论、农畜育种学和细胞遗传学专题等课程。他对教学准备十分充分，讲课语言准确，概念清楚，逻辑性强。他总是这样说："如果不事先默好，临时想着什么讲什么，很容易离题，也很容易出错。"他的教学得到了生物学系师生的一致好评。他注重抓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他领导建立了武汉大学遗传学博士点，这也是我国当时第二批博士点。该遗传学学科现在已经是国家重点学科，拥有植物遗传学、动物及人类遗传学、微生物遗传学等研究方向齐全的综合性遗传学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基地。他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学者，桃李满

天下。他不仅指导研究生，更重视年轻教师的培养，比如该博士点成长起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教授，以及余其兴教授、宋运淳教授、周暾教授、何光存教授、丁毅教授、杨代常教授、胡中立教授、李立家教授、李阳生教授，还有洪云汉教授(新加坡)、任修海(美国)、李渝成(美国)、李康(美国)、周密(美国)、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桂建芳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李奎教授和河南师范大学常重杰教授等。他晚年时还招收了唯一一名博士后——周荣家，后来也成为该系教授。

余先觉是位忠实的摩尔根学派学者。20 世纪 60 年代起，随着全国对摩尔根学派的接纳，余先觉教授选定鱼类为材料进行遗传学实验研究，招收了研究生。但不久又遭到十年“文革”浩劫，刚建立起来的遗传学实验室不得不终止。直到 1978 年“文革”结束，他才重新恢复招收研究生和进行遗传学研究。他和他的研究生们对中国淡水鱼类细胞遗传学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获得了中国淡水鱼类细胞遗传学的第一手资料，这是首次对中国淡水鱼类染色体进行的系统性研究。研究成果“中国淡水鱼类染色体组型的研究”于 1988 年获得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并由余先觉教授等主编成《中国淡水鱼类染色体》专著，1989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已经成为鱼类遗传学研究领域的工具书。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对鱼类染色体的精细结构和基因组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成果“鱼类染色体精细结构和基因组结构研究”，于 1995 年获得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979 年中国遗传学会成立，余先觉教授被推选为中国遗传学会第一届理事，《遗传学报》第一届编委会编委，湖北省遗传学会第一任理事长。1980 年被推选为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第一届理事。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他编写了《遗传工程简介》纲要，向湖北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和武汉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的干部作了报告。这为当时宣传孟德尔遗传理论，普及遗传学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余先觉教授在武汉大学执教 50 余年。1994 年 8 月 10 日与世长辞，享年 85 岁。

## 参考文献

[1] 宋运淳编写. 余先觉. 见：谈家桢，赵功民主编：中国遗传学史.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902-906.

[2] Sien-chiue Yu. A genetic and cytological study of some X-ray induced mutations and reverse mutations in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Ph. D. Thesis,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lifornia, 1949.

[3] Lindsley D L, Grell E H. Genetic variations of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Carnegie Institute of Washington Publication, 1968, 727.

（原载《遗传》2008 年 8 月）

作者 1992—1994 年在生物系（遗传学专业）做博士后

2022 年 1 月 18 日，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收到一笔 7800 万元的捐赠，捐赠来源于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一位匿名校友，为感激当年武汉大学对学生的关爱和培养，决定把自己的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匿名捐赠给母校。为了向恩师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余先觉致敬，将捐赠项目命名为“余先觉生命科学教育基金”。（编者注）

# 我的老师邵象华院士

张兴钤

1939 年暑期过后，王星拱校长发出聘书，请来一位学识渊博、年仅 26 岁的青年教授邵象华。他是有名的英国伦敦大学的冶金专业硕士，英国皇家矿学院、帝国理工学院特殊学衔和马瑟科学奖金获得者，同学们对他非常景仰。

虽已时隔数十年，当时曾在乐山武大读书的同学仍是记忆犹新，近日几位老校友重去探访了邵象华老师，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教授，虽已年逾 80，但精神饱满，谈笑风生地和我们畅谈往事，师母王晓云也在座，还不时插话。

邵老师兴致勃勃地说："我从浙大化工系毕业，在上海交大工作两年后，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公费赴英留学转习冶金，1937 年获伦敦大学硕士学位后，适逢当时任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先生作为特使访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之便，召见了我，动员我参加国内正在筹建的中央钢铁厂。钢铁救国本来是我的夙愿，我立即终止了继续攻读学位的手续，即先去西欧几国考察钢铁工业，然后到承包'中钢'工程的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实习进修。"从那时起，邵老师就和祖国的钢铁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邵老师说："我在国外任务尚未结束，抗日战争就已爆发，不久战祸延至湖南，日寇侵占了湘潭，钢厂宣布缓建。"1938 年，邵老师辗转回到昆明，暂在建设中的"中央机器厂"工作，在那里筹建了理化实验室和耐火材料车间。

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邵逸周早年亦曾在伦敦留学，是邵老师的校友，深知邵象华的学识和情况。当时武大正在筹建矿冶系，遂于1939年聘请邵老师为第一任冶金教授。他来校后的主要工作是筹建教学必需的冶金实验室，同时还为其他系开了工程材料学等课程。邵老师学识渊博，有雄厚的理论根基和丰富的阅历与实践。在讲课中他条理清晰，既深入浅出地讲清了基本概念，又指出了其实际意义和应用。每次讲课他都认真准备。如在讲作为钢的组织和性能基础的铁碳相图时，他将事先亲自用大张绘图纸工整绘制的相图挂在黑板上，大家一目了然。同学们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既学到了知识，又领受了他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娴熟的表达技巧。他还善于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学卢贞等提出请邵老师用英语授课，他即用流利的英语讲课，但因少数同学听不懂，又改用中文讲。邵老师讲到当年武大举办学术报告会的情况时说："当时虽是抗战的困难年代，但武大的学术空气十分浓厚，经常举行学术报告会，由教师自选题目，在由旧庙改成的大教室中做学术讲演，全校师生自由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座无虚席，很多同学即使是站着也听得津津有味。记得当时高尚荫、丁道衡(地质学家)、赵学田(机械专家)、杨仁缏(欧洲历史学家，也是中英庚款留学回国的学者)等教授都做过专题学术报告。"邵老师也做过几次学术报告，讲西欧各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情况，并结合讲到他在四川、云南等地亲自调查所了解的我国自古就有的土法冶炼方法。邵老师的报告内容新颖生动，联系实际，至今印象犹深。邵老师说："当时武大教学设备很差，但由珞珈山搬来的图书馆却藏书丰富，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的书刊都较齐全。我爱读书，经常去借阅理工书籍和一些外国古典名著。那时精神生活并不单调，物质条件则比较艰苦，夜晚靠一盏小油灯备课和编写教材。我们睡在竹片制成的床上，夏天虽凉快，冬天却很冷。幸好乐山的冬季不长，多穿点衣服，盖上厚被，也就过去了。"邵老师对当时生活更加艰苦的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感触极深。他说："我看到那些青年学生满腔热情地从事各种爱国活动，同情之心也就油然而生，由旁观而参加而支持。"他经常看爱国学生举办的各种演出，在对抗日前线战士的慰

问捐助活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他也曾帮助写论文的同学找到一些有关苏联的参考书刊。当行辕公署的便衣特务欲对爱国学生进行逮捕时，邵老师不畏风险，设法掩护特务指名要抓的同学，为他们寻找躲避的处所。邵老师的这些正义行动，老校友们至今念念不忘。

邵老师认为他在武大矿冶系任教的那段时间，是他为祖国的钢铁事业出力的真正起点，也是他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但为时不久。1940 年秋，资源委员会为了在大后方增产钢铁的迫切需要，又把他请了回去。他从当时当地的资源条件及产品要求出发，并考虑到全国铁矿资源的特点，为战后发展钢铁工业技术做准备。他提出建立小容量现代化碱性平炉炼钢厂的方案，得到了批准。其后几年，他参考国外经验，在四川运用最新的热工和气体动力学原理，亲自设计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小平炉并主持建设，于 1944 年末投产。这是我国炼钢技术发展初期的一件盛事。工厂的建设和投产过程，是和一支新的钢铁技术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的。在那个战争年代，有不少大学从沦陷区迁到大后方，加上那里原有的大学，每年都有矿冶系的学生毕业，邵老师每年都要吸收几名优秀的毕业生参加创建钢厂的工作，其中也有不少武大矿冶系毕业的学生。他们为当时的钢铁生产作出了一定贡献，后来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重要骨干力量。

1945 年日本投降后，邵老师被调到东北参加接管日寇占领时期建造的钢铁公司，其后担任鞍钢公司协理兼制钢所所长，当时的总经理是原武大工学院院长邵逸周先生。邵老师沉痛地说：“接管后看到，已在战争中破坏的钢铁厂又遭忙于内战的国民党军警明劫暗盗，致使复工极为困难，终于被迫停止，感到非常痛心。1948 年 1 月 29 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鞍山。军代表一再宣讲党的政策，打消科技人员的顾虑，以实际行动保护工程技术专家，保护钢厂，使我们深受感动。其后，东北地区有一段拉锯战时期，我们随解放军撤出鞍山，到丹东集中学习。除了学习当时党发布的许多文件、资料以外，还读了干部必读 12 本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些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我恍然悟到，

在自己过去许多年作为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经历中，只有那些符合辩证唯物发展规律的事物才能够得到成功，否则都要失败。马克思提出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一根本原理，使我深信共产党真正争取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发展生产力，使人类不断进步以达到更加幸福的崇高目的。”邵老师似乎突然发现他过去为什么搞不出钢铁救国的壮举，为什么过去的钢铁救国论是脱离实际的空想的了。而今后钢铁必然作为一门基础工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发展起来。邵老师决心留在解放区。邵老师在新建的鞍钢公司任总工程师、钢铁生产技术厂长、公司技术处长和中央实验室主任。他以极大的热情主持炼钢设备复修和生产恢复工作，被授予二等功臣称号。1950 年，他主持制定了各项技术管理制度，建立了公司技术管理体系，这是鞍钢人至今所共知的。邵老师是我国现代化大型联合企业技术管理工作的奠基人。

邵老师说：“钢铁工业创建初期，最急需的是人才。技术专业人才、技术工人，以及业务管理干部，当时鞍钢都十分缺乏。中央号召：‘全国支援鞍钢，鞍钢支援全国！’很多大学毕业的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向鞍钢，当时来鞍钢工作的武大同学就有 30 多位。他们都是第一次接触鞍钢这样的现代化大型联合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经验都急需提高。我提出加强技术教育的具体建议，经领导批准后由我负责进行。”邵老师一方面用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在建厂和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培养出一大批后来成为全国各大钢铁企业中举足轻重的技术骨干力量；另一方面组织公司、厂矿及科室全体领导干部，包括鞍山市委书记，每周两三次在清晨上班前学习两小时，由他讲课。邵老师说：“这些为解放事业作过重大贡献的老干部，没有居功自傲的架子，都虚心求教，渴求知识，努力争取变外行为内行，为祖国钢铁工业献身。他们在百忙中坚持业余学习，上课认真听讲，记笔记，严肃地参加考试，这种刻苦的崇高的精神使我十分感动，我越讲越有劲，我在业余时间努力编写教材，印发讲稿。以后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钢铁技术专著《钢铁冶金学》。这些老干部的作风使我对共产党能办好鞍钢增强了信心。”以后，我国钢铁业蓬勃发展，鞍钢为各大企业输送干部、工程师和技术工

人，达到鞍钢支援了全国的要求，当时冶金界称“鞍钢是冶金工业的老母鸡”，这和邵老师在技术教育中付出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1958 年，邵老师调钢铁研究所工作。40 年来，他结合国家急需和资源特点，研究开发冶炼钢、铁合金和特殊合金的新技术、新工艺，并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独创用普通电弧炉生产超低碳不锈钢的特殊工艺，解决了国防工业的急需。他创立从平炉渣提取铌、锰的工业生产流程和铁水连续处理提取铌、锰的喷雾处理法；他主持建设了国内第一台工业用电子束熔炼设备，等等。

邵老师对人对事虚心诚挚，普通科研工作者来求教，来咨询问题，或来信，他都平等对待，共同探讨。对每一篇求教指导的论文或信件，他不分日夜地查阅资料，认真答复。他虚心诚恳的态度感动了每一位来访者。

一丝不苟，敢于力排众议，直言不讳，更是邵老师的高尚品格。20 世纪 50 年代，邵老师冒着风险，对发展我国钢铁工业提出了正确意见，却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歪曲非难，他至今无悔。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未来学家提出淘汰钢铁工业的主张。他们说，今后信息计算机科学将代替一切传统工业。他们将钢铁工业称为“夕阳工业”，又说用不着制造工业了。邵老师说：“未来学家主要是美国的一些学者，他们主张社会分工，认为美国已发展了足够的钢铁等制造业，今后发展中国家不需要发展钢铁工业了。我们国内的一些科技工作者对此一知半解，也提出钢铁和汽车工业都用不着了的理论，有的领导干部也随声附和，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有些青年人认为搞钢铁工业很辛苦，不少青年不愿做钢铁工业工作，不愿报考冶金专业。有些流毒至今未肃清。我花了很多时间，查阅未来学派及现实工业发展的资料，发现未来学派的学说即使在美国也只是一部分人的主张。美国一些教授发表的论文也提出不能为发展高技术就不要钢铁工业。我不仅写论文公开批驳钢铁工业是夕阳工业的理论，并在国际国内各种有关会议上大声疾呼：我们要高技术，要发展信息工业，但我们的钢铁很少。现在世界上平均每人有 500 公斤钢，而我们每人只有 100 公斤。我国的钢铁工业不是夕阳工

业，而是欣欣向阳的现代工业。”在邵老师的大力批驳下，抑制了钢铁是落后工业的思潮。

师生畅谈了近 3 个小时，邵老师意犹未尽。他又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年老且曾患过重病却至今仍很健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多方面的生活情趣，从青年时代起就爱好足球，又喜欢音乐，曾是学校乐队的小提琴手，现在忙碌过累时，就以听音乐为最好的休息。邵老师的书橱里装满了古典音乐录音带，还编了藏带目录册。他每天坚持到紫竹院公园走一两个小时，这也是健身之道。我们感到，无私奉献，淡泊名利，性格开朗，更是他的健身之本。

20 世纪 50 年代邵老师就是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 年改称院士。1994 年邵先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双院士是我国最高荣誉，充分说明了邵老师对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和在我国科技界的崇高威望。

邵老师至今还不断在为研究钢铁工作执著地追求着。

（原载《我的武大老师》第二辑，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作者系矿冶系 1938 级校友

# 刘绪贻先生在1949

胡　耀

2018年11月10日，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于中南医院病逝，享年106岁。刘先生以其德高、学高、寿高闻名于世，但其1949年前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为武汉大学及武汉解放作出的历史贡献却不为学界所熟知。

2011—2014年，我曾到珞珈山麓“求索斋”和中南医院拜访、探望刘先生数十次，在协助先生处理部分日常事务的同时，有幸聆听先生纵论旧人旧事。近日，我在查阅档案史料时，更首次发现1949年前先生参加地下斗争的珍贵原始记录。本文综合利用未刊档案等文献，描摹先生思想觉醒的曲折历程及1949年前夕的革命经历，从中或可折射出包括先生在内的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团结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追求光明和真理的精神轨迹。

## 思想转变的艰难历程

刘先生1913年出生于湖北黄陂，1932年考入省立武昌高级中学，1936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生，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在陪都重庆短暂工作后，1944年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赴美之前，刘先生在中学、大学长期受“五四”启蒙教育和自由主义思想熏陶，有志于学术研究，对政治毫无兴致。1932年，

由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创刊，宣称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各自思考的结果。刘先生在阅读该刊的过程中，深感这一立场与其少年时形成的“素王”之志甚为契合，颇慕胡适为人，希望成为像他那样的大学教授。先生北上负笈清华园之际，正是华北危机日益加剧之时。先生忧心国难，但与政治保持距离。入校后，却意外被选为清华大学第十二级级会干事，虽一再接到通知，却未参加级会任何工作。先生自我评价称，他在清华这一年，“思想上还是个不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全面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刘先生在西南边陲的艰苦环境中发奋学习，亲炙陈达、潘光旦、费孝通等学术宗师教泽。刘先生当时虽同情联大左派，反感右派学生，仍极少与闻政治，也从不在活跃的校园壁报上开展争鸣，在喧闹复杂的政治浪潮中，他自认为“只是个有些热心的旁观者”。

本科毕业后，刘先生因女友周世英已在重庆工作，于是放弃跟随名师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来到重庆与女友结婚，并在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社会部等部门供职。约在 1941 年下半年，社会部两位青年因涉嫌参加共产党被捕，部长谷正纲遂强令凡在此工作者必须加入国民党。当时在社会部工作的刘先生不愿参加任何党派，但为了生计被迫加入国民党，由上级代办集体入党手续，做了一个挂名党员。在重庆期间，刘先生耳闻目睹国民党的专制腐朽，曾愤然投书《大公报》揭发身边贪污现象，最终决心与国民党官场彻底决裂，重返学术界。

刘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留学之初，已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但对共产党仍无了解。与先生同校学习俄语的美籍犹太人马尔科姆·柏森了解到先生的思想状况后，主动与先生接近，两人成为好友。柏森曾在中国解放区从事救济工作，同情共产党。1950 年，刘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起这位外国同窗对他的影响：“他给了我毛主席的一些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之类的书，此外，他还给了我《四大家族》一书。从这些书里，我认识到了四大家族的真面目和当时社会腐化的情形。看完毛主席的一些著作后，我才晓得尽管读了几十年书，在大学里还是专门研究的社会

学，可是对于中国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社会，始终都没有弄清楚，经过毛主席透彻的分析，我才恍然大悟，从这里我才找到了真理。”与柏森的交谊和对红色文献的阅读，成为先生思想转变的重要环节，他逐渐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希望寄托于当时唯一能与国民党颉颃的中国共产党。

## 珞珈山下的进步教授

1947 年 6 月，34 岁的刘先生硕士毕业后动身回国。因其家在武汉，且作为湖北公费留学生有服务本省之义务，故于同年 10 月正式应聘为武大经济系副教授，讲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

对于武大，刘先生并不陌生。1936 年，他在考取清华公费生的同时，亦和周世英双双考取武大，但因经济拮据只得选择清华，与周世英暌隔两地。1937 年 9 月至 1938 年 1 月，他曾在武大外文系短暂借读。刘先生因思想已左转，在教学工作中开始尽可能地做一些有利于共产党力量壮大的事。如他摘译芝加哥大学导师威廉·奥格本与人合著《社会学》一书中的内容作为武大社会学教材时，利用该书的自由主义色彩，影射并批判国民党政权的独裁专制；同时，刘先生还将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著作《社会学大纲》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因先生讲授内容新鲜生动，颇受进步学生欢迎。

在教学工作获得肯定后，刘先生又发奋写作，1948 年 1 月至 1949 年 2 月，在《观察》《时与文》《世纪评论》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其中，在极富影响力的《观察》杂志（储安平主编）上刊登的文章达 13 篇。这些文章从文化思想的深层次，剖析中国传统社会专制统治的形成和延续，反映出先生愈发鲜明的政治倾向。如先生 1948 年 9 月发表的《人民自己作主人才是真正的民主——论“民本”不是“民主”》，指出“民本”与“民主”的根本差异，呼吁群众不要被“民本”迷惑，而应真正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先生暮年曾回忆该文写作缘由：“当时，蒋介石搞小恩小惠，吹嘘自己是在搞民主。我有两个同事，都是老资格的教授，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在搞民

主，我就和他们争论。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揭露蒋介石搞的是民本，不是民主。”这些文章中亦不乏辛辣直白之语。如先生 1948 年 12 月发表的《狂澜》一文，在评论国统区的达官贵人随溃败的国民党军形成一股南逃狂澜时写道：“他们从前既然腐化了东北各城市，使十三个精锐军变成废物，自然他们也会腐化上海、汉口、广州、台北等，使守卫这些地方的精锐军队变成废物。”

刘先生晚年坦言，“1948 年我写这些文章时，政治上早已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在学术思想上，我还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转变往往难以迅速而彻底，刘先生在教学和著述中努力追求进步，但还遗留着自由主义者的情结。1947 年，毛泽东曾对国统区学生运动给予高度评价，誉其为同人民解放战争“第一条战线”相配合的“第二条战线”。1948 年一二月间，武大学运激昂蓬勃，学生为抗议英警九龙暴行、声援同济大学“一·二九”事件等接连进行罢课斗争。2 月 4 日，刘先生等 8 名教授鉴于罢课几乎有每周间歇发作的趋势，联名发表告全体同学书，劝导学生珍惜求学机会，并表示“我们承认罢课是青年学生对国家现状烦闷不耐的结果，但却不以为它对现状一定能有积极改进的作用”。这一不合时宜的意见和当时的政治大潮有着明显的隔阂。武大左派人士在 1949 年年初的一份内部材料中，曾这样直截了当地评价刘先生：“崇拜欧美民主，自由主义者，常在《观察》上发表文章，储安平的学生，读书用心，虚心追求进步，对樊弘、吴晗印象很好，是比较进步人物。”（按：樊弘、吴晗均为当时的知名进步学者。）刘先生亦新亦旧的思想特征，无疑是那个新旧转型时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一个缩影。

## 黎明前的觉醒与搏击

刘先生在教学科研中的突出表现，不能不引起地下党的瞩目。1948 年暑假，刘先生的高中同学、武大机械系讲师蔡心耜，邀约另外两位在武大执教的高中校友突然造访刘先生居住的半山庐，请他一起打桥牌。刘先生与蔡心耜等人此前素无来往，遂对此深感蹊

跷。原来，蔡心耜1947年已加入共产党，是当时武大教师中唯一的地下党员。蔡心耜此行乃是奉组织之命来与刘先生接触，但他并未当场向刘先生透露身份，且事后约半年又未与刘先生进一步联络；直至1948年年末1949年年初，武汉地下党为抓紧推动迎接解放各项工作，蔡心耜方向刘先生亮明身份，并介绍他加入武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简称“新教协”)。

1949年3月，新教协正式成立，下设教授支部、讲师助教支部。其中，教授支部在解放前共发展会员13人，包括刘先生、唐长孺、吴廷璆、梁园东、韩德培、张培刚、谭崇台、陈家芷、刘涤源、孙祥钟、张瑞瑾、曹绍濂、石峻，刘先生任支部书记。由此不难看出刘先生在武大进步教授中的威信与号召力。教授支部由蔡心耜领导，武汉地下市委对该支部非常重视，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江浩然每周来刘先生家一次，了解情况、指导学习并布置工作。

刘先生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憧憬，全身心投入地下斗争中去。《国立武汉大学1949年4月16日大事记》载：“法学院经济系各教授组织学术讲演，于每星期六下午二时起讲，本日为余长河先生讲计划经济。”据刘先生回忆，这类名为“计划经济”的演讲，实际内容是就新民主主义经济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介绍，报告人亦包括先生本人。这类新颖的学术报告吸引了不少听众，同时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国民党方面在一份对武大监视调查的材料中污蔑道：“武大教授颇多投机者，近将有不少教授被动地作关于‘新民主主义’之讲演。”这亦从侧面佐证了刘先生等人宣传新民主主义的影响力。许多历史亲历者仍对刘先生传播革命思想记忆犹新。时任武大矿冶系教授兼主任的黄培云，与刘先生交往才开始接触新思想，他晚年回忆：“大家都说新民主主义思想和旧民主主义思想是有区别的，我那时出于好奇心——究竟有什么区别啊——很纳闷，问别人，别人也说不知道。好像看起来人家都知道，但就是不说。那时，在‘少壮派’教师里有一个叫刘绪贻的，教社会学，我认为他可能知道多一些，就问他。当时在场有很多人，他说等会儿再说。等人都走了，他跟我说，你别问了，让国民党特务知道了，要掉脑袋的。我大吃一惊，他说，你别做声，我回去给你找点东西看，你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果然，他在没人的时候，给我带来一个小册子——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说，你千万别让人看见，没人的时候你看看，你就知道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区别了，新民主主义比旧民主主义好。”武大历史学院已故教授薛国中 1949 年春尚是武昌实验中学的学生，该校进步青年举办秘密小型座谈会，邀请刘先生讲述革命道理与当前形势，这次座谈会给平生第一次听大学教授讲课的薛国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撰文回忆：“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对我们革命思想的开导，终生难忘。”

刘先生还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的各类活动。1949 年 2 月，武大地下党给学生党员周克士布置刻印《新民主主义论》的任务，周克士经刘先生协助，到武大印刷厂免费印刷，书印好后，刘先生又为周克士提供法学院一间空教室供其秘密暂存。周克士对刘先生极为尊敬，称刘先生是“抗战胜利后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一批年轻教授中支持学生运动最积极的一个”。

1949 年三四月间，武汉地下党发动新教协教授支部改组武大教授会，刘先生竞选为教授会主席。刘先生任职期间的活动，在原始档案中留下了两条弥足珍贵的记录。

《国立武汉大学 1949 年 4 月 23 日大事记》载：“校长、训导长、教授会主席因公与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政委会等处接洽。”这一天，正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历史性时刻，刘先生与校长周鲠生、训导长朱萃濬赴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政委会等处接洽。大事记虽未写明接洽之内情，但解放前夕，武大校方因钱粮紧张，为维持教学秩序，不得不和武汉当局频繁沟通，刘先生等人当天行程或与此有关。

为防止国民党军溃败前在武汉大肆破坏，武汉地下市委于 4 月 19 日提出：“在保存地方元气，要活命、要生存、要安全的口号下，各阶层上下一致，团结应变。”鉴于武大教授会的社会威望，江浩然要求刘先生按此精神开展活动。5 月 6 日，刘先生以教授会名义起草、印发了一份《为争取武汉安定保护地方元气告各界人士书》，兹将原文迻录如下：

大局日紧，华中经济文化重心的武汉三镇，已经逼临战

火。在抗战期间，武汉的各种建设，曾经蒙受重大的损失。至今疮痍未复，到处残破。尤其最近币制紊乱，捐税重重，民生疾苦，不可终日。如再遭兵燹，则前途更不堪想象。衡情度势，今日的武汉，实在是不能再受战争的破坏了。

我们回溯武汉的历史：在政治上，它是辛亥首义之区；在经济上，它是中国新工业的诞生之地；在文化上，它又开新学之先河。这几十年来，不知经过多少实业界文化界先进人士的努力，也不知经过多少气度恢宏的地方当政者的辛勤培育，历经忧患，以有今日。我们认为具有这样历史的重镇，不论站在哪一个立场，都应该加以爱护。何况战争终有已时，一旦战事告终，建设工作即必须开始。我们为地方的前途着想，也应当为它留下将来复兴的基础。武汉三镇，绾毂华中，物质建设如各种交通工矿事业，文化建设如武汉大学及其它文教机关，皆粗具规模。只要不加破坏，将来不仅可发扬光大，且可对全国的复兴，有积极的贡献。在我们同仁之中，先后也曾有不少人，对于武汉的建设工作，尽其涓滴之助。缔造维艰，知之弥切。正因如此，所以我们对于地方各种事业以及人民生命财产的爱护，也和地方的父老人士们，同样具有迫切的心情。目前事机危急，祸福之分，决于俄顷。我们本着与地方首长和社会人士共忧患的精神，特发出下面的紧急呼吁：

一、争取武汉地方的和平秩序。

二、保护地方元气。

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四、保护文化教育事业。

深望凡关切武汉前途的人们，大家从远处着想，站在同一立场，为保护华中经济文化重心的武汉而努力。

刘先生起草的这份文件，从武汉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武汉长远建设发展着眼，道出了武大进步教授的集体心声。该文在全市散发并被《大公报》《申报》等媒体报道，为武汉较完整地迎来解放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5月17日，武昌解放。多年以后，黄培云夫人赵新那依旧难忘那天的场景：“记得我跟着刘绪贻教授一同赶到武汉大学大门牌楼前去迎接将要经过这里的解放军。刘先生穿着笔挺的西装，隆重地去欢迎解放军……”6月10日，解放军接管武大，校内各团体推选刘先生担任协助接管委员会主席。8月25日，武大校务委员会举行成立典礼，刘先生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代理秘书长。因武大教师中仅有一名党员，军代表还建议将刘先生作为发展对象培养。这无不体现了党组织对刘先生地下斗争经历和个人政治品质的高度认可。

刘先生是“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青年时期受到启蒙主义精神洗礼，后在黑暗现实的刺激和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选择了信仰中国共产党。1949年时代转折之际，先生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竭心尽力为迎接新中国贡献自己的才智，这段光荣的革命经历值得被历史书写、被后人铭记。

作者系文学院2010级本科、历史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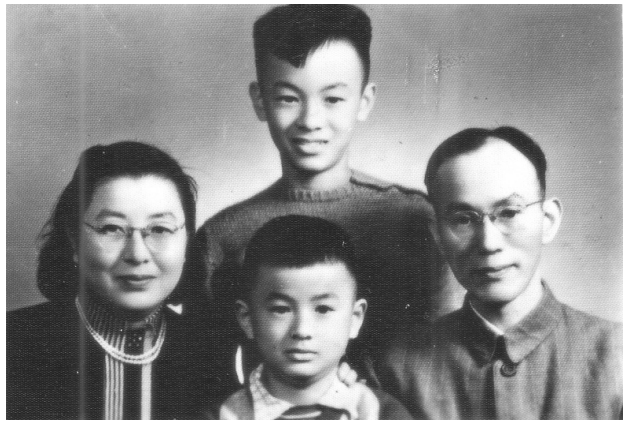
# 回忆父亲姚琢之教授

姚立宁

1950年，湖南大学水利系合并到武汉大学；1952年秋天，武汉大学土木水利系在全国水利院校的支持下，成为武汉大学水利学院。武汉大学农学院分出，成立华中农学院；1953年武汉大学工学院分出，成立华中工学院；1954年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分出，成立武汉水利学院。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七十年已经过去，现在回顾一些往事留做永远的纪念。

1950年，父亲携全家来到武汉大学任教。他出生于1917年10月27日，1960年5月8日患急性心肌梗塞去世，离开我们已经60多年了。我与新中国同年，也已到古稀之年，将一些宝贵记忆保留下来，是自己多年的夙愿。

父亲是湖南长沙人，老家位于湖南长沙市郊的姚家铺子，爷爷姚瑞生是一位教书先生，曾在长沙一所私塾学校担任校长。父亲酷爱读书，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他于1933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土木系学习，1938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土木水利专业，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留学于美国IOWA(爱荷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46年学成回国，在南京中央水工试验所任主任工程师，1949年到湖南大学水利系任教授。1950年院系调整后调入武汉大学任三级教授，住珞珈山一区。武汉大学水利学院成立后，任河港工程系系主任。1953年起担任水利建筑及施工系主任，水力学教研室主任。曾任湖北省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委委员。通晓英、德、俄三国外语。



姚琢之教授一家人

父亲的主要专业是土木水利工程，之后更注重水工建筑、水力学(流体力学)的研究。当年国家为治理长江水患，建设荆江分洪工程，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长江流域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父亲积极参与了此项工程的设计与建设，与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起为解决 8000 立方米/秒的泄水闸的动力消能问题夜以继日地进行模型试验多月，直到工程完工。这次与长委会的合作持续了一年时间，为长江科学研究院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父亲一直是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积极支持者，盼望参与三峡工程的设计和建设。20 世纪 40 年代在美国 IOWA 大学学习时就为此搜集过相关资料。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专家按照苏联的模式建设武汉水利学院时，父亲就和苏联专家叶菲莫夫教授讨论过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建设问题。可惜他去世太早，没能看到今天宏伟的长江三峡水力发电枢纽工程。

父亲治学态度严谨认真，经常整日待在书房，很少有和我们闲聊的时间；对于年轻的谢鉴衡教授、唐懋官教授以及包括越南留学生在内的自己的学生们，他却是欢迎至极，可以与他们进行长时间耐心细致的促膝畅谈。父亲出版的专著有《水力学》《明渠水力学》《水工建筑》等；他也发表过不少论文，只可惜当时自己年龄太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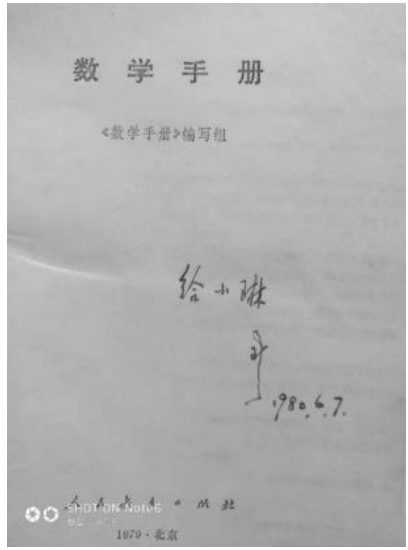
又不懂专业知识，没能很好地收集这些论文。

姚琢之教授指导学生

父亲回到武汉大学工作后，有幸遇到了他的同学张瑞瑾教授和大学老师俞忽教授。

张瑞瑾教授是当时武汉水利学院院长，是我国著名的泥沙工程专家，他和父亲是国立武汉大学同期学生，并同期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父亲当时就读于 IOWA 大学)。回国后，两人同时来到武汉大学工作，两家人的孩子也都在武大附小上学，彼此往来较为频繁。“文革”期间，我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了鄂西北山区插队。1977 年恢复高考后，我从湖北房县考取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水力发电工程系学习。在校学习期间，张瑞瑾教授于 1980 年 6 月 7 日将一本亲笔签名的《数学手册》送给我，鼓励我好好学习。这本手册至今珍藏在家。

俞忽教授是父亲大学时的老师，1919 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擅长工程力学方面的研究。他为人正直，业务精湛，富有正义感，是大家十分尊敬的老师。记得当时他就住在我家楼上。能在武汉大学遇到自己的恩师，父亲非常高兴。




张瑞瑾教授亲笔题字(注：小琳——小名)

俞忽教授

父亲出生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动荡年代，当时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国家内忧外患，战争不断。爱国的理念是父亲最基本的思想，他一直只想以知识求生存、以学识救国家，所以学成以后立即从美国跨越太平洋、历经两三个月的艰辛路程回到了祖国。回国后先就职于南京水工所；全国解放后回到武汉大学工作，同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爱国民主人士，并被推选为湖北省第二、三届政协委员。与此同时，他逐渐对共产党有了接触和认识，在党组织的关心和帮助下，思想境界不断提高，曾多次表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当时政治运动频繁，组织上没有考虑他的申请，这成为了父亲的终生遗憾。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艰辛历程，每一位善良的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100年历程，我自己也已成为有近50年党龄的老党员，实现了父亲的愿望。

我们将沿着先辈们的足迹，不忘初心，为祖国的兴旺发达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工学部(原水利电力学院)1977级校友

# 永远的老师曾启贤先生

朱　玲

时光飞逝，转眼间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恩师曾启贤去世近20年了。说来惭愧，若非校友关敬如打来电话，我还没有考虑如何表达对他的纪念。下面的文字，多是10年前写成的。我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他。有好友曾说，人的心里实际上排列着很多的空格，占据其间的是自己的亲人、师长、同学和朋友等，占得满满的，心里就很满足。平时不在意，因为他们都在，可一旦某位至爱亲朋离去，有个角落就空出来了，空虚感便油然而至。对此，我的评论是：曾经被占据的“格子”不会变成虚无，因为对逝者的思念还在那个空间。我对曾老师的怀念，就是这种感觉。

我视曾老师为恩师，最初是因为他“文革”后首次招收研究生便不拘一格选人才，将我们这些年龄、学历和经历大相迥异的学子汇集珞珈山，使大家饱享知识的阳光雨露，为后来各自选择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于我自己，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有志于经济学研究，无论是在工厂做工还是在中学教书，都孜孜不倦地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好容易盼到1977年恢复高考，却由于专业选择有限而进了西北大学历史系，幸亏历史系学风淳厚、兼容并包，加之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何炼成教授大力举荐，西大破例允许我报考1978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我虽学历短浅，却承蒙曾老师不弃而有幸进入武大，实现了走向学术道路的梦想，度过了生命中最快乐的三年时光，每当回想起这一切就对曾老师充满感激。

我之所以感激曾老师，不仅仅是由于上述经历。他的品格和学

识以及为人处世所给予我的教益，不是“感激”二字能表达尽致的，也不是这篇短文能包容无遗的。记得他每次给我们授课总是端一个大水杯，提一大摞资料，旁征博引，侃侃而谈，还不时与我们有问有答交流看法，使大家在不经意间得到启迪而顿开茅塞。那时经济学课程还没有脱离传统的苏联模式，我在入校前既未看过东欧有所创新的经济学专著，也未接触过西方微观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课本，更遑论其他现代经济学理论。即使是那些有本科学历的同学，对此也知之甚少。因此，我对曾老师有关东欧经济学家改革理论的介绍和对西方经济学家的评述感到既新鲜又好奇，课后总会不由自主地循着他提供的线索去查阅资料。即使从图书馆或资料室借不到所需要的文献，曾老师的私人藏书总是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在他的引导下，我的眼界随着知识的增多逐渐开阔，从学习中获得了莫大的精神享受。

常言道：“师傅引进门，学艺在本人。”这强调的是学徒的主观能动性。问题是倘若师傅引错了门，那就不知学徒是否能学到所需要的本领了。很幸运，我在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即将开始转轨的时刻，遇到曾老师这样富有远见和创新精神的学者。每当提起经济学的发展，他都坦率地说自己的数学基础薄弱，难以掌握数理经济学；只会“哑巴英语”，能读不能讲，没法与西方经济学家深入交谈。为此，他大力倡导经济系开高等数学课，在同学们通过基础外语之后，设置专业外语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邀请几位 20 世纪 40 年代从欧美留学归国的教授为研究生讲解原版的英文经济学著作，自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与学生一起旁听。曾老师还特地为我们设置“西方经济学入门”讲座。他从当时的华中工学院请来自己的硕士导师张培刚教授讲微观经济学原理，请本校的刘涤源教授讲宏观经济学入门，请谭崇台教授讲发展经济学理论。几年后，当我在书店看到这几位教授的专著，得知上述课程已列入高校经济系教学大纲的时候，自然更加佩服曾老师对课程设置的改革和对学生知识结构的指导所具有的前瞻性。

我之所以敬佩曾老师，不仅仅在于他学识渊博、思想深邃。他对科学的忠诚、对学术的民主和对学生的平等态度，使我永远敬

重。进校一年以后，曾老师要求我们开始自选毕业论文题目。八九位同学专长不同，兴趣点各异，选定的题目自是五花八门。他在听我们汇报时，先是默不作声，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方才一一评论，其中有几点看法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选题要小，小题大做容易将研究引向深入；二是做论文要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三是论文不拘长短，但求高质量。他还找出一本小册子让大家传阅。那是本译著——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曾老师不紧不慢地介绍：别看文章短，却是大卫·李嘉图之后的一篇经典之作。那时候我不知天高地厚地总想制造体系，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大约 16 万字的论文，未能完全按照曾老师的建议去做。然而他耐心地呵护学生的“创造性”，细心地审阅我的论文，并提出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论文定稿后，他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董辅礽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为我入选经济所提供了有力支持。

曾老师讲的道理，我直到做博士论文时才真正明白，因而也就越发由衷地为他当年的雅量所折服。他虽然听凭学生自由选题，但并非放任自流。不仅严格审订每个人的提纲，而且对达不到学位标准的论文毫不通融，即使学生已走上工作岗位，要想取得学位也必得将毕业论文提高到学位标准水平才准予返校答辩。当然，如此严谨认真的教授在武大并不只曾老师一人。这里之所以对此专门提上一笔，是因为近年来花样繁多的腐败活动正在侵蚀着圣洁的学术殿堂和学位制度，以至于维护学位制度的严肃性而铁面无私的导师，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形象就日益鲜亮起来。

曾老师之严谨认真，还体现在他恪守工作时间表的努力之中。这里不是要说他如何守时、如何一丝不苟，这些早已成为融入他生命中的一种自然品质。我想讲的故事发生在 1981 年的夏秋之际。武汉的炎热使我至今回想起来似乎还要浑身冒汗，20 世纪 80 年代初，电扇还未普及，更别提空调了。每天一大早，只消看看楼顶上、大街旁的竹床上辗转一夜方才入睡的人们，就知道武汉人是怎样以顽强的意志在忍受着酷暑的煎熬。可那时，曾老师不得不在盛夏期至少审完五六篇由他直接指导的学位论文，还要阅读几篇要求

评论的手稿，工作量至少在百万字以上。暑假来临，完成论文的同学先后带着手稿回家打印。我和几位等待审稿的同学留在学校，隔三岔五地去曾老师那里取回他审完的部分，根据他的批注修改或重写。这种流水作业方式使我感到挺轻松，然而诸位学生的轻松凝聚到一起就对导师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有次去送稿，看见平日衣冠齐整的曾老师光着个脊背在门前的大树下审稿，一边不停地扇着大蒲扇，一边盯着铺在小桌上的稿子写写画画。听到我的招呼，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天气太热了。"一边抓起大毛巾擦擦汗，一边换了副眼镜进屋套上汗衫出来。我这才注意到，对于他这样既深度近视又严重散光的人来说，如此紧张地阅读实在太损害视力了。于是就告诉曾老师自己并不急着回家，劝他放慢工作节奏。可曾老师却坚持要按计划办，说开学之后就得组织答辩，不能耽误同学们毕业。

那年入秋，待我携打印稿从家里赶回学校时，听说曾老师阅读完九篇论文之后病倒了。大家心里都过意不去，曾老师却不以为然，还把带了罐头去医院探望他的学生训了一顿，认为这当口儿送食品给他太世故了。类似这样令人下不来台的事还不止这一次，可这非但没有损害他与同学们的往来，反而赢得了更多的尊重。曾老师在"文革"中几乎家破人亡，夫人因他受冲击心脏病发作去世，儿子下乡时受审查精神分裂。也许家庭的不幸使他更加专注于教学与科研，并赋予他对学生一种亦师亦父的情感。毕业分配之前，他就像传统的中国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既舍不得我们离去，又期望我们到自己向往的地方成就一番事业，并尽可能帮助每位学生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征求我对留校的意见时，我坦言相告，希望能去孙冶方工作的地方。曾老师沉思良久才缓缓地说："经济所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可是武大也并不差呀，系里还会给你继续深造的机会。"我没有急于比较这两家机构的高下，只是给曾老师打了个比方，把学生比作他的作品，问他是否有勇气把自己的作品拿到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去检验。这一通激将法可能击中了他的要害，曾老师深深地叹了口气："唉，既然你执意要走，就去找研究生处的处长谈谈吧！我会帮你的。"此后他果然尽其所能助我实现了进入经济

所的梦想。此间有一位计划留校的同学迫切想回家乡的省城工作，可他羞于出口，让我去找曾老师探询。不想我刚一说完，曾老师就拍案而起："他也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不直接找我而要你来做说客?!"我尴尬得无以对答，只能二话不说当了一回通讯员。10 年之后，也就是 1992 年，我遇到那位当了省计委副主任的昔日同窗，回忆起这段往事，他感慨万分地说：可惜曾老师没能活到今天，要是他看到咱班同学都还算争气，该有多高兴!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代沟"曾一度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可是我从未感到与曾老师沟通有什么困难。在校期间，由于他的一系列创新举动使我觉得他的思想和自己一样年轻；毕业之后，又因为他不耻下问、随和亲切而视他亦师亦友。1985 年年底，我从德国回来准备下乡做抽样调查，恰遇曾老师带了学生赵青华到经济所办事。毕业四年有余，这是第一次重逢，师生都很兴奋。尽管所里的前辈同事嚷嚷着要我请客，最后还是曾老师掏腰包请董辅礽教授和我聚餐。那顿饭吃得热闹非常，天南地北、经济文化，无所不谈。饭后见小赵要帮曾老师穿大衣，我就忍不住提起德国见闻，说那里的礼仪是男士帮女士穿大衣。曾老师一听就笑着摆起架子来："这里可是中国，我才不管德国有什么礼仪呢！过来，帮我穿大衣!"董老师和小赵都在发笑，我只好乖乖照办。

次年，曾老师数次进京参加政治经济学辞典编委会会议，会议地点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距经济所不远，休会时他常到所里来看看。当时改革开放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学界也新人辈出。时年六十有五的曾老师，满怀欣喜地看待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积极地调整自己的视角和知识结构，而且还想摆脱"哑巴英语"的状态，每次见面他都要问起外语强化训练的细节，与我切磋口语练习的窍门，并不时来一段英语情景对话。当然，我也不失时机地请他指点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计划。曾老师又一次强调他在 1981 年给我们全班同学的提示，那就是深入细致地把中国经济运行机制搞清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研究或多或少还未摆脱苏联政治经济学概念推演窠臼的时候，他的建议促使我及早警醒；在 80 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出现一股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的风气时，

他的建议又激励我踏踏实实做好田野调查，理论联系实际，运用规范的经验研究方法，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专题成果。

回首往事，师生互帮互学的情景是那么令人怀念，人生旅途中能遇到这样的良师益友是何等幸运！也许是因为曾老师以高尚的品质和精神为我树立了终生学习的榜样，我才能不假思索地为本文找到“永远的老师”这个标题，这也恰恰是他留在我心中的一个不灭的形象。

（原载《经济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系经济系1978级研究生校友

# 怀念张兴钤院士

张晴丹

7 月 30 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发布讣告称，著名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兴钤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 5 时 59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101 岁。

张兴钤于 1921 年 10 月 16 日出生在河北武邑，1942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先后获美国凯斯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冶金硕士、博士学位。在美期间，他系统地研究了蠕变过程中多晶纯铝及合金的形变、断裂机制，先后发表八篇论文，成为金属蠕变结构研究的奠基性工作之一。

回国后，张兴钤在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参与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并著有《金属及合金的力学性质》，后成为全国通用教材。

1963 年起，张兴钤投身于我国核武器研制工程，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等荣誉。

他平易近人、宁静淡泊，从不标榜和表现自己。

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科研条件，回国后默默耕耘。在最艰苦的地方，几十年如一日，为我国核武器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生，张兴钤都在竭力固守脚下的土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 归途艰难　信念坚定

对科研的热爱，印刻在张兴钤的每个细胞里。

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时，张兴钤可以一连好几天泡在实验室，不间断地观察高温下材料的变化。在实验室里，陪伴他最多的两个东西就是烟斗和闹钟，烟斗是为了提神，闹钟是为了实验观察。导师尼古拉斯·约翰·格兰特教授也常对他的勤奋和严谨赞赏有加。

“他对那些晶界运动细节的观察，所拍图片的精美和生动，令人叹为观止。有一次日本朋友石田洋一和我说，当年在麻省学习时，一看到张兴钤的这些图片就被深深吸引住了。”李恒德院士曾这样回忆道。石田洋一最后也将研究方向定为高温金属合金。

张兴钤在美国所做的高温蠕变研究，是全球金属蠕变理论公认的奠基性工作，在业内赢得了很高声誉，取得的成果也被广泛引用。不过，随之而来的丰厚物质条件并未动摇张兴钤心中最坚定的信念——“将来学成后，要回国去，一起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在 1952 年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授予的博士学位后，张兴钤发现回国已十分艰难。

在中国百年留学潮中，20 世纪 50 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是非常特殊的一批。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美国政府不愿意放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甚至后来明令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

急切想归国的中国留学生都承受了巨大压力。但这些重重阻挠反而更加坚定了李恒德、张兴钤、师昌绪等一大批学子归国的信念，他们决心与美国禁令斗智斗勇。

之后的两年多，他们四处奔走，利用一切机会联络分布在不同地域且有归国意向的同学，壮大队伍。这期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举办过上百次小型聚会，并在多次讨论后明确：要把大家归国的强烈愿望尽早传回祖国，争取更多美国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他们把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交给了印度驻美大使馆的教育参赞，由他转交给中国驻印度大使，再转呈给周总理。为了给美国

政府施压，张兴钤等人又给美国总统写信，并将信的内容在报纸上发表，引发媒体关注，获得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同情。

美国人民质问政府："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自诩为民主、自由的国家要扣留那些渴望和家人团聚的中国学生？"在祖国的帮助和美国民众的支持下，美国政府终于妥协。

导师格兰特得知张兴钤要回国时，极力劝他留下来："为什么不选一个起点比较高的地方进行研究？"张兴钤婉拒了恩师，于他而言，建设祖国的信念高于一切。

1955 年，张兴钤终于踏上了令他魂牵梦绕的祖国大地，那一刻他热泪盈眶。

## 科技报国　矢志不渝

回国后，张兴钤在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任教，与柯俊教授等同事一起，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个金属物理专业。

这是当时国家正需要的，也是全新的领域，连教材都要重新编写。张兴钤经常熬夜准备讲义，一大早送去油印，上午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给学生们授课。

做科研不是一味地只研究，而是要把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升华。从教学内容到实验方法，从理论到实践，张兴钤言传身教，他着重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为我国钢铁行业、教育事业培育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

1963 年，一纸调令改变了张兴钤的人生轨迹。

那时，核武器是大国发展的战略重点，也是保护自己国家的重要砝码。直到报到当天拿到一份材料，张兴钤才意识到，自己即将参与到研制核武器这一意义重大的系统工程中。

这完全是一个陌生的科研领域，但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的张兴钤，又岂能被困难打倒。

张兴钤奔赴大西北试验基地，克服青海高原艰苦环境带来的不适，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中。面对全新的科研领域和无处不在的技术挑战，他白天穿梭于实验部各单位了解情况，晚上集中精力恶补

从未接触过的相关知识。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张兴钤带领实验部成功完成了缩小尺寸、全尺寸等多次爆轰物理实验，为解决引爆弹设计中的关键问题和确定引爆弹的理论设计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数据。这是原子弹突破过程中的里程碑。

首次核试验取得的成功并未让张兴钤停下脚步，他很快又投入到氢弹攻关实验与原子弹武器化研究实验中，凡事身先士卒，亲力亲为。

当进行核试验时，所有人都穿上了防化服，但在缺氧的高原，一戴上防毒面罩就会感到憋闷，张兴钤年龄大一些，更是有些受不了。零时核弹投下来，当蘑菇云腾起时，张兴钤带头冲向爆心收回重要的数据。整个回收过程持续约 1 小时，大家都被面罩憋得难受极了，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内早已汗水淋漓。

张兴钤开创性地提出模拟装置放松公差实验，参与领导多次国家核试验，参与建立了飞行试验装置及为其服务的遥测技术，为判定核爆效果提供数据，为建立可靠的核物理和核化学测试方法奠定了基础。

## 舍家为国　无怨无悔

在张兴钤女儿张涵的童年记忆中，父亲长年在外地工作，家里的大人只有妈妈和外婆。自己的父亲究竟做什么工作，她也是在成年以后从邻居和同学的家长口中得知：原来父亲是搞原子弹的。

“父亲离家在外工作这一走就是近二十年。这期间正好是我和妹妹成长的关键阶段。”张涵曾在《钤记：张兴钤传》一书中提及。张兴钤当年离家时，张涵两岁半，她妹妹才刚出生没多久。

在被允许可以短暂回家探亲时，女儿们却不认识他，也不愿意开口叫“爸爸”，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张兴钤就是一个“住在信箱里的爸爸”。

由于工作的保密性质，连妻子左涵征也不知道张兴钤被调去的单位是什么，工作的具体地点也不知道。全家人都只知道张兴钤是

去做一件很神圣的工作，而这一走就是 18 年。

在唯一一次到张兴钤所在单位探亲时，左涵征被眼前如此恶劣艰苦的环境震撼了。那里海拔 3200 米，高寒缺氧，饭都做不熟。很多人住在帐篷里，沙漠温差大，夏天晚上盖很厚的棉被睡觉也会被冻醒。

即便如此，大家的工作热情却丝毫不减，一心只想着如何能使试验圆满成功。这次探亲，左涵征深刻地体会到了丈夫在科研领域的执着和认真，并给予了丈夫无私的支持。

为了不让丈夫分心，左涵征用一己之力撑起家庭的重任，忙里忙外，照顾一家老小，同时又要当好中学的班主任。

左涵征会定期向公公报告张兴钤的平安。最让她难过的是，张兴钤的父亲到离世都不知道儿子在钢院当了 8 年教授以后，去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去了。

对于家人，张兴钤深感愧疚，但他对自己所做的事业无怨无悔。

金石人生，只为兴邦。时至耄耋，他也从未停止科学研究的脚步。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后来者追随他的光辉足迹，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砥砺前行。

## 参考资料

吕旗，谭淑红. 钤记：张兴钤传[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张克俭. 不折不坠青云志　守志弥坚白首心[J]. 军工文化，2018(4).

（原载《中国科学报》科学网 2022 年 7 月 31 日，标题及图片有删改）

# 我的老师谢鉴衡院士

韦直林

我于1979年考上谢鉴衡教授的研究生，1982年1月毕业后留校，一直在谢先生的指导下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在谢先生众多的学生中，我可能是在他的指导下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受谢老师批评次数最多的人。除了父母之外，谢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谢先生是我的业师，我有幸在专业方面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在与先生的长期接触中，先生的言谈举止使我受益良多。谢先生已经去世近六年了，但我总觉得先生还一直生活在我身边。工作上遇到难题或者心里有什么疙瘩时，习惯性地想着要去向他诉。只要一想到先生已经不在了，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在和谢先生的长期接触中，有几件小事对我触动很大，印象极深。我不但永远不会忘记，而且还要告诉我的后人和学生们，把它当做精神财富传下去。

读研究生时第一次参加教研室活动的一个细节使我终生难忘。会议开始前谢先生提前几分钟到场，当丁先生稍后进入会场时，谢先生很自然地站立起来给丁先生让座并示意。我这个动乱年代长大的人哪见过这种情景？一下子就被先生的儒雅风度给“震”住了。当时有位长我10岁的师兄小声告诉我，他很久以前就注意到这个细节了；他还说，这就是“知识分子”，这就是“风度”。丁先生比谢先生长几岁、早几年毕业，但谢先生从苏联留学归国前两人并无交集。谢先生的地位一直比丁先生高，可谢先生却一直对丁先生持弟子礼。了解谢先生的人都知道，谢先生以严肃严谨著称，少言寡

语，不苟言笑，但人缘极好。与谢先生一起工作的人无论年长或者年幼，心情都很愉快，这与谢先生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这是谢先生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1999 年中秋节傍晚，我在校园里看到谢先生提着一个盒子步履蹒跚地走着，很是惊奇：一是我知道谢先生极少串门，尤其是晚上从不出门；二是谢先生已经患病多年，身体很弱，师母多次抱怨说，怎么逼他出去走走他都不愿意。我赶忙跑过去问：先生有什么事？要上哪里去？先生说：去看看张师母。原来谢先生最尊敬的老师张瑞瑾先生刚去世，中秋节他要去探望师母！谢先生曾几次跟我说起，他进武汉大学读书不久，听了张先生的课，了解到洪水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严重危害，立志研究防洪之道，从而走上了研究治河防洪及泥沙的不归路。他一直称张先生为他的引路人。谢先生 1955 年从苏联留学归国之后，就一直和张先生一起创办和发展武汉水电学院防洪及泥沙专业，使其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防洪泥沙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之一。张先生和谢先生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后来谢先生被评上了院士，因种种原因张先生却没有评上。但谢先生对张先生始终如一地敬重。看着谢先生月光下蹒跚的脚步，我不禁落泪了。这个故事我要不断讲给我的后人们听，告诉他们什么叫做人的情感。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某一天，我因事到谢先生家，进门前就听到谢先生在电话里与人争论。师母开门后即对我说：他和×先生争论一个多钟头了，烦死了，他心脏又不好，出了事可不得了。我太笨，没想到应找理由让先生停止通话，避免过于劳累。几分钟之后，师母终于忍无可忍，一手夺过话筒吼了起来：“老谢快 70 了，心脏又不好，不能再吵了！”我知道对方是一个鞏出了名的老工程师，是先生和师母私交非常好的老同事。争论的问题还与我有关。当时某设计院委托我们研究论证规划设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水利工程中的技术问题，我是课题名义上的负责人，合同是我签的，但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担纲这个研究的能力。对这个问题设计部门实际上已有定论，只不过是想让我们给他们印证一下而已。谢先生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能轻易下结论，于是亲自操刀，带领中青年老

师以及几位博士生进行认真研究，我只是跑跑龙套而已。我们研究出的结果与设计部门原定的方案有实质性的差别，双方进行了长时间激烈的争论。对方总工程师曾找我私下谈，承认谢先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原来的方案已经上报而且已获批准，如果推翻原来的结论，会惹很多麻烦。他让我传话，能不能先不提我们的成果，技术上的问题以后再想办法解决？我当时不懂事，平时和谢先生说话又随便惯了，我对谢先生说：人家的观点是不是也有点道理？我们能不能暂时不跟他们争了？谢先生顿时发火了："我白教了你这个学生！"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谢先生发这么大的火。被谢先生批评次数多了，以往我大多是嬉皮笑脸的，这一次惊呆了也吓坏了！谢先生很严肃地说：我做了几十年的泥沙研究，做这个结论的把握还是有的，我一生都没有做过没有把握的结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按原来的做后果将极为严重。做科研最起码的是要讲真话，如果明知是错还要附和，那是犯罪！在此后的 20 多年里，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工程。随着阅历的增加，我愈来愈深刻地体会到谢先生当年坚持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在工作中我常常感到谢先生一直在盯着我，让我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们的工作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安危，我们得好好干认真干，在科学研究中得永远保持一颗赤诚之心！

谢先生晚年受多种疾病折磨，其中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使他逐步丧失了记忆力。在他去世前的几年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了，也几乎没有开口说过任何话。在他病重后的某一天，我的一位师妹毕业 10 多年后第一次返校，要去看望谢先生。我不顾院里的严格限制，自作主张地把师妹带去老师家了。路上我跟她说，先生已经很久不开口说话了，可能谁都不认识了，你见先生一面就走吧。进门后，师妹问先生好，我在旁边问了一句：您记得这是谁吗？先生竟然立马说道：不是×××吗？你不是分到广东去了吗？在那边工作怎么样？能适应吗？我当时就惊呆了，师妹感动得号啕大哭，我也不禁泪流满面。先生心灵深处一直记着我们这些弟子，始终关心着我们的成长！这种师爱绝不亚于父母之爱！

我还想起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1984 年夏的某一天，我随

先生出差在外地，被通知写一个关于我的硕士论文的介绍。当时没有带资料，当地没有查询条件，要求又很紧急，可我自己因记不清楚，写不出来。谢先生当晚完全凭记忆帮我把我的论文简介写了出来。我是无论如何努力也写不出那样的水平的，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谢先生工作那么忙，弟子又那么多，我只是其中很不起眼的一个，毕业了几年他竟然对我的毕业论文还记得清清楚楚！这里面固然有先生非凡的记忆力和他对研究工作认真执着的成分，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他将弟子们的一举一动都放在心里，在他内心最深处一直记着我们这些弟子的点点滴滴！

虽然先生已驾鹤远去，我却总感觉到先生时常在看着自己。我一定要按照先生的教导去为人做事，尽自己所能继续先生未竟的事业，不能再惹先生生气。套用一位师兄的一句话：我们活在先生的事业里，先生活在我们的心中！

（原载《我的武大老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作者系工学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79 级研究生校友

# 回忆父亲陶振宇先生

陶翠慧

父亲陶振宇先生生于 1927 年 1 月，于 2000 年 2 月 2 日去世。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 20 多年了，但是岁月的流逝并没有淡化我们对他的怀念。父亲生前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著名岩石力学专家，但我写此文仅从一个女儿的角度去追忆、去寄托哀思。

## 父亲和母亲身份悬殊

父亲生长在湖南省衡阳县一个叫太子庙的村子，爷爷是地道的庄稼汉。父亲还在读初中时，爷爷奶奶就张罗着给他定了一门亲事，对象就是我的母亲。母亲比父亲年长两岁半，是个文盲。父亲是孝子，在 16 岁那年和母亲完了婚。母亲结婚后一直在太子庙务农，每年只有在父亲放寒暑假时他们才能相聚于老家。我大姐出生于 1946 年，其时父亲在衡阳成章高中就读。我哥哥 1949 年出生，其时父亲在长沙湖南大学读大二。

1950 年全国院校调整，父亲又来到珞珈山在武汉大学土木系就读，1952 年 1 月毕业后分配到华南工学院任教。1954 年武汉大学土木系和别的大学相关系合并成立武汉水利学院(后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后文简称“水院”)，父亲又转到水院任教。母亲于 1955 年带着大姐和哥哥从湖南老家来水院和父亲团聚。母亲下火车后手牵着九岁的大

姐，肩膀上挑着一担箩筐：箩筐里一头是行李，另一头是六岁的哥哥。

母亲来汉之后在家里当了几年家庭妇女，后来父亲送她上扫盲班学习，也能认识许多字，算简单的算术，记些简单的账。在这几年里，母亲先后生下了二姐和我。

母亲后来也参加了工作，在水院托儿所当负责人，管着几位阿姨。母亲是临时工，曾经两次被精减回家，在家里母亲有一个外号“老临时”。第一次精减回家是在 1962 年国家困难的时候，第二次是在“文革”中父亲被批斗时。“文革”后学校根据水电部一个文件精神将母亲转为了正式职工，但母亲干到 1979 年就主动退休在家专职照顾父亲和刚刚出生的孙子了。

父亲读书、教书和做学问都是一把好手，但生活自理能力很差，父亲娶了母亲应该是享了福的。母亲来汉之后家里生活全由她打理，父亲从来没有买过菜做过饭洗过碗。不知道他 20 世纪 60 年代初去苏联进修那两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父亲因为有母亲的照顾，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学术造诣不断加深。父亲的研究领域为岩石力学，兼治中国水利史。他提出和创导了岩石力学研究及工程应用的许多思想方法，在水工设计岩体安全取值、岩石断裂与连续的统一性、岩体地应力、水库诱发地震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尽管父亲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因眼睛患白内障几乎停止了工作，但那时的他已出版过 17 部专著或合著，发表过学术论文 150 余篇，指导过 30 多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父亲的这些成就是有母亲的一份功劳的。

父亲在 1989 年发生了第一次心肌梗塞，所幸被抢救过来。我于 1990 年携女儿离开祖国到加拿大和先生团聚，在我出国之后父亲眼睛就患有白内障，且因为同时患有糖尿病，一直没有动手术；父亲的白内障手术一直拖到 1998 年才做。这八年里，父亲的生活完全依赖母亲。母亲是父亲的厨师、通讯员、护士，还是他的散步牵手员。那几年，人们常常看到母亲牵着父亲的手在水院校园内散步。1993 年，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水力学实验室有几位国内大学校长来参观，其中一位向我先生介绍了一件“趣事”：一次在武

汉召开一个全国性岩土工程学术会议，会议把我父母亲都接去了——父亲参加会议是因为他在岩石力学界颇有建树，母亲则是去给父亲当牵手员的。

父亲和母亲能白首偕老，完全是因为父亲身上有着传统的美德。父亲的美德不仅仅表现在他和母亲的婚姻上，也表现在他和他的家人及同学同事的关系上。父亲在参加工作后每月发的工资，首先要拿出不小的一部分寄往湖南老家孝敬爷爷奶奶和供姑姑读书；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每年还寄钱给我伯父。陆仕强教授是父亲大学同学，比父亲小好几岁，我叫他陆叔叔。陆叔叔因为所有社会关系都在海外，在学校受了很多委屈，父亲一直关心着他。父亲是陆叔叔最好的朋友，而陆叔叔则把父亲当大哥看待。父亲和他在学校任教的九位同班同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值得称道的是，尽管这10位教授的配偶大多是像我母亲这样的情况，但他们全都白首偕老了。

## 父亲和他的研究生

父亲曾经指导过30多位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父亲指导研究生往往让他们自己选择课题，而不是给他们指定课题。父亲的这个指导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当年的男朋友即现在的先生，虽然他学的是水力学，和父亲的研究方向(岩石力学)风马牛不相及。高校里有一种说法，真正了解一位教授的是他的学生。经父亲指导过的学生对父亲的感情都非常深厚，一方面是他们敬佩父亲的渊博学识；另一方面是感念父亲给予他们各方面的指导和关怀。

莫海鸿师兄曾经告诉过我先生，说父亲知识非常渊博，他由衷佩服；其实莫师兄还不知道父亲通晓好几门外语呢。我家里有好几箱俄文书籍，是父亲当年留苏时带回来的。

父亲爱生如子。余启华师兄曾经得过好长时间的胃病，那时他每天午饭都在我们家里吃，母亲还给他煎过中药，时间长达近半年之久；唐方福师弟在父亲去世之后多年，还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武汉大学校刊上纪念父亲；曾亚武师弟是父亲的关门弟子，他和父亲

合作出版的著作在父亲去世之后又再版，曾师弟把全部稿费都交给了母亲。

父亲的弟子有许多留学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许多弟子回国时还专门弯路到武汉去墓地祭拜父亲，到我们家看望母亲。

## 父亲和我

1958 年我出生时父亲正在外地开会。父亲回校之后给我起了个名字叫翠会，我上小学后将其改为翠慧。

父亲 1959 年在北京进修俄语，1960 年去苏联。父亲出国时我才两岁，还不记事。1962 年的一天，我正在丁君松教授家玩，我管丁老师叫丁伯伯，管他太太叫丁妈妈。这一天丁妈妈牵着我的手，指着一位刚来的陌生人说他就是我爸爸。我有些认生，父亲有一点点激动，我们彼此都不认识。我对父亲的印象是从那天开始的。父亲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年轻，瘦高个，很精神，很帅。

陶振宇先生在苏联时留影

很小的时候我有一次生病，父亲专门请假和母亲一起抱着我到

汉口同济医院看医生。母亲说我面子好大，因为父亲工作实在太忙(父亲除了教学外还担任系党总支书记)。

父亲不会干家务活，在我小时候还坑了我一次。那天我起床晚，母亲已经上班去了，父亲帮我梳小辫子，梳得很难看，引来了同学们的嘲笑。

在家里母亲是严母、父亲则是慈父，这和许多家庭刚好相反。一次晚饭时母亲因为我调皮，拿了一双筷子向我当头打了下来，父亲连忙用左手护住我。母亲的筷子没有止住，把父亲的手表盖子砸坏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父亲不仅仅在水院受到批斗，还到湖北医学院陪过斗。有一天全院在体育馆开批斗大会，专门批斗父亲；父亲怕我和二姐受不了批斗场面，事先让哥哥带我们去钓鱼。回家时我发现了父亲的高帽子和批斗牌子，牌子上还有父亲的血。即便在那样残酷的条件下，父亲仍然坚持做着学问：白天接受批斗，晚上写他的著作。我当时对父亲的这种执着精神很难理解。

我1975年下放到钟祥县一个生产队插队。1976年11月的一天，我正在水利工地干活，父亲突然坐吉普车来到工地看我。我当时皮肤晒得很黑，手上有冻疮，衣服脏兮兮的，干着很重的体力活。父亲见到我时非常心疼，但当时却没有表露出来。多年后，父亲对我先生回忆起那一次的见面仍然感慨良多。

我和父亲最后见面是在1998年夏天，我带两个孩子回国探亲。那时父亲刚刚做了白内障手术，视力没有问题了。父亲在时隔八年之后又见到我和我女儿，并且还见到了从未见过面的我五岁的儿子，格外高兴。虽然语言不通(我儿子中文不好)，但父亲和我儿子很快就成了好朋友。父亲的床头边挂着我们一家四口的合照，还有远在德国的二姐一家的合照。母亲后来告诉我先生，这是父亲的主意，老人家想每天起床就能见到两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女儿及其家人。我和孩子们离开武汉的那天，父亲送到了楼下。当我们坐进小车的时候，隔着车窗我见到父亲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

2000 年 1 月 27 日晚，我们在加拿大家中给父亲打电话祝贺老人家 73 岁生日(国内 1 月 28 日，农历腊月二十二)。孩子们用英语在电话这头同声喊“爷爷，Happy Birthday”。后来听母亲讲，父亲那天非常高兴。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通电话。五天之后父亲因为心脏病骤然离世。那是 2000 年 2 月 2 日，农历腊月二十七。父亲吃完早餐后到院收发室拿了一封挂号信，在院行政大楼外和两位熟悉的教授聊了几句话便突然倒地身故。两天之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武昌殡仪馆礼堂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父亲虽然去世多年，却一直活在中国岩土界学人心中。他的论文及著作，是岩石力学界的宝贵财富。他写的书有的已经再版，有许多一直是全国高校相关专业教材。他培养的几十名弟子现在正在国内外为岩土工程作出巨大贡献。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2012 年庆祝建院 60 周年时，院里将父亲选为十位著名教授之一(包括已经去世和仍然健在的)。

父亲是我们的骄傲。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以及作为我们的榜样，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作者系工学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77 级校友

# 深切缅怀恩师王昆杰先生

李建成

惊悉恩师王昆杰先生不幸因病离世，十分悲痛。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大地测量学家，博学多才，敬业爱生，德艺双馨，他的逝世是我国大地测量学界的重大损失！

1987 年，我有幸成为王先生第一批研究生。先生的精心指导和谆谆教诲让我全面成长，受益终生。得知先生离世的噩耗，30 多年来与恩师相识相知相处的种种往事，在脑海中一幕幕重现，让我无限思念、无比怀念。

## 历经磨难　奋发图强

1930 年 7 月，王先生出生在扬州市广陵区皮市街一户平民家庭，家中主要以裁缝为业。抗日战争胜利不久的 1946 年，扬州城内爆发传染病，王先生父亲染病去世，16 岁的王先生辍学到扬州市德大染坊当学徒，后因染坊停业而失业。

1950 年，百废待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对淮河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治理。王先生得知淮河水利委员会招人的消息，毫不犹豫报名并顺利通过考试，成为淮河下游工程局技工，在江苏盐城治淮工地当测量员。当时工作条件异常艰苦，风餐露宿是常态，但建设祖国的满腔热情和吃苦耐劳的品质让他在测量工地干得踏实认真，因表现优秀还获得了二等模范奖励。

1953 年 6 月，王先生被组织推荐到同济大学干部补习班学习，

并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机遇。他从治淮工地一路辗转来到上海，经过 3 个月的发奋备考，以优异成绩考入同济大学。因在工地干的就是测量活儿，他选择在测量系就读。王先生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为期两年的学习期间，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综合表现优秀；1954 年 5 月加入党组织，并担任班党支部书记；1955 年 9 月毕业留校任教。

1956 年，国家决定以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青岛工学院 5 所院校测绘专业的师资和设备为基础，在武汉创办一所民用测绘高等学府——武汉测绘制图学院。王先生随同济大学测量系离开繁华的上海，来到珞珈山南麓这片荆棘遍地的新校园，以巨大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投入新学校的建设中。“祖国的需要在哪里就到哪里”，正是王先生他们那一代学术前辈身体力行的人生价值追求。

作为学校的创建者之一，王先生与武汉测绘制图学院同呼吸共成长。1956 年 9 月至 1965 年 11 月，任大地系助教；1964 年任天文与重力测量教研组副主任；1965 年 11 月至 1970 年 1 月任大地系讲师。学校撤销停办后，他于 1970 年 1 月至 1974 年 2 月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治河系讲师。1974 年武汉测绘学院恢复重建，他于当年 12 月调回学校大地系任讲师，并接替首任系主任叶雪安先生担任了大地系 10 年系主任。1982 年 9 月至 1987 年 9 月任副教授，1984 年 11 月至 1985 年 12 月任测绘研究所副所长，1987 年 9 月任教授。1994 年光荣退休。在服务学校近 40 年里，他淡泊名利、奋发图强，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业界著名专家和深受师生爱戴的一代名师。

王先生长期从事大地测量、天文测量、卫星定位、河道与水文测量等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是我国大地测量学科的知名学者，也是我国卫星大地测量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积极谋划和大力支持石油系统开拓应用卫星多普勒测绘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他在我国较早开展卫星大地测量学、GPS 卫星定位技术及其应用等相关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他 1965 年参加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测绘学会，曾任测绘学会大地测量专委会委员。出版

了《卫星大地测量学》《理论天文学基础》《GPS 卫星定位技术及其应用》等专著。1991 年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王先生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气质，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潜心教学、精心育人；他一生中仅有的几项荣誉都是与教学相关的，如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优秀教师、教学优秀奖等。他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是公认的大地测量系课讲最好的五位老师之一。我听过他主讲的卫星大地测量学课程，他能把复杂的道理讲得简单明了、栩栩如生。我入校读硕士研究生时，他给我们介绍大地测量专业，以渊博的知识、绝佳的口才，令同学们叹服，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 立德树人　甘为人梯

王先生是我学习及科研路上最早的引路人，是我学术研究的启蒙导师，也是我工作和个人成长的人生导师。

我本科学的是工程测量专业，大学四年级时对空间大地测量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跨专业报考王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尽管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优异，但因报考学生特别多，能否通过复试并最终被录取为他的门生，却仍是一件悬而未决的事。

复试的主考官有两位教授：一位是王昆杰教授，另一位是薄志鹏教授。复试中有一道题是讲述几何大地测量与物理大地测量的关系，当时我按照本科期间所学的控制测量学和地球形状及其外部重力场这两门课的知识做了回答。答完后，王先生立即用最简洁、最易理解的方式给我做了清晰的解释，让人脑洞大开。王先生融会贯通、通俗易懂的表述，让我对大地测量的理解顿时透彻了许多。之后，我顺利通过复试，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

当时，王先生共指导了 4 位研究生，包括师兄熊春宝，同学孙黄琪和师弟兰虎彪。他对我们每个人因材施教、精心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为我们制订专业课程、外语学习等周密培养方案，细致讨论确定研究方向，耐心指导科研工作。当时 GPS 刚引入中国，急需这方面的人才，他就让我一师弟从事 GPS 数据处理，从数据

解码到基线处理等；让我做基础性研究，研究卫星网和地面网联合平差，还让我关注当时比较前沿的航空摄影测量与 GPS 的联合应用，并以航空摄影测量和 GPS 卫星大地测量相结合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

王先生带领我们做了 GPS 方面的一些开创性工作，1990 年完成了辽宁抚顺 GPS 网的数据处理，鉴定处理的精度达到 1～2 个厘米，这在当时是全国最早、最高精度的 GPS 网。

王先生的文笔和口才堪称一流，经他修改的文章常常让人耳目一新。他曾对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进行过全面修改，文中图表都是他亲自用圆规、尺子画出来的。他悉心教导我在撰写科技论文时如何做到清晰表述，如何做到逻辑性、结构性都要规范。这篇文章 1989 年发表在《武测科技》，虽然只是一篇短小的学术论文，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却极其深远。进入研究生学习以后，我由工程测量系转到了大地测量系。大地测量是最基础的学科，难度比较大，要求数学背景知识比较多。王先生就给我安排了一些工程测量外的互补课程、大地测量的主干课程，如卫星大地测量学、数学、数学物理方法等。我的第一外语是俄语，王先生夫人王瑛教授是北京俄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两位先生对我的外语学习给予了很多指导，要求我既学俄语又学英语，为我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先生懂俄文、英文、德文，酷爱阅读经典著作。他要求我们除了学好专业课程，还要阅读大量文献，特别重视培养我们阅读外文文献的能力。他经常复印大量专著和文献让我们阅读，经常布置外文文献阅读和翻译练习，再由他亲自修改并指出问题所在。他会把经典著作复印两本，他看一本我看一本。在论文调研、收集资料前，他会刻意培养我们查找文献的能力。那时还没有计算机，查找资料时他就让我们去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老图书馆等权威机构。大量的文献阅读和查找资料训练，快速提升了我们的学习和科研能力。

王先生非常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1989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先生在尊重我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建议我继续读博士。当年学

校只招收 4 位应届博士生，其中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的 3 位博士是推免的，大地测量专业 1 位博士不做推免。先生鼓励我积极报考，并为我制定了周密的复习计划。最终，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大地测量专业博士研究生。

王先生还通过言传身教、润物细无声地教我们为人处世，全面发展。1990 年 3—4 月，王先生第一次带我去贵州凯里出差。当时火车票非常难买，王先生是县团级干部待遇，可以坐软卧，他竟然给我也买了一张软卧。那时候出差要求住双人间，给我们安排的却是一间大床房，先生说既然来了就这样住吧。第二天我睡到上午 8 点左右，蒙眬中看到先生是坐着的；之后我又睡着了，醒来已是 9 点多。问先生吃饭没有？先生说等我一起吃。我问："您怎么不先吃早饭？"先生却说年轻人能睡是好事，我年轻时也同样能睡。这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于我，却是发自内心的震撼、敬仰和感动。

后来，为了做贵州兴义的 GPS 网项目，他带我整整跋涉一个月做现场考察。我们 4 个人 1 台车，途经麻江、贵定、贵阳，再到安顺、六盘水、兴仁和兴义，几乎跑遍了整个贵州南部。一个月的朝夕相处中，先生耐心地给我讲述了我国测绘事业和测绘教育发展史：从同济大学的测绘学办学历史讲起，到武汉测绘学院建校，再到学校撤销和恢复重建等，让我第一次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测绘教育事业。

王先生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贵州，他开始培养我们的外业观测能力。1990 年夏，为普及 GPS 技术，他去河南讲学。讲学完之后，他让我们三个师兄弟出去了解社会、开阔眼界。到了 8—9 月，他让我们去贵州兴仁、兴义进行野外测量。当时 GPS 仪器比较贵重，他就派我和孙黄琪坐软卧从北京取 6 台 GPS 仪器。我们两个小伙子带了 12 件行李，一件不落地带到贵州，又进行了半个月的外业测绘。师弟做 GPS 解码，GPS 网基线解算、网平差，我做联合平差。王先生对我们的研究报告进行认真指导，让我们的数据成果特别出彩。

博士期间，王先生积极帮我联系引荐，与宁津生院士、晁定波

教授三人共同指导我。三位老师都是国内测绘学界非常知名的学者，他们之后又给我介绍了很多著名学者，对我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启迪和帮助。

我读博期间的研究方向与王先生的研究方向不尽吻合，但先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却丝毫不减。他用项目经费支持我学俄语一学期、学英语一学期。他申请到 3 万元教育部博士基金后，就花 2 万元买了一台台式电脑供我使用。师母也为我精心制订外语学习计划，坚持不懈地帮我提高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能力。师母是一位特别和蔼可亲、特别善良的长者，她一直工作到 83 岁，为培养我等后辈付出了很多心血，我对她特别感激。

我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王先生认为我有管理能力，建议并支持我学术和管理并重发展，这是他对我高瞻远瞩的人生规划，让我受益无穷。

## 温情豁达　润物无声

王先生性格纯良耿直，温厚豁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59 年反右运动中，他提出“教育革命中编写讲义不易保证质量，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宜过长”，因此受到错误批判，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对错误批判过自己的人大度豁达。

王先生待人真诚，乐于助人。时任校长夏坚白先生对他的学习和工作帮助良多，他一直感恩于心。夏先生去世后，他积极奔走、帮助解决夏先生夫人的工作问题；逢年过节，总是带着全家去拜访看望。

王先生对学生更是关爱有加。我们读书期间，学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购买了一台西门子计算机，解决学生上机难的问题。有一门数值分析课的编程实习，有一次我做数值逼近上机实习，把程序编好运行了近两小时，已到中午 12:30，如果过了食堂开饭时间就没饭吃了，于是我把结果发了打印指令后就去了食堂。没想到竟然打印了将近一尺厚的打印纸，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浪费。计算中心工作人员发现打印机一直打个不停，查到是研究生发出的指令，就

强行终止了打印，随后找到了王先生。下午 2:30，王先生打电话耐心询问我是不是缺草稿纸？我说“没有”。先生继续问：为什么打印那么多？我说那个计算机只有字符终端、没有图形终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就准备打印出来再查问题所在。后来先生用自己的钱替我买了那一尺厚打印纸的单。我问先生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你既然不是故意的就应该原谅。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先生对学生的爱护，他特别注意用感化的方式来教育学生、影响学生。我在日后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王先生一生清高，甘于清贫。他不喜欢应酬，很少和学生一起吃饭。这方面他和我的另外一位恩师宁津生院士截然不同。我和宁先生经常在饭桌上交流，师徒之间偶尔小酌尽兴而归。但有两次聚会先生是破例参加了的：一次是亲自参加了我的婚礼，另一次是参加了 1977 级同学的聚会。2018 年，1977 级同学返校聚会，邀请先生作为时任系主任和授课老师参加。刚开始，他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耳朵也不好，就不愿意参加；1977 级校友知道我是他的学生之后，委托我转达了他们的强烈愿望。这样，88 岁高龄的王先生参加了人生最后一次校友和学生的聚会。

恩师王昆杰先生和师母王瑛教授都是知名学者，两位老师相濡以沫、相知相守 60 年，他们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一直是校园里的一段佳话。我读书时就经常到先生家里请教问题；工作成家后，经常带上夫人孩子一起去拜访，几十年从未间断。每年有 3 个节日，我只要在武汉就一定会去看望先生。这 3 个节日是元旦，7 月 4 日先生生日及教师节。每次见面，我和先生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从学术到工作到生活。

先生晚年听力极差，我们和师母交流时，他就静静地在一旁守候着，此时的他应该是满足的、欣慰的。

先生在武测工作生活了近 70 年，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德艺双馨，为我国测绘科技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作为学生的我很惭愧，先生为我做的很多很多，我为先生做的却很少很少……

三年疫情期间，长期教导我、培养我、激励我的恩师宁津生先

生、晁定波先生、王昆杰先生先后离开了我们。我痛失三位敬爱的老师，内心无比悲痛！

人生得良师何其幸运！三位先生都是我心目中的丰碑，是为人为学为师的典范，他们的高尚品格、谆谆教诲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激励和教育着我们不断前行！

尊敬的王昆杰恩师，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系信息学部(原武汉测绘学院)1983级校友

# 深切怀念茆智院士

刘　萍　雷　宇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农田水利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茆智院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13日7时30分在武汉逝世，享年91岁。现转载两篇文章，从成长经历、学术研究、日常生活等方面展示先生的精神风貌。（编者）

2023年1月13日早上7点多，田杨博士打来电话，说医院告知茆院士的情况非常不好，请家属尽快过去。我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还在路上，就又接到田杨博士的电话，说茆院士已经走了……我霎时泪流满面，无比悲痛。

一整天的忙碌中，关于茆院士的点滴不断涌上心头。

在老水院（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几乎没有人不认识茆院士，都知道他是一位传奇人士，几十年只做一件事：农田节水。一辈子不争不抢，在晚年评上了院士！这个故事非常励志，但更让人感慨的是当了院士的茆老师，还是那么的“不起眼”——背个挎包在校园里行走，在食堂吃饭，在各办公室串门……在我做水利系秘书的那几年，他几乎每天都亲自来系办公室拿信件，然后往沙发上一坐，看信、看报纸、看期刊，没有任何架子。高兴时，他会天南海北地讲古论今，话题可以是学术专业、时局政策、生活人文……他好像什么都记得，什么都知道。

2019年，因工作岗位调整，我兼任了茆院士的秘书。那时的他，虽然已退休但身体很好，经常一个人走到办公室呆上半天，或

交流工作、或收看信件。他还是那样从容不迫，一切事情都尽量亲力亲为，不麻烦别人。有工作上的事需要他签字时，他都会约在办公室见面。我曾多次劝他："茆老师您年龄大了，来办公室很不方便，可以让找您的人到家里去。"他却说："年轻人都很忙，我现在有的是时间，不能让人家等我。再说，我出来走一走，也锻炼了身体。"宁愿麻烦自己，也不能麻烦别人，他一直是这么做的。他想见团队的老师了，也是亲自去他们办公室的。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时，茆院士和夫人正住在汉口。虽然他们在学校院士楼里有一套房子，但他们习惯了住在汉口的一套老旧房子里。刚封控时，我预感到以后进出学校会有许多困难，就劝他们住回学校，他们却以住习惯了为由拒绝了。后来，他们所住的小区不让出门了，而他们都不会网购，这时才跟我说家里没有菜了。后来在校院领导的关心下，给安排了通行专车，我才能将想方设法买到的鲜肉等菜蔬，隔段时间送去一次。这一点点本就该我们做的、微不足道的小事，竟让他们心心念念一直感谢着。

茆院士和夫人独住，儿女都不在身边，大家都劝他们请个居家保姆，但他们却觉得自己能照顾自己，不用麻烦别人。这种质朴的精神和品质让人敬佩和感动，但也确实让人担心。果然，2021 年夏天，茆院士在起夜时不慎摔倒起不来了，他却没有喊叫、只是忍痛静躺着，直到夫人发现了他。之后在医院做手术，躺了大半年。在骨科病房里，病友们都说这位爷爷和蔼、乐观、健谈，会给他们解读电视剧《觉醒年代》，甚至还跟他们大讲三道防线、四道防线……

有学生专程从广西来看望他，他还仔细审阅了学生带来的报告文章，在病房里展开学术讨论。出院回到学校后，他第一时间是到各办公室看望团队队员。在劝阻不了的情况下，我每次都全程陪护、接送他来往学校或办公室。我怕他在家里再次摔倒，总劝他找人住家陪护，这工作却一直没有做通。直到他再一次摔倒，再没有离开过医院……

闲聊时，茆院士也给我们讲他的家事。他出生于书香世家，从

小成绩优异，在父亲的教导下，高中毕业后就立志投身治水防灾、造福人类。据说他父亲去世后在南京留下了旧居别墅，他却都捐了，只保留了父亲的手稿。当然，最开心的事，是讲孙女、孙子成长的故事。他虽然身体不好，但从不在儿女面前提起，每次都是用两个字回答：很好。

2022 年上半年，医生说他的情况不容乐观，有阿尔茨海默症倾向。怕以后留下遗憾，我就问要不要让孩子们回来看看。他却总回答：不用，不用，表情里却隐含着一丝落寞。后来，我联系上了他的儿子田杨博士，详细述说了他父母的情况，刚好那时疫情缓和了，田杨博士决定 9 月份回来。当我把这一消息告之时，他高兴得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念叨：田杨要回来了，田杨要回来了，田杨已经到上海了……

那时还只是 7、8 月，医生说他的阿尔茨海默症越发明显了。为了缓解他的症状，我约他们团队的老师定期去看望他，陪他说话聊天，每次他都很开心，关心地询问他们手头科研工作的情况，并当面给予建议或指导。省市及学校、学院等各级领导都时刻关心着茆院士，9 月 20 日，刚调回学校的黄书记，和学院周书记、龚书记，以及节水团队的老师，一起到病房给茆院士过了 90 岁生日。田杨也刚好回来了，茆院士身体状况、精神状况都大为好转，甚至在商量着出院后的安排了……

没想到，元旦前茆院士身体状况却急转直下。在各方面的关心重视下，经医院大力救治，前几天情况已经好转，没想到两天前病情又转重了。正当我们再一次期盼着他能顺利挺过来时，竟然传来了这样的噩耗……

在这寒冬腊月的今天，我相信很多人都听到了雷声，那是苍天的叹息和惋惜！

在茆智院士身边工作的这几年，我学到了很多，终生受益。谨以此文表达我对茆院士的深深怀念之情。

茆院士一路走好！（2023 年 1 月 13 日，作者刘萍系经济与管理学院 2001 级校友）

2021 年 12 月 27 日，中国青年报·中青网记者雷宇曾对茆智院士进行采访，此文比较全面展示了先生的成长经历和学术人生，标题为《茆智院士：逆境中的成长让人受益终身》，现转载如下，供读者分享与纪念。（编者）

20 世纪 60 年代，水利学家茆智做橡胶树灌溉试验研究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土壤湿度高土地里的胶树长得快，在土壤较干的土地里的胶树长得慢；但是在一场大雨或是一次充分灌水后，土壤含水率低的土地上，原来生长得慢的胶树反而生长得更快，原来生长得快的胶树生长速度未变、甚至退减，被原来生长慢的胶树超过。

他和学生用了几十天的时间挖掘树根，找出了埋藏在地下的秘密——干旱地里的胶树，根能长出半层楼高，多是有活力的白根（吸收根），而原来较湿土壤里的胶树，不仅根浅、分布范围小，而且还有许多黑根、烂根。由此，茆智创造性地提出了作物受旱后再灌溉生长发育的“反弹效应”理论，并推广到数千万亩农田。之所以“反弹”，他认为是在外界环境不利的“逆境”条件下，生物自身发展了适应此“逆境”的器官与能力。据此，他提出了作物节水灌溉的新途径。

穿越时光的尘烟风雨，这位即将迈入鲐背之年的科学大师说，“反弹效应”理论的意义远远不止于作物，逆境对今天的青少年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在逆境中的成长能让人受益终身”。

## 童年经历让他确立了一生的志向

1932 年，茆智出生于江苏省江浦县。江浦东南倚长江，西北枕滁河，曾有“京都拱卫”“京师屏藩”之称，自古墨香浓郁。茆智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曾创办全县唯一的一所新式教育学堂，是江浦县第一任教育局长；父亲 20 世纪 20 年代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终身在中学、大学任教。

抗战烽火中，5 岁的茆智随着家人，途经湖北、湖南、贵州等

省一路流亡，9 岁那年，最终来到了四川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

读高小时，小学在合川近郊，茆智家住在远郊的国立第二中学高中部宿舍，上学单程要走 1 个多小时。由于家穷，春、夏、秋三季，茆智基本上是赤脚走路，只在少数日子穿草鞋，冬天则是穿草窝子保暖。

从 1941 年至 1946 年，茆智的父亲在国立第二中学任教。这是一所由江苏省几所重点中学合并迁来合川的国立中学，主要招收来自苏、浙、皖、沪几省的“流亡学生”。在此期间，父亲经常邀请即将毕业的学生来家里夜谈，鼓励他们报考重庆的中央大学，并教育他们：“一定要为了国家学习、为人民学习。”昏黄的夜灯下，父亲的身影和唠唠叨叨的话语成为茆智儿时最生动的一堂人生大课。

上小学时，茆智每天都要从一片片水田之间的小径中走过，那些道路窄小难行、泥泞不堪。川渝多雨，每次暴雨过后，路和桥都被洪水淹没，无法通行；河面上飘着猪牛羊的尸体，河水发出腥臭味，一群群的苍蝇围在河道上徘徊……灾难深重的场景深深刺激着年幼的茆智，让他终生难忘，暗自决心长大后一定要治理这些水患。

1943 年年末，茆智还有一个学期就小学毕业了。此时恰逢国立第二中学的春季班招考，已经自学完小学内容的他提前报考了初中，被成功录取。国立第二中学的宿舍建在一座山上，而教室与操场则在山脚下。茆智数过，从山上到山脚的路共有 128 个台阶，正同抗战时轰动的“一·二八”事变吻合。

踏着这 128 级阶梯，茆智来回往返了 3 年。为了保持师生们的战时警惕性，学校会不定期地进行紧急集合，每次号声响起，茆智都要立刻冲出宿舍往山下飞奔，集合地有时模拟防敌机轰炸，有时模拟抢救伤员。

校园生活条件艰苦，但学校拥有一流的师资。来自扬州中学、苏州中学等国内著名重点中学名师荟萃，连军训教官都自黄埔毕业。国立二中在合川的 8 年，培养出的人才灿若星辰，仅两院院士就有 14 位之多。大地测量学家宁津生院士，正是茆智当年的上下

铺学友。

或许是继承了教数学的父亲的优秀基因，茆智的代数和几何几乎次次是满分。国家危难之际，救亡图存的志气弥漫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他还一度报考了空军少年学校，只因年幼体弱未被录取；他也曾目送过高中学长参加远征军，心有戚戚。

高中毕业时，茆智毫不犹豫地在自己的第一志愿里填上“水利”，决心治水防灾造福人民，“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

## “问题少年”与科学大师

学生时代的茆智让老师“又爱又恨”。

参加国立第二中学的春季班招考时，茆智同往常一样，从水田间的小径取道学校考场。倒霉的是，那天的小径上来了一条大狗。为了不耽误考试，茆智鼓足勇气斗争了十多分钟，才把狗赶到水田里，但他还是因此错过了开考前老师对试卷进行的解释。

匆匆拿到国文试卷，茆智看到作文题栏里只写着“见黑板”三个字。于是他误以为题目是“黑板”，洋洋洒洒写就作文，从黑板写到粉笔，从粉笔联想到老师。直到走出考场和同学讨论时，才得知黑板上写着国文考试的作文题《旧历新年的景象》。

做好了接受落榜打击的心理准备，茆智却意外迎来了国立第二中学的录取通知。判卷老师笑他异于常人的思维，也赞叹他绝佳的联想能力。这段轶事也在校园里广为流传。

在茆智看来，他能写出这篇文章在于平日的积累。他热爱读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几乎能背诵。他偏爱人物传记类书籍，牛顿、爱因斯坦、张衡等古今中外学者的传记故事就像是一盏盏明灯，“教给我要怎么去想东西、往哪里去想”。

学生时代的茆智甚至有点“叛逆”。读高小时，老师对他的评价是“品学兼优、刻苦学习”，在缺点那一栏，老师也写上了四个字：“交友宜慎。”茆智不服，跑去找老师理论，“我跟老师说，虽然老师担心差生会影响我，但是难道我不能影响差生吗？我把他影响过来，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在课堂上，思维活跃的茆智也常常会让枯燥的上课时间充满乐趣。在背诵《长恨歌》时，背到末尾的“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时，茆智想，那在水里应该是什么呢？最后他得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水愿为对虾”，还得意地和老师同学分享。

“老师们对我大概都是又爱又恨的，对我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茆智笑着回忆，“我不像一些人那样乖，也不循规蹈矩，满脑子都是问题。”用茆智的话来说，正是“叛逆”的思维让他对一些公式和原理明白得极其透彻，在此基础上才能有之后的创新。“我以前老是纠结的那些问题，几十年后都记得原理。这和死记硬背的东西不同，是我自己推导出来的，也将终身为我所用。”

大学刚毕业时，茆智跟随苏联专家学习了 3 年。在 20 岁出头的年纪，就曾怀疑过当时指导自己的权威专家推导出的作物需水量计算公式是否正确。为此他连续 3 年做田间试验，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提出了以水汽扩散原理为基础，以日照、气温、风速与栽培水平为指标的分阶段计算水稻需水量的方法，成为我国最早的按成因理论计算需水量的经验方法之一。“这样的怀疑与质疑恰恰就是创新的思维点。”茆智得意的是，自己在质疑和坚持中扭转了国际同行关于节水灌溉的观念。

国外几个很著名的灌溉科研单位，如国际水稻研究所、国际水管理研究院等，原来一直笃定的观念是，水稻节水要减产。然而，与茆智协作两年以后，外国同行就改口了，认为“水稻节水至少不会减产”。协作 3 年后，国外同行正式承认了茆智的成果，认为水稻节水灌溉，既节水还可增产，从而又设立了一项与茆智小组合作的国际合作新项目，题目为“既节水又高产的中国水稻节水灌溉技术”，在澳大利亚等国开展试验研究与应用。

“年轻人要敢想敢创新，敢向老师挑战，敢跟老师讨论。现在教育的最大弊病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想创新，不敢创新，也不会创新。”在面向青少年的讲座交流中，茆智常常借用钱学森的话谆谆告诫大家。

茆智把做学问比作瀑布，蔚然壮观的瀑布，都是山泉、荒溪一点点汇集，经历无数沟溪、狭窄的河谷和舒缓的河床之后，遇到陡

峻崖坎，最终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他看来，这些年少时发散的思维、“杠”过的问题，恰是自己学术生涯中的涓涓溪流。

## “逆境中的成长让人受益终身”

中学时，为了参加英语演讲比赛，茆智熬坏了眼睛。光线好的白天要用来上课，到了晚上，教室里光线很差。茆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写英语作文、看英语书，坚持了整整一个学期。“我的眼睛就是那个时候近视的，”经年之后回首，茆智坦言从不后悔，“感兴趣嘛，感兴趣的事你做起来是很忘我的。”

在一次进入瓜地挑选西瓜的经历中，茆智无意间发现了长在西瓜地里的几株水稻，按其密度计算，可以亩产稻谷几百斤。这次奇特的经历让他对水稻可以无水层生长深信不疑。他钻进研究室，潜心钻研“水稻无水层灌溉”的原理。他一点点地减少水量，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实验更节水，最终提出了水稻高效节水、持续高产、能保持土壤肥力的灌溉新技术。

由于提出运用作物受旱后“生长发育会反弹”来指导节水灌溉的理论与技术、水稻无水层灌溉理论与技术、用成因分析法计算与预报作物需水量的方法与技术等，茆智获 1996 年国际灌排委员会颁发的“国际农业节水技术创新杰出成就奖”，在当年，全球仅有茆智一人获此奖项。这些成果中的一项被苏联与越南刊物转载、写入我国统编农田水利教材，国际粮农组织知名水利专家的评价是，“该方法比粮农组织向全球推荐的方法更实用、计算精度更高”。

2013 年，茆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此后，茆智率研究小组参加了更多的国际合作试验研究工作，并提出了“四道防线”、高效削减稻田排水与渗漏——水中污染物质的理论与技术。

许多熟悉茆智的人都说，茆智最大的本领还不是节水，而是节省时间、珍惜时间。茆智家距学校 1 小时车程，为了节省时间，除节假日外，数十年里他都是一个人住在校内，在大食堂用餐。在海南岛做橡胶灌溉试验时，他住在试验胶园中专门搭建的茅棚内。这里无电、无自来水，经常受到蛇和白蚁的侵扰，在十里以外的华南

热带作物研究所楼房里为他留有住房，但他却在茅棚里住了3年。

在中央电视台为他摄制“东方之子”节目时，当主持人问他“如今你最需要的是什么?”茆智不假思索地回答：“是时间！假如有可能的话，我希望年轻20岁。”

（来源：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雷宇，2021年12月27日08版，图文有删减）

# 回忆导师李金荣教授

赵怡芳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扛着行李迈进湖北医学院的大门，到去年本人指导的最后一位研究生获得武汉大学口腔医学博士学位，我已在这所景色秀丽的大学学习和工作了 50 个春秋。真挚的师生情谊特别让人怀念。在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记录我与导师的二三事，作为人生里一段最温暖温馨的记忆，希望每位导师都能像李金荣老师那样，以立德树人为己任、关爱学生、引导学生成长。

我的导师李金荣教授 1959 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口腔医学院，回国后分配到湖北医学院参与口腔医院的筹建，长期担任口腔颌面外科学科带头人及医院与学院领导。她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道德价值等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李老师参加了援助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帮助阿尔及利亚受援医院开展多种口腔颌面外科手术，包括非洲首例全鼻再造典型病例，受到阿尔及利亚及中国大使馆通报表彰，她援非的感人事迹被中央电视台及人民日报等众多媒体多次宣传报道。

我是 1979 年入学湖北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学系)的首届研究生(图 1)。入学后李老师多次告诉我们，开展科学研究应结合临床问题，一定要不断学习本学科的前沿科学知识，应有学科交叉的思维。当时医院实验条件较差，没有独立的实验室。为了进行牙源性肿瘤的相关实验，课题开始前李老师带着我搭乘公交车去省人民医院检验科，请该科负责人指导学习课题相关的生化与免疫学

检测技术；并帮我联系病理科老师，在该科学习组织病理学知识、穿刺液涂片与染色技术。毕业后我继续从事牙源性肿瘤的研究，探索肿瘤侵袭生长的机制，并开发有利于保存颌骨功能、形态与预防病变复发的治疗手段。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团队已逐渐建立起在牙源性肿瘤及瘤样病变微创治疗的规范，此领域的研究成果多次在国际口腔医学杂志与国际学术会议上报道；国外留学生也因此来我校攻读博士学位，从事相关研究。

图 1　李金荣教授与研究生赵怡芳(右)、黄洪章(左)合影

1982 年 10 月的一天上午，我随李老师上台做手术，在手术室术前刷手的过程中，她问我：“怡芳，你写过入党申请书吗?”“好像你参加科室的活动不多?”我说：“我写过申请书，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并补充：“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知识较少，想利用较多时间巩固基础知识并掌握专业技能，所以……”。她深情地对我说：“你是工作几年后再进行研究生学习的，是我院及学科的首届研究生；要立大志、担大任，不光要努力学习、做好自己的工作，还应

考虑以后如何带领其他人承担更多的学科建设责任。”在她的鼓励下，我加强党章党史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勤奋工作，提升担当作为能力，两年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8 年被评为武汉市卫生局“十佳”优质服务先进工作者，卫生部全国卫生文明建议先进工作者。

1993 年 11 月下旬，我作为访问学者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29 日中午在温哥华机场转机时，正在大厅查看航班信息，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回头一看，是李老师，我既激动又惊讶，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她。出发前的几天我在院子里碰到李老师的爱人卢老师，只是简单提到某天要去加拿大。卢老师曾任教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因罹患慢性疾病，走路很慢，说话也不是很清晰，一直在家休息。没想到他将此信息打电话告诉了李老师。李老师当时是去温哥华探望在 UBC 牙学院读研究生的儿子。在机场的两个多小时里，李老师多次叮嘱我：多伦多天气冷，出门要多穿点衣服；那里的口腔颌面外科与国内的诊疗范围不同，在牙种植、正颌外科及颞下颌关节病的诊断方面有较多研究，但是很少涉及颌面部肿瘤与面部整形，有时间争取去其他相关科室看看，扩展学术视野。因此，1995 年回国之前的两个月，请指导老师 Syminton 教授帮我写推荐信去我工作医院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以及儿童医院整形外科分别参观一个月。在加拿大学习期间，李老师还多次给我写信，了解实验的进展以及临床学习情况。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学习，我充分了解了发达国家本学科及相关专业的发展趋势及诊疗新技术，同时英语交流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回国后相继担任学科带头人及进入医院行政管理岗位的我，时刻铭记导师的教诲与鞭策，爱岗敬业，不懈努力；1996 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后来还被评为卫生部特殊贡献中青年专家，并入选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

李老师爱国执教，潜心学问，为人师表。她退休后仍关心着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顾 80 岁高龄，多次来到科室给疑难病例会诊，并结合从医 50 载的经历和经验给科室的中青年医师及学生讲授学科发展史(图 2)。她要求年轻学子们有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

怀，激励他们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与专业技能，做到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成为病人信赖的好医生。她反复强调，教学医院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研究，要树立科学的学术观，坚守学术诚信，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充分利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口腔颌面外科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结合本学科的特点深入探讨科学问题，开拓进取，做到学无止境。她将坚韧的科学精神和浓厚的学科情怀传递给年轻一代，发挥了重要的学风引领及传承作用。

图 2　2019 年李金荣教授在科室讲课后与医生及学生合影

李老师是一位秉性宽厚又充满智慧的导师，为人亲和，受人尊敬，德高望重。自改革开放建立学位制度以来，李老师培养了一大批口腔颌面外科医学人才，有的成为全国性学术团体的负责人，省医学领军人才，大型医疗机构的管理者或学科带头人，桃李满天下。她希望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总是根据每位学生的特点，帮助他们规划更适合自身发展的事业道路。每当弟子取得成绩时，她都会不失时机地发信息或打电话加以赞扬和鼓励。近年，她双眼患白内障、视力明显下降，但在年初获知她早年的学生、一位高年资的医生去到新的单位工作时，还是在微信上写下近两百字的嘱咐，就科室设置、人才梯队建设、医疗安全等，给予一系列建议。令学生倍感亲切。

李老师诲人不倦的严师风范，虚怀若谷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感染并影响着我及其他学子的一生。春风化雨、薪火相传，我们要以李老师为榜样，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砥砺前行，精益求精，为把口腔颌面外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科奋勇前行。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1 年 8 月 25 日）

作者系医学部（原湖北医学院）1979 级研究生校友

# 追忆恩师余能斌教授

吕忠梅

余老师的英灵请慢些走！

2022 年 12 月 27 日接到素梅电话，说余老师感染新冠后情况不好，多番周折才进入 ICU 病房，我每天都在为余老师祈祷！素梅感染初愈，父母、哥哥同时重症，20 多天奔波于不同医院，万分辛苦。我每次联系素梅，都觉得不该再给她添乱，但又忍不住想知道余老师的情况。元旦假期后上班，问了素梅情况，也接到小武院长发来信息，感觉情况已非常危急，但依然心存侥幸。4 日上午，在会上接到素梅“老爸走了”的信息，不敢相信，急跑到会场外看了又看。中午，陆续接到蔡守秋老师、小武院长还有武大法学院同仁和学生们的信息，还是没有回过神来。余老师，国家图书馆正在筹建法律分馆，我告诉您要把参与第三次、第四次民法典编纂的历史保存下来，已和国图领导说好去武汉做一次专访，作为亲历、亲见、亲闻史料留给后人，您答应了我做好准备的；余老师，您的故事还没有讲呢……

思念中，与余老师相识到进入余门、再到成为家人，40 年往事涌上心头。“忠梅呀，我是余老师”的电话声依然响在耳边，“不要太辛苦，注意身体”的反复叮嘱常在心头，“把做学问和解决实践问题好好结合”的要求正在摸索，“你让老头子做的事情一定做好”的承诺尚未实现……许多难忘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许多感人的话语犹萦绕耳边，呵护、期望、指引……全是满满的爱。就这样再也不见，东湖呜咽，珞珈垂首。远隔千里，思念椎心，仅以文唁，

敬祈冥福。

## 人海茫茫　意外相识

1983 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大三，因为想报考武汉大学环境法硕士研究生，希望能有机会向武大老师请教相关事宜。一天上课时，听说有武大法学院的老师在京参加会议，一位想考武大国际法的同学和我商量，一起到会场去找武大的老师。那天晚上，我们直奔会议所在地，敲响了老师的房门。房里有两位老师，听我们说明来意后，其中一位老师笑着说："我们都是武大法学院的没错，但都是搞民法的，我叫余能斌，他叫马俊驹。"我们俩当时就傻眼了。老师们看到我们的窘样，连忙招呼我们坐下，并让我们讲讲报考武大的情况，表示愿意介绍我们认识武大国际法和环境法的老师。就这样，我认识了余老师，并知道余老师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去武大任教的。

后来，我在武大环境法所读硕士时去听余老师的民法课，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个"冒失鬼"，并主动和我打招呼。我在中南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工作时，中国法学会民法经济法研究会还没有分开，经常在一些会议上听到余老师的高见。40 年弹指一挥间，我从当年带着儿子去给余爷爷拜年到现在带着孙子去给余太爷爷拜年，余老师总是笑呵呵地和孩子们说话，师母更是会给孩子们准备一大包吃的东西带回家。这两天和儿子说起余爷爷，他还记得黄梅的酥糖，不胜唏嘘。

## 江水汤汤　珈山入门

在研习环境法、经济法的 10 余年间，始终感觉新兴学科研究需要有更加扎实的传统法功底，自己在这方面还有差距，就逐渐萌生了学习民商法的念头。记得有一次去武大开会前，和余老师约好汇报近期想法，听我说了后他非常支持，并指导我思考如何发挥环境法专业背景优势，选择好民商法研究方向。

在余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1997 年，我以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方式，成为余门弟子。读博期间，与余老师讨论了环境法中与民法有关的所有问题。当时，正值第四次民法典编纂启动时期，武汉大学和中南政法学院都承担了民法典编纂的研究任务，我从环境法的角度提出中国应该编纂一部“绿色民法典”的观点，余老师非常支持，鼓励我以此为方向思考博士论文选题，并多次与我讨论物权法、合同法及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启发我思考民法与环境法交叉研究的理论课题，引导我结合自身积累、聚焦难点问题进行学术创新。经过与余老师反复讨论，最终将我的博士论文定为《论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论文初稿完成后，余老师先是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然后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与我讨论，指出文章存在的不足，提出改正和完善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从环境法角度作出的一些不同理解，余老师在认真倾听后做了记录，表示需要思考后再予答复。不久，再次和余老师见面，得到了经过思考后的结论。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和论文修改过程中，我对余老师集严谨治学与鼓励后生创新于一体的育人方法感受至深，他严格的学术训练与开放的学术思维使我收获良多。

回想起来，20 多年前虽然遇到了国家第四次民法典编纂的大背景，如果没有余老师的因材施教和悉心指导，我不可能选择“绿色民法典”作为研究方向，也不可能有较为系统的民法思维与研究方法训练，更不可能在第五次民法典编纂研究中明确提出“绿色民法典”的系列主张并实际推动《民法典》“绿色原则”“绿色条款”的形成。清楚地记得，《民法典》通过的那天，我给余老师发信息：“报告余老师，我终于把博士论文写进了民法典。”余老师给我回电话说，看到绿色条款成为《民法典》的一大亮点，十分欣慰。

## 春风化雨　桃李关情

这些年来，余老师是我人生路上父亲般的存在，对于我的人生态度、处事原则都有极大影响。2000 年以后，我到湖北省高院工作，余老师耳提面命，提出坚守法律底线、做清正廉洁法官的要

求。我遇到工作上的难题、案件处理中的法律问题，也会找余老师诉说、求解，余老师总是既倾听又解答，还帮助我分析司法实践问题与法学理论之间的差距。当时我分管行政审判，面对“民告官”的种种困难，如何处理好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既要“监督”又要“维护”的关系，和余老师交流很多。余老师对如何缓解中国的人情社会、官本位思维与依法行政张力、做好司法审查工作的深刻思考，令人茅塞顿开。

还记得，我告诉余老师，湖北省高院的行政审判工作得到最高人民法院表扬，新华社对我的采访受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批示，都是他教导有方。他笑着说：“我只是想想，都是你做的。”2007 年，我到三峡公司挂职锻炼，负责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务和内部审计工作。当时，长江电力准备发行中国第一支公司债，因为没有公司债发行规则，证监会要求长江电力公司进行研究，确定规则后才可发行。我到余老师家里讲了研究公司债发行规则遇到的诸多难题，余老师帮着我对法律问题与金融问题、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进行了梳理，让我思路逐渐清晰。记得长江电力公司债在上交所上市后，我告诉余老师交易所挂着的大幅标语是“长江电力一小步，资本市场一大步”。余老师说：“这是一件好事，你们要把它做好。”

2008 年，我到湖北经济学院工作，余老师对我又成了“孩子王”十分高兴，给我讲了许多如何爱护学生、如何教育学生的故事，教导我要做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好校长。也许是这段时间看到我有些疲惫，余老师开始不断地叮嘱：要注意身体、要多休息。

还记得有一天接到电话，说余老师意外受伤做了手术，还在危险期。我急急忙忙赶到医院，师母说余老师念叨了好多次，问忠梅怎么没有来。我很惭愧，告诉自己以后一定要多去看望余老师。

调到北京工作后，我回武汉的时间少了，只能给余老师打电话问候；余老师也经常给我电话告诉一些好消息。2021 年，全国政协文史馆主办的《文史资料选辑》准备就民法典编纂出一本专辑，文史馆领导找到我，让我推荐民法典编纂的亲历者并邀请他们撰写回忆文章。我因为听余老师讲过他多次参与民法典编纂的“趣事”，也考虑到《文史资料选辑》是国家认可的“正史”，就给余老师打电

话，请他写一篇有关第三次民法典编纂的文章。余老师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说要立即动手写，但却因为工作原因，中间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有一次余老师电话问我是否可以不写了，我“威胁”着说，有问题我去解决，文章绝对不能不写。余老师说：“这是你让老头子做的事情，一定做好。”在我的一再“逼迫”下，余老师手写，立力在集中学习期间抽空录入电脑，父子合作完成了那篇《第三次民法起草琐记》。

读着文章，我在惊叹余老师惊人记忆力的同时，更感到有责任把余老师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留存起来。2022 年，国家图书馆启动了法律分馆的筹备工作，有一个项目就是收集“三亲”史料；我向国家图书馆领导推荐了余老师，并报告余老师请他做些准备，国图会专门派人去武汉进行采访。按照原定计划，法律分馆将于 2022 年 12 月正式开馆，因疫情原因延期，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具体开馆时间。如今，余老师却与我们阴阳两隔了！

……

40 年师生情，40 载学术缘！

此时此刻心之所感难以言表，余老师，天堂路远，一路走好！愿那里没有病痛折磨，只有您喜爱的诗和远方！

作者系法学院 1985 级硕士研究生、1997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 我的老师黄钊先生

沈壮海

2022 年 5 月 8 日 14 点 48 分，我的老师黄钊先生溘然长往。悲痛难掩。刊旧文以念师恩。

融贯中与马，笔耕墨耘真学问；
会通道和德，言传身教大先生。

2018 年 7 月下旬，我们在武汉大学校内以研讨会的形式，庆祝黄钊老师八秩华诞；受同门同学委托，我代表大家撰写了上述寿联以贺。联中所写，是黄老师在众弟子心目中的光彩形象。先生无论治学还是为人，都是我们时时应追寻的榜样。

我是 1990 年 9 月来到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始本科阶段的学习的。从那时开始，承蒙师长们关爱，在珞珈山，我一口气读完了本科、硕士、博士，整整 10 年。黄老师既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也是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导师，耳提面命，教诲谆谆。不知不觉，从先生学，已 30 年。读本科时，黄老师给我们这个年级的学生讲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他用带着浓重黄梅口音的普通话，有滋有味、抑扬顿挫地给我们讲解儒、墨、道、法等各家的政治思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课堂上的情形至今仍时时浮现在眼前。这门课，涉及大量古文献。那时候，教室里还没有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多媒体设备，为了课堂教学时同

学们学习方便，黄老师将有关重要古文献一段一段地用毛笔抄写在白纸上，上课时张贴于黑板，解字释句，阐发大义。黄老师的课，培养、激发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也润物无声地引导我打下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底子，至今受用无穷。

大四下学期，在黄老师的指导下，我以董仲舒的德育思想为主题完成了毕业论文的研究和写作。为了完成论文写作，我泡在图书馆阅读中国古代哲学史、伦理思想史等方面的论著，琢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人物与思想评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去啃了一段时间的《春秋繁露》。虽然这部在儒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著作自己没有“啃”完，更未悟透，只是浮光掠影地接触，这一过程却在无形之中培养了自己对中外经典的亲近感，强化了阅读经典著作的习惯。初稿成后，黄老师反复指导修改，增删多轮，才得以定稿。黄老师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对学生指导的耐心细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引导着我的学术成长。

1994 年本科毕业之际，幸得黄老师的赏识、提携及系里老师们的关心厚爱，我得以免试攻读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继续受教于黄老师门下。那时的研究生数量不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点一年也仅招收 4 位研究生，黄老师那年招收的研究生也仅我一人。对于我的培养，黄老师倾注了大量心血。除了课程教学之外，我课余、周末经常到黄老师家，听老师耐心地解疑释惑、指点迷津。三年学习期间，黄老师多次带我到外地去参加学术活动，引导我了解学术动态，近距离听名师大家高坛论道，还多次鼓励我就会议情况撰写《综述》，并精心修改、推荐发表。这些训练和指导，都是黄老师为培养学生所开出的营养“小灶”。

1997—2000 年，在黄老师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学业。当时，我们专业的名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这是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前身。武汉大学是全国第一批获得这一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三家高校之一，我很幸运地成为武大这一学科点首届招收的 3 名博士研究生之一。《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便是我在黄老师指导下写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黄老师认真审阅初稿后，写下了大量批注，还专门将

我约到家中细心长谈修改意见。黄老师结合论文情况，提醒我一定要注意文章的文字表达问题，强调文字晦涩不是好文风；到处都是长句子，也不是好文风。黄老师的循循善诱，醍醐灌顶。从那时起，每成一文我都会先放几天，并诵读几遍，先感觉一下文字表达是否清晰、简洁、准确，是否能清新明快地将问题说明白、讲透彻。

博士毕业虽已 20 年，一遇到重要问题，我仍是登门请益。从十年求学至今日，黄老师都是我的秉烛引路人。黄老师的“手把手”教、“手拉手”带，才得以让我走到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来。20 世纪 90 年代初，文章打印尚不方便，电脑尚未进入千家万户，老师们写好论文、书稿等，大多要用方格稿纸誊抄后复印，或用复写纸复写。由于是黄老师的研究生，我便有幸经常在第一时间读到黄老师最新写成的论文，帮着誊抄。这绝不是现在一些学生眼中的被老师“抓差”，而是老师“带徒弟”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是接受学术熏陶、训练的难得机会。每每接到这样的任务，我总是很兴奋，以争分夺秒将文章一口气读完为快，然后再一笔一画地用楷书誊抄，不敢漏掉一字、错写一字，哪怕一个标点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去体会老师的学术见解，琢磨文章的逻辑结构、说理论证、遣词造句。

现在回想起来，能够一笔一画、字斟句酌地去写作、用楷书誊抄论文，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多么有“静气”的过程和体验啊！学术研究，任何时候都不能少了这种“静气”。我想，黄老师交给我誊抄任务，也可能正是想让我慢慢领悟学术之乐、能够磨砺并持守学术研究过程中应有的“静气”吧！黄老师经常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的重要经典文献，一定要熟读精读，争取烂熟于胸。黄老师这一代学人及前辈学者，他们的学习过程中，没有方便各类学术文献存储、调阅的电脑，但是，他们将那些重要的文献深深地储存在自己的大脑里，打下了融会贯通的扎实功夫。在跟随黄老师学习的过程中，常常见到他在讲解有关问题时，大段古典文献随口诵出，然后给出逐句讲解，给我们很大的震动和感染。在攻读博士期间，我也更自觉努力地在精读经典文献方面多下工夫，购置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华元典以及汉译西学名著，努力多读一

些多消化一些。为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我专门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著作再次学习，并梳理、整理出多本厚厚的资料汇编，为论文写作的顺利推进打下了比较好的文献基础。

黄老师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勤补书斋”，多次在“勤补书斋”给我讲勤能补拙的道理，强调学习做学问做事，一定要有“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恒心和填干劲，要下得苦功夫。黄老师的这些反复叮嘱，饱含着他对学生、对后来者的殷殷厚望。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黄老师的学术研究曾有多次“转型”，这些学术“转型”，绝不仅仅是围绕着自己的学术兴趣而“转”；每次“转型”，都是黄老师基于自身的学术优长，更好服务、支撑学科建设的努力。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囿于一个固定的范围之内裹足不前，从来没有满足于自己已形成的学术优势不再拓展，而是在不断拓展调整中开辟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将已有的学术优势、特色，融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新需要中，融入对国家思想文化建设的思考和探索之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黄老师便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尤其是道家哲学思想方面接连形成厚实论著，为学界所关注、赞许。如撰于 1985 年前后、1991 年由中国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专著《帛书老子校注析》，萧萐父先生为之题辞，认为该著“综覈诸家传本，较论异同得失，扬搉古今，慎重裁断”，并称赞：“黄钊先生此书从文献的史源考订入手，以研治老学及传统思想，不作浮游、架空之虚谈，善体《老子》‘处其实不居其华’之旨，注意发扬科学学风。我读其书，深慕其找到了在学术上‘大巧如拙’‘大器晚成’的可贵起点。”同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启动撰著的《道家思想史纲》，于 90 年代初甫一出版，即为学界广泛称誉。唐明邦先生在为该著所撰“题辞”中称：“《史纲》是一部论史结合、古今贯通的力作，令人读之对道家思想刮目相看。《史纲》的问世，对于克服学术界扬儒抑道的传统偏见，批判文化思想界的历史虚无主义，均具有无可争辩的现实作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1987 年调回武汉大学政教系任教后，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专

业的建设，黄老师即将研究的主攻方向调整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德育思想研究，并逐渐聚焦于传统德育思想及其现代转化问题，先后出版教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纲》、专著《三德教育论纲》《中国道德文化》《儒家德育学说论纲》等，发表了大量专题论文。在此基础上，近些年来，黄老师在深化中国传统德育思想问题研究的同时，又将眼光投射到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这一更为宏阔的领域，以此为中心视点，立足现实，融通古今。退休后，黄老师精心撰成近140万字的著作《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该著于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古稀之年、一人之力、十年之功，撰成如此鸿篇巨制，在古代德育思想史研究这一问题上，当无前人。文集《思想文化建设综论》，则综合呈现了黄老师对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学术探索历程与宽广视界、精深研几。要关注中国传统德教智慧的研究整理、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当下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共识度显然越来越高、自觉行动也越来越多了。黄老师在这方面的数十年耕耘，无疑为我们在此领域的新开拓奠定了极富意义的基础。在《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的《自序》中，黄老师写道："这部书的写作，是在我的晚年完成的，经历了从'花甲'到'古稀'的年龄演进"，"多年来，虽年老体衰，眼花耳闭，却迎寒送暑，孜孜以求。直至'衣带渐宽''须眉变白'，也无怨无悔。总的感受是：'十年寒与暑，温凉我自知。甘作孺子牛，躬耕未敢辞。'"老师的这种学术精神、学术情怀，是我们所应奉为楷则、躬身践履的。

黄老师是学富五车的经师，更是仁和宽厚的人师。老师与我，情同父子；老师的仁爱之心，我私得更多。这也使我时时提醒自己要勤勉、不松劲，以不负老师的厚望。尤其令人难忘的是，1997年我硕士即将毕业、考取博士生之后，梅荣政老师、黄老师与学院的领导反复商量后，希望我当时便能留校工作、一边工作一边读博士。在那个师生都还没有手机、联系不便的年代，一天晚上，黄老师徒步校园多处，到教学楼自习室等处找我，以便及时将这个决定告诉我，让我能够及时安心留下来。后来，黄老师又给我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告诉我老师们对我的关心和希望。在老师们的鼓励

帮助下，我的思想也很快转过弯来，及时办理了留校手续，并由统招生转录为在职博士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当时曾有不理解，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调整，饱含着老师们深深的信任和期望。

多年以来，每每看到学生有新进步，黄老师都会及时以多种形式给以鼓励，喜悦之情难掩。一次，去老师家中探望他和罗萍老师时，罗老师告诉我，黄老师看到我在《求是》上发表的《文化自信的维度》一文后，对文章多有称赞；黄老师在旁不停点头微笑。2013年，得知我获评2012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后，黄老师还特意作了一首七律诗，并用毛笔写成楷书条幅赐赠与我，多有期勉。

黄老师对学生处处关爱提携，但要求向来也很严格。1996年年底，因我获得团中央一项奖励，学校在人文馆举行座谈会。黄老师作为我的导师参加会议，并在会上讲话。讲话中，黄老师既给鼓励、更提要求。他说："我把小沈比作一盏有油的灯，一拨就亮，因而我也对他特别偏爱，在他身上尽导师应尽的责任"；"我告诉小沈，人生之路长得很，你这次取得的成绩，不过是万里长征才迈开半步，一定要谦虚谨慎，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跨世纪的征程中，再造辉煌，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合乎时代需要的新型高级人才。"会上讲话的手稿，黄老师一直保存着。近20年后的2014年2月23日晚，我登门拜望时，黄老师将这一手稿专门转交给我。我知道，这泛黄的稿纸，浸透着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和叮嘱！

前几日又见到黄老师，虽然暑热难当，清瘦的黄老师仍是精神矍铄。他告诉我正在撰写一部新书——《〈庄子〉注析与研究》，且引论已就。这是黄老师的又一学术雄心。真诚地祝福先生幸福安康，新论早成！（2020年8月16日于珞珈山）

作者系马克思主义学院1990级校友

# 潜心学术锐意著史的学术大师冯天瑜先生

明海英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荆楚社科名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因病抢救无效，于2023年1月12日10时41分在武汉逝世，享年81岁。现将《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的文章《冯天瑜：潜心学术 锐意著史》转载如下，让我们再次目睹这位立言学者、立德立功智者的大师风采。（编者）

**学人小传：**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中国文化生成史》《明清文化史札记》《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张之洞评传》《新语探源》《“封建”考论》等。曾荣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荆楚社科名家”，也是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汤用彤学术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得主。多项研究成果被译为英、日、西班牙、韩文出版。

2015年以前，记者在学术活动或文物展览上多次遇到冯天瑜。他非常谦逊、随和，曾在会场间隙、展览现场接受记者采访。

2015年，冯天瑜经历了一次大手术，术后一度病危；2016年，他被诊断为癌症，当时医生表示极不乐观。之后的4年多，他多次住院。病床上，他坚持阅读，笔耕不辍，整理出版多部专著。

2021 年 6 月 17 日，记者拜访冯天瑜时，他从书房缓步踱出。这间他每天伏案工作的书房里，10 个大书柜摆满了不靠窗的三面墙。在打开的电脑文档上，记者看到一部正在撰写的《周制与秦制》书稿，当时已有近 20 万字。为赶在 80 岁时完稿，冯天瑜每天都工作七八个小时。

交谈中，有出版社打来电话，沟通书稿翻译事宜。记者了解到，2021 年 1 月，“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办公室启动本年度项目，冯天瑜的《中国文化元典十讲》《中华文化生态论纲》同时入选，将分别译为德文、英文在海外发行。

## 博览少年深受史学熏陶

冯天瑜出身书香之家，父亲冯永轩是史学教授，早年就读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从学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从小的家庭文化环境，让冯天瑜较早接触到历史文物，深受史学熏陶。

冯天瑜自幼酷爱文史。小学三年级至高中期间，他随母亲住在湖北省图书馆。省图“住读八年”，博览中外名著，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冯天瑜说，尽管以后很少重读这些经典作品，但早年从文史名著获得的中西文化体悟，对后来深入理解历史问题，尤其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大有助益。

少年时，冯天瑜喜欢阅览游记和地理书，甚至可以随手绘出中国各省区及世界各国的版图轮廓，如数家珍地说出各地面积、人口、简史及国民经济总产值。20 世纪 80 年代，冯天瑜与陪同的外国友人纵谈该国自然、经济，令对方大感惊讶。他表示，地理常识可以使人产生实在的空间感，多读点地理书、游记、笔记小说，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知人论世”说，体察古事古人如历其境。

看到冯天瑜喜爱文史，父亲冯永轩甚感欣慰。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他连续几个寒暑假给冯天瑜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每天晨起，父亲手中从来不持片纸，不仅能够逐句吟诵经典原文，而且背诵程、朱等各类注疏，并联系古今史事，议论

纵横。而我则记录不辍。偶尔插问，父亲又申述铺陈。如此，从早到晚，母亲端来的饭菜常常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冯天瑜说，小时候他博览群籍却未能精读，正所谓“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真正由泛览进而精读，默识深思，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其转折发生在1962—1965年父亲庭训这段时间。当时并未意识到其意义，直至后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才深知其重要。走入文化史研究的学术人生，用冯天瑜自己的话说是“蓄之久远，发于天然”。20世纪70年代后期，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他调到湖北大学历史系。“我30多岁才初入学术门墙，即深感理论思维紧要。读了一些思想史名著，渐渐被《读通鉴论》《明夷待访录》《历史哲学》所吸引。从年轻时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读。”冯天瑜说，《明夷待访录》的“新民本”观，成为他追考中国思想史的指针；他曾反复精读《历史哲学》，深受其整体史观、辩证史观的启迪。这3本书成为冯天瑜的“看家书”，既“观其大略”，获得关于文化学的理论架构；又采取“多遍读经典、每遍攻克一主题”之法，熟悉其精义。

## 深入探究中华文化生成机制

从1980年开始，冯天瑜致力于文化史研习。40多年来，他一直把文化生态作为重要切入口。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华文化史》到《中国文化生成史》，冯天瑜在不断研究和探索中，对文化史理论与研究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

冯天瑜认为，文化史不限于个别文化英雄的业绩记述，绝非帝王将相的家谱，而是亿万庶众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的创造性“共业”。由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共同合成的深层“文化结构”，是左右历史进程的推动及制约的决定性力量，亦决定了民族国家的集体生存方式。在2021年3月出版的《中华文化生态论纲》中，冯天瑜强调：“人类的生态战略须作路径抉择，应当扬弃直线进化的惯性思维，辩证地综合人类全部生态经验。”

研究中，冯天瑜尤其注意考察推进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他不仅研究文化的“外化过程”“内化过程”，还研究外化过程与内化过

程的交相渗透、彼此推引。在重视结构分析，揭示隐蔽在深层的、决定集体生存的结构性力量的同时，冯天瑜丝毫不忽视人的历史主动性，始终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系统论的方法，综合诠释中华文化特质，以剖析中华文化的内在生成机制。在学术生涯的每个阶段，冯天瑜总是强调将历史信息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致力于说明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张岱年曾称之为对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始终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并从一个长时段提供理论研究的独特价值，是冯氏学术研究的基调。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对记者说，社会大转型中的文化现代化问题，与历史学和文化史研究命题息息相关，在这一过程中，冯天瑜体现出作为一个学者的理论自觉，既援引时代入学术，又以学术呼应时代急需。

在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多维结构”中，冯天瑜近年来尤重“制度文化”与“生态文化”两个方面的探讨。“周制与秦制”是中国古代史上长期互渗互动的两种国家制度，儒家和法家的学说是这两种国家制度的思想基础。他在编撰中的《周制与秦制》的“题记”中说：“‘周制-秦制’是中国制度史的一对基本范畴，它们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中生成、演化，并非由某些个人‘顶层设计’左右其兴灭。生态环境于因革间持续维系，三千年周制与两千多年秦制未成明日黄花，若干变异着的要素仍与吾辈共生同行。”其著述目的是：“概述周制、秦制内涵，简析二者的历史功能，及其在现代社会建设中的效应。”此前，冯天瑜曾在《“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等著作中略涉此题，然言未尽意，故运用二重证据法及古今中外比较法，续作抉发，以还原两制状貌。这也是冯天瑜目前正全力以赴努力工作的重点。

## 持续推进区域文化研究

冯天瑜的区域文化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与贺觉非合著《辛亥武昌首义史》。当时，贺觉非交给冯天瑜大量手稿和资料卡片。在认真考订、消化和吸收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冯天瑜着重对武昌首义前后一系列似乎已有定论的微观问题逐一爬梳，重新考证。

“做历史研究，亲临历史现场，对当事人进行访谈，充分搜集口述史材料是非常必要的。他同时提醒我，人是感性的动物，研究一个人物久了，会对这个人物有偏好，研究一个地方久了，便会产生一种乡土情结。因此，在进行史料分析时，要学会排除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不能以今人之好恶来定古人之是非。而应当尽可能广泛占有史料，以中立的态度，公允地立论。”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周荣说，在《辛亥武昌首义史》中，冯天瑜以这种态度纠正了不少访谈资料的缺失。

对于史籍记述分歧、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史事，冯天瑜进一步缜密考订，提出了诸多有别习惯说法的新结论，其中就包括与合作者贺觉非不同的研究成果：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是吴禄贞主持的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只是承其绪的组织；《大江报》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作者并非詹大悲，而为黄季刚；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为 10 月 9 日，并非 10 月 8 日；首义第一枪由程正瀛打响，并非熊秉坤；等等。这些研究结论颇受学界关注。

“学术研究是否步入前沿的两个关键题旨：新材料和新问题。掌握新材料，用以研讨新问题，方得以参与时代学术潮流。”冯天瑜说。他的著述习惯不同于他人，材料搜集、题旨锤炼、结构形成，大多历时较长，一般须数年以上，有的准备工作不下 10 年。对于所需史料，冯天瑜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并坚持赋予周密的考证。在史料来源方面，尽可能追寻原始史料；在形式上，不仅包括文字史料，更包括各种承载着丰富历史文化的历史遗物，甚至扩展到亲自采访得到的口述史料；在时间跨度上，力求从源头追溯，不留遗漏；在地域范围上，不仅包括境内的史料，更包括境外各种有价值的史料，只要力所能及，总是不遗余力地追寻。

1996 年，冯天瑜赴日本爱知大学（东亚同文书院后身）任专任教授，开始接触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史料。1998—2001 年，他讲学于爱知大学，广泛浏览了这批文献并做初步研究，后又在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访学，得以浏览包括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在内的相关文献。又与爱知大学刘柏林教授采访多位东亚同文书院在世老校友，获得口述史学材料颇丰，逐步知晓日本明治–大

正-昭和年间中国调查实态，渐次了解上述文献的学术价值。

自 1996 年始，冯天瑜著文《日本“中国学”的启示——访问爱知大学有感》，率先向中国学界介绍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又陆续编纂出版几种调查材料选译本，如《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等。此外，他还完成了与此有密切关联的其他几种著述，如《“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 1862 年的中国观察》《日本对外扩张的文化渊源》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教授周建波表示，冯天瑜在研究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时，特别关注日本人当年考察中国的动机，并借以反思国内调查研究的开展；重视与文化史相关联的研究。在冯天瑜的大力呼吁和积极努力下，有关东亚同文书院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在基础资料翻译引介方面补充完善，利用调查资料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研究两个方面不断拓展。2015 年以来，线装书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先后影印出版了东亚同文书院编著的《中国省别全志》(50 册)，由冯天瑜主编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200 册)和《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250 册)。这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研究提供了便利的资料条件，是冯天瑜对东亚同文书院研究作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

2017 年秋，冯天瑜在病床上构思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研究》一书的详细纲要。经过两年的研究、讨论，几易其稿，该书第一稿于 2019 年夏完成。2020 年，该书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大项目立项。冯天瑜强调，发掘、整理、研究东亚同文书院有关文献的意义在于：其一，具体认识近代日本探检中国的用心之深、用力之勤，以引为警示；其二，增进国人对社会调查的重视，期以改变中日间关于国情的信息不对称局面；其三，获取研究清末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巨量实证性材料，并借鉴其系统、精密的调查方法。

“东亚同文书院的资料尘封已久，但冯天瑜先生通过有限的几次学术交流便能够敏锐地发现其价值，在长达 20 年期间努力发掘，积极向国内引进，这绝非偶然。”在周建波看来，冯天瑜能够率先发现，并在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是因为冯天

瑜学术视野宽广，善于将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相结合。他践行“二重证据”方法论，长期以来致力于开掘异域史料，故能借“他者”之眼重新审视已有之历史结论。

## 拓殖“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

冯天瑜治史，一贯奉行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力求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的交融互摄。

“先父的治学精神及方法对我日后研究，多有浸润、启迪。先父潜移默化中教给了我考据功力。”冯天瑜回忆道，少时常听父亲提及清人考据繁密，言必求据，如法官审案，孤证不决，务求旁证、反证；从同一源头发展来的一连串证据的母子证，不及来源并列的若干证据的兄弟证有价值等。成年后，他接触过乾嘉学者的论著，从事研究工作后更时常翻检这些书籍。这让他明白，考据精神是全体学者的必修功课，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既以“实录”为治史目标，也就格外需要相当的考据功力。

考察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是冯天瑜长期以来的用心所在。“表达概念的词(字)，是语言中有独立意义的微观世界，是文献、文化的缩影。”通过掘发关键词在古今—中外坐标系间的意义演进，以迎接“文化史研究的读词时代”降临。冯天瑜认为，这一“知识考古”，可以帮助我们窥见“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汉字文化坚韧的主体性、涵泳万方的包容性和行健不息的生命力，或许可于其间洞若观火。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冯天瑜通过对“革命”“共和”“科学”“文化”“几何”“上帝”等核心术语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别是清朝民国之际中西日文化交会间的思想因革状态。讲学日本期间，冯天瑜接触到东亚的语言传播问题，开始研究近代新语，并出版《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形成》等著作，以揭示近代以来文化术语在中西日之间的传播路径，展现近代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会状貌。由此，他致力于探讨“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模式。

“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要义是在概念厘定的基础上更为准确地解释历史；以关键术语和核心概念为关注点，通过概念作历史性考察，探析概念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意蕴。傅才武表示，这种语义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融合无间的研究范式，显示了其“有容乃大”的学术气象，在考论关键性术语的古今转换和中西对接中，显示了“一词一世界”的学术张力。

在具体研究中，历史文化语义学分为两种路径，同是这一范式经典之作的《新语探源》与《“封建”考论》分别代表了这两种路径。前者注重一群术语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面”的展开，通过对近代社会与文化各领域新生术语群的考察，来建构对于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后者则强调一个概念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点”的深入，通过对“封建”这个概念作历时性考析，从总体结构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深刻地阐释了陈寅恪所言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精义。

“封建”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旧词，意谓“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近代以前在汉字文化圈诸国(中、越、朝、日)通用，未生异议。19 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降，中日两国用“封建”一词翻译西洋史学术语 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领主制)，衍为一个表述社会形态的新名。此新名的基本内涵仍然与“封建”原义相通。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来自苏俄的“泛化封建”观强势降临，把“以农业为基础的”从秦汉至明清的中国社会视为“封建社会”。自 1949 年以降，正式颁行的历史学教科书和大多数社会科学论著及整个文化宣传系统皆沿袭此说。

冯天瑜初入学术研究时，也不假思索地运用这种论式。“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在系统阅读经典史学著作后，我对‘泛化封建观’渐生疑窦。思路的整理、明晰化和渐趋深入，得益于和中日师友的切磋。”

《“封建”考论》2006 年初版，一年之内连印 3 次，皆售罄，一时间洛阳纸贵。在吸纳各方见解的基础上，结合自己进一步的史料考析和义理思辨，冯天瑜又对初版修订补充，并于 2007 年 9 月出版第 2 版。不久，该书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学者

代表作文库》第一辑。在第 2 版基础上，冯天瑜作了结构上的归纳调整，内容上亦有所补正充实，于 2009 年 12 月完成《“封建”考论》修订版，2010 年 10 月面世。此后又出版了线装书版，至 2020 年共发行了 5 版。

《“封建”考论》甫一问世，即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2006 年 10 月，武汉大学召开“‘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讨论会”；2007 年 10 月，北京史学界召开“‘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2008 年 12 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联合举办“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曾说：“一本著作连续 3 年分别在中国的南部、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文化中心地带引起连锁讨论，在史学界是少有的现象，这本身就说明其影响力非同一般。”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广智表示，《“封建”考论》的学术贡献在于“流行与沿用已久的‘封建论’应当受到质疑，由此而生成的这则‘现代寓言’必须破解，还其本义，这就是该书所要告诉我们的”。

## 视家藏珍品为天下公器

冯天瑜治学勤奋，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耳闻目睹。近年来，冯天瑜承受重疾之苦，依然勤耕不辍，甚至多次刚下手术台不久，就埋头于书间笔头。

“冯先生特别勤奋，不论在什么样的时空环境中，都能静思与撰著。”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说，他晚年的大著都是在病房里、病榻上写成的。医生多次宣判他生命的期限，但他似乎无暇消沉悲戚，反而抓紧分分秒秒，专心专意思考理论、历史问题，一门心思写书。随着一部部深具“问题意识”的高品质专著问世，他的精神与肉体生命得以升华、延展，此后病魔竟奇迹般退却。他的老友、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刘大钧感喟：“这种精义入神之后能产生正能量，化淤克滞，带动元气生发。可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

冯天瑜追求学术心无旁骛，在各种荣誉、头衔面前，总是谦让。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冯天瑜一再拒绝“进京任职”；1984 年、

1986 年两次拒绝担任校长的任命。在湖北大学任教的 10 余年间，领导曾几次协商让其履校长之职，他却坚辞不受。为此，他给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写信，详细申述想法，一再声明这种安排是避其所长用其所短，恳请组织上更换更合适的人选。

“远权贵、拒妄财”是冯家“未成文的家训”。“父母一生清贫自守，淡看金钱，‘有饭吃即可，何必追求多财’是冯家口头禅。”冯天瑜说，家中的衣食非常简朴，工资半数用在购置书籍、古董上。几十年下来，数量可观，且多佳品。“自 20 世纪 50—60 年代即有人求购，父亲总以‘非卖品’相应。”冯天瑜告诉记者，2015—2018 年，他整理的冯家藏文物图册《冯氏藏墨》《冯氏藏札》《冯氏藏币》经长春出版社出版后，“冯氏三藏”遂渐为人知，内地及香港欲以高价收购者不时与他直接或间接联络，皆被谢绝。

1979 年年初，冯家将所藏古币全部捐赠给武汉师院刚复建的历史系。受父母影响，冯天瑜兄弟坚守“收藏而不贩卖”“取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冯家原则。2018 年，冯氏两代学人将长达半个世纪间收藏的珍品悉数捐出。冯家“以守护文化为职志，视家藏珍品为天下公器”的精神，堪称今世美谈。

由于捐赠的文物和艺术品数量庞大，仅书画就有 400 多幅，武汉大学特设“冯氏捐藏馆”，并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举行开馆仪式。开馆仪式上，有地方媒体采访时问：藏品价值多少？记者曾参与报道，至今依然记得，冯天瑜说，他对文物市场知识几近空白，也于此难生兴趣。幼年时，他父亲每有收获，都是为文物的史料价值和艺术魅力欣喜、沉醉。

“今日追忆、揣摩，参照藏品及相关文献提供的线索，每能打开新的认知门径。”冯天瑜说，40 多年来，他不时于清夜翻检图籍、把玩藏品，沉醉于历史现场感，在与先贤对话、相与辩难之际，思逸神超，偶尔迸发出意象奇瑰的火花，这无疑成为冯天瑜研习中华文化史的一种知识补充与灵感源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 年 9 月 22 日，标题及图片有删改）

# 古远清学长与《珞珈山文艺》

赵致真

2022 年的 12 月格外寒冷。大疫过处，如梳如篦。我自己也感染新冠病毒住进了医院。科技界和文化界精英的讣闻令人渐渐麻木，但古远清学长逝世的噩耗，仍让我悲从中来，黯然神伤。

我和古远清学长绝非一般的泛泛之交，我们相识相知整整 60 年了！

1962 年，我考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住在四区学生五舍。有天傍晚，身材敦实、面孔白皙的 1959 级学长古远清找到我，操一口广东普通话说，系里正筹办一本《珞珈山文艺》，想邀请我做编委。我自然受宠若惊，欣然领诺。这是我人生中头一次参加社团文化活动。

后来了解到，1962 年 3 月“广州会议”的春风吹到珞珈山，中文系急于恢复朝气，提升活力，恰好在校团委做通讯干事的古远清提出倡议，办一份校园刊物《珞珈山文艺》，于是很快得到了肯定和支持。

接着召开筹备会，确定《珞珈山文艺》为 16 开油印本，面向全校发行；“刊登反映大学生活的小说、散文、诗歌，包括当代文艺评论和翻译作品”；由武汉大学中文系团总支和学生会主办；系学生会主席、1958 级郭朝绪担任主编，古远清和熊运藻担任副主编，由古远清主持日常工作，每个年级出一位“笔杆子”担任编委；何国瑞、陆耀东、易竹贤老师担任顾问。我作为年龄最小的一年级新生，是以仰望和渴慕的心情参加编委会的。

还记得那次和古远清一起从四区新饭厅打饭回来，路上听他边吃边说《创刊号》的筹备进展和旗开得胜：由郭朝绪、宣凤华等学长出面三求四请，刘博平教授为《珞珈山文艺》书写了刊名；刘永济教授和沈祖棻教授各作了一首《水调歌头》；李建章教授写了小说《老章和六一亭笔记》；胡国瑞教授写了《浅谈辛弃疾的"永遇乐"》；何定华副校长送来了题词……在中文系，这种规格是超常越辈、空前绝后的。古远清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艺苑趣谈(之一)》。还有不少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同学踊跃投稿，其中袁步凡、袁茂余、刘虔等学长已经在文坛声名皎然，可见《珞珈山文艺》的诞生是群呼群应、众擎易举的。

只可惜当时"自印自发"的条件太差了。"三年困难时期"刚过，一台油印机十分简陋，据说还要公安局备案才能买得到。纸张更非常粗劣，不仅黑而且有疙瘩。我没有多参加劳作，但非常钦佩刘慰祖设计绘画和彩色套印的《珞珈山文艺》封面。还在一楼宿舍看过高年级同学刻蜡板——这是《珞珈山文艺》技术含量最高的工序：将蜡纸铺在布满细纹的钢板上，拿一只铁笔沙沙刻写。用力轻了显不出字迹，用力重了会划破蜡纸，刻错了就用香烟头凑近烤一下，让蜡融化后重刻。油印机的学问也很深，小心翼翼把蜡纸铺在纱网上夹紧，边缘对不齐就会漏墨，推辊子用力不当将引起蜡纸折皱，油墨不均匀又会让版面看上去像"瘌痢头"。我帮忙做过叠纸和装订工作。总见到古远清喜气洋洋地忙进忙出，脸上常常滑稽地粘着几处油墨。

这种油印本的《珞珈山文艺》大约一共出版了 5 期。每次墨迹未干，便被争抢一空。因为最多印刷两三百本，就更显得物稀为贵。如今回想起来，刚刚度过饥荒的学子不仅需要物质食粮"喂饱肚子"，同样需要精神食粮"喂饱头脑"。而"发表"是一种天然的欲望和追求，《珞珈山文艺》虽然菲薄粗糙，却几乎是当年实现"发表"梦想的最佳园地。

1962 年下半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越来越响。《珞珈山文艺》编委会也变得严肃了许多。当时收到 1960 级冼济华写的诗《咏梅》，就引起过一场小小的辩论。我资浅望轻，不敢多

言，但还清楚记得诗的前四句是“百花齐放我不开，我来了姐姐们都失芳华。要与秋风战一场，但等白雪揭开我的红面纱…”。古远清觉得诗写得不错，但也有编委说，要当心被扣上“小资产阶级清高孤傲”的帽子。最后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没有采用这首诗。

尽管编委会很自律，但大约是为了避免变成“同人刊物”，1963 年年初，《珞珈山文艺》收归武汉大学校党委宣传部直接主管了，成为校刊《新武大》的副刊，由杨小岩担任主编。保留《珞珈山文艺》的名号和古远清为首的编委会原班人马，并从此变成了正规美观、清晰易读的铅印版。“化蛹成蝶”的《珞珈山文艺》并没有染上多少“官气”，也发表了不少好作品。而古远清一直在尽心竭力，维系着《珞珈山文艺》的上和下睦和大趣高格，直到他 1964 年毕业。

后来的日子里，两次下乡搞四清，全系搬到襄阳半工半读。我便再也无暇念及《珞珈山文艺》的事。“文革”期间，《珞珈山文艺》也被打成“文艺黑线”，李建章教授的小说，何定华校长的题词，都成了他们的“黑帮罪证”。给我们这些编委留下了永远的痛恻和负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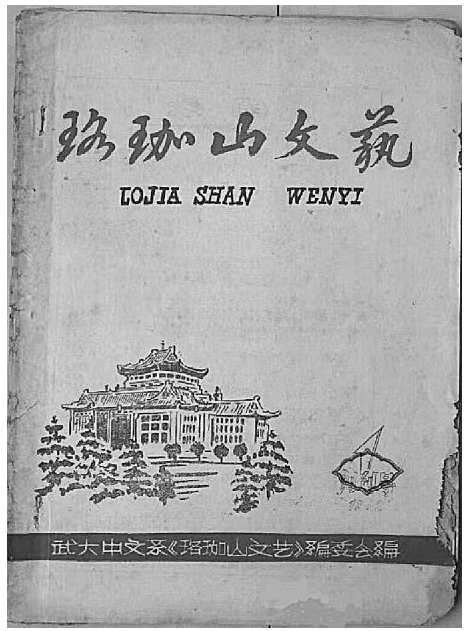
多年来，每当我从媒体上看到古远清新的成果和贡献，就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和同学朋友们谈起古远清，几乎众口一词，称他是“干净的读书人，纯粹的学问家”。

深深感谢互联网，让我们这对老友在晚年成了微信好友。古远清给我发来了他许多著作的电子版，我也给他寄去过几本自己新出的书。但我们“微信聊天”最热烈和不倦的话题，还要数《珞珈山文艺》。他给我发来了一张《珞珈山文艺》第二期封面的照片，还有 1963 年《珞珈山文艺》被《新武大》“收编”后的同仁合影；我则把珍藏的《珞珈山文艺》创刊号和第一届编委会合影找出来，扫描成高清图片发过去，让他惊为“文物”和“瑰宝”。古远清还一一订正照片上的名字，向我娓娓诉说每个编委毕业后的人生际遇和命运沉浮。聊到最后，自然少不了互道珍重和彼此勉励。2022 年 6 月 3 日，古远清还特意发微信提醒我，观看央视一套晚 8 点端午节晚会。其中“屈原与余光中对话《归乡》”，是他参与创作的节目。

1963 年 1 月《珞珈山文艺》编委会成员合影。前排(左起)：成久五、袁茂余、熊运藻、古远清、郭朝绪、陆耀东、宣凤华；后排(左起)：杨兴政、陈汉柏、张秉楠、袁步凡、何国瑞、赵致真、刘慰祖、鲁天夫、李竹雪。

1963 年 10 月《珞珈山文艺》转为《新武大》副刊后编委会合影(左起)：陈汉柏、古远清、成久五、柳佑、赵致真、冼济华、杨小岩、袁茂余、宣奉华、李尔莹。

古远清学长的文学人生，是一条支脉众多的大河。2022 年 12 月 27 日汇入了海洋。而追踪寻迹，沿波讨源，《珞珈山文艺》正是这条大河的滥觞和起点。




《珞珈山文艺》创刊号封面

作者系中文系 1962 级校友

# 同窗好友忆志希

玲子整理

老希(新闻学院教授、博导，秦志希，我们的大学同学)走了。风轻云淡(“云淡风轻”为其网名)，飘然远去。他的大学同窗及学弟学妹们，却陷入了一片悲痛中，无法相信这一事实。

那个温文尔雅的老希，那个憨厚而又有点小小狡诘的老希，那个聪明过人却又呆呆萌萌的老希，那个幽默风趣又总似憨憨傻傻的老希，那个大仁大义路见不平挺身而出的老希，那个飘逸孤傲的灵魂，帅气洒脱的身影，真的就化作一片云飞走了，再也不回来了么？

## 一、大学开始我们从此称他为“老希”

1972 年，我们进入武大中文系读书。我们年级分为三个班：老希在一班，一班是清一色的解放军学员班，全部军装军帽，个个英俊潇洒；二班三班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班。孙家富是我们的辅导员老师。

印象中，大学时期的秦志希是我们年级年龄稍长些的学长，安静、不喜欢抛头露面，每天都是洒脱飘逸微微带笑的样子，没有什么攻击性，但每次公布考试成绩，却总在“优”等之列。

明明叫志希，为什么同学们却都叫他“老希”？他的同室好友李邦泉道出了这个秘密：“老希、李邦泉、韩德全、袁保明、杨秀

贵五个同一宿舍。报到后，大家还不熟悉，一天系里让填表，我们看见秦志希用很潦草的钢笔字填写了自己的名字，‘志’字写得极像‘老’字，不记得是谁随口读道：秦——老——希！哈哈，你叫秦老希！志希赶忙解释：不是不是，秦志希、我叫秦志希；但任凭志希如何解释都没人听。”

可能是大家觉得这个误读既顺口又喜感，于是整个宿舍就“老希老希”地叫开了，后来全班、全年级也都跟着叫起来，连女生们也都“老希老希”地称呼他。刚开始听见同学们这么叫，他还故作无辜地苦笑一下，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可怜样子，叫多了也就习惯了，甚至还十分享受这种爱称。

“老希！”

“到！”

“老希，老希，在吗？”

“老希我在！什么事？”

再后来的几十年里，哪怕他当了教授、博导，在同学们心目中，他永远是那个随和可亲的“老希”；以致后来，他可能自己都记不清自己是叫“志希”还是“老希”了；再后来，仅凭对名字的称呼就能分辨出谁是他的同学，谁是他的朋友、同事或学生。

## 二、同窗四年欢乐多多

老希与陈广胜同学不仅同是鄂州人，而且同在鄂州华容中学初三同班一年，后来陈同学去了黄冈高中，听说老希考了电工，后来又参了军，随部队抗美援越去了老挝。据说，在老挝他是连队文书兼报社通讯员，写的战地报道多次在《解放军报》发表；于是，1972 年被部队推荐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

陈同学一次与老希聊天，聊来聊去居然发现两人还是拐了弯的亲戚，论辈分，老希是叔叔辈的、陈同学是侄儿辈的。这下可好，老希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以后在某些场合老希总会一本正经地说：我侄儿呢？然后自鸣得意地笑。

在女同学眼里，老希是个儒雅的谦谦君子、聪明智慧的优等好学兄；可是在他的同宿舍、同窗兄弟眼里，老希就要五彩缤纷多了。

袁保明回忆：有一次我在宿舍说，牛是没有上牙的，老希说不可能，其他室友都附和老希。我则坚持牛没有上牙。老希便说："打赌！谁输了谁买兰花豆。"于是，我们几个在小雨中打着伞在学校周边村里转了一圈，最后在校园操场上见到了一个老头儿在放牛。大家近前一看，果然所有的牛都没有上牙(牛真的是没有上牙的)。老希狡辩说这是牛小、小牛，还没来得及长牙呢，等长大了就有上牙了。邦泉也在一旁瞎附和着。我看老希他们又赖皮又不讲理，只好给他们买了两斤兰花豆。我赢了还得给他们输了的买吃的，天理何在？

邦泉回忆起另外一件趣事：老希十分聪明狡猾，常常和大家打赌。有一次他问我们，广西的省会是哪个城市？他以为我会回答"桂林"，而我说是"南宁"；他说"错"，广西只有自治区首府，不是省会。又有一次，他问：武大老图书馆的报时钟多长时间报时一次？韩德全说每逢半小时报一次，老希说一小时报一次。大家各执一词，都不服气，于是一屋子的人一起跑到老斋舍上面的大图书馆去盯着钟看时间。结果真如老希所说，每小时才报一次。老希又赢了，他得意地笑了。估计他是早已了解清楚了才来考我们的。

在室友邦泉等人眼里，老希还是个捣蛋鬼。记得有一回袁保明偶感微恙，韩德全说叫周冶陶(一班唯一的女生，在部队是卫生员)来看一下。老希说："不忙不忙！周冶陶不是不信邪不信鬼、天不怕地不怕吗？今天就测试一下。"他叫袁保明躺好，然后拿来袁从新疆带来的毛牛尾掸子遮掩在袁的头上，再给他盖好被子，这才让德全去叫周冶陶来看病。周来后，老希几位一本正经地示意她上前看病，周不知就里揭开被头一看，见一长发魔怪躺在床上，吓得这位平时胆子极大的假小子"哇"地一声怪叫起来，差点跌倒，老希和我们这才哄堂大笑起来。

上左：老希在老挝留影。上右：中文 72-1 班大部分同学留影。下：2000 年，应洛阳老同学袁保明的邀请，老希和一帮武大老同学去洛阳看牡丹（左起：韩德全、老希、董升、袁保明、杨秀贵、李邦泉）。

同班好友彭年贵对有一件事总是弄不明白：读书时，老希虽然离老家鄂州很近但却很少回去，总是躲在图书馆或资料室看书。吃饭时，大家就邀老希一起去食堂打饭。那时虽说伙食是免费的，但食堂的饭菜也着实不敢恭维，吃得最多的就是红菜苔炒腊肉、雪里

蘸炒黄豆。虽说食堂师傅炒出的菜惨不忍睹，但同学们对打菜师傅勺子里的肉片还是虎视眈眈、垂涎欲滴的。当时的食堂(现在叫桂园食堂)里负责打菜的是位女士，令人不解的是每次轮到给彭年贵等几位同学打菜时，明明看见勺子里有几片肉的，那女士却像是故意地将拿勺子的手一抖一晃，眼睁睁看着诱人的肉片就被晃下去了；更令人不解的是，每次轮到老希，那位女士的手就不抖不晃了，满满一大勺菜加肉一点不拉地就倒进了老希的碗里！老希端着碗眼都笑眯了。每次都如此。时间久了，室友们憋不住了追问老希咋回事儿？让老希老实交代——她为什么抖我们不抖你！老希一脸无辜：我咋知道啊！我的祖宗们啊，你们问她去啊！说着，还会把碗里的肉分给大伙儿几片。

一直到50年后，彭年贵说起此事还会哈哈大笑："据考证，那女士只不过也是鄂州人，老希根本就没有与这位女士有过任何私下交集。"

## 三、成为珞珈山名师的老希

老希毕业后留校，不久就转新闻系当了老师。后来，又读了研究生，又提了教授，成了名师、博导。听说他爱生如子，学生爱他如父；听说他在全国新闻学界都很有名气。但在同学面前，老希永远都是那个幽默风趣、温婉随和、风轻云淡、真诚善良的老希。

### 1. 永远的"讲师"

名教授也好、博导也好，同学们在聚会的餐桌上，都戏称他为"讲师"。其实"讲师"的帽子，还是老希自己给自己戴上的——每次远方同学来汉聚会喝酒，老希手握酒杯左敬右敬，说辞简洁且滴水不漏，被他敬的人不得不喝，直到快酩酊大醉了，老希依然轻举金樽，笑容满面地继续敬着大家。很快有同学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就抗议：老希！你这位大教授怎么在酒桌上这么没风度，只让俺们喝自己不喝？老希诡秘地笑着："我不是教授，我是讲师，负责讲……"

从此，每次聚会老希都是最受欢迎的“讲师”。无论哪位同学回珈，都会邀请老希光临。他的幽默话语、憨厚笑容，弄巧成拙后傻傻地一脸无辜的样子，便是受同学们欢迎的魅力所在。

**2. 一言九鼎的老希**

同窗好友吴楚汉回忆：2000 年夏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我乘车到武大校园接他去江夏流芳看楚王朱桢的陵墓，这是几天前就约好的。那天雨大路滑人稀，老希看看这天气有点犹豫，说：“这天气！要不就改天?”我微笑着说：“当兵的人老挝都去过，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这点雨算什么?”老希顿时抖抖精神，把小车副驾驶车门一拉：“走!”此时的他脸上头上已被雨水淋透。我开玩笑说：你已湿身了！他嘿嘿憨笑着，笑得像个孩子。

看完朱桢墓及相关墓地发掘实物资料后，我俩已浑身湿透，但老希似乎完全不在乎了，他觉得此行收获很大：“弥补了鄂人不知楚王的短板。当然楚国八百年的历史和明朝朱家楚王的历史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考究!”

**3. 夜半机叫，只为护你**

武汉大学某青年教授不但学识丰富，而且高大帅气、一表人才，与老希走得颇近。他近日回忆了一件老希爱生如子，却又令他哭笑不得的事：

“那晚，我、秦老师，还有秦老师一位美女博士，应邀去参加一个会议。散会时已经是晚上快 10 点了，我们仨打了一辆的士返校。其间，秦老师还送我一条玉溪烟。车到了武大，由于秦老师家最近，他就先下车了。下车时，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似乎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我估计他是担心他的女博士，因为她住湖边、最远；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就下车了。过了一会儿，我家也到了，我拿着玉溪烟也下车了，嘱咐司机把女博士送回湖边。

“我以为这事应该就这样了吧！谁知道，半夜 12 点 30 多，家里座机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把睡梦中的我给吓醒了。竟然是秦志希打来的！我以为有什么急事，谁知他小心翼翼地说：‘没什么事。

那条玉溪烟你拿走了吗？’”

“我滴个天！你半夜三更打电话只为问我拿没拿烟？我马上就破解了秦老师夜半机叫的目的，于是回道：‘烟我拿了，你的博士我可没拿！’”秦老师就是这样的人，极聪明心细。平时我与他都是手机联系，这次他不打我手机改打座机，为啥？他在试探我回家没！怕我打他博士的主意！他把每一位学生都当姑娘、儿子对待，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生怕他们受到伤害。

## 四、与君一见竟成永诀

同窗学妹万淑华回忆：

学生时代，老希是全年级第一位在讲台上演讲的，他谈吐潇洒、风趣幽默，用粉笔板书，犹如一位风流倜傥的青年教师……

他人特别好，比我和玲子都大五六岁，像兄长一样平易近人，所以每次回汉，我总喜欢邀上秦兄、邦泉、玲子等一起出去玩。然而，2021 年 3 月 17 日我们同学小聚时，我发现我们的老希说话慢了，仍是憨厚地笑着，却不像以前那样谈笑自若了。我和玲子都心中一惊，忙询问：“秦兄，近来身体还好吗？经常锻炼么？”老希慢慢回答：“还好。就是有点血压高，高压 150，在吃降压药。我每天还打乒乓球呢！没问题，明天的江夏踏青一定去！淑华小妹不容易来一回，俺舍命也得陪君子啊！”第二天，老希和同学们一道玩得很是开心。游玩期间，除了发现老希走路和语速稍有迟缓其他还好，我们的心才稍稍放下一些。“万万没想到，此次与君一见，竟成永诀！”

“那天，突然听说我们的好学兄志希走了。我真的接受不了。真后悔 2021 年同学们在江夏的聚会没能多几天，可以与志希兄多聊聊天；如今斯人已去，今后再回武汉，永远也听不见秦兄的谈笑声了……”

同窗好友彭年贵也是万分感慨：2021 年 4 月中旬，他们夫妇俩从北京来汉，邀约李敬一老师还有老希、广胜、玲子一聚。那天，老希按时到场，依然笑容可掬。年贵问他：最近怎么样啊，老

希？老希憨憨地笑了笑说，“TMD！医生说我有点老年痴呆！”说完调皮一笑。

桂园二舍那时叫九舍，我们年级都住在这里，
男生住一楼二楼，女生住三楼。

老希这句话引来了哄堂大笑。彭年贵笑着说：你这么聪明的人还老年痴呆？那我们怎么办？却没想到，这次一聚即成永别！

哭秦兄
痛彻心扉！
50 年一直相伴珞珈
我的好学长好兄长
志希老同学
你怎么可以这样
云淡风轻
风轻云淡地

走了
像一片温润的云彩
去了那能安顿你灵魂与傲骨的地方
从今往后天空一万片云朵
也遮盖不住我泉涌的悲伤
秦兄随风而去了
那么地轻轻
那么地轻轻
而我，而我们的眼泪
却是那么地如铅般
沉重。(玲子写于 2022 年 4 月 3 日晨)

作者系中文系 1972 级校友

# 纪念恩师卢烈红先生

金桂桃

恩师卢烈红先生已永远离开了我们！半个多月过去了，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先生 1959 年 9 月出生于湖北黄梅，幼承家学，喜读书，擅文思。高中毕业后回乡，在生产队任过记工员、出纳，后到大队学校当民办教师两年余。1977 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考取本校汉语史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周大璞先生，1984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3 年考取在职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郭锡良先生研习汉语语法史，1998 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二级教授。

先生在汉语语法史、训诂学、方言等领域造诣深厚，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沾溉学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著有《〈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训诂与语法丛谈》《古汉语研究丛札》《新译〈盐铁论〉》《汉语词汇语法修辞历时变迁考论》《刘赜评传》等著作，在《中国语文》《方言》等语言学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主编或参编《古代汉语教程》《古代汉语字典》《辞源》等多部教材和辞书。先生还积极投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推动全国首个汉字文化节目——湖北电视台《汉字解密》的创办并主讲共 67 期，担任湖北卫视《奇妙的汉字》节目第四季评委嘉宾。

先生于我，是师，似父，如兄，如友。

我有幸于 2000 年 9 月进入卢门，开启跟随先生求学之旅。因

本科阶段的语言学基础较弱，第一次去见先生时，先生交给我一份硕士研究生必读书目，并叮嘱“读书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我真的一次又一次地抱着书本去找先生请教。第一次是诚惶诚恐地去的，担心自己的浅陋会招致先生的不满；先生的儒雅微笑、谦和诚恳、耐心亲切立即让我忘记了先生名校大教授的身份，以后胆子渐大，请教得更加繁密起来。有一次与先生约定的时间是晚上，去到先生家楼下才得知教师宿舍区停电，给先生电话问要不要改天，先生回答已备好蜡烛，可以按计划进行。于是就着烛光，先生照例以我的困惑为起点，将相关知识理论串联相授。我硕士阶段的课后自学所得主要源于先生的这类解惑。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我确定写宋元明清的动量词，但担心论文的语言现象描写太多，缺乏理论深度。先生教育我“汉语史研究，分阶段的语言现象描写是关键”，“你尽量详细地多角度描写，最后一定可以发现一些规律，这种规律本身也就是理论”，“以宋元明清为基点，溯源讨流，就是一部完整的汉语动量词发展史，这种研究非常有价值”。在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下，我试着先写一个动量词，自成一节，交给先生审阅，先生看后在指出各种问题的同时，表示对整体颇为满意。就这样，我写完一节，先生就审阅批注一节，再修改、再审阅，再批注、再修改。记不清修改了多少稿，最后提交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答辩之后，先生又鼓励我修改出版，并亲自为书稿写序。

先生很严谨，即使是文献引用、遣词用语、标点符号也务必正确、妥当、规范。记得读硕士时我写的第一篇论文，自以为还不错，先生反馈给我时，文稿上面密密麻麻的红色圈圈点点和批注，除了逻辑思路等大毛病以外，还有多处引文和标点也都被改了过来，先生说“我查了原文献，这里有个字引错了”，“这些地方这样表述说得太绝对了”，“这里不应该用逗号，应该用分号”，从那以后，我转引文献时必核查原文，遣词用语必不敢太满，直到现在指导学生论文时也是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的。

先生视培养和帮扶弟子为终身之责。读硕士博士期间，所有文稿写完后交给先生把关，先生再忙再累也会挤时间逐字逐句审阅，

逐条逐项提出修改意见。记得读硕士时还没有微信、QQ 这类便捷的交流工具，交给先生的都是纸质文稿，有一次反馈稿上的红色批注不像先生的笔迹，先生笑着解释："这是用左手写的，当时右手在打吊针。"

博士毕业后直到现在，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写材料，依然是习惯性地写完发给先生把关后才能放心。2021 年有一次把材料发给先生时，心里突然有些愧疚，对先生说："毕业十几年了，我还是这个习惯，没经过您把关我就不放心。"先生回复："一日为师，终身之责，能帮你们进步，我很高兴。"2022 年 2 月我试报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没想到竟然入围了。我把选题入围的消息告诉先生，并流露出不太想写标书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太费神且极有可能是徒劳，先生鼓励我："选题入围非常不易，这也表明你有这个实力，好好写标书，你报的选题你自己中标的希望很大。"2022 年 9 月到国庆节，先生挤出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帮助我，大到整体布局、研究思路、子课题内容及负责人的设计与联系等，小到个别字、词、句的具体表述，皆一一予以指导。那段日子，先生白天忙自己的工作，晚上指导我论证或审阅标书。5 万字的申报材料，先生逐字逐句反复推敲，交流讨论电话常常由深夜持续到凌晨。可惜因为多方面的原因，最后没能中标，终究是辜负了老师的殷殷心血！老师却安慰我："努力过了，有遗憾，但不后悔。"

先生爱屋及乌，对弟子所在单位也是有求必应。我在武汉理工大学工作期间，汉语言专业的建设与发展、硕士学位申报、培养方案制定与修改、学生实践和就业等，无一不渗透着先生的指导和支持。可以说，是先生给了我当时负责汉语言专业的底气。

先生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百余人，其中留在武汉的有数十位。先生和师母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卢门团宴：以欢送当年毕业学生之名，宴请所有卢门在汉学生。每次宴请，先生一定至少花半天的时间给每一位弟子逐一发送邀请短信，告知宴请理由、具体时间、地点及路线。师母说："叫他群发一个通知，他不听，非要按着名册一个一个地给你们发短信邀请，发一个勾一个。"每次至少三大桌，一桌十多人，师母亲自提前点好菜，每次满桌佳肴之后必有一

道甜汤，师母说：“你们老师喜欢这个，味道不错，你们都尝尝。”席间，香气萦绕，欢声笑语，家长里短，业内学外，师生无所不聊，畅快温暖。先生是滴酒不沾的，却往往建议学生“喝点儿”。推杯换盏之间，学术前沿，业内动态，单位趣事，社会奇闻，了然入心；学习难题，工作困惑，研究瓶颈，豁然开朗。所有的工作压力，生活烦恼，皆一扫而空。按照惯例，会有一些同门趁机奉上自己的新作请老师帮忙把关。

先生特别喜爱小孩。卢门宴中弟子们的小孩，一定会得到先生和师母的特殊关爱，拉到身边，满眼宠溺，询东问西，倒水夹菜。跟弟子们见面总会问及孩子们的学业状态，常常能记住一些孩子们的重要日子，比如进新学校、中考、高考等。我儿子高考前夕，先生特意电话叮嘱我“孩子进考场时一定要给孩子鼓励和信心”，他以自身经历为例证明这对孩子考场好好发挥是多么重要。

先生涵养深厚，儒雅善良。我从未见过先生发脾气或生气，即使是面对弟子胡乱急就的烂文章，亦能心平气和地批阅、轻言细语地讲解，看不到半点怨言和情绪。先生在学院、学校、学界是出了名的低调谦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正直磊落。众人皆谓其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先生在师母的照顾下保养得不错，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十多岁，卢门弟子皆称赞先生“年轻”“帅气”“男神”。先生永远是我们卢门弟子心中的“帅气男神”，永远是我们卢门弟子前行路上的闪亮灯塔！

先生千古！

作者系文学院2000级硕士研究生校友

# 测绘世界文化遗产的朱宜萱先生

张　帆

朱宜萱老师是我在武大老一辈教授中接触得最多的一位，她从不刻意地讲大道理，而是在各种小事中让我学到了严谨、好学、认真、负责的处事真谛，让我受益匪浅，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2003 年的一天，我因参与数字武大项目需要采集院士楼的墙面纹理，早就听说这栋楼的主人不普通，男主人李德仁老师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女主人朱宜萱老师也相当了不起，父亲是原湖北医学院创始人朱裕璧教授，应该是书香门第的长期熏陶和润泽铸就了她卓尔不群的优秀品质。朱老师 1963 年于武汉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专业本科毕业，1981 年被评为航测工程师，1991 年和 1995 年先后两次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工作，1998 年 2 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在测绘界教育和社会服务中均贡献卓著的前辈人物。因此，这栋小楼在我们心目中一直带着神圣的光环。

那天，我和项目组同学一起拿着数码相机小心翼翼地拍着，有种“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感觉。不一会儿，一位慈祥而端庄的妇人从小楼中走了出来，衣着朴实但不失优雅整洁，个子不高脚步沉稳，目光犀利不失温和，她正是小楼的女主人朱老师。看到敬重的前辈突然出现，我们忐忑不安起来。没想到朱老师问明来历后，竟然热情地邀请我们进院子，为我们的拍摄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随后，朱老师还介绍了小楼的历史和结构，耐心地交代了拍摄技巧，并指出建模中要注意的问题。和朱老师的聊天欢快而亲切，

我们心中的惶恐一扫而光。那天天气很好，太阳照在院子里生机盎然的郁金香上；伴随着愉悦的交谈和朱老师的耐心指点，纹理采集工作顺利完成了。我和小伙伴们感叹：原来，我们眼里的“圣人”竟如此和蔼可亲。

几年后，我顺利进入了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始了研究生求学历程，和朱老师距离更近了。一天，在实验室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中，我有幸听到了朱老师题为《中国古建筑的 V3D 测量》的报告，那次报告真让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原来，朱老师从 1983 年就开始了文化遗产的测绘工作，利用航空摄影测量与近景摄影测量建立文化遗址的航空影像图库、数字线划图库、三维模型数据库和三维仿真平台等，先后服务于国内的北京明清建筑群及卧佛、呼和浩特白塔和五塔、四川乐山大佛、山东青州云门山石窟与大佛像雕刻、河南黄河母亲浮雕、湖南开佛寺、三峡库区新滩、秭归屈原祠、四川大昌古镇等文化遗址。不仅如此，朱老师还将她的技术带到瑞士，服务了也门萨那古代皇宫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古代皇宫等世界文化遗址，她那测绘人的智慧惠及全球。最值得一提的是，她主持的香港志莲净苑“仿唐木构建筑群现代工程监理与真三维数字建筑信息系统研制”项目，利用现代测绘技术保护文化遗产，建立古建筑的数字化信息档案，历经了近十年时间完工，可谓十年磨一剑。观看了成果演示之后，该项目建立的志莲净苑大雄殿三维模型气势恢弘、斗拱梁架结构刻画入微、虚拟组装过程清晰生动、木构组件尺寸精准细致，瞬间改变了我对测绘的认识：原来，测绘并不仅仅是绘制地图那么简单，还能做出这么精美的成果，服务于我们未曾涉足的这么多行业。于是我立志加入朱老师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团队，当即向朱老师提出了申请。不久之后就得到了朱老师的肯定回复。我喜出望外，激动万分。

从那以后，我便有了更多和朱老师交流的机会，在她桃李春风的吹拂下汲取知识的养分，学习科研的精髓。一次在给朱老师做工作汇报时我走进了她的办公室，一进办公室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书柜里满满的全是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各种资料，每本书都被翻得有些破旧了；书柜最下层整齐摆放着的厚厚 4 本手绘木构组件

图纸足有 20 公分高，每页图纸旁边还有朱老师的批注，字迹娟秀而工整；朱老师的书桌上还有一部《香港志莲净苑仿唐木构建筑群计算机三维数据库的建立与建筑工程监理》书稿，朱老师介绍，这部书稿约 35 万字，是她和许妙忠等项目组成员无偿为志莲净苑撰写的珍贵技术资料，她再修改一遍就可以交给香港志莲净苑审查出版了。为了做好这个项目，朱老师仔细钻研古建筑相关知识，已经将自己培养成了古建筑专家。朱老师一丝不苟、孜孜不倦、笃实好学的科研精神成就了学术贡献巨大且实用性显著的项目成果，立下了古建筑数字化保护中不朽的丰碑，该项目获得了测绘科技进步一等奖。

项目完成后，朱老师安排我进行志莲净苑三维模型后期的虚拟现实展示工作。志莲净苑精细的三维模型凝结着朱老师团队的心血和汗水，但其巨大的数据量着实给虚拟现实展示增添了不少麻烦。在朱老师耐心细致的谆谆教诲下，一个个技术问题得以突破，志莲净苑三维场景顺利地搬到了实验室虚拟现实展示大屏，将我们测绘的成果立体生动地展示给了海内外同行专家和各级领导，受到了众多好评。

2008 年 4 月，朱老师带领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团队赴敦煌进行精细测绘外业数据采集作业，我有幸与朱老师同行。在前往莫高窟的路上，第一次来到大漠的我兴奋不已，一路上用相机记录着沿途的风景，而朱老师望着车外茫茫的戈壁滩，眼神中透露出了更深沉的情感。原来，早在 40 多年前，朱老师就作为国家测绘总局第一分局地形七队的一员走进了大西北的沙漠，丈量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寺一龛。朱老师边讲过去大西北测绘的故事，边给我们展示当年的老照片。照片中朱老师骑着骆驼驮着测绘仪器和干粮，英姿飒爽，坚毅的目光望着远方，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和测绘队员的干劲。如今的敦煌已经修好公路通了汽车尚且路途遥远，而当年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在蓬勃生长的野蒺藜、骆驼刺丛中，测绘工作的艰辛可想而知。朱老师在大西北一测就是 8 年，洒下的是青春的汗水，留下的是一幅幅珍贵的地图。

一天，在敦煌作业时，为了寻找测绘控制点，朱老师脚步轻快

地爬上了近 50 米高的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的顶部，把我们这些年轻师生甩得很远很远。待我们跟上她的步伐，她早已找到了控制点，我指着地上的控制点说，控制是一切测绘工作的基础，测绘人一定要先把控制做好，才能纲举目张，进行其他工作。是啊，控制就像一个人的脊梁，脊梁正了走路就不会歪。

敦煌莫高窟崖壁较高，前期数据采集时总是因采集点高度不够而留有较大死角，为解决这一问题，朱老师购买了一台高 20 多米的液压升降机。液压升降机启用的第一天，朱老师就要求自己上升降机顶查看。升降机升到最高点后，朱老师站在升降平台上，不时用手对着崖壁比划，不时还在手心写着算着什么。4 月的敦煌强风呼啸，升到顶的升降平台随风在空中左右摇晃，我们在升降机旁都为朱老师捏了一把汗。朱老师在升降机顶查看了近半个小时才让操作员把升降机降下，这半个小时对我们来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朱老师下来后兴奋地跟我们说："升降机上进行激光扫描和双目相机数据采集的角度可以和地面形成绝佳的互补。"丝毫没有登高的恐惧感。

敦煌莫高窟的数据采集经常由不同单位的几个团队交叉进行，我们在 158 号洞窟采集三维激光扫描数据时就是这样。我们进窟后，洞窟内有一些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拍摄用的钢架、灯光等设备。为了数据获取的完整性，我们采集数据时将这些设备搬出了洞外，临收工时再搬回洞窟。一次，我们因赶时间，搬回洞窟的设备横七竖八地放着，很是杂乱。朱老师见状，批评我们："我们出来工作，每件事都是代表武汉大学的，你们动了别人的东西就要整理好，这是对其他团队最基本的尊重，也是我们武大团队素质的体现。"在朱老师"横平竖直"原则的指导下，我们不一会儿就把设备摆放整齐了，整个洞窟整洁了许多。我回头望了一眼，侧卧在佛床上释迦牟尼的嘴角仿佛也露出了一丝微笑。

那次数据采集临近结束时，请敦煌研究院老师检查我们的数据成果。交流中，敦煌研究院老师批评我们做出的佛像没有"敦煌的感觉"，而我们则总是强调自己用的是当前最先进的技术，数据精度达到了毫米级，对他们的批评不屑一顾。朱老师在一旁笑而不

语，只是事后给了我们《讲解莫高窟》《敦煌鉴赏精选 50 窟》等几本介绍敦煌石窟历史背景、艺术风格和佛教内涵的书籍，让我们认真研读。刚开始，我们不为所动，但读完这几本书后，再看敦煌的壁画和雕塑，仿佛看到了更多更深的东西；再看看我们做的模型，确实有太多缺陷。原来，敦煌佛像的神韵表达是依靠眼角、嘴角、手型、顶髻等很多细节进行的，古代虔诚而技艺高超的工匠们非常注意这些细节的处理，而我们做出的模型细节上哪怕只差了一个毫米，整个感觉就差了很多，难怪被批评没有“敦煌的感觉”呢。在对敦煌文化了解的基础上，我们重新处理了模型数据，成果很快就得到了敦煌研究院老师们的肯定。后来，每次做文化遗产项目前，我都会先找几本相关的书籍仔细阅读，对其文化内涵了解清楚了后知道哪些是重点、哪些细节该如何表现，之后再没闹出“有知识、没文化”的笑话了。

从那以后，我们团队在朱老师的带领下，攻克了高精度几何重建和高保真度纹理重建难题，这些技术得到了敦煌研究院的高度评价，并作为关键技术应用在国家发改委投资的 2.6 亿元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球幕电影的素材制作中。我们的团队也被敦煌研究院打上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标签。数字敦煌的成果也被列为实验室六大标志性成果之一，为实验室评估贡献了一份力量。

朱老师业余热衷于各种公益事业。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朱老师和李院士夫妇都带头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奉献爱心。此外还有两件很有代表性的事情是她为了环保和生态一直坚持在做的。为了掌握世界水大环境，从 2005 年在青海湖取得了第一瓶水之后，走到任何地方看到重要的水源朱老师都要取水。朱老师的取水行动得到了先生李院士及家人，还有地理信息圈内林晖教授、孟春玲教授、周启明教授、沈欣博士的大力支持，他们都被朱老师的取水行动所感动，纷纷从考察路过的世界各重要水源地帮朱老师取水。截至目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世界水 100 多瓶。在实验室水环境遥感专家陈晓玲教授的帮助下，对这些水样进行了重金属成分分析。因为取水化验，看到世界水的大环境，使我们的眼界大开，保护水环境的责任心也越来

越强烈。

朱老师一直坚持做的另外一件公益就是赴新疆植树。自 2014 年以来，朱老师每年都会召集两批志愿者，分别于 4 月和 11 月赴新疆麦盖提进行植树活动。朱老师带领志愿者们挖坑、下苗、填土、补水、施肥，在新疆沙漠恶劣的环境下干劲十足。几年下来，朱老师的志愿者团队已经累计在新疆种下了上万株树苗，早期种下的树苗如今已生根发芽，茂密成林。

朱老师将她的青春岁月留在了大西北，以测绘人的服务保护了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将胡杨和红柳种在了新疆戈壁滩上，而她在人间种下的一片片桃李如今也已芬芳满天下。

（原载《我的武大老师》第二辑，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作者系信息学部（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1999 级校友

# 罗以澄教授与武大新闻学院

刘建明

罗以澄，1944 年出生，祖籍福建省福州市。1961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1966 年毕业后长期在报社、电台从事记者编辑工作。1984 年调入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先后担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副院长、院长。兼任第五届、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新闻传播学科组成员，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全国新闻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

以下是两位新闻人的对话。

**刘建明**：罗老师，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从 1983 年创办以来，已经走过了 30 多个年头。在这 30 多年里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普遍认同。作为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创建人之一、元老之一，您亲历和目睹了这种变化，能给我们讲一讲 30 多年来学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吗？

**罗老师**：我是 1984 年年初到武大新闻系任教的，至今在这里工作了整整 32 年。作为武大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感到十分自豪。武大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创办时期(1983—1986)，也就是我刚来武大任教的头几年。那个时期是非常艰苦的，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一穷二白。记得刚来时，武大新闻系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什么都缺。

一是缺师资，缺少老师尤其是专业教师。当时系里只有十几位

老师，都是从中文、历史、外语等人文社科类系调来的。这些老师有着较丰富的高校教学经验，但大多非新闻专业科班出身，也缺乏新闻实践经历。搞新闻传播教育，对这些老师来说可谓仓促上阵。为此，1984 年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和专科生时，时任系党总支书记兼副系主任的吴高福老师曾感慨地对学生说："你们这一届学生是我们的试验品。"这一状况直到 1984 年下半年后才开始有所改观。当年先后从复旦大学新闻系和本校其他学科选留了几位优秀毕业生，也从新闻媒体选调了几位专业人士，这样师资队伍才充实到了二十几位。

二是缺钱，缺少办学经费。1984 年我(当时担任副系主任、主管教学)和胡武老师等人去湖北日报社、长江日报社、湖北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联系学生实习时，舍不得、也花不起乘坐几毛钱的公共汽车，来回几十里路都是骑自行车；我和系党总支副书记汪华去北京、安徽、湖南等地看望、了解学生的实习情况时，也是为了省钱都不敢坐卧铺，而是坐着火车硬座到处奔波。那几年，我们为学生联系实习，出于礼节需要，给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带的礼品，也都是自己掏腰包，因为系里没有这笔开支。

三是缺硬件，缺少教学设备和场所。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自然离不开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等教学设备和相应的实验场所。当时我们一届本科生有四五十人，每年还招了干修生五六十人，系里的照相机却只有几部，每次上摄影课，几十名学生排着队轮流等着用照相机。至于实验场所更是谈不上了，当时新闻系 20 多位教职员工只有四五间办公室和男女两间厕所。为了给学生一个冲洗胶卷的地方，系党政联席会不得已决定把女厕所改造成暗房，这就是我们系当时唯一的教学实验场所。

总之，一缺人，二缺钱，三缺教学设备和实验场所，武大新闻传播教育便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起步的。

第二阶段是夯实基础时期(1980 年代中叶到 1990 年代后期)。在这个时期，武大新闻教育先后经历过数次组织体制的变迁(1995 年由新闻系更名为新闻学院，1999 年新闻学院与图书情报学院合并更名为大众传播与信息管理学院)和领导班子的变更(1990—

1992 年樊凡出任系主任，1992—1997 年吴高福出任院长，1997—1998 年张昆出任院长，1998—1999 年我出任大众传播与信息管理学院新闻系主任，张昆时任该院副院长）。尽管如此，在几任院系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全体师生共同努力想方设法为武大新闻教育和学科建设的发展打好基础。总体上说，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一是配齐师资队伍。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先后从新闻媒体、兄弟院校和社科院等单位引进了何微、桑义嶙、赵贯东、单承芳、周永固等一批既有较高学术造诣又有丰富新闻实践经验的老师，教师队伍一下就从 20 多人增加到 40 多人。这些老师的引进，既充实了师资力量，又增强了办学实力，尤其是何微老师，他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就从事党的新闻工作，1949 年后先后担任过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山西总分社社长、陕西日报社社长、陕西省社科院院长、西北政法学院院长等职，在新闻业界和学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他的引进，大大提升了武大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的声望和影响力。

二是健全专业设置。创办之初，只有一个新闻学专业；1986 年增办了广播电视专业（1985 年获批，1986 年开始招生）；1993 年，又办了广告学专业。对于传统新闻传播学科而言，专业设置已相对比较齐全。

三是千方百计争取办学经费、添置办学设备和实验场所。1990 年代时，不仅办学经费较过去有了较大幅度增加，而且还先后建立了广播实验室、电视实验室、摄影实验室，各种教学实验设备基本上配备齐全。与此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个时期还探索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适应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办学理念——“注重基础，强化实践，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这四句话是时任系领导的吴高福老师归纳的，很有道理，符合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规律。

第三阶段是发展时期（20 世纪末至今）。这个时期的主要工作就是抓学科建设，把抓学科建设作为办好新闻传播教育的龙头，以此提升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2000 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武汉水利水电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四校合并，成立了新武汉

大学，并组建了新闻与传播学院，由我出任院长主持工作。这之后，主要围绕学科建设抓了三件大事：

一是狠抓特色。就是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既注重向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兄弟院校学习，又十分注意千方百计挖掘、寻找、张扬自身特色，以此与兄弟院校实施错位竞争。武大新闻传播教育和学科建设的创办历史不长，加之地处中原，基础条件和资源与这些老牌新闻院校以及地处沿海地区的兄弟院校相比较，毫无优势可言。如果按照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的传统习惯和做法，去确定办学定位和学术研究的方向，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只能望兄弟院校的“项背”，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前进。为此，我们必须确定自身的办学定位和学术研究方向，从自身特色和优势上做文章。比如，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上，我们有背靠综合型 985 高校的优势，可以主打高端新闻传播人才市场，我们要求培养的学生不仅要精通专业业务，还要懂管理，有较强的组织领导才能，将来能成为新闻传播业界的精英和领袖。再比如，在学术研究方向上，传播学研究，我们重点搞跨文化传播；新闻学研究，重点搞新闻文化和社会发展研究，搞媒介生态和媒介发展研究；广告学研究方面，我们重点抓广告策划和创意研究。我们就是这样抓住自身特色，组织学术团队，凝聚学术方向的。

二是抓队伍建设。在队伍建设上主要是抓两手：一手是面向海内外网罗人才。武大地处中原，又非发达地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再像 1980 年代那样广揽人才实在是困难重重。我们有一个想法，天下英才不为我所有，但可以想办法为我所用。我们要尽力争取得到海内外最优秀的学者和业界精英的支持和帮助，让他们与我们一道为武大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做贡献。这些年来，童兵、李良荣、郑保卫、陈力丹、胡正荣、喻国明、黄旦、戴元光、黄升民、郑贞铭、李金铨、祝建华、洪俊浩、杨志宏等一批海内外著名学者，以及徐光春(时任广电部部长)、王晨(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冯并(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杨伟光(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刘长乐(凤凰传媒集团总裁)等业界领袖，都曾应邀来我院担任兼职

(客座)教授、博导，或者担任研究基地的学术委员，或者来我院讲学。另一手是强化本院教师的职业素养。对本院教师，我们一方面十分注重师德教育，尤其是对中青年教师的师德教育，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比如，我们搞了“双一计划”，即 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一定要有一年的时间到国外的重点大学做高级访问，还要有一年的时间到主流媒体挂职从事新闻传播实践工作，并把这作为青年教师晋职、晋级的硬性要求。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扩大他们的视野，提升他们的教学水平和学术能力，更是为了让他们熟知世情、国情、社情，增强他们从事新闻传播教育与学术研究的责任心。

三是抓学院的影响力和美誉度，用市场化的说法就是注重学院的品牌建设。抓影响力，主要是打国际牌，强化国际交流，扩大学院在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界和学术界的知名度。从 2000 年开始，先后和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几十所国际著名的新闻传播教学和科研机构开展了“制度化”的合作交流。比如，2002 年学院与法国波尔多三大传播学院联合发起组织了“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论坛”，规定每三年分别在中国和法国举行一次大规模高层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此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制度化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每年在中国召开大会时，世界各地至少有四五十位著名学者参会)。抓美誉度，一方面，注重打教师牌，积极鼓励支持教师参加国际国内高规格学术会议，在国际国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争取国际国内重要的科研课题，以扩大他们的知名度；另一方面，注重打学生牌，为业界与兄弟院校输送高质量人才。这些年来，通过抓学科建设已尝到了不少甜头：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们便有了新闻学科博士点；21 世纪以来，学院不仅从拥有二级学科博士点“跳到”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而且还与人大、复旦、中传媒一起被确定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与此同时，还被确定为新闻传播学科第一家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这些都是学院全体师生齐心协力抓学科建设取得的成就。

**刘建明：**罗老师，学院在您担任院长期间取得了快速发展，这

也是与学院的教育理念息息相关的。我记得，您出任新组建的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时，便在全院教职工大会上提出，“我们的办学宗旨是要培养有思想、有责任感的新闻传播人才”，您能讲讲这一教育理念是怎么来的吗？它的深刻含义是什么？

**罗老师：**我认为新闻传播教育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它合乎人类社会实践理性的需要。就是说，新闻传播教育不光要考虑如何去适应新闻传媒业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如何去适应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发展的需要，如何去维护和发扬新闻传播教育本身所应具有的人文品质。这一抽象的道理蕴含了我们办学实践因循的方向和路径，这就是要承续现代大学精神，以培养通识博学、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造精神、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为目的。作为新闻院校，我们担负着为新闻媒体输送合格人才的重任。在当今信息爆炸、思想多元的时代，一个新闻人如果只会做单纯的信息采集者、告知者，是远远不够的；真正合格的新闻人，不仅要做时代风云的记录者、人类历史的见证者，还要做社会前行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做人类精神灵魂的铸造者。这就是我提出的培养“有思想、有责任感的新闻传播人”的要义所在。

**刘建明：**刚刚您提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媒介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您觉得我们现在的新闻传播教育存在什么问题，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罗老师：**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有了快速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或者面临着不少问题。当然，各个高校当前遇到的困境和问题不完全一样，但从总体上看，问题主要出在这样两个方面：

一是由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问题。随着媒介市场化的推进，加之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迅猛发展，迫使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既不断地推向“小众化”“分众化”，实施“精准传播”，又不断融入新媒体，实施全媒体转型。这样，今天的媒体所急需的人才必定是全媒型和专家型的，而传统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的“万金油”式的、“大路货”新闻传播人才自然不吃香了。这就是近几年新闻院校毕业生进媒体工作的人数不断下降的一大主要原因。

二是新闻传播教育本身的问题。具体来说，有这么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开办新闻传播教育的学校太多且同质化现象严重。目前，全国设置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高校近千所，在校学生达 20 多万人，在全世界都位居前列；更为严重的是，这么多新闻传播院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乃至教学大纲都大同小异。这种同质化现象不仅表现在办学上，在科研上也是如此，大家一窝蜂地做着相似的课题，发表着相似的论文。

第二，不少新闻传播院校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手法呆板。有学生反映，如今早已进入新媒体时代，但有些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仍然是 20 世纪传统媒体一统天下时的事件，使用的也是 10 多年前乃至几十年前出版的教材，而且讲课方式是满堂灌，从不问学生喜不喜欢听。

第三，一些新闻传播院系和教师的功利心太强。大学的职责和使命应该是两句话：第一，做学问，追求真理，追求人类普遍的学问和价值；第二，甘做人梯，为培养学生尽心尽责。这两个东西都要求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务必摒弃功利，要有献身精神。目前状况却恰恰相反，作为新闻传播教育的组织，院系、专业考虑更多的是同学科中的排名位次，以及上级领导的评价；作为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老师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争取到更多的科研经费、发表更多数量的论文，以早日晋职晋级。

第四，学科自信的迷失。首先，表现在一些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缺失文化自觉，思想禁锢太多，不敢越雷池一步；教学上墨守成规，科研上也毫无创新。其次，表现在教育制度安排中对现代迷信的推崇。比如，“迷信”传统规制，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同其他人文社科学科一样，长期奉行的是“政治本位”“行政长官本位”等传统规制，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都是由政府(教育管理部门)指导制定的；尤其是政治、外语等公共课程的设置，更是实施强制性规定。在学术研究上，纵向课题的设立、学术成果的优良判定，乃至科研经费的使用等也都是由政府和上级领导决定与监控，学者、教师没有自主权，更没有主导的话语

权。再比如，“迷信”洋人，一些高校把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的国际化，囿于洋人的参与和认可，不管洋人真正的教学水平与科研实力，也不管国际化的实际效用。引进人才，要看是否喝过“洋墨水”，只要是国外尤其是西方培养的“洋博士”就是优质人才，就要千方百计高薪引进；发表论文，要看是否在国外发表，只要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表的，就是高水平论文。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学科自信缺失的表现。

因此，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发展，一方面，有赖于新闻传播教育界同行自身的努力，我们要牢记职责与使命，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要顺应当今时代、社会发展需要，勇于特立独行，不断探索创新，为社会培养出真正合格的新闻传播人才，也为社会奉献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制度安排上的改革与创新，要尊重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的内在规律，尊重高校新闻院系及其教师、学者的自主权，尽力为他们营造一个宽松的、富有活力的教学与科研环境。只有这样，我坚信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与学科建设一定会前程似锦、更加辉煌。

**刘建明**：好的，罗老师，谢谢您。

（注：此文整理于 2016 年）

作者系历史系 1983 级校友

# 我眼中的马费成老师

王晓光

时光荏苒，岁月穿梭。从 2001 年跟随导师马费成教授攻读硕士开始，一眨眼就过去 15 年了。这期间，我经历了硕士、博士、留校工作三个阶段，始终都在先生身边，深受先生教导提点，回想起来，感慨万千。先生对学术事业执著追求的精神让我佩服之至，为人为师的高尚品格更让我衷心敬仰，现谨以二三事述之。

我 1997 年考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当时学院的名称还是旧称——图书情报学院。1999 年，学院与新闻学院合并，改名成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后因武汉大学整体学科调整，2001 年又与新闻学院分开，并改名成为信息管理学院，在此期间先生一直担任院长一职。

学院改名兹事体大，更何况学界翘楚。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既是国内图书情报学科的创立者，又是多年的老大哥，在专业发展中举足轻重，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国内外学界强烈关注。在先生看来，更改学院的名称绝非随波逐流，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在改名过程中，虽遇到巨大压力，但先生的改革之心从未犹豫，其开阔的视野和前瞻的眼光在此改革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图书情报”到“信息管理”，看似只有四字变化，事实上这里面隐含着深刻的学科认识。在先生看来，学科与专业的发展必须适应社会潮流。20 世纪后半期，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信息时代，知名情报学家兰卡斯特教授提出的“无纸化社会”正在加速来临，图书馆与情报机构早已不是为数不多的信息富集机构。政府、企业和

公共机构等部门的信息管理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信息社会的发展为图情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空间。借此改名，图情学科不仅可以重新梳理自身的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向，更可以借机超越机构范式，进入更大的学术疆域，获得更高的学术影响力。

先生开此先河，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随后图情学科的蓬勃发展也证明了先生的眼光之准，思想之深。继武汉大学改名之后，国内众多知名大学的图书情报科系纷纷效而仿之，有的直接改名为信息管理系，如北京大学；有的则顺势成立信息管理学院，如南京大学。图情科系名称的改变直接带来了学术视野的扩大，以及教学理念和课程体系的更新。信息管理院系及相关学科在此改革中也从一个小院系小学科逐渐成长为一个拥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和巨大发展潜力的学术领域。

此次改革影响的不仅是专业教师，还有每一位普通的信管学子。记得我当时本科还未毕业，同学们听说学院改名后都欢呼雀跃，对学院与个人的未来都充满憧憬，庆幸自己踏上了时代的快车。后来学院长期领先的就业率和赴国外名校进修的比例也证明先生的改革之举功德无量，同学们每每聚首回忆当年的学习情境，都感慨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学到了真本事。

当然，任何改革都并非一帆风顺，更何况拥有全国头块牌子的、历史最为悠久的图情院系，改名之举实属冒天下之大不韪。作为一个旁观者怎能体会其中的艰辛，我也是后来慢慢知道其中的困难的，也深深佩服先生顶着巨大压力勠力前行的执著精神。

2014 年，我在美国图书情报学院长期排名第一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访问研究。临回国前，我去见合作导师、时任院长的 Allen Renear 教授，他悄悄问我如果开设一个新的硕士方向——信息管理专业硕士，并把学院名称由“图书情报学院”改为“信息学院”如何。我当时骄傲地回答：十多年前我的导师马费成教授早已践之。今年，Renear 教授的愿望已经实现，不仅开设新专业还改了学院名称，此举掀开了美国图情类院系的改名潮。

1983 年，先生在 37 岁时硕士毕业留校工作，至今已在珞珈山工作 33 年，培养各类硕士博士生逾百人，其中既有教育部的“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又包括知名企业的高管领导，还有各类信息机构的骨干员工，可谓桃李满天下。

我是2001年本科毕业继续攻读情报学硕士学位的。记得当时我的入学考试分数排名并不靠前，选择导师时有些踌躇，担心先生不愿意接受，就试探着给先生打了电话，诚恳地表达了想随先生学习之意，没想到先生直接就答应了，我惊喜异常，也倍感压力。师门里个个都是佼佼者，我有幸被先生直接接受，真是出乎意料；也许是先生看我在班上还算活跃，参与了学院的几个学术活动，临场不怯，还算有些胆量吧。

跟随先生学习，虽然先生很少直接批评人，但压力是无形的。我攻读硕士期间，先生还担任院长一职，工作繁忙，但是《信息经济学高级专题》一课基本上从未间断，很多时候课程是在院长室旁边的小会议室进行，多采用Seminar这种教学方式，也就是小型讨论会。开课之初，先生给我们安排了讲授任务，四个人分别讲授不同的章节内容，我负责讲授信息商品的定价方法。在当时，信息经济还算新颖，远不如现在火热，信息商品研究也不多见。为了准备这次讲授，我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找资料看文献，试图从信息商品的特征、定价基础理论到定价方法和具体的定价策略给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讲授思路，并在先生的《信息经济学》这本专著之外给出一点新的见解。轮到我讲课时，心里已经基本有数，并提前打印了讲课提纲，分发给所有人。研讨过程还算顺利，从先生点评来看，是满意的。

到了研二期间，先生有天突然叫我面谈，交给我一个任务，给核心期刊《情报理论与实践》撰写一个信息经济学系列专题文章。连续五期，每期一篇。当时，这个专题可以说代表了学界对信息经济学的最新认识，每篇文章都是先生精心选择的一个主题，并列出了大纲，希望借机梳理图情领域关于信息经济学的最新研究进展。这样的文章，写起来难度较大，即使有先生列的大纲，仍信心不足。在先生的鼓励下，我硬着头皮答应下来，随后即使参与了先生的其他科研项目，也按时交稿给先生。在先生的精心打磨下，五篇文章最后都顺利发表，后来引用率都还比较高。

正是这次锻炼，极大地提升了我发表论文的信心。临近硕士毕业时，我共在核心期刊发表了 10 篇文章。我想，如果这算我学术道路上一个里程碑的话，那与先生的鼓励和鞭策是分不开的，正是先生的信任和给予的压力促使我尽快踏上了学术之路，并获得前行的动力和小小的成绩。

2004 年，我硕士毕业后因夫人留校而放弃工作，继续攻读博士。读博期间，除了基本奖学金外，并无收入，先生考虑到我的家庭原因，经常从科研项目中拿出一些补贴资助于我，希望我能安心做研究。师母石晓英女士也竭力给我的夫人提供了很多英语教学的机会，使我们的生活宽裕了很多，不用再为日常生活发愁，可专心于学术。

2007 年，我博士毕业，很幸运能留到出版科学系从事数字出版与情报学交叉研究与教学，这与先生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暑假期间，我向先生请教如何做好本科教学工作，先生知无不言，倾囊相授，并将其所有的教学 PPT 交于我学习，没有半点保留。9 月，开学前一天晚上的深夜，先生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晓光，你明天早上有课知道吗？要提前 10 分钟到，第一次上课不要紧张，上课要有信心。"先生一席话让我感动至深，至今记忆深刻。后来，我的一名硕士生也有幸留在学院从事行政工作，我也学先生提醒她，不管是教学还是行政工作，都不要迟到早退，要尽心尽力，这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现在她已成为学院的骨干员工，我也体会到先生那种无私关怀学生的快乐。

近些年来，随着科研资历的积累，我也参加了一些人才项目的申报。2011 年，我参加了中组部首届"青年拔尖人才"项目的申报。先生十分重视这次申报，从开始撰写申报书到准备参加面试答辩，都给予了深切关心。参加面试答辩前，学院进行了集体预答辩，之后先生又专门叮嘱我修改答辩稿，并组织专家团队给予多次指导，进行预答辩预演。最后的答辩十分顺利，我有幸入选中组部的"万人计划"。我想这与先生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追随先生 15 年来，先生睿智、谦逊、大度的高尚品格，执著追求、从不退缩的敬业精神无不影响着我、激励着我，也时刻提醒

着我作为一名教师的本分，那就是传道授业，为人师表。

今年是先生 70 岁大寿之年。虽是古稀之年，但先生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只要谈起学术和教学工作，先生言语中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学院和学科的发展关心倍切，似乎这是先生唯一的乐趣。近几年来，先生为推动“情报工程学”的发展不辞辛劳，上下奔走。先生说“三尺讲台通四海，桃李芬芳业千秋”，在先生看来，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是千秋之业。从黔灵到珞珈，先生一直在追求他的情报学千秋之业。

《诗经》有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先生君子之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我一生学习的典范。

（原载《我的武大老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作者系信息管理学院 1997 级校友

# “标本唐”家族的守望者

刘　丹

1891 年的一次邂逅，改变了一个东方家族的命运。

家住闽江边的青年唐春营和英国人拉都胥相遇，开始学习标本制作技术，“标本唐”家族肇始发端。

接下来的 100 多年历史里，这个家族的子弟从福州开枝散叶，分布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个城市的研究机构、博物馆和大学，直到今天，历时五代，“标本唐”家族在标本界如雷贯耳，举足轻重。

“我国 1300 多种鸟类中，武汉大学标本馆收藏了超过 700 种，可以说在全国所有的博物馆、大学标本馆都是最丰富的。”武大标本馆创始人唐瑞昌的后代、馆长唐兆子难掩骄傲。

但辉煌仿佛已经只是历史，现在的标本馆更让他忧心忡忡。由于标本制作逐渐受冷，参与人员逐渐减少，这项技艺的传承面临诸多困境。

“我曾经带过 30 多个徒弟，现在还在从事这一行的不超过 3 个人。”唐兆子说，他很喜欢“守望者”这个词。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名守望者。

## 出 身 世 家

今年的春天来得有些迟。

每年的 3 月中旬，武汉大学樱花大道上的樱花已经开始绽出粉

粉的小花苞，再过不久，漫天雪白的云霞就会笼罩整个樱园。

只有在这个时候，樱园旁边的武大标本馆才会开始热闹起来。里面收藏陈列的那些动物：3 米多高、昂首采食树叶的长颈鹿，举臂抓耳挠腮的大猩猩，作势飞奔的豺狼虎豹……才会在一年一度地迎来赞叹和惊奇的目光后，又归于沉寂。

武汉大学标本馆一共收藏了几千件标本，其中鸟类标本种类及数量为全国之最：有制作年代最久的 1911 年的崖鸽、全国最罕见的黄腹噪鹛、最高达 2 米的非洲鸵鸟，也有世界上最小的、连嘴带尾仅 4 厘米的蜂鸟……

“我国 1300 多种鸟类中，武汉大学标本馆收藏了超过 700 种，可以说在全国所有的博物馆、大学标本馆都是最丰富的。”标本馆馆长、著名动物学专家唐兆子如数家珍，脸上难掩骄傲。

这是一个自 1928 年开始存在于历史的标本馆，这任馆长、上任馆长、上上任馆长，都姓唐。他们，以及国内很多大学、博物馆的标本制作人一起，都发端于闽江边的一户渔民家庭。

1861 年秋，祖辈靠捕鱼打猎为生的年轻渔民唐春营，有一天打到了一批白鹭，在出售白鹭的翎羽时，意外结识了当时刚任职福州海关的英国官员拉都胥。作为一位狂热爱好自然科学的海关官员，当时的拉都胥已掌握了一套颇为先进的动物标本剥制技术，而年轻的渔民唐春营则具备其他很多人没有的非凡捕猎能力，他甚至能不凭任何工具、赤手在江水中抓到活蹦乱跳的江鱼。

很快，拉都胥跟唐春营达成协议：唐春营帮他捕捉稀罕的鱼和鸟，再由他制作成标本，使动物在若干年后看起来依然鲜活如初。在制作标本的过程中，拉都胥将这套制作技术也传授给了唐春营，唐春营再传给自己的子孙。

直到今天，历时五代，“标本唐”家族在标本界如雷贯耳，举足轻重。上海自然博物馆所收藏的 24 万件动物标本中，由唐家几代人制作的达 90%以上。

武汉大学标本馆肇始于唐春营的四子唐启秀。1928 年，唐启秀跟 16 岁的儿子唐瑞昌一起来到武汉，父子俩把唐氏家族历年苦心积累下来的鸟类标本全部捐给了武汉大学，并在武昌阅马场武大

旧址(今湖北教育学院)创办了武大标本馆，这也是中国成立最早、最大的动物标本馆之一。

## 快乐童年

对于10岁以前的故事，唐兆子的记忆并不特别清楚。

他还记得，那时的武汉大学校门口的一大片土地都是农田，珞珈山下，村民们和大学生、教授学者们一起，共生共处。这一阶段的唐兆子胆子很小，即使跟珞珈子弟们一起打弹珠、拍洋画，多半也都在房前屋后，不敢走得太远。

记忆在1957年左右变得格外鲜活。

“那时候的磨山还不是风景区，就是东湖中间的一个小岛，要去只能划船。现在的风光村我们以前叫小码头，从这里上船，船票一人一毛钱。”冬天的周末，在武大生物系担任动物标本技师的父亲唐瑞昌就会带着他一起坐船去东湖打鸟，以制作和补充标本馆的标本。

“那时候姐姐已经出嫁，我跟爸爸妈妈三个人租一条渔民的小船，爸爸拿着猎枪坐在船头，我跟妈妈坐在船尾，一去就是一整天。”唐兆子说，那时候的东湖飞来越冬的鸟儿非常非常多。“常常是船一到湖心，就有一群鸟儿哗啦啦地飞来，遮天蔽日。我估计最少也有两三万只；不像现在，湖面上的鸟恐怕连一百只都不到了。”

说到鸟儿铺天盖地的胜景，唐兆子把手用力一挥，仿佛幼时的画面再一次重现了。

这些鸟儿中，最多的要数雁形目和鹳形目。“那些嘴巴扁扁的，不管个子大或小，都是雁形目；腿长长、嘴尖尖的那些鹭都是鹳形目。”这些鸟类的归属知识，在风光村渔民的船头，10岁的唐兆子就听父亲说过无数遍。他认真而专业地纠正记者的错误理解：“鸬鹚和鹭鸶不是一回事。鹭鸶长嘴、长颈、长脚，通常安静地涉行浅水捕食，鸬鹚才是渔民养来捕鱼的那种。”

他印象最深的是鹈鹕，渔民叫它水葫芦。“这种水鸟的胆子特别小，常常在40米开外看到有人来，就一头扎进水里逃开，一口气能潜出去20多米。”唐兆子说，每次看到这种鸟，父亲就让船夫

全力划过去，运气好的时候，刚从水里钻出来的鹡鸰刚好会在船边露头，还没来得及换气逃开，很容易打到。

“因为现在鸟儿太少，你们恐怕体会不到那种看到鸟儿被打下来后，一个孩子的惊喜和兴奋。”唐兆子笑着说。他对动物学及标本制作的热爱就在一次次的打猎过程中被培养和激发，12 岁，刚读初中的他就开始自己扛枪打猎。

“每个周末放学回家，爸爸总是给我准备好了猎枪和几颗子弹。”从小看惯了父亲用枪的唐兆子对枪的熟悉超过任何一个同龄少年。很快，他的身后聚集了一大帮珞珈子弟，有数学家李国平、化学家查全性的儿子等，他们有的比他小，有的比他大。一帮小孩跟着领头的唐兆子，浩浩荡荡去打鸟。“有时候人太多目标太大，很容易惊到鸟儿，我就跟他们一起趴在路基边上，只露出一排小脑袋。”说起童年时的趣事，唐兆子兴致勃勃。

没有船到不了湖心，他们的狩猎时间总在傍晚，地点在珞珈山脚下。“晚上的时候鸟儿要归巢，我们就守在路边，等着有鸟飞过的时候给它一枪。”“少年打猎队”每次出去竟然都有战利品，有时候是喜鹊，有时候是乌鸦，有时候是斑鸠，总有两三只。

## 旧时辉煌

武大生物系学生在大一结束时，有两个星期的生产实习，不管是动物、植物还是微生物专业的学生，都要扛起猎枪去东湖采集鸟类标本，唐瑞昌就负责指导这门课程。

“不是单纯地打鸟，主要是要熟悉标本采集的规范流程。”唐兆子示范，鸟儿打下来之后，要马上在鸟嘴里塞上棉花，并用报纸包起来。这样，血水就不会从鸟嘴或伤口流出来污染别的标本。

唐家人主要采用填充法做标本：先把鸟或鱼的皮小心剥下来，再上药处理后塞入棉花等填充物。因为是后期填充，比较容易表现动物的肌肉和姿态。但是动物的皮肤干燥后很容易收缩，填塞物的多少就是个技术活。“填少了显得干瘪不生动，填得多了又会臃肿，时间长了皮肤收缩以后还容易崩裂。”唐兆子觉得有些遗憾，

在武大标本馆陈列的一头长颈鹿标本原本是他的得意之作，姿态动作都堪称经典，却因为填塞物稍微多了点，经过长时间的皮肤收缩，原来固定缝合的部分竟然裂开了。

但他对于唐门的手艺十分自信："看外面那些小白鼠标本制作的好坏，看它嘴头部分的处理就知道了。"因为这个部位的软骨不容易被取出来，很多人做标本的时候干脆弃之不顾。"做得不好，时间长了就会变得干瘪收缩，变成尖尖的形状，很难看。"

唐兆子对标本制作的手艺要求相当苛刻。2011 年，他被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筹建中的博物馆聘任，布置动物标本展区。对方提供了 20 多只金丝猴标本供选择，没有一只他看得上眼。"猴子的皮子本来就比较松，如果硬把它填满，瘦猴就成了胖猴，连手臂的形态都没有了，这样的猴子怎么能在林间自由跳跃穿梭？"

虽然国内各大标本馆的技师多半出自唐门传人，但在唐瑞昌掌舵武大标本馆的时候，这里的风光国内没有标本馆能出其右。

"家里的叔叔伯伯堂兄堂弟分散在国内各大高校，北大、中大、福建师大……爸爸在的时候，他们常常约在一起集中打猎，采集标本。"唐瑞昌在唐门三代弟子中威望最高，每次出远门的打猎活动都由他发起，西双版纳、海南，他们先后去过好多次，一去就是两三个月。

之所以选择热带是因为这些地方的气候合适，植被丰富，动物的种类和数量都格外多。每次打猎，唐门弟子都团体作战，再集中分配。因为唐瑞昌的影响力，分配战利品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打下来的鸟儿每个种属只有一只的，一定要留给武大。"两只或者以上的，武大标本馆拿了以后，才会分给别的学校。"唐兆子用几叠报纸给记者做示范，当时父亲是如何为武大标本馆争取到最丰富的鸟类标本的。直到现在，武大仍然拥有全国高校中最完整的标本收藏。

"文革"以前，蜗居在平房内的标本馆是武大对外交流的窗口。1963 年，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陪同阿富汗国王前来参观，看到了这里的窘困，尤其是世界上最小的鸟——蜂鸟被很委屈地放在一个角落，建议再盖一个标本馆。于是，1974 年新馆动工了。考虑到要做有飞禽走兽的立体布展，标本馆一共四层，每层都有 5.2 米净高。

## 尴尬境地

4年前，唐兆子已经退休，但他仍然担任标本馆馆长。

他很喜欢“守望者”这个词。他说，现在他就是武大标本馆的守望者。说这句话的时候，唐兆子的语气中透着无奈和苍凉。

让他无奈的是这个行当的后继无人。因为纯粹属于一门技术，没有任何可以镀金的学历和文凭，加上辛苦非常，唐兆子说，现在国内从事标本制作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包括唐门子弟，很多都已经转行做其他。

早先的时候，因为武大标本馆的领先地位，国内的其他高校有时会委派一些工作人员前来学艺，其中很多是司机、木工。在20世纪80—90年代的10多年间，唐兆子曾经开班授徒，带过30多个“徒弟”，“现在还在做标本的不会超过3个”。

“关键是要有兴趣。”唐兆子说，学做标本的技术很快，一个月就足够了；但要了解动物学的知识，还需要长期的观察和学习，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常常留心，现在，唐兆子通过观察天空中鸟儿的个头、颜色、飞行姿态，就能判断出它们属于哪种科属。

“比如说鹤跟鹭体型都较大，飞行的时候脚是直的；但它们也有区别，鹤飞起来的时候脖子是直的，鹭的脖子会弯成S形。”同样是斑鸠，唐兆子也能从它们飞过去的瞬间一眼分辨到底是山斑鸠还是珠颈斑鸠。他很怀念小时候在珞珈山上看到的一种火斑鸠，但近年来这种鸟儿仿佛已在武汉地区绝迹了。

在唐兆子30多位弟子中，对制作标本最有兴趣的是当年新疆沙漠土壤研究所来学习的一位司机。“但他已经超过50岁，很早就退休了。”唐兆子语气里透着惋惜。

最“能耐”的一位弟子去了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位弟子看到了澳大利亚博物馆的动物标本，找到馆方说自己也能做。对方不信，给他一只猫让他做成标本，结果两天后，他拿着做好的成品被录取为工作人员。

“这样算起来，做这行的3个人都不到了。”唐兆子也能理解弟子们的选择，毕竟这个行当早已不再时髦，且前途暗淡；他的儿子唐健择业时，他都不想让他再从事这一行，而希望他改学计算机。只是没想到兜兜转转，唐健最终还是回到了武大标本馆。

让唐兆子同样感到有心无力的是经费不足。虽然标本馆在20世纪70年代建造时相当先进，但近些年来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1980年代开始，武大每年给标本馆的拨款是2000元，用于馆内的维护。到了1995年，2000元也停了。标本馆的鸟厅最后一次全面改造是在1993年，“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的遴选前夕。学校拨给标本馆3万元，想将它作为武大特色向评审团队介绍。已经80岁高龄的唐瑞昌按照自己一直梦想的模样布置了鸟厅：顶部的铁网上覆盖了塑料的绿色藤蔓，营造出绿色、幽暗的气氛，油彩布景衬出鸟的居住环境，蓝色汪洋、碧绿池塘或者斑斓雨林，每只鸟都停留在它们生前最美的一瞬……

没有经费支持，曾经一度唐兆子他们只能趁每年樱花节的时候卖一点参观门票来解决一年的日常开销。一张门票5块钱，一个樱花节下来，门票收入不会超过2万元。

“国家现在很重视环保，也设立了很多保护区，像我们做标本制作要争取项目拿到经费，几乎是不可能的。”唐兆子说，自己退休后不是每天都来标本馆，现在这里只剩下唐健和另外一名美工。平常的日子里，标本馆寂静冷清，仿佛被遗忘的孤岛。

为了解决经费，唐健除了做好馆内的日常维护，也开始接受一些社会上制作标本的订单。“主要是处理一些宠物。”唐健说，制作一个标本收费最高也就几百元，除去成本，能够补贴的实在有限。

唯一能够让唐兆子觉得稍感安慰的是，目前，他在福州的堂兄弟们正在准备将唐门标本制作技术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能不能成功，他没有把握。

（原载《长江商报》2011年3月9日）

作者系新闻与传播学院1999级校友

# 我与老师夏军院士

左其亭

我和夏军老师相识于 1995 年的一次国际会议，1997—2000 年，我在他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经师易遇，人师难遭，他不仅是我的授业恩师，更是我待人处世的好导师和工作上的好伙伴。22 年的接触，夏老师对我的科研之路和处事态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发生在夏老师和我之间的几件小事，现在依然历历在目。

1995 年，我硕士毕业后当教师已有两年，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偶然的机会让我有幸见到了夏老师。夏老师在此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主持大会报告，并作了报告，他流利的英语发言与丰富的专业知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也是我对夏老师的第一印象。会后，我立即开始收集夏老师的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夏老师作为我国第一个自主培养的水文水资源专业的博士，刚刚被国务院学位办评为博士生导师。此时的夏老师意气风发，谈吐不凡，儒雅和善。虽是初次见面，谈不上相交深浅，其闪耀的光芒和大家风范便让我敬佩不已，心中暗暗下定决心要跟随夏老师继续深造。经过两年时间的准备，克服了种种阻力，1997 年，我终于成为夏老师门下的一名博士生。

夏老师为人师表，对学生尽心负责。1997 年入学时，由于我是水文地质专业出身，水文学及水资源专业基础薄弱，心里有点忐忑。清楚记得夏老师第一次与我谈话是在入学后的 10 月，当时夏老师生病在校医院住院输液，我去看望他。在交谈中他发现我对专业知识的犹豫和迷茫，就鼓励我说：“地表水与地下水本身是相互

联系的，都是水资源的一部分。你以前学习地下水，再把地表水知识补上，就比一般人更全面了解水资源。博士就应该博学。”这次如沐春风的“医院”谈话对我鼓舞很大，解决了一个初入门学生的困惑，也激发了我的学习积极性。实际上，夏老师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他不仅仅熟悉地表水而且熟悉地下水，在水系统科学研究方面造诣很深，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为了弥补我的短板，夏老师让我跟随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本科生一起上课，还专门为我挑选了几门主干课程。通过学习本科生课程，我的专业素养有了很大提升，其间也结识了很多老师和同学，收获颇丰。有了夏老师的因材施教，我的专业基础才会这么牢靠。在后来自己的教学过程中，我谨记和发扬夏老师的教育方法，多与学生交流、多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不断优化学生结构，积极开展“传、帮、带”工作，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鼓励学生扩展知识面，以便更好地发掘学生的潜力，为国家培养更优秀的人才。

夏老师是位处事严谨、力求完美的人。1998 年，夏老师第一次组织承办国际学术会议，会务的方方面面都精益求精，安排很是周到，我也从中学到了安排会议的很多工作精要，为以后自己承办和组织会议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此期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会议议程需要用 Office 办公软件修改，现在看来这是最基本的办公工具，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我却还没有用过。夏老师让我到他家帮他修改会议议程，他一边说一边让我改。非常遗憾和羞愧的是，我当时还不会用 Word 软件，最后还是交由另一位博士生做的。夏老师第一次批评了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他说：“其他博士生会，你怎么不会。这些基本功必须有。”我明白了学生不只是简单地学习专业知识，待人接物、基本的工具操作等方方面面都应该学好，更不能比别人落后。谨记夏老师的批评和教导，在之后的一个月内，我努力学习并熟练掌握了 Office 办公软件，为后来撰写报告和论文打下很好的基础。

夏老师对科研的态度很严谨，同样，他也教导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他说做好工作才能出有价值的成果。1999 年年初，我写了一篇文章给夏老师审阅，原本是想让夏老师修改后推荐发表的。

但夏老师看后，认为学术成果质量不高，水平还不行，让我重新进行修改完善，在夏老师的指导下，我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字斟句酌的修改，前前后后改了多少次我已记不清楚了，最后终于得到夏老师的认可。其实，最后论文的发表与否已经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我从夏老师那里学到了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对科研事业应该持有的严谨与认真的态度。在以后的学习和科研生涯中，我一直秉承着夏老师的处事方式和凡事尽善尽美的态度处事待人，力求做有价值高质量的工作。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于我，夏老师是良师，更是乐于学术交流的益友。夏老师喜欢集思广益，喜欢和同仁甚至学生探讨学术问题。从 1998 年开始，我参与了夏老师主持的博斯腾湖水资源研究项目，第二年 4 月的一天，我把研究报告初稿送到夏老师家，夏老师听了我的介绍后，非常高兴，对我的研究初稿给予肯定，说“确实下了工夫”，听了之后，我当时别提有多高兴了。这对我是一次人生的勉励，也激发了我更大的干劲，让我坚信“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有回报”。

夏老师在对我的研究成果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具体且有前瞻性的意见。曾经有三次，在夏老师家里，我和他对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量化方法和计算结果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其中有一次，对可持续发展量化准则计算问题，我们有不同的思路，从上午争论到下午，中午还在夏老师家吃饭，那是我第一次在夏老师家吃饭。在夏老师的启发下，我慢慢探索出一套新的可持续发展量化研究方法，那也是我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样的过程增进了师生间的友谊，也让我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毕业之后，我与夏老师也没有停止学术上的讨论，印象深刻的是在 2010 年，夏老师主持的淮河重大水专项课题研究中，有一次在蚌埠集中工作会议上针对研究内容我们存在不同意见，争得面红耳赤，外人觉得我对夏老师竟然如此大不敬。其实，我们是乐在其中。只有通过交流与争论，才能促进科学问题的更好解决，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夏老师经常说学术需要争论，学术界百家争鸣才能更加繁荣地

发展，只要是学术争论就应该平等争论。对科学不懈追求，对学生工作认真负责，没有架子，喜欢和学生平易近人地探讨学术问题，夏老师就是这么一位治学严谨、尽职尽责、追求卓越的科研工作者。正是由于多年来他对科研始终如一的严谨态度及与大家的共同探索，夏老师才一步步成为一名走在水文水资源科学最前沿的学术大家，同时也推动了我国水文水资源事业的发展。

夏老师对学生的负责和督促不只在学生的求学期间，更在学生们工作之后。每次相见，夏老师首先问的就是学生们的工作进展，督促大家志存高远，好好工作，教导我们做人做学问要积极向上，不断进步；再接着进行批评指导。夏老师在科研之路上一直矢志不渝，勇于探索，每次与夏老师的见面，都是继续学习、聆听教诲的好机会。当然，他不只是严格的老师，也有慈爱和善的一面，私下时常和学生谈心交心，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教导我们在学习工作之余多锻炼身体，也常常和我们一起聚餐、表演、唱歌、游武大樱花园。多年来，夏老师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让我更加兢兢业业地投入科研工作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2 载，夏老师从一位博士生导师成为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一名蜚声国际的水文水资源科学家；我也从一名普通的老师成长为一名有着自己研究团队和众多弟子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夏老师对我不只是学业上的教诲，更是在处事待人、科研态度上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正如他常说的："高标做事，低调做人。"夏老师一直秉承着这一理念，孜孜不倦，严谨治学，尽心育人，专注地投身于水文水资源事业。夏老师的人格魅力让我在心里暗暗钦佩。身为他的学生、后辈及工作伙伴，自当见贤思齐，继续努力，为我国的水文水资源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原载《我的武大老师》第二辑，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作者系工学部（原武汉水利水电学院）1997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 难忘珞珈岁月

陈长畅

在你的一生中什么岁月最令你终生难忘？我最难忘的岁月是1955—1959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青春年少的日子。下面让我一一道来。

## 一

1955年秋，当我接到以第一志愿被录取为武汉大学法律系新生的高考通知书时，高兴得跳了起来。我急急忙忙回老家告别亲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以及闻讯前来送别的乡亲，便提着装有老母亲给我整理好的装有几件衣服和日用品的白布袋行李，坐上汕头至广州的汽车，沿着崎岖不平的泥沙路和滨海公路，颠颠簸簸、风尘仆仆到达广州，再转乘广州至武昌的火车，直奔武汉大学。进入学校，首先映入眼里的是刻有“国立武汉大学”几个大字的宏伟石碑校门。

学长学姐们早已站在校门口迎接前来报到的新生。我被领到依山而建的学生宿舍宙字斋住下。这是一个学生宿舍群，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从上到下分别命名，美丽壮观。更令人惊奇的是，沿着宿舍旁左边的路上种了不少樱花树，每到阳春三月，一树一树粉红色的樱花婀娜多姿地招展着，让人如入仙境，心旷神怡。

沿着宿舍楼右边的路，每隔两米左右就有一棵耸入云端的法国

梧桐树，像威武的卫士捍卫着校园，令人肃然起敬。

我入住的宙字斋得天独厚，拾级而上便可到达宽敞美观的图书馆及其左右的法学院和文学院。法学院内还长着一棵桂花树，每到开花时节香气四溢。由于宙字斋靠近图书馆，自习时我们都能占到座位。

学习累了休息时，我站在珞珈山高处俯瞰山脚下不远处的东湖，湖水荡漾、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大风起时，波涛翻腾，宛若海浪般滚滚向前，拍打着岸边，令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朱德总司令寄予深情厚望的预言："东湖渐让西湖好。"

## 二

1955 年法学专业招收的上百人分甲乙丙丁四个小班，我被编在 923 班，9 是暗指 1959 年毕业，2 是武大院系排序，3 是指年级的班次，即丙班。我的室友一个来自东北，一个来自湖南，三人同住，相处甚欢。

1956 年，入学第二年，是全国向科学进军的伟大时期，在我们住的房舍楼道的两面墙上用石灰水涂上两条大标语：一边写着"向科学进军"，一边写着"向副博士进军"，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号召。

每到考试时，为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精力，我便到东湖边的校体育教研室借条双桨船，划到湖中间的凉亭读书，累了便下水游泳。这样不仅锻炼了身体，而且因缓解了压力，每年考试我都获得了良好的成绩。

1955 年 9 月入学时，武汉大学发给我一本记分册，证明我是统考录取的法律专业学生，经国家考试通过后，以本册换取专业文凭。最近我打开了记分册：考试门门优秀，考查科科及格。我还记得"国家与法律通史"是卢干东老教授主讲和考核的，"国家与法律理论"是张泉林老师讲授主考的，"中国宪法"是何华辉老师讲授主考的，"中国刑法"是曾昭琼教授讲授主考的，他们都在记分册上签上了名字……

1957 年，一场意想不到的反右派运动弄得大家晕头转向不知所从。令人庆幸的是，我们党后来及时纠正了此次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 三

1958 年 9 月 12 日，在珞珈山武汉大学行政大楼前的操场上，毛泽东主席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领导陪同，接见武汉大学等高校师生。那天风和日丽，小鸟在树梢上鸣叫，宛若在高奏迎宾曲欢迎贵宾的到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校园上空。毛主席微笑着频频与大家招手。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伟大领袖。

第二次是 1959 年。10 月 1 日凌晨，我们从北京西郊的中国人民大学出发，冒着瑟瑟的寒风进入广场预定位置。9 时 55 分，在欢乐的乐曲声中，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同赫鲁晓夫等贵宾一道登上城楼。同他们一起站在城楼上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林彪、邓小平、林伯渠等，以及苏斯洛夫等贵宾。

10 时整，北京市长宣布首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典开始，国歌高奏，礼炮齐鸣，400 名少先队员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在盛大的国庆十周年阅兵和 70 万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之后，中午 12 时半，雄壮的国际歌曲一奏响，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排成国徽形状的 11 万人一齐涌向金水桥畔，涌向天安门城楼下，向领袖和国际友人们致敬。毛泽东、刘少奇则来回走在天安门楼两边，向群众致意。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团队是负责排国徽中的天安门的，离楼上更近，看得更真切。

2021 年 11 月 2 日，北京市拘捕两个违法狩猎的人，因他们用弹弓射死两只麻雀，这令我想起数十年前在珞珈山发生的一幕，那时，同学们趁着夜黑在法学院或文学院驾起梯子，胆大的小伙子沿着梯级拾级而上，把手伸进屋顶的洞穴将麻雀抓下来“除四害”。多年过去后，人们的观念更新了，不仅给麻雀正名益鸟，而且要与之同其他生物一起构建地球生物共同体了。

## 四

1958 年院系调整，武汉大学法律系同在武昌的中南政法学院、中南财经学院等合并组建湖北大学。

1955 年入学的同级同学，一起告别美丽的珞珈山到湖大就读。我们923 班的同学大多转读政治系。1959 年 8 月，湖北大学发给我登记号为 590015 号的毕业文凭(湖北大学校长孟夫唐签发)。

昔日的文凭令我想起了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们，正是他们传授的专业基本理论知识，为我做学问打下了基础。在湖北大学就读时，每到周六，便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沿着长江边来回信步。边散步边吟诵诗仙李白送友人下江南的名作《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身心都得到了完全的放松。

毕业时，同学们被分配到祖国各地，要好的同学曾德盛被分到广东，罗明达被分到云南。我由于品学兼优，被允许报考教育部研究生，送到北京，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考得上就读，考不上重新分配。我与同班同来报考的袁耀东同学考试完一星期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通知我们被录取为哲学专业研究生。1962 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

1955—1959 年的武汉学子岁月，是祖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年代，我亲眼见证兴建“天堑变通途”的丰功伟绩。

1959—1962 年的研究生学习岁月，则亲眼见证了首都十大建筑的兴建：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矗立起了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些都成为首都国庆十周年前兴建的十大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

1962 年 7 月 22 日，我出席了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为两万多首都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应届毕业生举行的报告会，亲耳聆听了北京市长彭真的讲话：你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自己锻炼成伟大的、光荣的社会主义战士和共产主义战士，按照历史发展的需要和全国人民的利益，确定自己一生的方向和道路，不断改

造自己，和工人、农民群众结合。这番讲话，对于曾获吴玉章校长颁发的“1960 年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生奖状”，不久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刚领到吴玉章校长 1962 年 7 月签发的文凭号为 00093 的研究生毕业证，即将走上社会的我，格外亲切。数十年来，我都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朝前迈进的。

作者系法律系 1955 级校友

# 我所了解的农业生物系

杨学仁

1975—1977 年，我经历了武汉大学农业生物系的创建与撤销，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珞珈记忆。

## 一、校党委召集筹备会议

1975 年 5 月，武汉大学决定在沙洋分校创建农业生物系和农用化学专业。校党委书记纪辉主持召开筹备会议，沙洋分校党委书记、工宣队负责人马道炎，分校政工科科长兰远庆，生物系党委副书记杨学仁和化学系副系主任余席茂参加。会上传达了“学朝农”的精神，明确了办学的指导思想，确定了招生及人员、设备、实验室、教室、宿舍等的准备工作与安排。

## 二、农业生物系的建立

1975 年 6 月 30 日，校党委连发三份文件：一是任命杨学仁为沙洋分校农业生物系主任，余席茂为农用化学专业教研室主任；二是确定下沙洋分校的人员名单；三是沙洋分校成立筹备领导小组，由马道炎、黄腾、洪振兴、王熙纯、张克勤、杨学仁、余席茂七位同志组成，马道炎任临时领导小组组长。

农业生物系的教师队伍基本上由植物专业的教师组成，主要成员有戴伦焰、杨弘远、汪向明、王明全、宋运淳、舒理慧、利容

千、徐乃瑜、张廷璧、朱英国、陈克诚、艾邦炎等 20 位教师。肖翊华任副系主任，何之常任教师党支部书记。

沙洋分校建立的实验室，主要用于植物学的基础实验；用于科研的植物生殖和遗传学等的实验室仍留在校本部。有关实验室的台桌、仪器、药品等的搬迁，主要由艾邦炎同志负责调运，先调卡车运至汉江码头，然后装船沿汉江行至沙洋镇，再用大卡车运至沙洋分校。

沙洋分校腾出了旧房和新建砖瓦平房，为实验室、教室和宿舍做了具体安排，为新生入学做准备。

## 三、坚持科研、教学、生产三结合

1975 年 8 月，武汉大学党委又任命我为沙洋分校党委副书记，主要负责管理与协调分校的教学工作。教学方面，政治和英语老师直接从原来在分校工作的教师中挑选，体育老师易勤是从体育学院应届毕业生中招进来的，我们还从农学院招收了李庆祝、王许莲两名毕业生，补充和完善了教师队伍。

1975 年秋季开学，沙洋分校迎来了首届新生。作物遗传育种专业(三年制) 招收了 20 名工农兵学员，水稻遗传育种专业(一年制)从荆州和襄阳地区招收了 30 名社来社去学员(学员毕业后回原单位)，另有农用化学专业招收了 30 名社来社去学员。

农业生物系的专业教师户口仍留在武汉，教员轮流下沙洋分校上课，大多数时间在学校本部和实验基地坚持科学研究。杨弘远老师与学校本部的周嫦老师，在张均燕、陈家治两位实验员的协助下，坚持植物生殖生物学研究，取得了优异的科研成果。

以汪向明教授为首的科研团队，坚持从细胞、生理、生殖、杂交等方面研究水稻的遗传与发育，在学校本部实验室和湖北、海南等育种基地，将科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最后选育出“红莲”不育系。以红芒野生稻与莲塘早稻杂交育成红莲型三系的研究成果，于 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 四、教师的敬业精神

植物专业教师队伍里大多是师生关系，彼此又是同志、同事和战友，大家目标一致，团结攻坚，教书育人，彰显了崇高的敬业精神。远去的年代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深深怀念。

### 具有可贵敬业精神的肖翊华老师

肖翊华老师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对全系的教学计划与管理工作非常到位，他还十分重视科学哲学方面的宣传与教育，努力将俄文版的《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宁论生物学》译成中文，并由分校的韩德培先生进行校对，内部印刷发行，鼓励师生们学习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肖翊华老师被人们称为“樱花教授”，在长达 50 多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对樱花花期进行观察和记载，即使在沙洋分校工作期间仍委托家人将樱花的观察结果记录下来。关于日本樱花花期的记录比日本的还早 6 年。肖老师曾发表《珞珈日本樱花 51 年的花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一文。

### 永远怀念戴伦焰老先生

戴伦焰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讲授的“植物学”生动有趣。1975 年秋，戴先生下沙洋分校讲课，正好中秋节到了，戴先生与我及王世昌三人坐在宿舍外的走廊上，边饮茶边吃花生边聊天，戴先生仰望明月即兴吟诗一首。此情此景，至今难忘。深感遗憾的是戴先生彼时已患癌症。

戴先生下沙洋分校不久，我发现他身体异常，建议马上回武汉检查与治疗，他却拒绝了；直到国庆节放假时才回武汉，经医生检查患了睾丸癌。在武汉住院治疗期间，戴先生还念念不忘上课之事……

戴先生在武汉住院治疗期间，生物系副主任刘兴顺安排年轻教师轮流在病房看护。一个月后，我和朱英国回武汉看望戴老师，当

天即由朱英国陪护，第二天由我陪护，晚上 11 点左右戴先生因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戴先生去世后的第三天，在原老生物系大楼(现为新闻与传播学院)的 119 教室举行追悼会，生物系许多教职工都参加了，追悼会上由肖翊华老师致悼词。在农业生物系刚建立的第一年里，就失去了德高望重、尽心教学的戴伦焰老师，大家心情无比悲痛。

**一心扑在科研上的好党员朱英国同志**

1964 年，朱英国同志从武大生物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他一直从事水稻的杂交及遗传育种方面的科学研究，常年在水稻育种基地辛勤工作和劳动，每年春节都是在育种基地度过，和在湖北罗田家中的父母、妻子、儿女相聚甚少。

朱英国同志工作兢兢业业，不畏艰辛，始终战斗在科研第一线，真不愧为“一心扑在科研上的好党员”。

## 五、农业生物系撤销

1976 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动乱，开展“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当年社来社去的水稻育种专业的 30 名学生毕业，一年后这批学员先后安排了工作，活跃与战斗在农业第一线。同年 12 月，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学员返回学校本部上课。

1977 年 10 月，沙洋分校农业生物系正式撤销，我重返武大本部任生物系党委副书记。1978 年 5 月我调任自然辩证法研究所副所长，从此离开了生物系。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仍不忘生物系情结，曾面向全校首次开了“自然科学史”“生命科学史”等选修课，还由我主笔、与朱英国同志合作出版了《遗传学发展史》一书。

1978 年，作物遗传育种专业 20 名工农兵学员毕业，不少同学选择了读研究生或出国留学深造。其中黄斌同学成为“改革开放”后率先出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女生；田惠桥在武大获博士学位后，调至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助手尹华奇和同班同学王贵元，分配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在袁隆平的领导下，为我国杂交水稻的研究与推广作出了卓越贡献。

## 六、结束语

1975 年，生物系部分教师下沙洋分校创建农业生物系，师生走过了近两年的艰辛历程，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行。值得庆幸的是，在改革开放 20 年后，杨弘远和朱英国先后被评为院士。2022 年是武汉大学生物学科创建 100 周年，植物专业教师将继续发扬团结攻坚的科学精神，同生科院全体教师一道，在科研与教学上再创辉煌，为国家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为科教兴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沙洋分校：1970 年 5 月，武汉大学在湖北沙洋建立沙洋分校，主要作为学校教师、干部劳动锻炼和教育的基地，同时还为当地举办各种短训班。沙洋分校于 1977 年停办。

作者系生物系 1956 级校友

# 20世纪60年代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张　珉

1963年8月，我被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简称水院)水工建筑系河川枢纽及水电站建筑专业录取，分配在6303班；自此开始了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直至1968年12月毕业共5年零4个月。自1954年1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至1964年12月共10年，称为校庆十周年。学校生活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校庆十周年前后，即1963—1965年。

## 喜讯飞到百姓家

我成长于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父母用微薄的薪资养活着外婆和正读书的四姊妹。1963年8月16日下午6时，邮递员把一封录取通知书送到了长沙的家中，大家都为我考取大学而兴奋不已。

妈妈抓紧时间为我准备求学物品：购得打折帆布箱(13元)1个，将衣服及日用品装入；又准备了1条麻袋，将被子、蚊帐、脸盆装下。凭录取通知书购得普通客车学生票(半价3元)1张，几乎花去一家人整月的开销。

8月26日傍晚，我与同班考取武汉工学院的韩同学一起坐火车离开长沙。父母、姊妹们送我到火车东站(现芙蓉广场处)进站口，我依依不舍告别了亲人，第一次离开父母、姊妹，内心难过而空荡。火车从晚上10点多开车，坐了8个多小时，翌日早上7点到达武昌火车站。

## 入学感觉真奇妙

火车驶入武昌站后，看到站台旁栽种着几棵柳树，残缺简陋的木栅栏围着一条近百米长的开敞站台，狭小的候车室里有几名铁路职员在工作，周围全是农田，像座乡村车站。当时心想：武汉不是座大城市嘛？火车站怎么还赶不上长沙？却并不知长江对岸还有座驰名中外的汉口火车站。

我们下车出站取出行李直奔新生接待站。半小时后，一辆解放牌敞篷校车开了过来，随车下来几位高年级同学，热情地帮我们搬运着行李，领我们上车。校车经小东门、武珞路、中南路、水果湖和湖北省委礼堂后，眼前突然一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湖泊——东湖：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碧波荡漾的湖中划过几条小渔船；湖水一望无际。

汽车沿着湖边土路行驶几百米后，从武汉水生所旁的校门拐进校区，一座没有围墙的学校呈现在眼前。汽车经过行政楼(现雅各楼)左拐，穿过 4 号与 6 号楼间的天桥，驶入 8 号教学楼前的水泥马路，可直接望见东湖旁的土路、树木和湖水，树木稀疏但视野开阔。高年级同学介绍水院按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规划设计：中间有花园广场，四周由 8 栋教学楼围合，楼宇间用走廊连接，风雨无阻。汽车刹那间到达学生七舍前，我住进了编号为 7120 的寝室。

当时的校徽

## 校园学习锻炼忙

1963 年 9 月 2 日(星期一)上午，学校体育馆(老体育馆)举行迎新大会。新生们带上小板凳，按照划定区域整齐就座。学校领导介绍了国家水利电力事业的发展、学校历史沿革、院系和专业开设情况、未来从事的工作等；要求我们遵守纪律、尊敬老师、刻苦学习、锻炼身体，做又红又专的学生。水工建筑系粟一凡主任说：通过 5 年 42 门本科课程学习，成绩及格就可以毕业，参加祖国建设。

迎新时认识了同城考入水院的长沙老乡、6304 班的涂启能同学。我们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同学好朋友，在后来的生活中共同学习、相互帮助，特别是互相帮忙在上晚自习时到图书馆或教室抢座位；有时候抢不到座位，就得移至阶梯教室或小教室自习。当时生活艰苦，在食堂打饭经常吃不饱，条件好点的同学，常在食堂门口小贩那里买个花卷或麻砣补充营养。

学校规定早上 6:30 起床参加早锻炼，做早操、跑步等；下午课外活动时可到主操场跑步、打排球，到体育馆打乒乓球。夏天的主要活动是去东湖游泳。

排球队休憩时合影(1964 年 5 月摄于水院排球场)

每周最盼望的就是周六晚电影。水院仅有一个露天电影场，银幕置于中间，我和涂启能经常坐银幕反面看电影，人少宽敞，前面没有高个子挡着，看得清楚，稍微来迟点也没关系。

## 学习雷锋好榜样

1964 年的社会生活主题是向雷锋同志学习。在全校范围内，各专业大班小班经常性地开“忆苦思甜”会，举办学习雷锋精神做好人好事活动，时常请学雷锋精神英模人物作报告等。有几件事情，回忆起来印象深刻：

一是毛主席提出教材要“少而精”。水建系学习毛著和雷锋精神，组织老师将结构力学与材料力学合并变成了建筑力学。两门力学综合在一起讲授，实现了教材精简创新。二是毛主席提出要提高大学生伙食标准，改善学生体质。学校立即行动，从第二个月开始学生伙食标准就从每月的 10. 5 元提高到 13. 5 元，相当于每天增加 0. 1 元菜金。三是在雷锋精神鼓舞下，学校排演出话剧《年轻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还参加了全市高等院校歌舞剧《东方红》的排演。四是在学雷锋精神鼓舞下，我们学会了帮助同学、爱护公物、保护环境，如女同学帮男同学缝衣补被，帮助困难职工家修水管安电灯，不在树苗上拉绳晒衣服等。

## 见习及测量实习

1964 年 1 月 20 日上午，学校从部队租来几辆敞篷军车，把水建四个班同学送到漳河水库进行第一次见习实习，并与民工“三同”参加水库建设。同学们冒着凛冽寒风，跨过长江、汉江，一路向西北方前进。经汉川、天门、沙洋、荆门等县镇，下午 5 点多到达荆门北郊的漳河水库工地。全班拆分成几个组，分住到民工班组工棚中去，与年轻民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的任务就是挑土筑坝、填土夯实。晚饭后，在工棚昏暗的马灯下，与年轻民工聊天，他们都是从本县乡镇抽派的农民，自带口粮和工具，由生产队

记工分。我们从年轻民工身上学习到了许多。通过劳动实习，我们初步认识了水库、大坝、厂房和溢洪道，懂得了填土要层层夯实变成土坝等常识。

1964 年 8 月，暑假尚未结束，天气非常炎热，老师通知大家提前到校去徐家河水库进行测量实习，检查“工程测量”这门课的学习效果。其实，这是学校承接了水库管理局的测量任务需要完成的，正好与实习结合起来了。同学们带上测量仪器、标尺、花杆、皮尺、钢钎、计算尺、钢笔和测量记录本，乘火车到随州以前一个叫长岭岗的火车站。崔国范老师带队，把全班同学分为 5 个小组，每组 6 人，分别包干一个测量区域，完成一幅合格的工程测量图，再对所有分幅图进行调整拼接，最终形成一幅完整工程测量图。全班同学被安排住进管理所大礼堂，打地铺睡觉。

湖北徐家河水库工地测量实习(1964 年 8 月)

开始测量时，崔老师对每个小组提出测量要求、注意事项，强调最终成果需要应用到工程中去，一定要保证质量。在测量过程

中，大家都把最苦、最累的工作留给自己。经过 1～2 天实战，我们发现清早测量效率最高。由于采取了早干晚收的办法，经过 10 多天的艰苦奋战，最终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测量任务，顺利结束实习。

## 参加“四清”及社教

1965 年 2 月，刚回家过完年就被学校催促回校，准备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按照学校统一部署，我班被分配到孝感毛陈镇唐家湾一带参加“四清”。住户唐大娘约 40 岁，中等身材，人和气朴实，小儿子是现役军人在新疆当兵。她常说：看到你们，就想起了自己的小儿子。那时节小麦刚长出来青黄不接，家家户户只能下绿豆丝吃。唐大娘总把最好的豆丝留给我们，自己却总是吃点红薯和青菜，我们心里非常难受。她却总说：我不饿，你们年轻正长身体，你们吃吧。看到她就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们心里只牵挂着儿女，唯独没有自己！生产队组织社员天天晚上开会，读报纸、念新闻、清账目、清财物等。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中，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农民兄弟的善良纯朴。

1965 年 11 月初，结束本学期课程期末考试后，11 月中旬，老师带领大家到武昌县纸坊区郑家店公社参加社教运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斗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整顿干部作风。通过狠批资产阶级思想根源，丢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思想变轻松，觉悟大大提高。

## 精彩校庆十周年

1964 年 12 月 1 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全体师生迎来了建校十周年。这一年内，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赫鲁晓夫下了台，总体形势呈欣欣向荣状。我们认为从此天下太平了，考虑着解放全人类，心中铆足了一股子干劲。

校庆十周年前夕，学校把 4、5、8 三栋教学楼围合的那片乱岗

进行开挖，理顺为两级台阶。从 8 号楼前马路中央向下放 10 多级踏步，放到二级平台，设一个插旗帜的小广场；沿二级平台 4-5 号楼间，修筑一段浆砌块石挡土墙，墙顶铺混凝土路面，安装混凝土栏杆；再兴建 3 号教学楼，使其与图书馆楼对称。作为临湖一级平台，新建临湖广场。随后几年又建成了 7 号教学楼与 6 号楼对称。在广场、道路和教学楼周边新栽和补栽了一些乔木、灌木和花卉，至此一个完整的校园格局基本形成。

1965 年元旦晚会(摄于水院老体育馆)

经水利电力部批准，将全院整合为三个系：一系包括农田水利和治河专业；二系包括河川枢纽及水电站建筑和水利工程施工专业；三系包括发配电、水利动能机械、电厂化学和高压专业(1964 年由北京电院调整过来)。这样就完成了水利电力各专业的配套设置。

在校庆十周年期间，全院及各系都在排练文艺节目。如院文工团排演的“丰收歌”“洗衣舞”，二系排演的“中国人民有气概”等节目。课余时间，到处莺歌燕舞，一派喜庆祥和景象。水院还向清华

大学学习，也提出了“为祖国工作 50 年”的口号。学生早晨坚持锻炼，上课认真听讲、主动提问，认真完成作业；晚自习认真完成当天作业，复习及预习课程；每周只周日下午放半天假，由学生自由活动。学校各项工作都进行得轰轰烈烈，学生、老师们干劲十足。

其后不到两年光景，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于 1968 年年底毕业。老五届大学生的美好年华，被白白耽误。正因如此，我对校庆十周年前后学校发生的某些历史细节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作者系工学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63 级校友

# 1970年代的图书馆学系

汪晶晶

## 一

刚进图书馆学系的头几个星期，我过得十分不愉快，甚至有几分无奈，这恐怕是别的同窗们绝对想不到的。

我们7701班由于历史原因年龄相差很大，有人比我老，有人比我小；老的有人敬，小的有人怜，24岁的我在年龄上显得有些尴尬。上大学之前，如果从1969年在纺纱厂当学徒算起，我在社会上已经闯荡了整整9年；同时代的所有人，包括我哥哥、嫂子、姐姐、姐夫，甚至岁数比我小的同窗们，大多能带工资读书，而我所在的医院却因为属于集体所有制，我只能靠年迈的双亲继续养着。每念及此，我就感到一种深深的愧疚。

彼时，小宪担任着我们7701班的正生活委员。之所以强调她担任的是正职，是因为1/4世纪之后，竟然有好事者散布谣言，说她的生活委员是副的。这样居心不良的诬蔑之词，让我这个知情人十分愤怒。要知道，我后来荣幸地接任了生活委员，直至毕业。我的职务和小宪平级，当然也是正的。

小宪万分同情我的不幸遭遇，曾千方百计为我争取过助学金。

不幸的是，我那时还没结婚，没结婚便意味着我还属于父母那个大家庭，能和父母平分他们的工资；平分的后果是，我不但得不到助学金，还从道义上担负着帮助更贫穷同学的义务。

其实考大学之前，我和自己的好朋友们已经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了。大家曾讨论过我是该老老实实考大学，还是参加医师晋升考试、再直接去考研究生。他们有些人就是参加的医师晋升考试，他们认为我考上大学的概率并不大；同时，却认为我考上研究生的概率不小。

然而，我的父母双双毕业于 1949 年前的七年制医科大学，对学历、学制迷信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论怎么做思想工作，他们都不相信“自学成才”一类的神话。就这样，我最后还是参加了高考，阴错阳差地走进了武汉大学。

既来之，则安之。我压抑着自己不愉快的心情，劝自己埋头读书、好好学习专业知识。不料几个星期过去，我似乎一点专业知识也没学到。第一学期 7701 班共开了四门课，分别是：中共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图书馆学基础知识，我全力以赴地学习着，上课时像机器一样飞快地记笔记。我天生有速记本领，老师嘴里蹦出的除了咳嗽打喷嚏之外的每个字我都能一丝不苟地记下来。然而，上了整整三个星期课，我却不知所云。

这样下去怎么办？这不是白白浪费父母的钱么？思前想后，我决定瞒着父母去参加医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也许我的朋友说得对，考研究生对我来说可能比考大学希望更大。考大学我不过看了三个月书，而医学我却下过整整七年苦功。我选择的专业是“小儿肾病”，导师是母亲的顶头上司宋名通教授。宋教授是原武汉医学院儿科系主任，毕业于德国汉堡医学院。

报名时我才发现问题——由于没有医学院校的毕业证书，除了户口和单位证明，我还得出示一份同等学历证明。

政治辅导员何老师是位极和气的人，几乎没有“革命警惕性”，我含含糊糊地说自己想要得到系里的一份证明，何老师立即把我带到系办公室主管学生事务的小 Q 那里。我原以为小 Q 写一份证明盖上章就完事了，没想到这类证明还得请系主任 H 先批准。

H 主任冷冷地用似乎是赣南一带的方言说了几句我没全听懂的话，大意是我想要的证明系里不能出，进大学才短短三个星期就想报名考研究生为时太早；想考研究生以后有的是机会，现在的首要

任务是安心学习等。H 主任的态度虽然令我不悦，但他说的话却让我无法反驳。我无可奈何、魂不附体地在学校厮混了两天。周末回家我对父亲说，上了三个星期课一点也没听明白。我甚至大哭了一场，向父亲宣布要退学。

父亲对我怀有深深的内疚。我喜欢文学，羡慕老师们的寒暑假。报考大学时填的第一志愿本来是武汉师范学院高师班的中文系，父亲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粉笔灰是哮喘病发病的重要诱因。他戴着老花镜，从《武汉晚报》上找出了图书馆学系这么个“稀有品种”。

## 二

我回家哭闹的那个晚上，父亲几乎通宵未眠。最后，一生信奉“世上只有人求医，人间哪有医求人”的父亲给著名的病毒学家高尚荫先生写了一封信，并让母亲亲自找高先生一趟，希望能把我转到病毒系去。多年后在父亲墓前，我才痛彻心扉地意识到，自己那场哭闹曾经多么严重地损害了父亲的好强和自尊！

母亲去找了高尚荫先生。高先生对我考上了图书馆学系，却不愿意在这个专业学习感到非常惊讶。高先生万分诚恳地对母亲说，武汉大学的这个专业排名全国第一，北京大学都得排在后面，且当时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中，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的毕业生能有图书馆学系学生的分配去向好。母亲无法回答我为什么不想在图书馆学系学习的问题，只能含含糊糊地说：小女自小就喜欢病毒。

著名的病毒学家终于被感动了：这世上虽然喜欢什么的人都有，但无缘无故喜欢病毒的毕竟不多。高先生同意我从第一学期起修病毒系的课。大课自不待言，就是小组的实验课我也可以参加；但能不能成为病毒系的正式学生，还得等到第一学期结束之后。如果我的考试成绩能超过病毒系全年级平均水平，高先生将为我的转系亲自到系校两级去申请。高先生还很抱歉地告诉母亲：假如最终没能转成系，我必须做好思想准备，继续在图书馆学系学习，同时还得留一级。

两个星期之后我再次回家过周末。父亲为我的事已经思考了好几天，却还是拿不准该不该让我转专业试读一事。父亲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却发现我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完全忘记了两周之前曾经宣布过的退学要求。

父亲自然不知道，上次我灰溜溜地回到学习小组之后惊异地发现，全组乃至全班同学都在意气风发地干着各式各样有趣的事；而我，已经完全沉浸于第五组组长陈源曙领导的那场完全称得上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了。

## 三

陈源曙的岁数比大部分同学略大，按 7701 班的惯例，大家叫他“老陈”。当年的老陈，长得一副文质彬彬的迂夫子模样，即使你对文学毫无兴趣，见到他也会忍不住联想起陶渊明、李白、朱自清、郁达夫等如雷贯耳的名字；更重要的是，老陈还不是徒有其表，他和文学的渊源确实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要深得多。上大学之前，老陈教过多年语文，还是我们大部分同学(包括我)根本没上过的中学语文。可想而知，热爱文学的同学们对他是何等崇拜了。

想想当年的同窗们真是质朴，崇拜什么人，崇拜的只是他的真本事，而不是所谓权力。我们那个班最高的权力机构是党支部，由一位书记、若干位副书记和若干位支部委员组成，党支部下面是团支部——这是党务方面；政务方面则有班委会，由一位班长、若干位副班长和若干位班委组成。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衡量，老陈当年的级别似乎还在小宪和我之下。

老陈进校伊始，便办了一个似乎叫《蔷薇》的文学期刊，曾有人提议叫《无花的蔷薇》，被老陈断然否决了。老陈说，鲁迅的时代蔷薇无法开花、只能长刺，今天已进入新时代，既需要花也需要刺。刊物一诞生，稿件便雪片般飞来。写文章的——在我印象中至少有老陈自己、老王、家骥、汉桥、建设、述鸿、玉江、刘迅；写诗的有白薇、怀涛、中燕等。中燕不但喜欢诗，还认识一些诗人，并把某位知名诗人带到班上来过，我甚至还荣幸地获赠过诗人的一

本诗集。

最初的几期排好版后，用毛笔往白纸上抄好，再贴在一块大木板上，就横放在老斋舍门口。出第一期时，老王提议多让几个人试抄，选字最好的。那时到底因为年轻没什么羞耻心，老王让我去试，我居然就真去了。结果只抄了两行就败下阵来，而且败得心服口服。南国来的家骥，貌不惊人，写的那手魏碑却让人叹为观止。最后抄写这个工作自然落到了他的头上。

我很快就和老陈混熟了。一天看左右无人，我便小心翼翼地告诉老陈，自己刚进校那几个星期曾一度犯过“不安心学习”的错误。老陈一听就笑了。他说，据他所知，外地同学大多根本不知道有个图书馆学系，大家填的志愿不是中文系就是外文系，分到图书馆学系的几乎没人安心；比如他自己，只上了两三堂课就觉得无聊极了，“简直……想退学”。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一时欣慰得喘不上气来，几乎叫出了声！

“那你怎么不退学呢？”我问。

老陈叹了口气：“咱们这个班有多少有才的人啊：有省一级的高考文科状元，文章都作为孩子们的范文出版了；有懂八国文字的奇才；有英语日语说得比老师还流利的专职翻译……我算老几？不过在社会上虚度了几年。别人都老老实实地待着，我哪有资格去退学啊。”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不过在一所小医院里厮混了几年，竟以为自己真懂医，还斗胆想退学。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

## 四

那份刊物在老陈和 7701 班众多文学爱好者的齐心努力下，很快就有了越办越好的趋势。编辑老陈和老王商量了一下，决定在刊物中加进针砭时弊的短小杂文，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我那篇杂文叫什么名字、具体写了什么，早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内容和当时校团委不同意学生跳集体舞有关。如果那篇文章交给老陈去审、家骥去抄，再老老实实地横躺在老斋舍门口，原本也不会发

生任何事；不幸的是，不知哪位好事的读者竟把文章抄了下来，交到校广播站去了，恰好广播站又播出了，这下影响就大了，系里马上派了一位王老师来找我谈话。

王老师说，文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并不奇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对党团组织有建议，或者对党团组织的某项决定有看法，可以直截了当地向各级党团组织提出；发牢骚讲怪话，还把文章登在班刊(虽然我当时的感觉那份刊物似乎是“民办”的)上，甚至随随便便地拿到校广播站去广播就不对了。她相信，吃一堑长一智，我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的。

事实证明，王老师对我的批评教育、帮助启发都是万分及时的。不久之后的诗歌比赛，我想起了王老师的教导，决定在歌颂樱花的同时顺便歌颂一下珞珈的山和东湖的水，果然很快便得了奖。

杂文风波引起了老陈和老王的高度关注，两位总编辑思索再三，决定去掉杂文加进小说。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再一次交给了我。我小时候听过中南音专声乐系一位教授唱过一首歌《星星索》，留下了很深印象：“呜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船儿啊，随着微风荡漾，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于是，我为自己的小说起了一个美丽动听的名字《风儿吹动我的船帆》，并且决定忽略掉老陈老王写成知青或“文革”题材的建议。我要写一部荡气回肠的爱情小说。

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星期，我什么正经事都没做，即使是去图书馆上专业课，人虽在那老老实实坐着、脑子里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那部小说。最后的结果是，虽然老陈老王对我的小说有不同意见，却还是全文照登了，连一个字都没改。《蔷薇》甚至专门为“风儿”连出了四期特刊。看过的同学纷纷告诉我，他们完全彻底地被“风儿”感动乃至征服了。

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一想起“风儿”我心中就乐滋滋的；真的，比最重要的专业课得了满分还要高兴。如今，当我写下这些回忆文字的时候，距离写作“风儿”的故事已整整过去了 1/4 世纪。真是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

离开珞珈山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老陈——我的源曙学兄，他

一帆风顺的仕途让我感到由衷欣慰，那是我亲爱的祖国在我离开之后 20 年间沧海桑田巨变的一个明证。

老王，我亲爱的渡江学姊，已经先一步去了天堂，惟愿她的在天之灵能感觉到：苟活在人世间的我，没有、也永远不会忘记她……(2002 年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6 日写于德国不来梅)

作者系图书馆学系 1977 级校友

# 在珞珈山求学的日子

宾晓华

在我们毕业 40 年之际，迎来了母校 129 周年校庆。

1978 年深秋，我从湖南湘潭农村来到武汉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上学，这年我 18 岁。我上的是乡村中学，那个年代，父母亲对我的期待是只要能考上学校，中专大专都行，能当上工人、吃上“商品粮”就好。那年高考，自觉考得并不如意，加上当时高考成绩和报考志愿还未实现电子系统管理，无法知道自己的高考排名；但在学校统计高考志愿时，我却斗胆告诉老师想报长沙铁道学院，能否录取听天由命。

记得某一天，中学一位老师骑车十多公里捎信给我，告之学校想调整部分考生的高考志愿，问我是否同意？我回复老师，一切以学校的考量为准，填哪个志愿我都服从；当时并不知道老师到底给我选了哪所学校。这以后，我变得沉默寡言，白天挥汗农作，夜晚默望山峦，陷入了长时间的、无望的等待，从骄阳似火的夏末到蝉鸣聒噪的初秋，再到寒意渐浓的晚秋。九月底的一天，我正在田间耕作，忽然来了一位邮差在岸上呼喊，说有我的一封信函。我将信将疑上了田岸取信，拆开一看，是武大的录取通知书。可以想象，我当时是怎样的惊诧、怎样的高兴，父母、乡亲更是喜出望外。收到通知后没几天就要报到。临行前的傍晚，没出过远门的我独自沿着小河漫步：一来向熟悉的山村道别；二来理理茫然的思绪。想着想着，不禁潸然泪下，眼泪中有对乡村的依恋，对未来的憧憬，更有对时代的感恩。

这天晚上我心潮起伏，隐隐觉得应该知恩图报，好好珍惜这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尽管后来得知自己的成绩报考清华北大也够了，但至今却一直在心中默默感激中学老师为我选择了武大，庆幸自己能在这所校园环境最优美、治学氛围最包容、人文积淀最深厚、学子出道最多彩的大学，度过青春韶华、开启别样人生。多年以后，女儿又以高分考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从此，我家两代人与武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到武大报到是 1978 年 10 月 3 日下午。武大在武昌火车站设有迎新站，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我与十来位新生坐解放牌大卡车来到校园迎新站。师兄师姐们根据录取通知书，很快查到了我将入住老斋舍。我们用三轮车装上行李，一起推车上坡，顿时，参天的法国梧桐、巍峨的琉璃瓦建筑映入眼帘。把行李放到宿舍后，我迫不及待地爬上顶楼，趁着夕阳、趁着秋色，惊喜地欣赏着仙境般的校园。此情此景，40 多年后依然历历在目。校园的古朴恢弘和典雅沉静，沁润了我们每一位青年学生的心，在认知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滋养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为我们抹上了唯美、包容、开放、尽责、上进的青春底色，终生难忘、终身受益。

入学武大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全社会改革思潮风起云涌，对知识、对科学如饥似渴。武大在全国率先实行学分制，为我们选择课程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因受“文革”影响，很多学科和课程早已被荒废，能开的课程有限，这让我们选课时有些“饥不择食”——本专业非本专业的、校内校外的，都一股脑儿地学。虽然入学时整个武大只有 2000 多名学生，教室、宿舍、图书馆都比较宽松，但因有的课程特别受欢迎，教室爆满，上课时同学们坐椅子上的、台阶上的，或站在走廊上的，都有，大家一个个听得神采飞扬。印象最深的是路见可老师讲授的“数学分析”，路老师对数学精髓的透彻理解令人折服。他可以将某些数学原理与哲学概念串通起来讲，在讲解数学定理定律的同时，还介绍其发现、发明的来龙去脉，甚至拓展到相关事件的科学史及做出贡献的数学家生平。选他课的学生有数学专业的非数学专业的，甚至还有文科专业的。作为计算机专业学生的我，深深受益

于路老师的数学分析课。当时课堂同样爆棚的还有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的音乐课，他讲解中外经典音乐、流行音乐、音乐指挥理论和个人音乐素养，充满了大家之气、人文精神。由于听课的人太多，课堂放在老斋舍食堂，即便空间已很大了，但还有很多同学只能趴在窗户上听课。

在我上过的课程中，需要提前占座位的还有空间物理系的天体物理课、中文系的莎士比亚文学鉴赏课、经济系的经济管理课、哲学系的马列主义与中西比较哲学课等。

最受欢迎的“必修课”，是带着小马扎在梅园操场观看露天电影，每次都是万人空巷。我们先后观看了几十部世界著名的电影，这对了解各国的历史文化、沁润艺术心灵，很有益处。大学四年，我还和同学到湖北美术学院、华中师范学院，选修过武大不开的课程。从以上点滴描述可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武大的“杂糅”和开放，已可见一斑。

回忆武大往事，最亲切的当然还是日后成为自己饭碗的计算机专业。在校四年，计算机系各位领导、任课老师，特别是辅导员朱立胜老师、周兆华老师，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教导，师生情谊历久弥新，终身感激。

入校第一学期我们就开设了必修课“离散数学”(The Discrete Mathematics)，教材是大厚本的英文。我们不少人在中学没有学过英语，我本人高考也没考英语，对这群完全不懂英文的学生来说，教材无疑是天书。教这门课的是李琼章老师，他一边讲解离散数学基础知识，一边耐心教我们专业词汇，千方百计帮我们克服畏难情绪、激发我们对课程的兴趣。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学期过去，同学们英语水平“突飞猛进”，基本上能阅读原文教材了，连同学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了基础，李琼章老师讲起课来就没有了顾虑，挥洒自如、深入浅出、酣畅淋漓。他那思想者般的面相、沉稳笃定的声调、睿智理性的思维，给我们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课堂仪式感，让我们深深体味到了离散数学的抽象之美、逻辑之美、形式化之美，让我们惊叹于，离散数学能用简单的符号系统描述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的离散量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也引发了我们对科学史上

创建相关理论的数学先驱的无比崇敬。这不仅仅是门拿学分的必修课，对刚刚踏入校门的我们更是一块引路石，引导着我们在大学四年，以致更远的将来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在知识荒芜的年代，在面对朦胧世界充满茫然的懵懂年龄，一下子接触到如此高大上的知识，对我们是怎样的一种心灵体验！感谢李琼章老师的启蒙之恩，给予了我们知难而进的勇气。感谢当时学校对课程的合理设置——学了离散数学之后，接下来无论是修理论计算机科学方面的课程，还是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课程，我们都更得心应手了；同时，离散数学本身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有益于日后的学习与待人处世；再就是，一入校就啃下阅读原文教材这块硬骨头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资讯接受能力，大大拓展了我们的阅读范围。

大三时，我又选修了李琼章老师讲授的“可计算性理论”。教材是李琼章老师自己编写的，很薄，言简意赅，阐述如何以最简指令集构建冯·诺依曼机，证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计算装置与冯·诺依曼机的可计算等效性，以及基于冯·诺依曼机型的计算机，哪些是可计算的、哪些是不可计算的，从理论上指出一些看似异想天开实际上可行的事，另一些看似理所当然实际上不可行的事。课程也讨论了有别于冯·诺依曼机的量子计算和生物计算问题，这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科学。课程偏重于认知与哲学，为我们认识世界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在大四，李琼章老师还和其他老师一起指导我的毕业设计和论文撰写。

大学四年，我们还特别得益于曾宪昌老师的教诲。我们踏入武大时，曾老师已是国内计算机界知名教授，他那时刚从国外回来，既有对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理论的权威治学，又有对外部世界计算机发展动态的最新了解。他不但亲自给我们讲授“形式语言与自动机”这门艰深的基础理论课程，还经常举办不同专题的学术讲座。我们从曾宪昌教授那里认识计算机科学的本原，也从他那里了解外部世界，还通过他牵线与国内其他院校的计算机同行进行交流。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曾宪昌老师和李琼章老师还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

大约在 1980 年年底，计算机系 1978 级成立了人工智能小组

(如图)，曾宪昌老师指导该小组的研究，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许多次与我们研讨甚至辩论。记得有一次辩论的主题是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即计算机会不会控制人类。当时有的观点认为这是无稽之谈，现在看起来，还真是一个人类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

前排由左及右：周时阳同学、李琼章老师、曾宪昌老师、杜阿古同学。后排由左及右：谭东风同学、宾晓华同学(笔者)、王长青同学、罗剑波同学、沈齐平同学。

在曾宪昌老师和李琼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完成了机器自动求微积分的研究，并在系里的 CROMENCO 微型计算机上编程实现，毕业设计取得了优异成绩。我们在校时，曾宪昌老师已是白发苍苍。作为知名教授，他能如此关心我们青年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让我们终生难忘。

毕业以后，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武大作为综合性大学的优势。

首先，本系的计算机专业课程齐全，开课水平上乘。武大计算机系脱胎于数学系，有深厚的数学根底，这是一种天然优势。我选

修过齐民友教授的“偏微分方程”，虽然没学好、修过两遍，且两次考试成绩加起来也没过 100 分，但到工作时却派上了用场。毕业后第二年，我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利用偏微分方程改进了苏联科学家创立的一个大气折射修正公式，独立获得 1984 年国防科技三等奖。我上过何炎祥老师讲授的“编译原理”，他讲课生动深刻、入木三分、引人入胜。后来我读研究生时，师从国防科技大学的陈火旺教授，他对武大的编译课程称赞有加，认为武大重视基础理论教学，打通了形式语言、操作系统、计算机原理等知识脉络。

其次，武大文理科专业跨度大，便于拓展学生视野、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大学期间，我和班上不少同学常到空间物理、生物、病毒等其他理科系，以及中文、哲学、法律、经济、外文等文科系蹭课或听讲座，选修当年武大一些知名教授的经典课程，如参加空间物理系关于 UFO 的辩论，听法律系审判“四人帮”的报告会，听中文系的学生竞选演讲，看外文系排演莎士比亚剧，听经济系的股票市场讲座等，这些今天宛若平常的知识，在当年却都是开先河、难得一见的。同学们发自内心的求知欲，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蓬勃向上的大环境大氛围，促使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由于在武大接受的是广谱教育，武大的毕业生具有独特的人文气质，立足社会后与周围环境和人相处比较融洽，认知比较全面，比较有大局观。

转眼毕业已经 40 年。今天的武大办学条件更好了，学科专业设置更宽了，学生知识起点更高了；比起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这批学生的蒙昧和青涩，现在的同学们视野更加开阔宽广、思维更加成熟稳健。相信未来的武大将越来越好，母校永远是我们的骄傲！

作者系计算机科学系 1978 级校友

# 大学读书亦读人

杨厚君

1981年，我进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就读电厂金属专业。大学四年，若以考勤论，我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但是，有些课程我却考了优秀，如政治经济学、断裂力学和电工学等。政治经济学纯属兴趣使然；断裂力学，我觉得这门课程有意思，加上王文安先生上课时声如洪钟，容不得我开小差；电工学，陈邕怀老师的课讲得太好了，撩拨起我的兴味，期末考试不少同学担心挂科，我竟然考了满分。

大四上学期有门课，具体课程名称我忘了，大概是“金属材料与失效分析”，由电厂金属专业的创始人、时任电厂金属教研室主任的林咸成先生和刘尚慈先生合开。林先生讲课一口宁波话，听不太懂，但是课堂之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总体还是比较封闭的，老师也相对传统保守。有一次，我上图书馆，远远望见一对中年夫妇手挽着手在悠闲散步。那时候男女手拉着手还是挺罕见的，我很好奇，加快步伐走近他们，发现是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训珍老师。我本来还有点不好意思，林先生和张老师却很自然地停下脚步和我打招呼，让我有时间上他们家去玩。虽然林先生说的还是宁波话，但这句我听懂了。从那以后，我便常去林先生家串门。

大四上学期快结束时，学习委员通知我们选毕业专题的指导老师，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林先生，请他不要给我出命题作文。林先生开始有点不明白，我解释说：“林老师，我知道您在研究如何提

高磨煤机衬板的耐磨性，我想探讨一下使用爆炸的方法而非传统的方法能否提高衬板的耐磨性。我查过文献，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在这方面有所研究。”林先生对我的想法表示支持，并同意我结束专业实习后到中科院力学所进行调研。林先生这种开放的学术态度正是最让我佩服的地方。

大四上学期快结束时，我临时决定转专业，报考王文安先生的研究生，研究如何延长火电厂高温高压主蒸汽管道的寿命。王先生开始有点担心，因为我要报考的方向对材料力学要求高，而我只短学时学过材料力学。我反问王先生：“如果材料力学我过关了，您录不录我？”“只要你总分和各科都过关，我肯定录。”有了王先生的这句话，我就有信心了。

高等数学和外语政治都是我的长项。短短两个月的复习，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材料力学这门课程。那年考研，高等数学我考了97分的高分，材料力学考了47分涉险过关，因为国家规定的及格线为45分。得知考研成绩后，我第一时间报告王文安先生。王先生也替我高兴，并嘱我认真准备面试。

王文安先生早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他是山东潍坊人，身材高大，一脸严肃，上课时声如洪钟，让人联想到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后来，和先生熟了，他和我讲了“十年浩劫”期间如何拖煤渣、如何保护受难中的常树荫先生的故事。先生身上的凛然正气让我越发肃然起敬，觉得他更像一位梁山好汉了。王先生是一位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他做的课题既有理论深度又紧密结合生产实际，是非常难得的。葛洲坝人字门启闭机的力学计算，他是课题的带头人；当年秦岭电厂转子飞裂，时任电力工业部领导点名要他参与事故原因调查和分析。

王先生的夫人周素真老师早年留苏，两人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堪称教授夫妇中的典范。每次王先生带我出差，周先生必把我和王先生在路途上吃的东西准备好，一人一份。直到现在，每每想起两位老师对我的关心关怀，泪水都会不自觉地滴落下来。

因为我和电力系统联系较密切，自然了解生产实际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在火电厂，异种钢接头频繁出问题，我就想在这方面做点文章。于是我找到焊接专业的章应霖教授，希望读博。章

先生说，焊接专业没有博士点。于是，我壮着胆子去找曾任三峡工程论证施工专家组专家、水工结构工程专业大名鼎鼎的肖焕雄教授，想挂靠在他的名下读博。肖先生问我为什么找他。我说："我想研究的是高温高压金属构件的结构强度，您研究的是水工结构工程，尽管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特殊情况下，风马牛也是可以相及的。"肖先生听我这么一说，竟然爽快地同意了。

因为我的数学功底不错，博士论文我选择用有限差分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技术模拟异种钢焊接接头的碳迁移。章应霖先生一开始并不是很赞同，因为人工神经网络技术最初是为控制技术服务的。但我的性格中有一种固执的成分，认准的事情绝不轻言放弃，我把想法向肖焕雄先生汇报了一次，他鼓励说："技术思路可行。"

读博期间，和肖先生接触并不多，但向肖先生有限的几次请教，却让我受益匪浅。肖先生拥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质，他带出来的学生思维既敏锐又严密，多有见地。

不过，尽管得到了肖先生的鼓励，我的课题进展却并不顺利，一上机计算就不收敛。那段时间，我三天两头往数学教研室陆君安教授家跑。陆君安教授本科在北大物理系学习，后攻数学。有一天，陆先生忽然提醒我："小杨，你是不是忽略了某一个物理条件呢?"陆先生的提醒对我至为关键，加上活度梯度后，一下子就收敛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本科到博士的几位导师真的是各有特点、各怀"绝技"。他们都不给我出题目，同时又都可以帮我排除问题。正如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谈到他的博士生导师王尧先生时说，王先生"不管我怎么读书，怎么选题，只告诉我哪种选择可能是错的"。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老师才能培养出有见地的学生。老师们身上闪耀着的人性的光辉，则是我终身珍惜的最宝贵财富。

所以，上大学，读书固然重要，不过在我看来，读人、尤其是读那些可堪为"大先生"的学者，更重要。

（原载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公众号"我的武大时光"栏目 2022 年 3 月 3 日）

作者系工学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81 级校友

# 珞珈山下岁月有痕

骆　毅

时隔多年，我仍然常常想起当年在珞珈山下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武汉大学教室和梅园寝室的情景。

我与武汉大学的缘分，始于2000年的一个春天。那时，我读高一。落英缤纷之际，全家人兴致勃勃地从汉口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来到武汉大学，只为观赏那久负盛名的武大樱花。

走在开阔的未名湖边，我便被校园的美景和历史建筑所深深吸引。头顶着春光灿烂的和暖阳光，追逐着纷纷飘落的樱花花瓣，享受着游人如织的校园美景。记忆里，漫天纷飞的樱花里，映照着校园里一张张青春的脸颊。

出于对具有深厚办学积淀的文化仰慕，以及对校园樱花的浪漫记忆，我之后在高考志愿书上毫不犹豫地填上了“武汉大学”。入学那一刻，我拿着属于自己的武汉大学学生证，兴奋而自豪。

在梅园六舍的413寝室，我遇到了7位后来有了兄弟情谊的伙伴：一位叫“高斑斑”，来自山东日照，瘦高，话少，自信；一位自称“土匪”，来自江西萍乡，“披头士”装扮——披着染黄的长发，经常昼夜颠倒，记忆力超群；一位绰号“小罗”，来自湖北荆州，爱好广博，成绩优异，尤擅教育史和中国地理；一位被戏称为“王爷”，来自湖北孝昌，瘦小个子，勤奋好学，上课抢座积极；一位绰号“小胡子”，来自江苏宜兴，肤色黝黑，常留一撇小胡子，不善言辞，为人极慷慨；一位自称“鼎鼎哥”，来自湖北广水，身瘦话多，精力过人，擅长数理分析；一位绰号“葛优”，来自广东顺

德，姓葛，名非“优”也，喜欢与人辩论。413 寝室珍贵的友谊在笑声中传递，这笑声来自夜间熄灯后的风趣卧谈，来自携手走在跨校区上课的路上，还来自对彼此并无恶意的种种调侃。

2006 年，在即将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季，我和那位充满着学者风度的室友“小罗”，徒步近 6 个小时穿越黄山西海大峡谷。在荒无人烟的深壑里，我们互相鼓励，搀扶前行。朋友之间的信任和默契，在经历了这次难忘的艰难跋涉后，更显弥足珍贵。

四年校园生活中，令我难忘的不仅有珞珈山下的友谊，还有那里美丽的景色。在武汉大学学习的青葱岁月里，我得以尽享珞珈山的自然景色和人文精神。

在武大人心目中，对于校园似乎没有东南西北的概念。几处被称为“园”的校园布局颇具诗意，弱化了呆板的方位感。四个“园”——“枫园”“梅园”“桂园”“樱园”，皆有代表性植物景观；四个“园”的园中或周边，也都分布着宿舍、食堂和教学楼。这些教学楼，就像是镶嵌在各个园的碧玉，浑然一体，自然妥帖。

若论及建筑与自然完美结合的代表，则当属“樱花城堡”。这里有学校标志性建筑——老图书馆。而“樱花城堡”上的其他建筑，也遵循中西合璧的风格。那蓝绿色琉璃瓦的设计，典雅而不张扬，绝不守旧，也永不过时。这里每一栋楼宇的每一片瓦砾，似乎都和四周环绕的绿树交相辉映——这是和谐的“绿色交响曲”。

美丽的大学，拥有美丽的“四园”。随着四季的变化，它们唱着四首动人的歌：春，樱花在樱园绽放；夏，桂园弥漫着桂香；秋，枫叶将枫园染红；冬，红梅在梅园傲然挺立。每个“园”，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品格，都能彰显自己的意志；每个“园”，也都象征着一种格调，一种气质，一种文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武大的学子们在“四园”间穿梭，驻足，交流，学习，成长。

在很多人心中，武汉大学的美丽无可替代。它一面坐拥珞珈山，一面紧邻东湖，可谓“得山得水”。“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武汉最美的两个景点被武汉大学独占。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文精神，便在这山水之间荡漾开了。它的校园风貌，精神气

质，仿佛永恒伫立在流动的时光隧道中，自信而独立。

我相信，一所大学的气质和精神，既不会限于其所在的地理坐标，也不拘于一座城，而是会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

100 多年前，“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了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弘毅”“自强”也成了武汉大学后来 8 字校训中的一部分。校训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武大人不断拼搏，自立自强。

武汉大学的校风，向来崇尚自由。大学一年级的第一节语文课，老师向我们介绍了武大自由之风的历史，令我印象深刻。后来，随着学习和教育工作经历的日益增长，我对课堂教学应该尊重学生自身兴趣和自由选择的权利也更加理解和看重。

每年秋天，校园的各个角楼，都会响彻院系合唱团排练的歌声——学子们将会在校庆这天奉献一场精彩的“金秋文化节之合唱比赛”。合唱，是武大学生的文化品牌之一。当合唱比赛成为大学的一个文化传统，便成为师生心中一道深刻的文化印记。武大学子毕业时，常常不能忘却的记忆，就是曾经合唱排练的那些日日夜夜。

我曾有幸在学校的多个大型晚会中担任主唱。每次演唱，感觉都不同。我最喜欢的演唱场地便是梅园操场的那个半露天舞台。它是一个半开的舞台，被绿荫环绕着，观众席却是一片延伸到远处的露天场地——这里至今仍是学校的“露天电影院”。在那里唱歌，有一种与大自然对话的奇妙体验。只要留心，时常能听到某个角落传来悦耳的鸟鸣。当然，只要专情，这里也能品到很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各色植物芳香——这大约就是所谓的“鸟语花香”吧！

珞珈山下，曾是一代代青年梦想的诞生之地。时隔多年，我仍然不会忘记，当年在珞珈山下遇到的那些人、发生的那些事。

生命中，永恒驻留的往往更多的是文化、体验，或者感悟、感动等无痕的事物。而这些看似无痕的事物又都是有痕的。它们像一团团火焰，也像一颗颗星辰，在未来一代代青年的心中点燃、激荡、照耀。

（原载《青春期健康》2022 年第 6 期，此处有修改）

作者系电子信息学院 2002 级校友

# 毛泽东主席视察武汉大学始末

秦　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成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文理综合性大学。截至 1958 年 9 月，学校设有哲学、中国语言文学、俄罗斯语言文学、历史、图书馆学、经济、法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合计 11 个系 12 个专业，在校学生 3700 人，教师 450 人，教研组 39 个，图书馆藏有中外文图书 65 万册，各类实验室 90 余个。

1958 年，武汉大学在贯彻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的过程中，进行政治和业务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教学和生产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改革。当时，全校创办的与教学、工农业生产和尖端性学科相联系的，以及为从事劳动锻炼的中小型工厂(车间)、农场已达 100 多个，如钢铁厂、建筑材料厂、化工厂、机器仪器制造厂、电子计算机厂、电工厂、综合农场等。

1958 年 9 月 12 日，毛泽东主席亲临武大视察，在武汉大学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天，毛泽东主席视察了大学生办的工厂，对教育改革做出了指示，在武汉大学大操场前接见了武汉地区四所高校的 13000 余名师生。

## 视 察 工 厂

1958 年 9 月 12 日晚 7 点 20 分，毛主席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

任重，武汉大学校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副校长刘宿贤、张勃川的陪同下，视察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和物理系所办的工厂。

毛主席先后视察了化学系的炼焦厂、电池厂、硫酸厂、硅胶厂、卡普隆厂和锅炉厂，详细询问了工厂的生产情况和工人(即学生)的学习情况。当毛主席走进学生中间时，化学系党总支书记罗鸿运，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学运领导人、中共地下党员握着主席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张勃川向主席介绍："他叫罗鸿运，是化学系的总支书记！"毛主席笑道："好啊，我是来看你的工厂的，你们有多少个工厂？"罗鸿运说："化学系共有 30 多个工厂，请主席看看。"毛主席点点头。

毛主席首先来到了炼焦厂。罗鸿运及副厂长盛蓉生同学向毛主席介绍了工厂的情况。毛主席问："工厂是不是全由同学办的？"盛蓉生回答："除了正厂长是工人外，其余全部是同学。"毛主席接着又问："正厂长是什么工人？"罗鸿运同志说："厂长是煤气工人。""是外边请来的吗？"主席又问。"是我们化学系的煤气工人。"最后在别的同志的催促下，毛主席离开了炼焦厂。

晚上 7 点 40 分，毛主席来到空气电池厂。罗鸿运指着一位扎着短辫、戴着眼镜的文静秀气姑娘向毛主席介绍："这就是厂长，叫徐茜莉。"主席握着徐茜莉的手笑着说："啊，你就是厂长。"徐茜莉连声说："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在两台土机器前停留了很久，随后走到电池厂存放成品的台前，拿起一个空气电池看着，用手指着商标上印着的"国营汉口电池厂"问："这就是你们的厂名吗？"徐茜莉老实回答："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封套，因为来不及印刷，暂用汉口电池厂的，下个月我们就有自己的封套了。"毛主席走到每个工作台旁问道："你们是学生吗？"徐茜莉回答："是的，我们的工人全是一、二、三年级的同学。"毛主席看完空气电池厂，再一次和厂长徐茜莉握手说："谢谢你！"

离开空气电池厂后，毛主席来到硫酸厂。厂长方佑龄赶紧跑上去陪同。罗鸿运向主席介绍了工厂的情况，然后指着方佑龄对毛主席说："这就是厂长。"毛主席问："你们厂里有多少人？"方佑龄回答："15 人。"主席又问："为什么现在只有 4 人呢？"硫酸厂赵春珍

同志回答："还有人在里面。"方佑龄接着说："还有两个工人在里面，其他的人都支援钢铁工业去了。"主席说："这很好！"毛主席转过身来，用慈父般的眼光打量着每一位同学，并与其他三位同学逐一握手。看到方佑龄穿着一件破背心，一条蓝裤子，满身都是灰，毛主席笑着对他说："像一个工人的样子了。"

硅胶厂就在硫酸厂旁边。硅胶厂的同学很早就开始了紧张的劳动：挖地、洗硅胶、晒硅胶、烘硅胶，忙个不停，准备迎接毛主席的到来。毛主席来到厂房外洗硅胶的同学旁边，弯下身子仔细地看，边看边说："这像盐一样"，并问同学们："这是硅胶吗？你们为什么要把水倒掉呢？"刘仰峤说："要把硫酸根离子洗掉。"毛主席站在炉边看着往缸里倒着的一盆一盆硅胶，注视了很久。

毛主席走到了一个梳着短发的姑娘身边，罗鸿运介绍："这是硅胶厂的副厂长谢能詠。"毛主席和她握手并问道："你们工厂有多少工人？"谢能詠马上用湘潭话回答："26 个人。"毛主席笑起来了，又问："你怎么能领导得了？"谢能詠说："同学们一起干，发挥大家力量。"毛主席满意地笑着说："对啊！"又慢慢地说："边学习，边领导。"

毛主席看着柜台上摆着的产品，低下头一个瓶子一个瓶子地指着，并读道："防潮硅胶，吸附硅胶……"并问谢能詠："什么叫做防潮？什么叫做吸附？"谢能詠回答后，又问："为什么叫防潮？"谢能詠说："防潮就是防止潮湿，吸附就是吸收水分。"毛主席接着看防潮硅胶的生产过程。谢能詠介绍说："缸里面是硫酸，上面的是水玻璃，用玻璃棒搅拌，这是土法；现在我们正在搞技术革新，做搅拌器。"毛主席马上接着说："这是土法，土法再改洋法。"然后加重了语气，笑着对身旁的同学们说："对，土洋应结合。"

接着，毛主席朝着用彩色灯泡装饰的化学系工厂系统图走去。毛主席很关心稀有元素的情况，对于中药厂也极有兴趣。当讲解员介绍到活性氧化铝厂时，主席问："什么叫活性氧化铝？与普通氧化铝有什么区别？"厂长曾莉蓉回答："都是氧化铝。"

在走向卡普隆厂的路上，毛主席停下来，转过身来问陪同他的化学系总支书记罗鸿运："你们办这么多的工厂，你是内行还是外

行?”罗鸿运说：“我是外行。”主席意味深长地说道：“外行要变成内行。”罗鸿运说：“我一定要变成内行。”

在卡普隆厂，厂长周法昱同学向毛主席介绍：“以前要花几万元搞设备，现在用土法只花几十元。”主席说：“好！把你们做的卡普隆拿来给我看看。”周法昱说：“现在还没有投入生产，在实验室已经做出来了，没有拿到厂房来。”当时周蒸萱同学正在做木架打洞，主席弯下腰看了看说：“你的手艺还不错。”

毛主席又向物理系工厂区走去，先后视察了物理系的炼铜厂和炼矽钢片厂。

毛主席来到炼铜厂，指着正在生产的冒着熊熊烈火的炉子说：“这是干什么的?”厂长曾广培告诉主席：“那是物理系炼铜厂的一部分——火法炼精铜小组，这个炉子是用来炼精铜的。”毛主席接着又问：“你们炼铜厂还有哪几个部分?”曾广培回答：“我们炼铜厂还有水法炼粗铜和电解炼纯铜两个小组。”毛主席看了看同学们之后又问：“水法炼铜的原理怎样?”张勃川副校长见他们站在炉边太近，就说：“边走边讲，边走边讲。”曾广培边走边说：“水法炼铜的原理是置换反应原理，用矿石与稀硫酸作用，生成硫酸铜，然后加铁屑，铜就被置换出来了。”主席很欣赏地说：“这个办法很好呀！水炼组在什么地方，可以去看看吗?”曾广培说：“当然可以，不过水炼组现在在红安县与当地政府合作建工厂，不在学校里。”毛主席惋惜地说：“哦！原来不在这里。”这时已走到反射炉旁，有两位同学正在操作，毛主席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们两人生产，过了一会指着反射炉说：“这就是炼精铜吗？用什么炼?”曾广培回答说：“是的，我们用粗铜和废铜来炼。”毛主席又问：“粗铜含量是多少？精铜含量又是多少呢?”曾广培不慌不忙地回答：“粗铜含铜量一般是 80%，我们精炼之后达到了 97%、98% 和 99%。”毛主席以惊讶的口吻说：“由 80%炼到 99%，那真不容易呀!”曾广培听到毛主席在表扬他们，便说：“是的，确实不容易！我们是经过尖锐的思想斗争和好几次失败的考验，在党总支的领导与支持下苦干出来的。”毛主席面带笑容用赞扬和勉励的口吻说：“好哇！青年人就是要有志气，要经得起考验，要苦干，要巧干。”

他们边走边谈，在火炉的另一端，张秀鹤同学手里正拿着一块泥做坩锅，看到毛主席走到她身旁并用亲切的眼光看着她时，她马上放下泥坩埚，上前一步叫了一声："毛主席！"毛主席先伸出了右手，张秀鹤同学欢笑地握住了毛主席的手。握手之后继续前进，刚走两步，毛主席又停下来问曾广培："你们的电解炼铜组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可以去看看吗？"曾广培回答："我们电解组还没有生产，只做了实验。"毛主席又问："实验室在什么地方？"曾广培回答："在图书馆侧面文学院普通物理实验室。"毛主席遗憾地说："喔！原来也不在这里。"

快要到炼矽钢片厂的炉子了，毛主席指着前面的炉子说："那是干什么的？"曾广培说："那就是炼矽钢的。"毛主席看过物理系的矽钢片厂后，已经连续参观了七八个工厂，显得有些累了，两位副校长便请主席离开。

## 接见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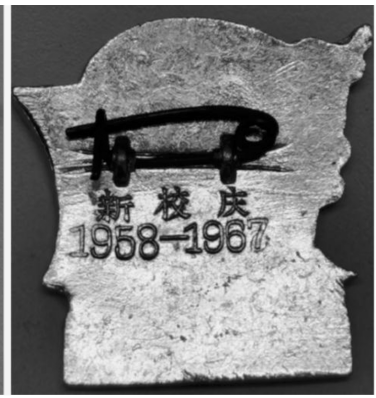
晚上7点50分，毛主席来到武汉大学大操场前，与在此等候的武汉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后改名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2000年并入武汉大学）、武汉水利学院（后改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大学，2000年并入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学院（现中南民族大学）四所高校的13000余名师生员工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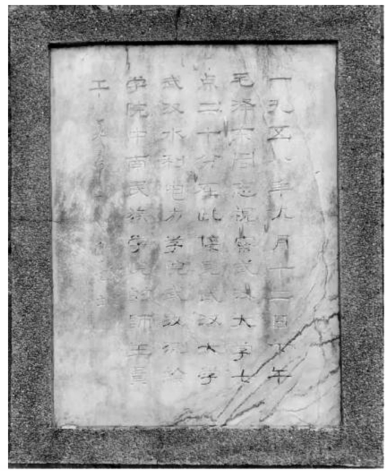
毛主席在主席台上接见了武汉大学副校长何定华，武汉水利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张如屏，武汉水利学院副院长张瑞瑾，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党委书记毛远耀、副院长陈永龄，中南民族学院院长、党委书记白瑞西，副院长严学窘等负责同志，然后走到主席台的中央，频频向广大师生招手、微笑。接着又走向台前的左边和右边，站立片刻，一再向大家挥手致意。

晚上7时55分，毛主席离开大操场，并驱车离开了珞珈山。

为了纪念这一光辉日子，武汉大学把毛主席接见师生的操场定名为9·12操场；1958—1967年，学校使用印有毛主席像和"9·12"字样的校徽；1983年，学校领导决定在毛主席接见师生的

“9·12”操场前勒石纪念。



勒石上的文字：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同志视察武汉大学。七点二十分在此接见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的师生员工。一九八三年于武汉大学立

作者系信息管理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校友

# 珞珈文苑

# 清平乐·忆珞珈樱

陈　卫

东湖春早，日出波光淼。
总是疏枝栖宿鸟，梅谢樱红刚好。

青灰屋顶萧萧，登台却望遥遥。
粉黛如云飘落，心留寒气童髫。

作者系中文系 1995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 早　樱

陈　勇

好比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醒的樱花
得以贪吃率先来投的那一缕春光

珞珈山的樱花有不一样的轮回
随意绽放的动作，都能找到声母和韵脚

被阳光碰响的闹钟，用超声波
弹奏早樱最敏感的花蕊，像读着一封情书

深呼吸，吐出一个花瓣，再吐出一个
粉嫩的红晕，直达早恋的白云，再也不想散去

作者系中文系1985级校友

# 望海潮·武汉大学

丁海军

珞珈苍翠，东湖浩渺，凭阑极目殊佳。仙阁丽台，雕梁画栋，可怜美玉无瑕。鸿雁落平沙，锦云笼桂岭，七彩烟霞。四季芬芳，春引万户赏樱花。百年武大风华，聚山灵水秀，地杰人嘉。弘毅拓新，求真自强，几多泰斗名家。前辈泽新芽，文脉恒承启，四海皆夸。母校情深难忘，纵学子天涯。

作者系新闻与传播学院1997级校友

# 母亲——武汉

范　江

想看看武汉，
心装着武汉，
因为武汉是母亲，
乳房是珞珈山。
我们受其三年的哺育，
一个个为未来的人生，
打牢了基础，
铸就了肝胆。

呵！我的同学们呀，
日后有的成了专家、学者，
有的成了富豪、高官，
即便是普通工作者，
也有一份自信、高尚在心间，
因为我们是武大学子，
都会有份正直、俊雅，
甘于奉献在心田。

想看看武汉，
心装着武汉，
因为武汉是母亲，

我们从这里走向地北天南。
樱花的灿烂桂花的香甜，
让我们永存善良和美好，
琴台的知音江水的浩瀚，
让我们常思互助心向高远。

呵，我的同学们呀，
坐车路过时我们脸贴紧车窗，
乘机飞过时我们低头俯瞰。
不管我们走出多久多远，
我们成长的根在这里，
不管我们的事业有多辉煌，
我们进步的源在这里，
我们有多少话要说
有多少情要谈。

想看看武汉，
心装着武汉，
武汉变得越来越美了，
我们也跟着美呀，
武汉变得越来越富了，
我们也跟着甜。
我们把汗水洒在了外地，
这也是对母爱的回报，
因为武汉的宏愿，
是美化祖国的万水千山。

想看看武汉，
心装着武汉，
当有机会时，
我们一定会回来，

与花草树木握握手，
与大桥楼宇贴贴脸，
然后站成一排，
喊一声“母亲——”
但愿都不要泪水涟涟！

注：受江中联同学发布的武汉壮美的市貌录像和她的“给同学们看看今天的武汉、相信同学们都心装着武汉”这句话的触动而作。

作者系中文系 1975 级校友

# 一剪梅·鲲鹏广场

刘怀俊

冥北鲲鹏落此间，沉静千年，灵睿博渊。
轻舒金翅九霄旋，击浪滔天，鸣振人寰。
鸟瞰珞珈智慧园，典海籍山，师圣学贤。
精培俊彦百十千，立地擎天，梁栋扛肩。

作者系数学系 1952 级校友

# 七绝·信息管理学院九十华诞感怀

李金庆

回首昙花林筚路，
先贤璀璨耀中西。
后学驽钝当勤勉，
图苑文华不落旗。

（2010 年 10 月 9 日回校参加院庆时作）

作者系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专业 1980 级校友

# 秋之珞珈

李立屏

每年十月，珞珈山最先醉的
总是桂花
然后才是银杏、枫、梧桐树
而我，和老斋舍的红窗户
这么多年来，就一直没有醒过
梅也要到深冬才迟迟
笑一次

无论朝霞薄雾，还是夕阳暮霭
这里的一年四季
都宛如仙境
她身体里的樱花，是短暂、凄美的
但她孕育出的秋天很长
长到连黄鹂路过
也心心念念，久久不忘

作者系日语系 1983 级校友

# 在珞珈山

李　浔

许多事都和家乡无关
譬如，在武大读外语的女孩
还有漂洋过海的樱花树
她们都有秘而不宣的心思。
走在这样的樱花大道上
还是说说三月的单词吧
青葱。洁白。这是一个连续性的赞美词。
有樱花树的地方，女人都有一双纤细的手，
挑三拣四，总是在寻找美的来历。

我是个粗心的人，一片二片三片
我还没有集中精力，它就开了。
美，可不可以依靠？美会不会长大？
美女的手始终承受不起这么沉重的问题。

樱花树开着白白的花、结满了小小的果、说着小小的秘密，
谁还有秘密？可惜口太小，说不出太大的往事。
可惜，我是个慢热的人
一片二片三片，我刚喜欢上它，它已走了。

我曾看见的朗朗上口的外语系女生
已在樱花树下悄悄长大。

作者系中文系 1988 级校友

# 最美校园，我们的武大

李远谋

你的美
绝对是一见倾心
再见沦陷，一生一世

如果让我，选择一个
最喜欢的季节回来
我会不知所措
因为我爱你的春、夏、秋、冬
如果再问，想最先走近哪里
我同样茫然
因为我想亲近你的全部

春天的樱花大道
那是全世界的最爱
美若天仙的樱花树
让三月的母校，一夜之间
成为国人争相幽约的情人

三月的武大是读不了书的
那纷纷飘洒的樱花雨
落满衣襟，落满地下

也落得我的心扉纷乱如麻
多想能将一朵洁白的花儿
插到樱花城堡里的一位公主头上

夏天的酷热算不得什么
校园古木参天，绿荫如盖
如果还不能消解你的心烦神躁
去鉴湖边走走吧
那里的一池莲花正灼灼夭夭
兴许你能想起徐志摩的“沙扬娜拉”

仲夏夜更是迷人
作业做完可去情人坡吹吹风
但小心不要踩到树丛后的双双对对
如果一时没有合适的人牵手
换个地方去凌波门栈桥吧
那里的一湖星月也足慰情思

武大的秋天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大学
它是一个童话
迎着丽日蓝天，踏一地软软的
银杏、梧桐、枫香的金黄落叶
你像不像童话里的公主或者王子

至于樱花道、文体路、桂园、枫园
以至整个东湖之畔、珞珈山脉
那无与伦比的秋色之美
我实在无力描绘
只好请你去凡·高的秋天里领略了

如果你不小心错过了秋天

冬天的童话也会接着上映
每年，某个你猜不到的冬夜
一位绝美的天仙会悄悄降临珞珈山
皓腕环约，将玉龙鳞甲遍洒校园
于是，早晨的武大
一片雪国

你可能会拉起女友奔向梅园
这时的梅园操场不会有露天电影
在疏影横斜的梅园映上双双雪人吧
让静默的石刻和傲雪的红梅见证你
爱情美好，恒久

又一个早晨，冰雪初融
校园屋顶露出它独有的孔雀蓝
飞檐翘角，蓝光点点
犹如无数只孔雀，或者凤凰
藏浮于珞珈山中
是传说中的凤鸣岐山吗
是现实中的有凤来仪吗
我能告诉你的是
我们的武大，最美的校园

作者系工学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80级校友

# 白头堪比樱花秀

龙育群

再回珞珈，匆匆四十三年过去。

耐不住同学索句，便有了如下无牌长短句数行：

四十三年，梦中犹记，珞珈山中驻。再登临处，落樱委地，树呈新绿。想当年，倚窗夜读，方困顿时，一束早樱舔袖。便欣然，焚膏继晷，三更无休。而今老矣，不敢倚窗，怕把樱花嗅。却与相邀，趁芳菲落尽，重走樱花路。纵使落樱无觅，少年依旧，万绿丛中，白头堪比樱花秀！

作者系哲学系1978级校友

# 观展感赋

陶佳珞

5月18日，《万里千年——敦煌石窟考古特展》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隆重开幕，百余件珍贵展品犹如视觉盛宴。余两次观展，沉浸其中，大饱眼福。

珞珈山下看敦煌
万里千年一馆藏
瑰宝匠心观者叹
佛光艺脉传人扬
黄沙难掩神奇貌
妙手勤书绚丽章
石窟无声惊举世
沧桑续写史悠长

作者系中文系1984级研究生校友

# 总有一朵红梅，是你的心事

吴根友

满目萧瑟肃杀的冬日
一树含苞的红梅
几朵先开的花瓣
让眼睛升起暖意

我想这时的你们
大约与我相似
身体与心思
都裹着厚重的棉服
正如这无力的夕阳
被裹在墨色的丛林

总有一朵红梅，是你的心事
除非你没有一丁点意愿
准备在明年的春天重启

厚重的棉服裹得住身体
从来裹不住跳动的心思
萧瑟的寒风吹光了树叶
吹不尽大地丝丝的暖气

这一树又一树的红梅
总有一朵，是你的心事

作者系哲学系1989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 浣 溪 沙

王新才

半是樱花半是云，半山飞雪上枝匀。半看春色半行人。
春到人间方一半，人来花下尽天真。半边月上夜时分。

作者系图书馆学专业1981级校友

# 美 人 樱

张彩雯

你迫不及待地盛开
吸引着我
马不停蹄地赶来
我们共赴
一场风雨过后的约会

阳光正好 温度正好
时间也选得刚刚地好
似乎一切
都显得那么的圆满
你灿如朝霞的模样
是早春的珞珈
最美的风景

三三两两的游人
都是像我一样
来珞珈山
与美人樱约会的
珞珈樱花的痴迷者吗

在珞珈城堡里
美人樱，该是多少美人寄寓的化身？

作者系图书馆学专业1986级校友

# 珞樱朵朵我愿做其中一朵

陈　敏

珞珈山下，这一季的樱花又谢了。

时隔五年，我本想着终于能回母校去看心心念念的珞樱了，却因疫情之下的封校没能成行。前几天听闻樱落的消息，我忽然感到深深的遗憾，怀念起读书时漫步樱花树下细听樱语的时光了。

好友说“分外想念樱花”，我说“樱花也想念你”。作为曾在校园里看过四季樱花的武大人，想念樱花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了，并不是某一个人独有的情愫。或许，从离开校园那一刻起，想念樱花便成了武大人一生的念想；而母校的樱花，想必也时刻想念着树下洋溢着青春的欢笑，想念着每一位如花的少年。

在校就读时，武大“樱花节”的名头就已很盛大，每到樱花盛开，如织的游客就蜂拥着慕名前来，樱花大道上人流摩肩接踵，偌大的校园俨然成了武汉市最著名的景点。白天的樱花树下，永远是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到武大来看一场人海，是每一朵樱花的梦想”是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

那时候，我最爱在夜晚的灯光中从樱花树下走过，聆听夜樱细碎的梦呓。夜晚的校园很幽静，全然没有了白天的喧闹，樱朵儿静静地像熟睡了的婴儿的面颊；也只有在夜晚，樱花才是独属于武大人的——如朋友，如恋人。

在夜幕的掩蔽和灯光的映衬下，夜樱有一种别样的美。白樱皎皎，绿樱袅袅，粉樱窈窈，像一群遗世独立的仙姝，随意舒展她们的身体，恣肆绽放她们的心意。夜风来袭，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

飞舞的花瓣使人迷醉。站在樱花树下的我，仿佛化作彩蝶置身花间了，伴着风嬉戏、逐着花轻舞，所有的倦意都一股脑地散去了。

我还爱看清晨的樱花。这时朝阳还未升起，沾着晨露的花瓣有些许湿重，微微蜷缩起来，被一层薄薄的轻雾笼罩着，好一副将醒未醒、睡眼惺忪的娇俏模样。树下，落了一夜的花瓣，将樱花城堡下的水泥路和石阶铺成了粉白色的花径，让人不忍踏足，不愿破坏这“花径不曾缘客扫”的唯美意境。

微雨中的樱花也是极美的。不必撑伞去避，在烟雨蒙蒙中，自有“沾衣欲湿樱花雨”的妙趣。但相比之下，我更爱在樱落时分，看一场自然而然的樱花雨，听着那首印入脑海的《合照》——落英缤纷，我的灵魂，和着节奏，穿梭行走，幻觉爱上这花瓣……

在我的印象中，每年最早开放的，是珞珈山路校医院一侧的云南樱花，也叫早樱，是繁密的重瓣花朵，花色红艳；而广受大家喜爱的，是樱园、樱花大道、人文馆至行政楼一带的东京樱花和山樱花，都是娇小的单瓣花朵，花色以粉白、粉红、白色为主，还有几株是淡绿的。我最爱看那几株绿樱，第一眼便爱上了，觉得它们美得不可方物。

母校也有晚樱，工学部的路边就有不少。晚樱和早樱一样，重瓣的花朵多了一丝雍容华贵，却少了那份清瘦的风骨和灵秀。我独喜“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境地，就像工学部图书馆背后的那株老樱，很少人知道，更无游客光临；她就静静地站在那里，在图书馆传出的朗朗书声中茕茕孑立、自开自谢，她的花香和书香一起深深地融入了我的心里。如果可以，我愿化作一朵樱花，长在这株老樱之上。

这一季的珞樱虽没有依心愿亲临其中，却在线上直播的“云赏樱”中欣赏到了，并在朋友圈里赋得一首《云赏春樱》：

云赏春樱花想人，春风送客到江城。
料得今朝樱语时，恋我昔年亭亭影。

作者系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12 级校友

# 爱情原本的样子

珈　言

上班路上经常碰到一对散步的老人，一样的节奏，一样的步调，画面温馨和谐。他们是儿子发小的爷爷奶奶，爷爷 87 岁，奶奶 82 岁，儿子上幼儿园时我就认识他们了。20 多年过去，如今他们的孙子都有孩子了，他们却依然是那时模样，岁月对他们好像格外厚待、眷顾，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太多的烙印和痕迹：他们依然身板硬朗、步伐稳健，脸上多了的是岁月洗礼后的淡定、从容。我不知道他们受过何种教育，但分明地，他们脸上呈现的是一种知性的书卷气。应该是钟灵毓秀的珞珈山，赋予他们这特有的气质和容颜吧。

原来，时间的长河中竟然有“老了岁月，他们却依然故我”的奇迹。

第一次遇到两位老人时我很激动，毕竟好多年没见面了，忙上前介绍自己，奶奶很开心地与我闲聊起来；我也与爷爷打了招呼，他却并不回答我的问候，仿佛没听见似的。

“他耳背，听不见你说话。”奶奶解释。

之后，就不断地与他们在珞珈山的环山路上相遇了，因为年轻时就认识，觉得特别亲切，总是老远就想着上前问候，照例是奶奶回答我，爷爷则静静地站在一边；再之后，我知道自己的问候打扰了他们的二人世界，也就只点头示意或干脆从旁边绕着走了。

一次，走在他们后面不远处的我分明听到爷爷奶奶在交谈着，奶奶的声音很轻，照理耳背的爷爷是听不见的，可他们确实是有问

有答地在聊着天。看来，爷爷只是听不见外界的声音罢了；或许只是不想听到外界的声音——那些声音都与他无关了，他全部的听觉能力都留给了奶奶；抑或他的听觉只对奶奶的声线有感觉，他只保留了听见奶奶声音的能力，他以这样一种姿态向全世界宣告：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久经洗礼的他，心里只剩下她，也只有她了：十里春风不如她——她就是他的阳光，就是他的全世界！

他们步调一致、默契十足、悠闲自我、不紧不慢地散步的画面总强烈地吸引着我，尽管知道自己上前问候一定会打扰到他们，还是忍不住跟奶奶说，希望给他们拍张合影——想着把这相亲相爱的美好瞬间留存下来，发给他们的孩子。

“不用了，谢谢！”奶奶礼貌却又坚决地拒绝了我。

或许，对于他们，这就是生活的常态，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不需要外人围观和打扰，也不需要刻意留存；他们只想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享受着彼此的温暖和幸福，安静而优雅地老去。

他们不再需要从全世界路过，因为全世界就在他们心里。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从第一次牵手到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雪雨之后，他们仍然牵着彼此的手，仍能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自己，这就是人生最平实的幸福吧。也许，他们的眼睛不再如年轻时明媚清亮；也许，他们的身姿不再如年轻时挺拔矫健，但他们在对方的眼里、心里，仍然是最美的存在。

变化的是珞珈山春夏秋冬四季的风景，不变的是两位老人徜徉于珞珈山舒缓稳健的步伐；明媚阳光中是老人们渐行渐远的背影——这才是珞珈山最美的风景，胜过缤纷似雪的樱花，金黄璀璨的桂花，暗香浮动的梅花。

年轻时追随你浪迹天涯，年老后陪伴你卧赏夕阳，携手并肩，一起看这繁华而温暖的人间。你在他（她）心里永远是初见时的模样。

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你在，我在，便是最美最好时光。

或许，这就是爱情原本的样子！

作者系中文系 1983 级校友

# 《武大校友通讯》捐订名录

——(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 | |
|---|---|
| 李金庆 | 200 元 |
| 关育华 | 300 元 |
| 余传隆 | 300 元 |
| 孔令仁 | 900 元 |
| 谭任杰 | 1000 元 |

# 征订征稿启示

《武大校友通讯》由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辑，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沟通信息、联络感情的纽带和桥梁，是广大校友共同的精神家园。刊物宗旨：传播母校信息，展示校友风采，联络校友感情，弘扬珞珈精神。

《武大校友通讯》每年出版一辑，栏目分为：卷首语、特别报道、珞珈风采、珞珈记忆及校友文苑等；每年还会根据校友活动及来稿的特殊性增加相应栏目。《武大校友通讯》以回忆文章和校史资料为主，偏重于校友对学校生活、昔日老师和同学的回忆，对学校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回忆。正因如此，《武大校友通讯》已成为史料价值高、值得收藏的校友读物。

《武大校友通讯》是校友自己的出版物，办好它需要充足的经费。我们借鉴兄弟院校的经验，采取校友捐资订阅的办法。《武大校友通讯》每辑工本费人民币 48 元。捐订者可直接向校友总会办公室订阅，《武大校友通讯》将刊登订阅和捐赠校友名单。捐订款请汇寄至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邮政编码：430072，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299 号；收款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洪山支行，账号：17038201040007536，收款人：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为办好《武大校友通讯》，欢迎海内外校友踊跃投稿。来稿形式不拘，以真实、原创、传播正能量为原则，内容要与母校、校友活动、校友生活相联系，由于篇幅所限，来稿一般不超过 5000 字，图片不超过两张；各地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校友事迹的文章，

也恳请积极推荐。

稿件请寄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武大校友通讯》编辑部收。投稿电子邮箱：aaoff@ whu.edu.cn。

《武大校友通讯》编辑部

2022 年 12 月

# 关于进行校友信息系统认证的通知

亲爱的 WHUer：

您好！武汉大学校友信息系统是武大人的掌上校友之“珈”，欢迎广大校友注册认证。

校友信息系统现已具备校友多途径身份认证、智能自动匹配组织(地方校友会、行业校友会、院系校友会、年级校友会)、校友卡、校友活动、赏樱预约、校友投票、校友问卷、个人信息管理、校友学苑、校友刊物、校友福利、校友捐赠、校友咨询、智能会务系统、留言板等基本功能。

一旦通过校友身份认证，即可自动加入与你同城、同行业、同年级、同院系的校友组织，与同窗、校友、母校建立起终身联系，还能畅享各类校友福利，参与各类校友活动。

加入步骤：

1. 校友身份认证：

①关注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四海为珈-校友认证”即可进入到认证页面。

②直接扫码认证：

2. 在手机上下载安装钉钉 APP。

3. 用身份认证时填写的手机号码注册登录钉钉，点击最下方菜单栏第 3 个图标，即可进入武汉大学校友信息系统。

认证温馨提示：

校友可通过三种途径进行认证，即证件认证、学籍认证、上传附件认证。如您证件认证没通过，有可能是您毕业时档案数据库未采集到您的身份证或护照信息，请您进行下一步学籍认证，学籍信息中五项填对四项即可认证成功；万一证件认证、学籍认证均失败，可能是档案库缺失您的数据，您也可以采取上传附件进行认证，管理员进行人工审核。

咨询邮箱：xyxxxt@ whu.edu.cn。